



领导干部读 群书治要

刘余莉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3卷 / 刘余莉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4 (2022.1重印)
ISBN 978-7-201-17031-2

I. ①领… II. ①刘… III. ①政书—中国—唐代 ②《群书治要》—通俗读物 IV. ①D691.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8437号

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

LINGDAO GANBU DU QUNSHUZHIYAO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网 购 电 话 (022) 23332469

电 子 信 箱 reader@tjrmcbs.com

责 任 编 辑 郑 玥

特 约 编 辑 王佳欢 王 珝 王 倩

封 面 设 计 张 敏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72

字 数 929千字

版次印次 2021年4月第1版 2022年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168.00元 (全3卷)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图 书 如 出 现 印 装 质 量 问 题 , 请 致 电 联 系 调 换 (022-23332469)

《群书治要》与百年大党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的格局出现了微妙变动。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将要走向何方，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走下去，表达了较之以往更为浓厚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里面仍然裹挟着大量批判和质疑，但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西方社会也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中国成功背后的答案。

与西方社会表现出的困惑不同，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根本制度，是能够确保我们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读懂中国，首先应该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蕴藏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中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气质。这不仅要立足当下的伟大实践，也要深入孕育中国共产党成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略其生生不息且日新又新的古老智慧。

“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

好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所蕴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气质的最佳体现。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本思想，可以更好理解百年大党初心使命的历史文化渊源，也可以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牢记使命提供历史借鉴。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经史子集浩如烟海，百家理论众说纷纭，要从诸多经典中迅速领略其思想精华，实属不易。幸有《群书治要》重现于世，可使读者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群书治要》的成书、内容及历史影响

《群书治要》由唐太宗于贞观之初下令编辑。鉴于前隋灭亡之失，唐太宗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千方百计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于是令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繁择精，从唐朝之前的典籍中撷取了六经、四史和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编纂了约五十万字的《群书治要》。魏徵在序文中称之“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

唐太宗读《群书治要》后，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他认为此书广博而切要，特令缮写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

由于唐朝雕版印刷尚未发达，《群书治要》又主要存于宫中，流传不广，加之战乱，传至南宋只剩十卷残帙。《宋史·艺文志》尚有著录，《元史》已不见记载，至此，《群书治要》在中国亡佚。所幸《群书治要》被“遣唐使”带到日本，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更成为日本人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日本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中指出：日本承和、贞观年间（约834—876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

荣的盛世局面，应该就是讲学研读这部书所成就的。

《群书治要》摘录的原著有些在五代之后便已失传，唯有在《群书治要》中保留了其精华内容，如《尸子》《申子》《桓子新论》《崔寔政论》《昌言》《典论》《刘廙政论》《蒋子万机论》《政要论》《体论》《时务论》《典语》《傅子》《袁子正书》等，这更使得《群书治要》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岛田翰在《汉籍善本考》中称叹金泽本《群书治要》时说：“笔精墨妙，光耀日月，数百岁下，俾人凛然生敬也。顾亦继今而后之君子，苟有拜秘府之藏也读斯书也，则必有思所以斯书之存于今者，感极而泣若予者矣！而唐士之人读斯书，则其尊崇威敬之心，其有不油然而生者耶？”

诚如其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发表新年贺词时，在办公室书架的显著位置摆放的正是大部头的《群书治要》。据统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的用典来自《群书治要》的就有82条。不仅如此，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提法、新命题也都可以从《群书治要》中找到其思想渊源。

例如：《群书治要》中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贾子》），“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六韬》），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更好地承担起对人民的责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群书治要》中的“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礼记》），“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政要论》），“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傅子》），证

明了“打铁必须自身硬”是来自历史经验的重要论断。

《群书治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傅子》），“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周书》），对于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群书治要》中的“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管子》），“古之所与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汉书五》），“负且乘，致寇至”（《周易》），有助于领导干部深刻地理解“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道理。

《群书治要》中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获弗亡”（《尚书》），“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奢。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政要论》），“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汉书》），“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晋书上》），有助于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性。

《群书治要》中的“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贤者亡”（《孙卿子》），“制爵必俟有德，班禄必施有功”（《典语》），“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赐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昌言》），“有大善者，必问孰进之；有大过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赏罚焉，且以观贤不肖也”（《尸子》），对于理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群书治要》中的“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典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傅子》），“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盐铁论》),有助于坚定我们党反对腐败、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坚持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由此可见,《群书治要》不仅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理论基础,也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泉。这是因为《群书治要》所记载的是古人关于“道”的整全认识。孔子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抑或是处理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人形成了关于“治国之道”的庞大而又严谨的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与此一脉相承,全面体现了古人治国之道的精髓。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群书治要·尚书》记载,禹王的孙子、启的儿子太康,身居帝位,却不务朝政,放纵情欲而没有节制,百姓对他非常怨恨,但他还不知反省。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打猎,打了百余天都不回京都,国民怨声载道,有穷国的国王(即后羿)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回国。太康的五个弟弟埋怨太康不理朝政而使国家陷入困境,分别作了一首诗来劝诫太康。其中,第一个弟弟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麋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弗敬?”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能够战胜我。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该在尚未显露时就有所谋划。我面临亿万民众,危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驶六匹马拉的马车。作为民众的君主,怎么能够不谨慎恭敬呢?

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关于人民是社稷之本,《群书治要·孙卿子》中也有论述:身为执政者,拥有国

家而不能爱民、利民，却期求人民亲附自己、爱戴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人民不亲附、不爱戴，而期求人民为己所用、为己效死，这也是不可能的；人民不能为己所用、为己效死，而期求兵力强劲、城池坚固，也是不可能的；兵力不强劲，城池不坚固，而期求敌人不来侵犯，也是不可能的；敌兵来了而期求没有危险，不被削弱、不被灭亡，同样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君要想国家富强、稳固、安乐，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对于人民的态度。如果想使下属亲附、人民团结，就不如反省一下自己政事办得如何。由此，荀子强调了一国之君“爱民而安”的道理。这也正如《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中所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群书治要·魏志下》记载：夏商周历经数十世才衰败，而秦朝两世就衰亡了，原因在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和天下的人民同甘共苦。而秦始皇独裁专制，压迫百姓，所以一旦倾覆、遇到危难，也没有人去拯救他。由此可见：“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可见，在位者、执政者对待人民、百姓的态度与其基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密切关系。《六韬》中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疼爱自己的儿女、兄长友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

在位者对人民的态度与人民对在位者的态度如响之应声、影之随行一样自然而然。《群书治要·管子》中讲道：“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反之，“人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因此，如果国君不能使人民安乐，则人民就不会为其分忧。如果国君不让人民安居乐业，则人民也不会为他效死。这说明，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深得百姓的拥护，在位者必须能安其民、爱其民。

“劝之使谏，宣之使言”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

中国古圣先王很早就认识到，要实现社会大治、国泰民安，在位者就必须保证听到人民的呼声，使下情上达。《群书治要·潜夫论》中讲：“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为此，古圣先王设立了各种制度，以便听取人民的谏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群书治要·汉书五》记载：“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古圣先王采取的制度，是史官在前记载君主的过失，乐工诵读规劝的谏言，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事，商旅之人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议论朝政，这样国君方能听到他的过失，见义则从，加以修正。这些劝谏制度的制定，都是为了使民情上达，民心安定。《群书治要·后汉书三》中亦记载杨震所言：“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杨震之语道出了古圣先王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于不仅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甚至听到百姓的怨骂，都会洗耳恭听，真诚接受，真正做到了广泛听取百姓的意见、全面细致地体察民情。这样广开言路，才能洞察隐忧，做到兼听则明，不被蒙蔽。

《群书治要·史记上》记载，周厉王即位后，贪图财利，亲近佞臣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耐心向他劝谏，然而周厉王却拒不接受，仍任荣夷公为卿士，主管国事。由于厉王“暴虐侈傲”，人民怨声载道。当时召公劝谏说，人民已经不堪忍受他的政令了。厉王不但没有反省自己，反而找来卫国巫师，让他监察人民，凡巫师上告有谁指责他的过失，就将那人处死。于是，“其谤鲜矣，诸侯不朝。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眄而已”。厉王为自己的威势得意，告诉召公：“我能止息人民的指责，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召公告诉他，这并不是人民不敢说

话，而是把人民的口堵住了而已，并警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但是周厉王仍然听不进劝谏。三年后，厉王终于遭到了国人的共同讨伐。这一典故告诫为政者要善于通过各种渠道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民众的正当诉求。

历史上但凡贤明的君主，无不主动求取谏言、集思广益。《群书治要·新序》记载，齐桓公去拜访小臣稷，一天当中拜访三次，都没有见到。随从人员就说：“万乘之主见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则曰：“不然。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纵然这位先生轻视官爵俸禄，我怎敢轻视成就霸业之道呢？直到第五次拜访时，桓公才见到小臣稷。人们听到后都说：桓公对布衣之士尚且如此尊敬，何况对于诸侯国君呢？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充分理解与继承，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将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改革开放后，协商民主贯穿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覆盖政党、人大、政府、社会等各领域，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等全面铺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这就使得各级、各党、各社会群体、各方面民众的意愿都能通过适当渠道得以充分表达，更好地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了人民合法权益。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上深具信心，要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这种自信归根结底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在这

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之下，父与子、夫与妇，乃至兄弟、朋友、君民、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在这种“一体”的思维方式下，在位者对人民应尽到“君亲师”的责任，做到“率先垂范”“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民胞物与”，而人民对在位者的回报则是“不令而行”、感恩戴德。君（领导者）与民（被领导者）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而是相互爱护、相互感恩、互助合作、各尽其责。可以说，也正是这种“一体之仁”的深厚传统文化基因，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总之，从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及实现初心和使命的制度建设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入学习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群书治要》，古镜今鉴，古为今用，有助于人们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牢记使命。

为了让这一治世经典更好地惠及当代领导干部，笔者结合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领导工作的特点，对《群书治要》中的经典章句进行了细致讲解，并在此基础上整理成《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一书。相信这套书对于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心理素质、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对于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乃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坚实根基和深厚土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就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这套书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历史渊源、独特创造、价值理念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讲解和梳理。阅读这部典籍，可以帮助领导干部深入认识和正确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条件。

刘余莉

2021年4月

目 录

第一讲 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 / 001

- 学习《群书治要》的意义 / 002
- 《群书治要》的编纂起因 / 003
- 《群书治要》的内容 / 010
- 《群书治要》的历史贡献 / 010
- 《群书治要》的流通过程 / 012
- 如何学习《群书治要》 / 014

第二讲 修身是成为卓越领导者的基本功 / 020

- 修身从戒贪做起 / 021
- “五伦”大道 / 023
- “五常八德” / 029
- 奢靡之害 / 030

第三讲 在德行和学问上扎根 / 033

- 孝敬仁义是立身的根本 / 034
- 发展经济、科技的中庸之道 / 040
- 企业如何长久发展 / 040

第四讲 利令智昏 / 042

- 厉公正谤 / 044
- 修身为治国之本 / 046
- 修身始于戒贪 / 046
- 防民之口，甚于防水 / 052
- 教学为先乃盛世之因 / 053

第五讲 养心莫善于寡欲 / 054

- 戒慎视听，提升心性 / 055
- 戒色戒淫，修身养性 / 057
- 德音雅乐，调养生息 / 058
- 涵养口德，净守本心 / 059
-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 060
- 拒贪财宝，克己守正 / 061

第六讲 远离酒色声乐 / 064

- 五子之歌 / 065
- 英雄一定能过美人关 / 067
- 饮酒的过患 / 069
- 靡靡之音的危害 / 072

第七讲 治理国家要以道德为上 / 078

- 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 / 079
- 唐太宗崇尚俭朴 / 082
- 居高位而务于道德 / 084

第八讲 好名之患 / 088

- 领导者爱好虚名的祸患 / 089
- 学习传统文化要身体力行 / 090

好名的表现 / 094

第九讲 节欲者安 / 098

欲是深渊 / 099

弃农从商令人忧 / 100

节欲而富民 / 105

俭者节欲 / 106

第十讲 官者要有仁爱之心 / 110

禁令不明的原因 / 112

好的制度需要好人推行 / 114

道德教育治理人心 / 116

法治德治相结合 / 117

道德教育是首要 / 119

恩及刑人，仁恕树德 / 120

第十一讲 仁义道德好于功利强权 / 123

刑罚积则民怨背 / 124

西方民主选举的弊端 / 128

王道文化与霸道文化 / 134

第十二讲 不因私怒而损害国家公义 / 137

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 / 138

三人行，必得我师 / 143

有过不改是真正的过错 / 148

能改过者为真英雄 / 148

第十三讲 知过改过 / 150

圣王知过的机制 / 151

有过不改的四个原因 / 155

第十四讲 改恶迁善 / 160

乐知其恶者难，以恶告人者难 / 161

恩义源于孝亲 / 165

第十五讲 敬身为大 / 171

敬妻有道 / 173

教子有方 / 175

爱护身体 / 178

提升德行 / 179

成就自身 / 179

第十六讲 正心为立德之本 / 181

君主用法度制约亲属 / 182

对亲属不能搞特殊化 / 185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 187

心正则身修，国治天下平 / 188

第十七讲 自我反省 / 191

曾参受教传孝道 / 192

三省吾身 / 194

第十八讲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 201

君子不重则不威 / 202

如何避开他人的怨恨 / 207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 209

君子从政先端正自身 / 210

第十九讲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 214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 215

明君治理好国家的原因 / 222

第二十讲 行德爱人，厉行节俭 / 225

长民治国之本在身 / 226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 / 228

节欲中听则民富国安 / 233

第二十一讲 处尊位而纳谏 / 237

英明的君主有三惧 / 238

争做先醒者 / 243

得意而恐骄 / 245

周公理政，天下归心 / 247

第二十二讲 力行至言，应对反常 / 249

孝是中华文化的根，敬是中华文化的本 / 250

做人要厚道 / 251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 253

第二十三讲 教学为先，至诚感通 / 261

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 262

不教而杀谓之虐 / 266

上行下效，至诚感通 / 267

第二十四讲 除四患，崇五政 / 270

达到政治清明，先除四患 / 271

施行德政以除四患 / 278

崇五政 / 279

第二十五讲 得贤才而天下安 / 280

- 任贤关系国家安昌危亡 / 281
- 用不世之臣，立不世之功 / 284
- 敬重贤能 / 290
- 慎择亲信，谨防“社鼠”与“猛狗” / 292

第二十六讲 诚以得贤 / 294

- 文王施仁，天下归心 / 295
- 桓公礼遇管仲 / 298
- 孙权爱敬大将吕蒙 / 300
- 景公若元首，晏子如股肱 / 301
- 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 / 307

第二十七讲 任贤的十重难处 / 308

- 治天下的最高境界：三至 / 309
-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 / 311

第二十八讲 任人唯贤，用人必察 / 322

- 以邪说乱正度 / 323
- 以谗嫉而废贤能 / 323
- 治国之道，知易行难 / 325
- 欲霸王者，托于贤 / 327
- 用世俗之所誉，不得其真贤 / 329
- 君主侮辱臣子的结果 / 332
-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 333

第二十九讲 忠言逆耳利于行 / 335

- 听忠难，从谀易 / 336
- 开敢谏之路，纳逆已之言 / 338

劝之使谏，宣之使言 / 341
乐闻其过，过日消而福臻 / 343
禁戒谏言是国家的大患 / 345
桀纣拒谏而亡 / 347

第三十讲 无为而治是最高境界 / 350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 351
佞臣乱政 / 354
富而不骄，功成身退 / 357
听察广博，明辨邪正 / 361
选拔人才，以德为先 / 364
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 / 366

第三十一讲 君主离其民陨其国之常行 / 371

国贫而好大 / 372
智薄而好专 / 373
尚谗谀而贱贤人 / 374
乐简慢而轻百姓 / 375
国无常法，民无经纪 / 376
好辨以为智，刻民以为忠 / 376
流湎而忘国，好兵而忘民 / 379
肃于罪诛，慢于庆赏 / 379
乐人之哀，利人之害 / 379
德不足以怀人，政不足以匡民 / 380
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防非 / 380

第三十二讲 忠以敬，谦以和 / 382

君子事上必忠以敬，接下必谦以和 / 383

小人事上必谄以媚，待下必傲以忽 / 385

平居不惰其业，穷困不易其素 / 386

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 / 390

杨震不收“四知财” / 391

第三十三讲 正臣与邪臣 / 394

臣忠必直谏 / 395

有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 / 397

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 / 403

第三十四讲 尽忠劝谏 / 404

上下相亲 / 405

尽忠劝谏的三种策略 / 408

侍于君子有三愆 / 411

言而见用，终身无难 / 413

第三十五讲 举荐贤能 / 415

进贤为贤 / 416

忠臣举贤，不避仇雠 / 419

第一讲

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编纂的资政巨著，概括了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这部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从哪里学起？就从《群书治要》学起。这是用时少而获益多的一种途径。

《群书治要》的“群”是一个形声字，从“羊”，“君”声，本意作“辈”字解，乃同类相聚时之称。羊性好群，故“群”从羊。在这里“群”作形容词，是众的意思。“治”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之意。《群书治要》就是把群书当中有关修齐治平的道理、精华概括出来。我们读了这部书，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基本理论、方法，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学习《群书治要》的意义

领导干部学习《群书治要》，可以懂得成为卓越领导者最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加强道德修养，提高领导素质和能力；如何掌握领导艺术和方法；如何观人、选人、用人；治理好一个地区、管理好一个企业、带好一个团队的关键是什么；如何使道德教育深入人心且行之有效；如何反腐倡廉，才能够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等等。

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学习《群书治要》，可以懂得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才更加顺畅，如何趋吉避凶，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人生追

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等等。当然，这里也包括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如何改变命运，转祸为福；如何做到俯仰无愧，君子坦荡荡；如何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如何经营幸福美满的家庭；等等。

《群书治要》的编纂起因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627年）下令编纂的。唐太宗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出生的时候瑞相稀有，有两条龙戏于门外，三天才离开。唐太宗在四岁的时候，有一位自称善于看相的书生来拜见高祖，并且对他说：“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当他看到唐太宗之后，称赞他“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意思是说他以后是真龙天子，可以当皇帝的，后来就采用济世安民之意作为他的名。

唐太宗于626年即位，649年去世，在位23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有人称赞他是“千古一帝”。唐太宗以能用贤纳谏、尊儒重道、勤政爱民著称。他以文治天下，力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贞观盛世究竟兴盛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当时的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物产丰富。根据史书的记载，贞观六年（632年）、贞观七年（633年）风调雨顺，连续丰收，人们从长安走到山东的一些地方，可以不用带多少粮食，直接在路上就能买到。在山东的村子里，村民遇见路过的客人，一定会盛情招待他们，有时候还会赠送给客人粮食，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到了贞观八年（634年）、贞观九年（635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全国上下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贞观八年、贞观九年、贞观十三

年（639年）、贞观十四年（640年）、贞观十五年（641年）、贞观十六年（642年），又是连续丰收。结果怎么样？粮价从每斗米一匹绢，跌至每斗米四五钱，再跌至每斗米二三钱，可见当时粮食丰收、物产丰富的局面。

第二，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贞观四年（630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到了贞观六年，死刑犯虽然增至390人，但是这一年年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代都是在秋天行刑，这是顺着时节的变化来治理国家。结果第二年九月的时候，390个死刑犯全部返回，没有一人逃跑。那时政治清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百姓心中没有怨气，因此社会秩序非常好。

第三，贞观时期大概是中国历史上鲜有贪污的时期，这可能也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唐太宗统治下的王朝，因为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些成就的取得，和唐太宗运用《群书治要》的理念，以身作则，重视道德教化，并且制定了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腐败密不可分。这些成就的取得也说明，能够运用圣贤之道治国，不仅有效，而且快速。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七年，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恐怕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并非如此，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惧死亡，忧惧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的动乱之后更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更容易满足一样的道理。”

唐太宗说：“贤明之人治理好国家尚且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做到呢？”《论语》中也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所以唐太宗认为，要恢复太平，即使是贤明的人来治理，也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魏徵却说：“这话是

对一般人来说的，并不能用在贤明之人的身上。如果是贤明之人来推行教化，上下同心，就会像响之应声那样响应迅速。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地推行下去。一年就能够见成效，看来也并非难事。如果说要三年成功，才该说已经太晚了。”

唐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很有些道理。但是封德彝等其他大臣却对唐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逐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严刑峻法来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却没有成功。怎么说是可以教化，却什么都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徵所说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

魏徵听了之后，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他们并没有把百姓换掉。也就是说，百姓还是同样的百姓，但他们仍能够把百姓教化好，可见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的治理者是否施行了教化而已。看古书的记载就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70多次，天下乱得很厉害，而胜利以后，天下很快就太平。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淫虐，商汤把他赶走了，但是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王专干荒淫无道之事，周武王便起兵讨伐，到了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在位的时候，也实现了天下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到现在百姓都应该变得和鬼魅一样了，还能实行教化吗？”

封德彝等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辩驳，但是他们还是认为魏徵说的方法行不通。

幸好魏徵博览群书，对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了解得非常透彻，他能够引经据典，让这些大臣没话说。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他能够辨得清是非、善恶、美丑。唐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结果几年之间，突厥战败臣服，天下康复安定。

唐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并不能搞帝道、

王道，不能够施行道德教育、圣贤教诲，只有魏徵劝朕推行，朕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达到中原安定、边远的外族臣服的结果。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来做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大唐的衣冠，也就是说这些外族也受到大唐文化的影响。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

唐太宗回头又对魏徵说：“玉虽然有美好的本质，但是如果藏在石头里面，没有好的工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瓦砾碎石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遇上好的工匠，玉就可以成为流传万代的珍宝。朕虽然没有好的本质可供爱卿雕琢研磨，但多亏爱卿用仁义来约束朕，用道德来光大朕，才使朕能有今天的功业。爱卿确实是一位良工巧匠。”

唐太宗对于魏徵确实非常恭敬，视他为老师，而且自己还很谦虚，把贞观盛世的成就都归功于魏徵。

唐太宗打了十几年仗，终于平定了天下，建立了唐朝。他27岁就登基做了皇帝。由于唐太宗年轻时就带兵打仗，对于怎么样用圣贤教诲来治理国家，他的积累显然不够。唐太宗对此也有自知之明，而且他非常有悟性。据《贞观政要·论政体》所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了十几把上好的弓箭，把它们拿给弓箭师傅看。结果没想到，弓箭师傅却说，这些弓都不是良弓，都不够好。于是朕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正，就使得木头的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然强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中，朕领悟出很多道理，朕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这一生中所用过的弓箭已经够多的了，但是朕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朕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朕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朕对弓箭的了解尚且有偏失，更何况掌握治理国家的要领呢？”

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每次

召见，唐太宗都要赐座给他们，并且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情，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的得失有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唐太宗很好学，很谦虚，而且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于是就虚心地向那些有经验的大臣们请教，并对这些贤士礼敬有加。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道：“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是什么原因呢？”王珪回答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静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会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是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了。”唐太宗听了之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又懂得治国之道的，大多能得到提拔并委以重任。

唐太宗之所以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下令编纂《群书治要》，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对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教诲了解得不够，希望不仅能和群臣探讨治国经验，而且还能随时翻阅记载古圣先贤治国经验和教训的书籍。

唐太宗武功高强，而且思维也非常敏锐，很有判断力。他带兵打仗，面对千变万化的军情，都能够随机应变，睿智决策，百战百胜，是一个很有作战能力的统帅。他遗憾的是早年从军，一心一意用在行军打仗之上，读圣贤经典不多，对古圣先贤修齐治平的道理不甚了解。中国有句古话叫“殷鉴不远”，意思是说夏朝的经验、惨痛的教训离我们还不远，我们应该引以为戒，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唐太宗当了皇帝之后，非常善于借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贞观九年，他和群臣谈到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这样说：“当年刚刚平定京师（这里指隋

朝），宫中的美女、奇珍玩物，没有一个宫苑不是满满的，可隋炀帝还是不满足，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加上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弄得百姓无法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朕亲眼所见。因此，朕每天从早到晚，辛勤努力，毫无厌倦，只求清静无为，使天下不生事端，从而做到徭役停罢，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国好比种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君主若能实行清静无为，百姓怎么会不安居乐业？”唐太宗很善于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深刻地体会到创业不易，守成更加艰难。

守成最难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德行。对于每个人来说均是如此；顺境比逆境还难经受住考验。逆境有的时候反而更能磨砺人，让人的志气增长，锻炼人的品志，增强人的意志；而顺境却是淘汰人，如果没有高度的警觉，在财色名利面前很难不堕落。《孝经》提醒说，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面对财色名利，要高度警觉，不要迷在其中。

唐太宗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鼓励群臣进谏。他甚至主动地去求取谏言。比如，在贞观十一年时，魏徵屡次上书劝谏。唐太宗就亲自写诏书回答魏徵。在诏书里，他说：“朕看了爱卿写的奏书，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爱卿的奏书，常常让朕忘记疲倦，而且爱卿的言辞让朕深受感动。倘使爱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朕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朕的过失呢？朕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当时的太傅何曾退朝回家之后，就对他的儿子何邵说，我每天都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这难道不是将灾难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保全。说完，他又指着他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等到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果然如何曾所料，他的孙子何绥遇上了晋王室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

果在叛乱中死于酷刑。”

唐太宗说：“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件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但是朕的看法却不同。朕认为，何曾是不忠之臣，是罪大恶极的。为什么？因为作为臣子上朝的时候，就应该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之后应该废寝忘食地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才能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也就是常说的君臣同志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是很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员呢？爱卿所上疏的建议，朕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朕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校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朕有爱卿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有水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爱卿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地奏疏，朕现在才回复，此后朕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爱卿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这个明君明在何处？魏徵屡次犯颜直谏，直接指正唐太宗的过失，唐太宗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还称赞魏徵的质言。他认为，有了魏徵的助力，仿佛如鱼得水一样，治理国家得心应手。皇帝有这样虚心求谏的态度，才会出现像魏徵这样敢于直谏的臣子。唐太宗主动引导并且鼓励群臣向他进谏，体现了一个为君者难得的胸怀。

一个错误的决策影响的百姓何止千千万万，天子代表上天爱护子民，怎么忍心由于自己的过失而让百姓受苦呢？唐太宗知道守成不易，希望群臣给他劝谏，也希望从古圣先贤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宝贵的教诲来提醒自己。这是他命人编纂《群书治要》的初衷。

《群书治要》的内容

《群书治要》的内容包含六经，就是《诗经》《书经》《礼记》《周易》《乐经》《春秋》，孔子就是以六经教导学生的。后来六经中的《乐经》失传，到汉代的时候只能置五经博士。在《群书治要》中五经有关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都涵盖于内。《群书治要》包含四史，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包含《晋书》在内。《史记》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史书，记载了从黄帝一直到西汉中期的历史。除了史书之外，还有子书，也就是诸子百家的思想言论，如在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农家、兵家等，在各家言论中，关于国家治理的经验都被汇编在《群书治要》之中。

从五帝开始，一直到晋朝，其中几千年的历史。古人编纂《群书治要》非常认真、非常恭敬，从1.4万多部、8.9万多卷的古籍中选取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挑取其中的精华，最后挑出了66种书；又从这66种书之中，把最精粹的道理撷取出来，最后才汇编成《群书治要》。因此，称《群书治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精华，确实不是夸张。学习《群书治要》这部书，可以视为掌握了开启《四库全书》的金钥匙。

《群书治要》的历史贡献

到了贞观五年（631年），也就是历经5年时间，《群书治要》才编纂完成。《群书治要》编纂完成之后，魏徵在序文中说了一句话称赞《群书治要》的历史价值——“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魏徵说，这部书用在当时的社会，可以鉴览前古。以古人的经验智慧来经营自己的人生，尤其对领导者而言，可以少走很

多弯路，可以有很多的榜样效法，可以吸取从五帝到晋朝时期古人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学习其方法和智慧。“传之来叶”，就是传到后世去；“可以贻厥孙谋”，“贻”就是遗留的意思，这部书传下去之后，可以恩泽后世。“孙谋”就是后代子孙能够更好地谋划他们的人生，使他们的人生幸福。由此可知，《群书治要》确实是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

《群书治要》编纂完成之后，唐太宗非常欢喜，这部书涵盖的内容不仅广博，而且精辟、切要。唐太宗“日日手不释卷”，皇帝这样不辞辛苦地学习，是因为他有一个根本的动力，那就是爱护人民，希望能够把国家治理好。不仅如此，他还胸怀天下，在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的同时，希望给世界各国做出良好的表率。

唐太宗汲取了古圣先王经典的智慧，并因时因地地把它运用到治国之中。太宗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卿等力也。”唐太宗说：“（这部书）让我每次面对事情，都能以几千年历史当中的经验智慧来判断、来作决策。”“稽”就是考察的意思，这部书使他不迷惑，面对事情，能够应对笃定。唐太宗讲这句话的时候，充满了感恩之心，他说“卿等力也”，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大臣所贡献的力量。唐太宗身为天子，还能够时时想着臣子的恩德，殊非易事。

唐太宗成就盛事的政治智慧就是从这部《群书治要》中借鉴而来的。《群书治要》实在是从政者必读的一部宝书。

《群书治要》不仅应是从政者、领导者必读之书，也应该是所有为人父母者必读之书、为人师者必读之书、企业家必读之书。因为此书中所蕴含的关于修齐治平的学问都是相通的，治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企业、经营一个家庭的道理都是一致的。

《群书治要》的流通过程

因为那时中国的印刷术还不是很发达，所以《群书治要》一书没有得以广泛流传，也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但是日本人很珍惜这部宝典，日本僧人把《群书治要》手抄下来，将这部书从大唐带回日本，并且把它完整地保留下来。由此而知，不仅仅是中国人，日本佛门的出家人也对中华文化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从历史可知，日本留学生到中国留学，带回去的书，都是从众多的古籍中挑选出的精华。后人手抄书也是抄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书。

后来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嘉庆登基的时候，由日本人进贡，把这部书送回到中国本土。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和台湾分别以此版为底本影印出版，是在1935—1937年。

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教授在《未来属于中国》一书中提出，只有中华文化能够救世界，未来是中华文化得以普遍宣扬的世界。

为什么作为一个英国人，汤恩比没有说西方的文化可以给世界带来和平，而是把眼光放在了中华文化之上呢？因为中华文化讲究的是“仁、义、忠、恕”。“仁者爱人”，这个“仁”从人、从二，我们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对方，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古人说“仁者无敌”，并不是说仁者能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是说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他从心底不和任何人起对立。古人经常用“一体之仁”来形容一个人的仁爱之心。什么是“一体之仁”？比如，人的身体，假如右手有点痒，左手就会去帮右手一下，那是不讲条件的，为什么？因为它们都属于一个身体，密不可分。中国人讲“仁”，是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人和自然之间，还有族群和族群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都是一体的关系。只有体会到一体的关系，才能够做到“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因为有这种仁爱的教育，所以中华文化能够为世界带来和平。

中华文化还讲“和而不同”。比如，我们看一个大花园，有五彩缤纷的花，所有的花在一起，让人觉得美不胜收。但是如果这个花园只有一种花，清一色，就会让人感到单调无比。所以中国人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认可各个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差别，求同存异，这样才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而不至于产生文明的冲突。汤因比教授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相信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

最为关键的是，中国人自身必须能够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树立起高度的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信心，对古圣先贤的教诲不要心存怀疑，要对它有信心。为什么对它要有信心？因为古人所说的道理都是恒常不变的规律，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圣贤经典所记载的都是道，道就是恒常不变的规律，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一样，在古代如此，在今天依然如此。

为什么圣贤传统文化到今天还不过时？因为它是一切众生自性的流露。“自性”，古人的性和今人的性是一个性，历久不变。圣贤所传下来的这些文化经典也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就像孔子所讲的“述而不作”，他也是承传古圣先王的，而且古圣先王不是一般人。之所以被称为圣，是因为他们都契入了心性，开启了明德，他们都是依循性德来处事待人接物、治理国家的，怎么可能过时？只要人们切实地依教奉行，也可以契入明德，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了解到，是随顺自己的性德去处事待人接物的。这部《群书治要》，也可以引导我们契入性德，回归本性。它开启的是我们每个人本有的本善和明德。这些经典是超越时空的真理，亘古不变的。

如何学习《群书治要》

学习《群书治要》，要用真诚恭敬心来学习，来领受圣贤教诲。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如果没有恭敬心，就不得利益。因为传统文化是心法，必须用真心才能契入。如果没有恭敬心，就连皮毛都学不到。进一步讲，同样是一位老师讲课，学生的接受程度不同，切入程度就会不一样，而且进步快速也不一样。不是老师讲的有区别，而是学生的恭敬心有区别。

《曲礼》曰：“毋不敬。”“毋”就是没有，任何时候没有不保持这种恭敬的态度，也就是说时时刻刻都要保持恭敬的态度。《中庸》中也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一旦诚敬心不见，当下就不在修道的状态了。就是随顺习气，攻乎异端了。圣贤的学问就是在主敬存诚，诚敬的程度愈能保持，就提升得愈快，也愈能凸显真正的修养。

怎样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真诚恭敬心？就是要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譬如说，读圣贤书的时候，展开圣贤经卷就如面对圣贤人，要非常恭敬。要把心沉静下来，把自己的诚敬心提起来，不能胡思乱想。不然，就容易敷衍了事，想入非非，做事情时没有真诚恭敬地去做，为的是完成任务而已，这样心就不在正道上了，傲慢、烦恼牵绊，决难提升。像《弟子规》，整篇就讲了一个“敬”字，告诉我们从敬父母、敬兄弟、敬人到敬事、敬物，要时时提起恭敬心。

康熙皇帝确实让后人非常佩服，他本来是满族人，入主中原之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学习和深入程度远远超过汉人。特别是康熙的祖母孝庄皇太后，重视对康熙的培养，而且她对汉族的文化也非常认同，所以康熙取得这样的成就绝非偶然。《四库全书》《四库荟要》《乾隆大藏经》等，都是在清朝编纂的。清朝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最令人佩服的就是康熙皇帝以身作则，自己好学、真学、真干，带动文武百官

都深入经藏，自己坐在前面听讲，上行而下效。所以清朝才能够出现100多年的康乾盛世。

康熙说“临民以主敬为本”，强调时时要对老百姓有恭敬之心、爱护之心。这其实都是领受了孔子的教诲。《论语》记载，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怎样能够做到让老百姓恭敬他、对他忠诚。换句话说，当领导的人都希望受人尊敬、一呼百应，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老百姓之间如何能够相互劝勉为善？孔子回答说：“临之以庄则敬。”也就是说，你要对老百姓尊重，你尊重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尊重你。这也是《孟子》中所说的“敬人者人恒敬之”。在夏代，大禹是圣人，他平时在家的时候穿着非常简朴，而上朝的时候穿着朝服，非常隆重，这表明了他对文武百官、对人民恭敬的态度。

“诚与敬，千古相传之学，不越乎此”。康熙皇帝领会到，千古相传的心法就是在这两个字——“诚”与“敬”，不会超出这两个字。

程子曰：“敬胜百邪。”宋朝的大儒程子说，恭敬胜过众多的邪思邪念。这个“百”不是一个实数，是众多的意思。恭敬心能够震慑住所有的邪念。就是说修养德行，以至于治国为政，教化百姓，重点都在“诚敬”两个字上。有了这颗诚敬心，才能够把学问和利世济民的事业都做得圆满。

假如对古圣先王的这些教诲提不起诚敬之心，纵然遍览所有的古籍，也很难获得真实的利益。因为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从他们的真心流露出来的。真心与真心才能够相呼应，如果自己的心不恭敬、不真诚，也很难体会到古圣先贤的存心，切入他们的境界。一个人只有开启了孝敬心、仁慈心，才能够切入、领会它。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这种求学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述而不作”是对古圣先贤的教诲非常尊崇，不夹杂自己的意思在其中，这是不傲慢，这是学谦卑。“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谦虚使人有

受教的余地，因而会获得无穷的好处。

“信而好古”是不怀疑圣贤人的教诲。因为古圣先贤的教诲是真心流露出来的，如果我们也契入这个境界，开启了自性的明德，定然能够体会到和他同样的境界。如果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就像圣贤人站在20层楼上，我们站在第二层楼上，如果说圣贤人看到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境界，就会对古人产生怀疑，甚至妄自批判。若有贪、嗔、痴、慢、疑这些习气，诚敬心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求学困难？这是因为对古圣先贤、对自己的师长怀疑，就很难受益。

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四讲中说：“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过是近来二百多年的事。……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①孙中山先生很有先见之明，他曾经留学欧洲，对中外的政治思想都有很深的了解。他的体悟很深刻，认为欧洲比中国先进的地方只有它的科技、它的机器。要说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向中国人学习。“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是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②在一百多年之前，孙中山先生已经有这样的见地，已经看到西方思维的偏颇，认为必须靠中国的哲学和印度的佛理来调整它的偏失。

英国学者汤因比教授也说，欲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汤因比说得很肯定，“唯有”就是唯一能够依靠，依靠孔孟儒学与大乘佛法。而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都在中国。所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得到弘扬，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整个世界的未来。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智慧、五千多年的方法、五千多年的效果、五千多年的经验。在世界四大文明中，其他三个文明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

^①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231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1页。

承传至今，绵延了五千多年而不衰。中华民族至今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靠的就是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要有责任心，要让灿烂辉煌的文化继续发扬光大。我们应该树立起“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把古圣先贤良好的治国理念、方法传承下去。

现在为学习企业管理，很多人都会去美国、日本学习。有一批企业家坐上飞机“万”里迢迢地飞到了美国，要向通用公司学管理。结果美国通用公司的人很谦虚地说：“我们这一套管理都是从日本丰田公司那里学来的，你们不如直接到日本去学，学得更加彻底。”这群企业家又坐上飞机“万”里迢迢从美国飞到了日本。他们下了飞机，来到了丰田公司的大门口，还没有入门，就看到在大门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他们还都认得，写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的教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凡是稍有成就的日本企业家，可以说无不是熟读《论语》的。譬如说，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的涩泽荣一，他就是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的企业经营之风。被誉为“日本的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也是把“君仁臣忠”的理念运用到管理之中。被誉为“经营之圣”的稻盛和夫，在短短70多天拯救了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并且在一年之后就使日本航空公司成为全球所有航空公司中效益最好的一个。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当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稻盛和夫时，他说：“我不过是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理念运用到管理之中而已。正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读了孔子、孟子这些圣贤人的著作，所以才成就了今天的我。”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最高明的管理在中国。西方人的管理方式，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用这个来引导人们，如果人们触犯了这个政令条款，就给他们以刑罚的处罚。人民因为惧怕处罚而避免去做坏事，但是他们没有羞耻心，甚至他们做了坏事之后想方设法地逃避惩罚，还以此沾沾自喜，认为

这是自己聪明的结果。他们达到的充其量是不敢欺、不能欺的境界。而中国古圣先贤讲究礼法合治，让人们达到不忍欺的境界。那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用道德来教育人们，用礼义来引导人们，人们有了羞耻心，从心底不愿意去做坏事，而且还会让人心归附，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领导。

松下幸之助的企业中一位厂长有一天没来上班，恰恰在这个时候工厂着火了，大片厂房被烧毁，损失严重。这件事发生之后，一般领导可能会火冒三丈，马上去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给予惩罚。但是松下幸之助很冷静，他先调查原因，这个厂长为什么没来上班？松下幸之助通过调查发现，这位厂长的母亲得重病住进了医院，厂长是一个孝子，去照顾自己的母亲而没有来上班。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工厂发生了火灾。

之后，松下幸之助购买了礼物，亲自到医院探望这位厂长的母亲，并且安慰厂长说：“你的母亲得了重病，都已经住进了医院，而我却没有关心到。你现在全身心把你的母亲照顾好，火灾的事我也有责任，你不必担心，等你母亲出院之后再说。”

后来这位厂长的母亲康复出院了，他又回到了企业。松下幸之助将他调换了工作岗位，仍然委以重任。松下幸之助知道这位厂长平时对工作都是认真负责的，他那天没有来上班有不得已的苦衷，不是故意为之，而是因为对他恩德最重的母亲得了重病，他去探望母亲、照顾母亲是理所应当的事。

《孟子》中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当成手足一样加以关爱，被领导者会加倍地回馈领导者，把领导者视为自己的腹心一样对待，这就叫“君仁臣忠”。

松下幸之助学到了儒家管理的精髓，他对下属仁慈关爱，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下属也就对他竭忠尽智。从这里，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确实胜人一筹，不仅让人达到了不敢欺、不能欺的境

界，还让人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

可见，只要我们把中国传统的治国智慧运用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去，就会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代代出圣贤，时时有盛世。

今天要想让世人对传统文化生起信心，最重要的是我们以身作则，从做好自己开始。譬如说，我们将自己的家庭经营好，将企业经营好，最终把我们把国家治理好，其他国家就都愿意来学习和效仿。

《群书治要》讲的是道，既然是道，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依然适用。中国几千年来，很多朝代和家庭都已经验证了这些道理。特别是《群书治要》传到日本之后，还为日本的盛世做出了贡献。

这部宝典如今能够重现世间，我们后人要进一步地认真学习，要维护社会安定和谐，带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对古圣先贤的教诲重新产生信心。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移风易俗必须通过教学。社会良好的风气之所以能够产生，最重要的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这个“教”是身教胜于言教。《说文解字》上解释“教”，是“上所施，下所效也”。“教”首先是教自己，正己化人，上行而下效。所以我们要带头学习《群书治要》，努力把自己的家庭和团队都经营好。

第二讲

修身是成为卓越领导者的基本功



修身从戒贪做起

关于“修身”，《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想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者，首先要从修身开始，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修身应从哪里开始做起？就是《大学》上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要从格物做起，格物就是格除物欲的意思。我们在财色名利各种诱惑面前能够把持住自己，做到八风吹不动，修身才有一点点基础，所以修身从戒贪做起。

《群书治要》的取材是经、史、子，史部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称为“四史”，此外还有《晋书》。史书都是由很多的历史事实来验证“经部”和“子部”的道理，所以经史合参的特点在《群书治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自《史记》到《清史稿》一共25部史书，俗称“二十五史”。“二十五史”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社会兴衰成败的规律，这个规律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因果感应”。《周易》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书·伊训》中也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二十五史”就是通过史实验证了这些道理。历史上有一部书叫《历史感应统纪》，这部书就是通过正史之中的数据，验证了上面所说的道理。看了这一部书才知道因果感应并不是迷信，而是已经通过史实验证的

规律。吃饭可以止饥，喝水可以止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果。有一些隐而未宣的因果，只有圣人认真观察到了，把它记载下来，记在了经典之中。我们学习经典，也就是在学习“道”，学习因果的事实。可见，史书核心的内容是讲因果感应的道理。

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

——《群书治要》卷十九《汉书七》

这句话出自《汉书七》，是西汉谏大夫贡禹在劝谏汉元帝的上书中所说的。贡禹看到当时朝政腐败、宫廷奢靡、圣教不行、社会风气日下的状况，于是建议兴起孔子的教诲来改变世风。

在这句话之前，贡禹写道：“孔子不过是一个寻常之人，但是因为乐于研求道义、端正自身而从不松懈，以至于现在四海之内，天下的君主都将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现在汉朝地域辽阔，陛下德行高尚，又居于天子的尊位，相信凭借上天的帮助，如果想改变社会风气，调和阴阳，陶冶万物，通过教化匡正天下，就像决堤放水、遏止物体坠落一样容易。”后面他说了这句话，告诉我们盛世不复存在的原因，以及如何能够恢复盛世。

“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成康就是西周周成王和周康王统治的时候，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囹圄空虚”，监狱里都没有犯人；“刑措不用”，刑罚都放置不用，因为没有犯罪的人。西周的时候，周成王、周康王能够继承文武、周公的遗风，兴起道德教育，特别是周公制礼作乐是在成王的统治时期。到了汉代的时候，将近1000年了，“几且千岁”，“且”就是将要的意思，几乎要有1000年之久了。

“欲为治者甚众”，想使天下太平的君主很多。但凡君主统治国家，都希望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自己走到哪里也备受尊重。“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结果却没有出现太平盛世，这是什么原因？下面这一句话给我们指出了关键，“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 “法度”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律、成文法、法令、条文等，它有道德标准、道德规范、规矩的意思。譬如，在《管子·中匡》篇就说：“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这个“法度”就是指标准、规范的意思。

“五伦”大道

治国的常理常法是什么？《孟子》中说，早在舜的时候，他就以契为司徒，也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员，专门兴起伦常教育。“五伦”大道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我们把它称为“伦常大道”，就是说它不是圣人制定下来的，而是本来就有的、自然而然的规律。我们现在讲道德，这个“道”就是自然的规律，这个“德”就是按着自然规律去做。

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父母爱儿女，儿女爱父母，他们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情，这种自然的亲情不是圣人要求我们产生的，而是人性自然而然的表现。父子之间的亲情在小孩身上特别明显。中国古人说：“人生百日，体露真常。”孩子在小的时候，一看到父母，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从这种喜悦中我们看到了孩子对父母的喜爱。怎么样把这种自然而然的亲情保持一生，顺着“亲”的方向发展而不改变？圣人观察了，只有父母慈爱教导儿女，儿女孝敬父母，这自然的亲情才能够维系。所以顺着父子有亲这个伦之道，提出了“父慈子孝”的德行要求，也就是父母要慈爱教导儿

女，儿女要孝敬父母。

从这个“慈”字上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父母对儿女的恩德所在。这个“慈”上面是一个“兹”，下面是一个“心”，父母对儿女的慈爱就表现在他们的心“念兹在兹”，无时无刻不在儿女的身上。有过孩子的人可能都有这种体会，孩子在小的时候，还不会说话，他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只要一哭，父母就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他是渴了还是尿了，因为父母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孩子身上。《大学》中说：“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没有人是先学了怎么养孩子然后才出嫁的。但是她一出嫁，一有了孩子，就知道如何去照顾孩子。那么她是怎么学会的呢？就是有一颗真诚的心，这颗真诚的爱心，无时无刻不在关爱孩子。所以她自然知道孩子的需要在哪里，应该怎样照顾好孩子。所以儿女从这个“慈”字就能够体会到父母的恩德。

古人常说：“母活一百岁，常忧八十九。”老母亲已经活到100岁了，还经常惦记着她那80岁的儿子。现在做父母的经常一拿起电话，对儿女也是嘘寒问暖的。而做儿女的往往粗心大意，没有在意父母的用心。从这个“慈”字上我们要体会到父母的恩德，对父母生起感恩之心。做儿女的无论怎么样都无以回报父母养育的深恩。“孝”字，上面是“老”字的上一半，下面是一个“子”字，这就告诉我们要“子承父，子承老”，背负着老人。父母养育了我们，我们在小的时候“三年不免于父母之怀”，三岁之前我们都没有生活的能力，饮食起居、走路都需要父母照顾；等父母老的时候，他们也同样需要儿女的照顾。现在一些年轻人和父母有代沟、缺乏沟通，就是因为没有至诚之心，耐心不够，感恩之心没有生起。所以做儿女的要能够设身处地地为父母着想，孝敬父母，这样才能做到至诚感通。

中国人找到了仁爱之心的根本，就是对父母的孝，还有对兄弟的友悌。我们从竖的方面看，讲对父母的孝，上一代上面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下面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过去、未来，自始至终都

是一体的，竖穷三际。从横的方面看，把对兄弟之间的友悌推而广之，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就是横遍十方。所以真正把孝做到圆满的人，就是圣人，他真正看到了自己和众生是一体的；而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其实就是人的自性。所以从孝入手，就可以找到也可以回归人的自性。

儿女孝敬父母，在《论语》中讲得很多。譬如说，孔子的弟子请教他，什么是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现在所谓的孝子，认为能够赡养父母，就算尽孝道了。但是狗、马也都能以自己的体力奉养主人，如果仅仅赡养父母而不尊敬父母的话，就没有办法和禽兽区别开来。这句话提醒我们，赡养父母不仅仅要养父母之身，保证他们衣食丰足，让他们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还要养父母之心。孔子说“色难”，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能可贵的。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孝乎？”有好东西让父母先吃，有事情做儿女的去代劳，你以为这就是尽孝了吗？换句话说，这样做还远远不够。

《礼记》中也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一个真正对父母有孝心的儿女，他对父母说话的时候，一定是和颜悦色、愉色婉容，态度柔和，不俭朴戾气；即使父母做错了，儿女也要很耐心、很委婉、很柔地去劝谏他们。《弟子规》中说“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父母有过失的时候，儿女要去劝谏，但是劝谏的态度一定要和颜悦色，这才符合人子之道。

周公有一个儿子叫伯禽。伯禽和他的叔叔一起去见周公，结果三次都被周公给打出来了。伯禽很奇怪，就去问很有学问的商子，向他请教道：“为什么我去见父亲三次，都被他给打出来了？”商子告诉他说：“南山的阳面有一种树叫桥树，北山的阴面有一种树叫梓树，你去看一看就明白了。”伯禽到了南山的阳面，看到那里的桥树长得又高又大，树冠是向

上仰着的；而北山的阴面，梓树长得又矮又低，树冠是俯着的。伯禽回来后就向商子报告。商子说：“从桥树我们看到了父道，而从梓树的姿态我们看到的是为人子应有的态度。”伯禽很受教，再去见父亲的时候，一进门就赶快小步快跑，以示恭敬；一入室就赶紧跪下，向父亲请安。周公看了很高兴，说：“你这是得到了有德行、有学问的人的指教了。”可见，儿女对父母应该恭敬有礼。赡养父母最重要的是要养父母之心。而养父母之心，除了恭敬父母之外，还要让自己的所作所为让父母放心，不要让他们为自己担忧。《论语》中说：“父母唯其疾之忧。”父母仅仅为你的疾病而担忧，完全没有必要为你其他的事情而担忧了，这样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譬如说，有的人在初中的时候，学会去网吧打游戏，游手好闲，耽误了学业，让父母担忧，这是不孝。有的人上了大学，不在父母跟前，开始泡酒吧，把时间都荒废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让父母担忧，这也是不孝。有的人虽然找到了工作，但对工作不认真负责，被老板解雇了，这也是不孝。还有的人得到了一官半职，结果因贪污受贿，而锒铛入狱，让父母蒙羞，这仍然是不孝。

一个真正的孝子，其实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一个完美的人”了。所以古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做儿女的，除了养父母之心，不让父母担忧之外，还要“养父母之志”。父母培养了我们，并不是要我们为他们端茶倒水，而是期望我们为国家做贡献、为人民服务，竭忠尽智地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因此，当我们为国家尽忠、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就是在养父母之志，就是尽更高层次的孝。“孝”的内容很全面，我们只有全面地理解它，才知道怎样尽孝，才不会陷于愚忠、愚孝。

君臣有义

我们也可以将“君臣”理解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有很多表现。譬如说，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老师

和学生的关系，等等。他们之间怎样才能和谐成一体呢？这个“一体”的观念也体现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

在西方，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老板制定各种制度，想方设法地让员工不要触犯规矩。中国的大多数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是一体的，是互相感恩、互相协助、互相合作的关系，他们之间以“义”相处。“义者，宜也”，这个“义”和适宜的“宜”是相通的。做领导的和被领导的要各尽本分、各守其责，关系就能处理好。

领导者应该如何做领导？中国古人用一个字来表示，那就是“仁”。也就是说，领导者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对方，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地体恤关怀下属。好的领导者应该同时具备“三样”，就是“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不仅当下属的领导，还要当下属的父母，像亲人一样去关爱下属。此外，还要当下属的老师，教导下属做人的根本道理。

《孟子》中有这样一句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当成自己的手足一样加以关爱，被领导者会把领导者视作自己的腹心一样，更加关爱、重视领导者，并加倍地给予回馈。

相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当牛做马地来使唤，结果下了班之后，被领导者在超市里遇到领导者，一低头，装没看见，就走过去了，就像看到陌生人一样，没有亲密感可言。

更有甚者，“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如果领导者把被领导者的生命视为像泥土和小草一样低贱不值钱，随意地践踏，你就会发现，这个被领导者说起领导者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那个领导简直就是个吸血鬼，甚至连吸血鬼都不如”，非常痛恨。被领导者的这些反应都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态度所致。所以“君臣有义”，要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体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对立、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关系。

夫妇有别

夫妻在职责上有分工。这个“别”并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别，而是在职责上有区别。

古人说“男主外，女主内”。意思是说男子要负担经济收入，养家糊口，让家人衣食无忧；而女子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把儿女教导好，让他们成圣成贤。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无后”并不是说没有儿子。即使生了七八个儿女，但他们都是败家子，这就不能把良好的家业、家风传承下去，更有甚者还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事，这样的儿女与其有，还不如没有，这才是“无后为大”的真正含义。所以中国古人将儿女的教育看得非常重要，这么重要的职责当然不能推给别人，必须由他们的父母亲自来承担。做丈夫的要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不能寻花问柳、见异思迁。而做妻子的，要承担教育儿女的责任，身教胜于言教，把儿女教导好，才能让丈夫安心地工作，使家业、家风、家道代代相传。

长幼有叙

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的出生有一个自然的顺序，这个自然顺序不能够颠倒，应该给予尊重。《弟子规》中说：“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应该是兄长友爱、关心、帮助弟弟妹妹。这个“友”，古代写作“”，表示两只手互相搀扶，也就是说弟弟妹妹有了困难，做兄长的要去帮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要讲什么条件。而弟弟妹妹对于兄长的关心、帮助要感恩，对兄长要恭敬。兄弟之间只有做到“兄友弟恭”，才能够和睦相处。

《弟子规》中还说：“财物轻，怨何生。”兄弟姐妹更看重的是手足之情、骨肉之情，把财产看得淡一点，争讼又怎么会产生呢？“言语忍，忿

自泯”。兄弟姐妹在交流的时候，言语上互相忍让一下，少说一句，愤愤不平自然就泯灭了。

朋友有信

朋友是和我们地位平等的人，和朋友相处一定要做到诚实守信。这个“信”字是一个“亼”加一个“言”字。人言为信，人讲的话必须守信用。古人把“信”这个字看得非常重。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一个人言而无信，在这个社会上寸步难行。

中国古代自舜的时候就用“五伦”大道来教导人民。“五伦”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就安定和谐。

“五常八德”

除了“五伦”之外，还有“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

还讲“四维”，管子提出的“礼义廉耻”。古人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就像国家这个大厦的四根大柱子一样，四根大柱子若不存在了，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

还有“八德”。“八德”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朱子所提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另一种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我们把“八德”的两种说法重复的去掉，就得到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用“五伦”，还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道理来教导民众的。人人都明白了这些道理，社会自然安定和平。

如果人们把“五伦”大道、“五常八德”都忘记了，不去遵循了，就会出现如左丘明所说的：“人弃常则妖兴。”“妖”就是不正常的现象。譬如说，父子反目成仇，儿子把父亲杀了；兄弟因为一点点财产就起了纷

争，上了法庭；夫妻不能相互信任，同床异梦。

可见，一个国家之所以会由盛转衰，一个社会之所以不能够出现太平盛世，就是因为舍弃了治国的常理、常法，使得私欲兴起了。

奢靡之害

现在我们全国上下都在反对“奢靡之风”。为什么国家领导人这么重视反“四风”？奢靡之风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群书治要·墨子》中说：“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富贵的人都铺张浪费，贫困的人受冻挨饿，要想保持天下不乱，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君诚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饮食不可不节”。国君如果真想让天下太平，真的是厌恶天下混乱，那么在生活饮食的节俭上就不能够不审慎了。

《管子》中也论述了奢靡之害确实非常严重。以前圣君制造车船是为了方便百姓办事，而如今的君主制造车船就不同了，车船的完备、坚固、轻巧、便利都具备了，但君主却仍向百姓横征暴敛，用彩色刺绣装饰车，用精致的雕刻装饰船。于是，女子放弃了纺织而去学习刺绣施彩，男子放弃耕种而去学习雕刻。由于没有人再去纺织耕种了，所以百姓受冻、挨饿。

君主制造车船如此华美，左右亲近的臣子也都纷纷仿效。百姓饥寒交迫，才去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事多了，刑罚就愈来愈苛刻；刑罚愈来愈苛刻，国家就会出现动乱。君主若真正想使天下太平，憎恶天下混乱，那么在制造车船的节俭上就不能不审慎了。

《管子》进一步分析说，当一个国家有了奢侈浪费的风气时，它的花费就会非常多，即“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花费很多，老百姓就会贫穷，没有钱财。特别是现在的很多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奢侈的生活方

式，他们借贷已经借到第二代、第三代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根源就在于自私自利，为了满足私欲，甚至连子孙后代的利益都不予考虑。“民贫则奸智生”，一些人已经习惯于过奢侈浪费的生活，因为由奢返俭难，没有钱财花费就会很难受，所以就会产生奸智的念头；“奸智生则邪巧作”，结果邪巧的做法也就出来了。可见，“奸邪之所生，生于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于侈”，奸邪的行为之所以产生，都是因为有些人精神上匮乏不足；而匮乏不足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有些人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所以要从根本上杜绝奸邪欺诈的行为，就要从提倡节俭、遏制奢靡之风开始，这是国家和每一个家庭的当务之急。

《孔子家语》中也记载着孔子和鲁哀公关于当时的国君为什么不能修明礼教的对话。当时的国君之所以不能成功地推行礼教，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像古圣先贤那样厉行节约，反而过着奢侈浪费、荒淫无度的生活。鲁哀公问孔子说：“请问什么是大礼？为什么您一谈到礼，就那么尊崇呢？”

孔子回答说：“百姓之所以能够正常生活，礼是最重要的。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神灵；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秩序；没有礼，就无法区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的远近亲疏关系。所以君王对此非常重视，带头恭敬奉行，然后以自己率先做出来的样子来教化百姓，使他们都能顺礼而行。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居住的是简易低矮的房屋，穿戴节俭的衣服饰物，乘坐的马车也不加雕饰，使用的器物也不是精雕细刻的，饮食不讲求美味，心里也没有过分的奢望，使自己与百姓有福同享。古代的贤君是这样恭敬行礼的！”

鲁哀公又问：“当今的君王，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孔子说：“当今的君王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无道，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自己的贪心，使百姓抱怨朝廷；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任

意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诛杀人民，而不依据正常的法度。从前的君王治理和役使百姓是按着前述的做法去做的，而现在的君王则是按照后面的做法。可见，当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礼教了。”

在位者不能率先避免奢侈之风，而是一味满足私欲，所以礼教不行，上行下效。太平盛世之所以不能复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位者不能克服私欲，不能身体力行古圣先贤的教诲。这是社会兴衰成败的根源所在。

第三讲

在德行和学问上扎根



孝敬仁义是立身的根本

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

——《群书治要》卷二十六《魏志·王昶传》

据《王昶传》记载，王昶，字文舒，是太原郡晋阳县人。王昶后来升任兗州刺史，他为侄子和儿子起名的时候，都依照谦虚和诚实的意思来取，体现出他对儿子和侄子们的期许。他的侄子，一个叫王默，字处静；一个叫王沈，字处道。他的儿子，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王昶告诫他们，为子之道最重要的事情是珍爱自己的身体，培养良好的品行，并以此来使父母的名声显扬。孝敬仁义是各种品行当中最重要的品行，也是立身的根本。人们只有讲孝敬，家族内部才会安定；讲仁义，才能深受乡亲们的尊重。

富贵和声名，可以说是人人都喜欢的。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哪一个人不喜欢富与贵？这是一般人都愿意追求的。但是君子有时候能得到富贵声名，却不想要，不愿意要。这是因为他们厌恶不由正道而得来的名利。人生值得担忧的事，是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知放纵欲望而不知满足，所以才会有遭受困辱的忧患，才会犯下令人悔恨的过错。常言道，人不知足，往往会丧失其所拥有的，知足的富足才是长久的富足。

观察往事的成败就会明白，追名逐利、贪得无厌的人，没有能保持家族不衰而长久享有福禄的。王昶希望儿子和侄子们立身处世要遵从儒家的教诲，奉行道家的箴言，所以用深沉、静默、谦和、淡泊之意为他们取名字，希望他们不敢违背、逾越圣人的教诲。古时候，盘、盂上都铸有铭文，几、杖上也刻有教戒，为的是低头抬头都能看见圣人的教诲，以提醒自己不要有越轨行为。更何况这些警言就在自己的名字之中，能不随时提起警诫吗？接着，《魏志·王昶传》中写道：“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

“夫”是“凡、所有”的意思。“疾”，就是快速的、疾速的意思。“就”是成功、完成的意思。“朝华”，这个“华”也写作花草的“花”，指早晨开的花朵。“隆寒”是指严寒。“大雅君子”是才德高尚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凡事物发展过快则衰亡也快，缓慢稳定地发展则容易有圆满的成果。我们观察自然界，能看到早晨开花的植物到了傍晚就凋落了。而茂盛的松柏，即使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枯萎。所以德高才大的君子忌讳速成。

《大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道德是根本，财富等只是末枝。财不仅指财富，还指一个人的声望、地位等。古人说“厚德载物”，一个人的德行深厚，他才能承载很高的名声、很多的财富、很高的地位而没有祸患。观察自然界，我们发现，植物根深，才能够叶茂。

孔子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凡事愈是求迅速，愈是达不到目标。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结果反而把大事给耽误了。《大学》告诉我们：“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你追求财富，想一夜暴富，采取了种种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坑蒙拐骗的手段，最后给自己招致了灾祸。古人提醒我们，财富若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也必将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

古人教诲后人真可谓用心良苦，把不好的败散钱财的方式都给我们概括出来了，总结为5个方面：第一是官府。譬如说，这个钱是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换来的，结果东窗事发，自己锒铛入狱，所有的不义之财被没收、充公，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悔之晚矣。第二是水灾。第三就是火灾。这些不义之财会被洪水夺走，被大火焚烧掉。第四是盗贼。古人讲“盗亦有道”，有些盗贼也讲道义。他们的道义首先体现在他劫富济贫上。他们看到一些富人的钱来路不明，又没有拿去做慈善事业、救济穷苦，于是专门偷盗、敲诈、勒索为富不仁的人。第五是不肖子孙、败家子，防不胜防。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孔子的眼里，古时候的学者，学习的目的是提升自己的道德学问，所以称为“为己之学”。

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人不提高自己的德行就会天诛地灭。但是现在很多人把这句话给理解错了，认为人就是要为自私自利而生存，如果不追求自私自利的话，就会“天诛地灭”，这个是不符合道理的。

“今之学者为人”，孔子认为，现在（春秋时代）的学者学习的目的是在聚会时引经据典，说“子曰”“诗云”的一大堆别人听不懂的话，以此显示自己才学突出，胜人一筹，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叹，这就叫“为人之学”。

可见，读圣贤书的目的是志在圣贤。读圣贤书就像照镜子一样，自己身上的毛病、坏习气、问题被照得一清二楚。我们不读书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读了书之后，傲慢心无论如何也生不起来了，愈学愈谦虚，愈学愈觉得自己和古人的境界差得远。

修身的目的是成就自己、自利利人、自觉觉他。古人说“理得心安”。理得心安的人才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忙忙碌碌地去妄求，甚至采取一些不合法、不合理的手段，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利益。

我们再来观察自然界的现像，发现自然界有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如果我们的事业还处在春生的阶段，就不能指望它立刻有所收获。我们都知道《孟子》中有一个揠苗助长的故事，如果你嫌禾苗长得太慢，把它拔高起来，它很快就会枯萎了，这就叫适得其反。

明朝的张居正，在少年时就非常聪明，7岁的时候就能够通达六经大意，在荆州府很出名。13岁的时候他去参加举人考试，文章写得非常好，考官看了之后大为欣赏，准备录取他。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看到了张居正的文章之后，虽然觉得他的文章写得很好，认为他有宰相之才，但是如果13岁就能中举人，恐怕他以后会骄傲自满，所以应该给他一些挫折，以便他以后更加奋发有为。于是，他就让考官不要录取张居正为举人。后来，张居正在官场上走得很平稳，对明朝的贡献很大。他知道顾璘曾经对他有意培养之后，对顾璘一直心存感激。他认为如果没有顾璘，也许他后来不会成为内阁首辅。

古人常说：“少年得志大不幸。”孩子从小就聪明，又接触圣贤教诲，写一手好文章，走到哪里大家都对他赞叹，随着赞叹声愈来愈多，骄傲的心也会日渐生起。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这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华，但如果又骄傲又吝啬，其余就不值一提了。少年得志容易长养一个人的骄慢之心。

《尚书·大禹谟》里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骄傲自满给自己招来损失，因为他觉得他比别人都强，他就不会再有好学的度量，他的人生就很难再进步了。谦虚使自己受益，一个人谦虚好学，对人彬彬有礼，做长辈的、做老师的，都愿意提点他，他的进步就会很快，走到哪里都是一帆风顺。《论语》中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个结果，原因就在于“君子敬而无失”“恭而有礼”，他为人处世恭恭敬敬，没有什么过失，对待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能够看到对方的需要，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样走到哪里，

哪里都有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些教诲，如果我们很早就能够学习到的话，相信我们的人生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王安石的文章《伤仲永》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文章中记述：金溪县的贫民方仲永一家，世代都以耕田为业。方仲永5岁的时候都不曾认识书写工具，也就是不认识笔墨纸砚等。有一天，他忽然哭着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很诧异，就从邻居家借来书写工具给他。没想到，方仲永立即写了四句诗，这四句诗的意思是要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等，并且传给全乡的秀才欣赏，大家对他的诗都很肯定。从此以后，凡是指定事物让他作诗，他都能立即完成，而且诗的文采和义理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同县的人对此感到很奇怪，渐渐地邀请他的父亲去做客，甚至还有人花钱请方仲永作诗。他的父亲认为这样做有利可图，于是每天都拉着方仲永四处拜访问县的人，不再让他继续学习了。

到方仲永十二三岁的时候，王安石再回到家乡，在舅舅家里见到了方仲永，让他作诗，结果一看，他写的诗已经不能与他从前的名声相称了。又过了7年，王安石从扬州回来，再次到舅舅家，问起方仲永的情况，舅舅说：“他的才能已经完全消失，成为普通人了。”

方仲永本来天资聪颖，年仅5岁就能够写出好文章、好诗篇，但是他的父亲急功近利，整天带着他去赚钱，没有让他继续学习，结果到他20岁左右的时候就和平常人一样了。所以王安石在评论的时候这样说：“仲永的通达聪慧是天赋，他的天资比一般有才能的人要高许多，但最终沦为一个平凡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像他那样天生聪明、有如此才智的人，没有接受后天的教育尚且沦为普通人，那么那些本来就不是天生聪明、本来就平凡的人，又不愿意接受后天的教育，恐怕想成为一个平常的人都很难了。”

可见，人有天分要珍惜，再经过后天的勤奋好学，才能够有成就。更何况一个人要取得成就，才华是次要的，根在于德行。

对于修学的人而言，要扎两个根：第一就是德行的根。扎德行的根要从学习《弟子规》做起，这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学习完并落实。第二就是文字学的根。扎文字学的根要从学习《说文解字》开始，这样才能够领会四书五经，乃至“十三经”、《四库全书》的义理，否则很容易望文生义。如果依照我们现代的语义去理解一个字，往往那个甚深的义趣是领略不到的。

正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没有10年的工夫，我们的德行、学问都很难扎根，像树一样，根扎得不深，遇到风一吹，很容易就枯萎了；如果把根扎得很深，即使遇见大风大浪，也不会被摧毁。更何况一个人要在德行上有长进，要改变自己的种种不良习气，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长时间的工夫。

我们调伏浮躁的习气需要10年、20年的工夫，更何况习气毛病那么多。譬如说，别人赞美你几句，你会不会很欢喜呢？自己没有受到应该有的尊重，会不会心生烦恼呢？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会不会心生嫉妒呢？忽然听说某个人成名了，会不会想那个人为什么不是我呢？“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我们做到了看到别人有获得，就像自己有获得一样喜悦吗？看到别人有损失，就像自己有损失一样难过吗？

譬如说，当听到领导在表扬某一个同事的时候，你心里是为他的成就感到高兴、心生欢喜的吗？恰恰相反，愤愤不平之心、嫉妒之心常常就生起。当领导在批评某一个同事的时候，我们是为他的过失感到难过吗？恰恰相反，有些人会想，他做的错事、坏事终于被领导发现了，于是心中窃喜，幸灾乐祸。这些心理都是和人们本来的同情心相违背的。同情心就是和别人有同样情感的心，别人感到悲伤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别人感到欢喜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为他感到喜悦。

不学圣贤经典，确实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即使看到了自己的问题，要想调伏浮躁之气、改正过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发展经济、科技的中庸之道

有些人抱怨说，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因，才使得我们国家的经济、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相对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确实比西方国家发展缓慢，汤因比在《未来属于中国》这本书中说：“中国的发展缓慢反而是有利的，可以避免西方的过度工业化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国古人有一种整体的观念，通过观察宇宙发展的规律知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盛极必衰、消极必长是一个规律。经济、科技盲目过分的发展会使自然界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生态危机。在三国的时候，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这种运输工具，解决了十万大军的粮草运输问题。但是后来他把这种工具给销毁了，没有让它流传下来。因为他看到了机械技术的负面性，担心其会引起社会动乱。

古人发展经济、发展科技背后的哲学理念就是中庸之道。古人常用太极图来表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规律，太极图半边是阴的，半边是阳的，中间还有一个界线，如果过了这个界线就意味着阴阳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平衡就会引起变化，这就叫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消极必长。中国人认识到了这样的规律，才不会过分地发展经济、发展科技，目的是使人类可以持续地发展。

企业如何长久发展

据统计，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是40年到50年。中国大企业的平均寿命是7年到8年，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就更短了，是2.9年。所以在企业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

《大学》告诉人们，做事情是有先后次第的。“有德此有人”，你自己有德行，你所感召的人就是和你志同道合的有德行的人，大家在一起众志

成城；“有人此有土”，这个土在农业社会就是发展一个事业必备的资源，有人才来了，就会有人力资源，使各种资源具备；“有土此有财”，有了资源之后大家又众志成城，把机会、才能发挥出来，自然会创造财富；“有财此有用”，财富创造出来了，要用在哪里非常关键，那应该用在哪里？就是用在使自己的“德日进，过日少”上，而不是用在自己的奢侈浪费上。企业要拿着钱回馈自己的员工，因为没有一线员工的辛苦付出，就不会有整个企业长足的发展。要让员工接受良好的教育，使他们的德行和能力提升，从而更好地推动企业发展。企业还要回馈客户，让他们以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好的产品和服务。企业还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声誉自然很好，能得到很多的助力，大家都愿意帮助它、成就它，这样的企业才能够可持续地发展。

第四讲

利令智昏



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

——《群书治要》卷十一《史记上》

魏徵在《群书治要》的序言中提到，《群书治要》的编辑采取了一个原则，即“一书之内，牙角无遗；一事之中，羽毛咸尽”。也就是说，他所选录的典籍之中，凡是重要的内容都没有遗漏。譬如，如果选的是《论语》，那么《论语》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华，一点儿都没有遗漏；如果选录的是一个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的内容则非常完整，甚至连细节也全部保留。我们从中体会到，魏徵等编纂《群书治要》时用心良苦，目的就是给后人最好的借鉴和启示。从魏徵的存心看，我们也应对《群书治要》这部书生起信心。这部宝典用了5年的时间才编辑完成，说明古人治学的态度非常严谨，把古籍中的精华都挑选出来了。

古人的智慧有两点值得学习：第一就是古人的心很清净，清净才能生智慧。如果把我们的心比作湖水，当我们生气时、发怒时，湖水就会波涛汹涌，对外界的映照就不是如实的了。即使水面泛起小波纹，就像是我们不满意、不高兴了，这个心也不是完全心如止水，对外界的映照也有些许的歪曲。只有当我们的心水平如镜、波澜不兴时，对外物的映照才是如实客观的。第二就是古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时刻想着怎样利

国利民，怎样能够把国家治理好，使天下太平。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气度和胸襟，智慧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唐太宗之所以派魏徵等编纂《群书治要》，就是因为他有胸怀天下的心，确实想把国家治理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要带着这种心理去学习《群书治要》，才能领会其中蕴藏的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①而《群书治要》被誉为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精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读了这部书，对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智慧就会有深入的了解。

厉公正谤

“厉王止谤”是《史记》中的一个典故。《史记》记载，周厉王登位，贪图财利，亲近荣夷公。这时有一位忠臣叫芮良夫，劝谏他说：“王室大概要衰微了吧！”为什么？下边就说到了这一句话：“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荣夷公喜欢独占利益，却不知道会因此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财利是天地之间万物所依赖生存的资源，而要有独占的现象，造成资源分配不均，害处可就大了。“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天地万物都需要用到这些财利，怎么可以独占？“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专有独占财利，所惹怒的人一定会很多，他这样做却不知道有大的祸患，还用这个方法来教唆君王，君王的统治怎么能够持久？

^① 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芮良夫的劝谏非常诚恳，也非常直接，可以说是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劝谏君王。这是古代忠臣一贯的做法，如果看着君王做错事而不去劝告，就是陷他于不义。芮良夫接着说：“作为君王，应该奖励生产，开发地力，公平地分配给上上下下的人，使天地自然、人和万事万物都各得其分。即使如此，还要每天警惕，怕招来怨恨。现在君王却要独占财利，这怎能行得通？普通人独占财利，还被称为‘强盗’。君王如果干这样的事，归附君王的人就少了。荣夷公若被重用，周朝必定会衰败。”

可惜的是，周厉王没有听从劝谏，还是任用荣夷公为卿士，让他主管国事。周厉王施行暴虐的统治，奢侈骄傲，国都的民众都纷纷议论他的过失。这时，召公（也就是召穆公）又来劝谏他说：“民众都忍受不了君王的政令了。”结果，厉王很恼怒，找到一个卫国的巫师，派他去监视那些指责自己的人，只要这个巫师来报告有谁诽谤自己，便立刻把这个人杀掉。于是，议论朝政的人愈来愈少了，诸侯也不来朝见了。

厉王更加严厉，结果“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都的民众都没有人敢讲话了，在路上相遇时，也只能是互相用眼色示意一下。这下周厉王高兴了，得意地告诉召公说：“你看，寡人能消除非议了，民众都不敢乱讲话了。”召公说：“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这些话也成为历史名言了。意思是说：如果把老百姓的口堵住，就像把洪水堵住一样，危害很大。水流被堵塞了，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人民也是如此。所以善于治水的人，要懂得疏通水道；善于治民的人，一定要让民众敢于说话，把心里话表达出来。

厉王仍然不听。3年之后，民众联合起来反叛，袭击周厉王。周厉王只好逃到彘地。后来，宣王即位，整顿政事，效法文武、成康的遗风，诸侯重新归附周朝。

这个典故，至少给予我们以下启发。

修身为治国之本

为什么周厉王任用荣夷公，而不听芮良夫、召穆公的劝谏？《周易》中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道合的人自然会走到一起。君主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也就喜欢任用什么样的人；自己的修身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也会感召什么样的人来到自己的身边。《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君主能修养身心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是难事。

《群书治要·列子》中记载，楚庄王向詹何请教说：“怎么治国？”詹何反问说：“君主为什么明白修身，却还不明白治国的道理呢？”楚庄王很真诚地说：“寡人尊奉宗庙，拥有整个国家，希望学会怎样来守护它。”从这里可以看出，楚庄王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一心一意想把楚国治理好，让百姓安居乐业。詹何回答说：“臣不曾听说君主自身修养很好而他的国家却没有秩序的，也不曾听说君主自身修养不好而他的国家却安定的。所以根本就在于自身修养。像治理国家这种次要的事情，臣就不敢对您讲了。”楚庄王听了之后说：“你讲得很好。”所以在《群书治要》这本讲治国理政的书中，有大量篇幅都是告诉在位者、从政者应该如何修身。

如果君主是贤德的君主，他也必然会用贤明的臣子。《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中说：“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所谓的“不世之君”就是指不是世代都能出现的卓越君主，所谓的“不世之功”就是指不是每一个时代都可建立的伟大功勋。

修身始于戒贪

在位者一定要戒止贪心，特别是不能够与民争利。如果想独占财利，必定会招致民怨，甚至导致王朝的灭亡。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创下

“贞观之治”，和他熟读《群书治要》这部书密不可分。《贞观政要》中记载着唐太宗和臣子的谈话，从中可知，他确实是把这些教诲力行在治国之中了。

《贞观政要·论贪鄙》中记载，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如果人有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没有不视之为宝贵的，但是如果拿着宝珠去射鸟雀，岂不是很可惜吗？而人的性命比明珠要珍贵得多，但一看到金银钱帛而不畏惧法律的惩罚，立即就收受，这就是不懂得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去射鸟雀，怎么能用比明珠更加贵重的生命来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够尽忠职守、正直公道，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得到，一律不必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收受财物。赃物、贿赂一旦暴露，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很可笑的。”在这里，唐太宗用了一个“明珠射鸟雀”的形象比喻，来告诫官员，不能拿着自己的官位不珍惜，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否则只能是得不偿失。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朕曾经说，贪婪的人不懂得爱财的道理。例如，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所得的收入本来就很多了。如果接受别人的财物贿赂，不过几万钱而已。一旦丑行暴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样做哪里是懂得爱财的道理？他们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过去鲁国的丞相公仪休很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送的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鲁国的丞相公仪休，为官很清廉，对属下要求很严格，从来不与民争利。他有一个嗜好就是特别喜欢吃鱼，结果有人就投其所好，送给他很多鱼。他却拒不接受，派人把鱼送了回去。这个送鱼的人就问：“我知道您爱吃鱼，所以特意选了一些上好的鱼送给您，您为什么不接受，又给送回来了？”公仪休说：“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所以今天我不能接受您的鱼。我爱吃鱼，我自己去买不就好了吗？如果我今天接受了您的鱼，会因为受

贿而被抓进监狱，当我进监狱的时候，请问我还能再吃到鱼吗？还有谁再给我送鱼呢？”公仪休的明智之处就体现在没有利令智昏。

唐太宗博览群书，引用了这个典故，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从不接受别人送鱼的官员，他就可以长久地吃上鱼。“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如果国君很贪婪，必定亡国；做臣子的很贪婪，必定丧命。他还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并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提醒臣子不要做这样得不偿失的事。唐太宗作为皇帝，秉持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时时警告朝廷百官，让他们引以为戒。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公卿大臣们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高地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不但百姓安乐，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贤者多财损其志”，虽然原本是贤德之人，财富一旦多了，可能就会骄奢淫逸，过着放纵的生活，不思进取。他的志愿就不像以前那么坚定了。所以“自古公卿出自白屋”，很多有成就的人，年轻时生活都很贫苦，为的是让自己长守这种清白的志向，能够磨炼自己的意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没有智慧的人，给了他很多的钱，他就会拿着钱无恶不作。

唐太宗说：“这话可以引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实践证明，贪官心里都是战战兢兢的，只要一听到外面的警笛声，就想：“哎哟，不知道是不是来抓我的。”他们的这种压力、紧张，让自己的身心都不得安宁。

“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蒙受羞耻？”一旦锒铛入狱，不仅害了自己，自己的家人、儿孙也要跟着蒙羞。从这些对话中可见，唐太宗是一个真正明理的人，他自己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

贞观七年，唐太宗到蒲州考察。当时的蒲州刺史赵元楷是隋朝的旧臣。在隋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游江都（即今天的扬州）的时候，就是赵元楷负责供应美酒、饮食的。隋炀帝与萧后以及宠幸的美女酒杯不离口，赵元楷因“献异味”被提升为江都郡丞，初尝“媚主”的甜头。现在唐太宗又来蒲州巡视，他故技重演，令老年人穿着黄纱单衣，准备在路旁迎接拜见皇帝，并且大肆修饰官署的房屋，修建、装饰城楼城墙以讨好唐太宗。除此之外，他还暗地饲养了几百头羊、几千条鱼，准备送给皇亲贵戚。

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后，他把赵元楷招来斥责说：“朕巡察黄河、洛水之间的地区，经过了几个州，凡是用度所需，都是由官府的物资提供。你给我们饲养羊、鱼，雕饰庭院屋宇，这种行为无疑是已灭亡的隋朝的坏风气，现在不能再实行了，你应该理解朕的心意，改变旧习。”由于赵元楷已经习惯于阿谀奉承，为人很不正派，所以唐太宗就说这样的话来告诫他。结果，赵元楷听后又惭愧、又害怕，几天吃不下东西就“寿终正寝”了。由此可知，为什么隋朝很快就灭亡，而唐太宗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恢复天下安定，创下了“贞观之治”？这是因为他真正能够从古籍之中汲取经验教训，明白修身是治国之根本的道理。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的大山有很多银坑，如果开采出来，利润很大，每年可收入银钱几百万贯。”如果是贪财好利的君主听到这样的建议，一定会非常高兴，马上派人去开采。但是唐太宗到底熟读经书，他说：“朕贵为天子，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缺乏。朕缺乏的是什么？朕需要的是什么？朕只需要有好的建议，来推行善事，以有益于百姓。更何况国家增加几百万贯的钱，怎么能比得上得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呢？”这全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古人不以金银财宝为宝，而是以人才为宝。唐太宗说：“你不推举贤能，建议善事，也不揭发奸邪之人，使权贵豪强震惊敬肃，只会说出租出售银坑以获取利益的事。过去尧

舜把璧玉扔进山林，把宝珠沉没于深渊，因而美名被称颂千古。后汉的桓帝、灵帝却重利轻义，是近代有名的昏庸之君。你这样做，是要把朕当作桓帝、灵帝吗？”我们从这一段对话中，就能够看出明君的风范确实与众不同。不仅如此，他当天就勒令权万纪停职回家。

《论语》中有言：“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如果在上者没有贪欲之心，即使奖赏人们去偷盗，人们都不会去偷盗的。如果在上者特别喜欢这些珍奇之物，喜欢贪财好利，那么上行而下效，老百姓也都会竞相去追逐利益。所以唐太宗能够把朝政治理好，创下一代盛世，成为一代明君，绝非偶然。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又对侍臣说：“古人说，飞鸟栖息于树林，还唯恐树木不够高，要筑巢于树木的顶端；鱼藏于水中，还唯恐水不够深，穴居于水底洞穴之中。然而它们仍然被人们所捕获，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它们贪图诱饵、抵制不住诱惑。现在大臣接受任命，居高官、享厚禄，应当忠诚正直，清廉无私，这样才没有灾祸，长守富贵！古人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那些以身试法的人，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些人与那些鱼和鸟又有什么不同？你们应当好好想想这些话，作为借鉴和告诫。”

古人提醒我们，面对财色名利，要有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当别人用金钱美色来诱惑你的时候，不要觉得很得意。实际上，人家不过是拿着诱饵诱惑你，希望你跳下这个悬崖。如果你把持不住，经不起诱惑，就会滑向深渊，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学习《群书治要》，为什么对反腐倡廉有帮助？如果领导干部都能够读一读这些历史教训，看一看唐太宗是怎样身体力行圣贤教诲的，就知道贪财好利的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得不偿失。“祸福无门，唯人所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至理名言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适用；在中国适用，在外国也适用。

譬如说，2001年，著名的安然公司（原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天然

气和电力公司之一，在北美地区是头号天然气和电力批发销售商）突然破产了。为什么会破产？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在位者、公司的领导层想独占财利。当时安然公司在世界500强公司中排名第7位，可以说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家公司。这样一家公司为什么说破产就破产了？西方国家很重视制度建设，他们的制度看似很合理：要聘请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光给他工资是不够的，还必须给他公司的股份，这样才能调动其积极性，使他愿意为公司的利益去打拼。

一家公司的发展如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有起有伏，有上升的时候，也有下降的时候。当公司经营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公司的股价就不会增长了，这样就会影响CEO的收入。股价不增长怎么办？这些“聪明人”就想出个办法，为了保证自己的收益不受损失，他们就通过做假账来创造利润。结果他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公司上层做了6亿美元的假账，掩盖了29亿美元的负债。董事会的29个成员，因为持有173万股的安然公司股票，获益高达11亿美元。

这11亿美元让29个人分，每个人获利确实丰厚，诱惑也很大，但是这样的丑行迟早会暴露。安然公司破产以后，公司CEO被判处有期徒刑165年。另一名董事会高级成员刚用贪得的钱买了一辆豪华轿车，还没有机会去享受，就在豪华轿车里开枪自杀了。

这就是“利令智昏”。在利益面前，人们失去了冷静，昏头昏脑，最后做出了这样不理智的行为。事情败露之后，安然公司宣布破产，这家世界500强的企业毁于一旦。

安然公司的破产被称为美国经济界的“9·11”事件，并不是因为安然公司做假账的数额巨大，而是在安然公司破产之后，美国政府开始调查各大跨国企业做假账的情况。结果发现，有些跨国企业也做了巨额假账。譬如说，有一家著名的公司，在15个月内，伪造了38亿美元的假账。而另一家著名的国际企业，在5年之内做了60亿美元的假账。2002年，

美国政府发布报告指出：2001年美国各大企业因为这些假账，给美国政府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00亿美元。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必须戒止人的贪欲，“多行不义必自毙”。

防民之口，甚于防水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着“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这个乡校就是古代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郑国人都到乡校休闲聚会，并经常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郑国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我听说过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的。很快制止这些有益的议论不是很容易的吗？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我们听取这些有益的议论，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可见，开明的领导者，都是想方设法地了解百姓的心声，要让百姓把他们的建议传达出来，而不是一味地把他们的嘴巴堵住，不让他们说话、发表建议。

这段话讲的就是，中国人讲“民本”，很注重让民众反映心声，汲取民众的建议。历史上很多开明的君主，设计了很多制度，使得民众能够直接批评朝政的得失，并且选拔任用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臣子，听取他们对朝政的批评和建议。

可见，古代有些君主非常开明。他知道任用什么样的臣子对自己有真正的帮助，而且还想方设法地鼓励臣子监督自己的言行，给他提不同的建议。这样才能够使民众的意见传达到上面，上面的决策才能够体现民心，受到民众的拥护。

教学为先乃盛世之因

“宣王即位，修政，法文、武、成、康遗风，诸侯复宗周”。周宣王即位之后，他整顿朝政，而且效法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遗风。诸侯又重新来向周朝朝拜了。为什么在短短时间内，周宣王就改变了社会风气？这是因为他兴起了道德教化。“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文、武、成、康之所以能够创下盛世，把国家天下治理好，就是因为他们重视道德教化。只要我们重视道德教育，把人教好，那么，天下太平，恢复安定，也是指日可待。

汤因比在系统研究了各国文明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属于中国”的论断，认为未来世界是中华文化得以普遍宣扬的世界。一个外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充满了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性。我们一方面要提倡深入经典、弘扬《群书治要》《国学治要》等，让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正确的认知；另一方面要提倡通过弘扬传统文化，建设和谐小区、和谐企业、和谐城镇，在实践中树立典范。相信，通过弘扬中华文化，必将大大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第五讲

养心莫善于寡欲



戒慎视听，提升心性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群书治要》卷三十四《老子》

“五色令人目盲”，“五色”是指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在这里也泛指各种颜色，以及五彩缤纷的色相。意思是说，过分地贪恋五花八门的色彩，追求五彩缤纷的色相，注重视觉的享乐，会使人精气神外散，让眼睛受伤，视觉迟钝。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电视、计算机、网络普及以后，患有近视的人愈来愈多。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沉溺于声光刺激之中，对眼睛的伤害很大。“盲”，不仅指眼盲，而且还指心盲，也就是看不到别人的需要。愈来愈多的人把时间用在了看电影、看电视、打游戏上，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而看不到周围人的需要，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愈少，心与心的感应能力也愈差。古人所谓的察言观色，是当你特别关心一个人的时候，看一下他的面目表情、他的一个眼神，就知道他身心的状况，他是不是有压力，等等。甚至当你真正关心一个人，心里时时刻刻念着一个人的时候，两个人都不需要见面，心与心之间就能够互相感通。

对于修行人而言，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提升自己的心性。人的心为什

么不灵了？就是因为被欲望、思绪、烦恼占满了。古人有一个词叫“空灵”，这个词很有味道，只有把心空掉，才能变得灵敏，才能够更好地感知他人的需要。

现在，很多人都过着一种“忙—盲—茫”的人生。第一个“忙”是“忄”加“亡”。这个字告诉我们什么叫“忙”，当我们很忙碌的时候，我们的心被诸多琐事占满，它就不敏锐了，不觉悟了。第二个“盲”就是眼盲的盲，看不到周围人的需要。第三个“茫”是茫然的茫。虽然有些人事业很成功，但换来的是家人的怨声载道。他很茫然，不知所措，很无辜地说：“我这样忙碌、这样辛苦，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为什么大家都不理解我？”这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家人真正的需要。

修行人特别重视修身。《大学》的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身的首要目的就是明明德，使自性本具的明德开显出来。人的本性本自清净无染，寂而常照，为什么现在变得不明？原因很简单，就是被私欲、外物所障蔽。因为人心不断向外驰求，所以就离本自清净愈来愈远。

人的真心“本无动摇”，能动的是妄心，不动的叫真心。古人常用水和波的关系表明真心和妄心的关系。真心和妄心是一不是二，就跟水和波是一不是二的道理一样。当水波动的时候，它就是波，就是妄心；当水平如镜，不动的时候，它就是水，就是真心。

人心之所以会妄动都是缘于外境的感发。《礼记·乐记》中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眼见色被五色所迷惑，耳闻声被五音所牵引，口尝味被五味所诱惑，这个本心就会随而迁化，丧失了本有的中正状态。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特别是对初学者而言，要想恢复明德，操存本心，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戒慎视听，也就是要做到孔子所教导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个方法就是程子所说的

“制于外所以养其中”，就是制止所看的、所听的、所吃的、所说的、所起心动念的，为的是能够保持本心的不动。我们知道了修身的目的在于明明德，对于耳目口鼻身等器官所交接的东西就不能够不谨慎。一定要做到《弟子规》所说的：“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这句话就是提醒初学者，要懂得主动远离赌场等诱惑人堕落的场所，远离污染源，不接触就不会受到诱惑。

戒色戒淫，修身养性

《群书治要》中对“五色令人目盲”的批注，采用的是《老子河上公注》。批注说：“贪淫好色，则伤精失明。”其中的“色”就不能解释为色相、色彩之意，而应解释为女色。从这里我们知道，经典中的句子不是只有一种意思，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同一个经句的理解和体悟也都有所不同。经典里的句子都是与性德相应的，每一句话都有无量义，可以反反复复地读，每一遍的义趣都不同。古人小时候读《论语》，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还在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就是乐在其中。因为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一句话的体悟会有所不同，有所提升。

“贪淫好色，则伤精失明”说的是，假如贪好女色，就会伤害眼睛，伤精害神。这句话主要是提醒人不要过分地迷恋女色，要节制欲望，不可以放纵。孔子也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人在青少年时期血气未定，身体的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对于色要特别谨慎，要戒禁，否则会纵欲伤肾，最后连眼睛都会受影响。在中国古人看来，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一旦放纵欲望，整个身体系统就会失衡。

常言道，“万恶淫为首”。一个人要想修身立德，戒色、戒淫是首要的。古人说：“克己须从难克处克将去。”一个人要克除自己的私欲，要

从最难克除的习气下手。人如果能够戒除贪淫好色，不仅可以战胜自己的欲望而成圣成贤，还可以强身健体，使精气神充足。反之，不但容易衰老，而且在不能自抑的时候，容易败德乱行，做出种种恶事来。

所以古人对这个“色”字看得十分重，很多圣贤书都告诉人要戒除女色。贪淫好色不仅伤身，而且有损道德。古代大多数读书人对于“色”都是战战兢兢的，不敢越雷池半步。

要避免受到色欲的诱惑，第一，必须戒慎视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远离“污染源”，保持自己的清净心。第二，要明白贪淫好色得不偿失，特别是邪淫危害很大。

古人有很多方法来克除邪淫的欲望。譬如说，“不净观”。古人把人体比作一个臭皮囊，外边好像装饰得很好，穿着绫罗绸缎等，但里边装着的都是血、肉等。明白了这一点，对于人体结构就会比较明了，就不会被表象所迷惑了。

德音雅乐，调养生息

“五音令人耳聋”，“五音”是指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群书治要》中的注释说：“好听五音，则和气去心也。”不良的声乐刺激，不仅会伤害人的身体，也会伤害人的心灵，让人的心很难安定下来。《礼记》中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先王制礼作乐的目的并不是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教导人们培养出正确的好恶观念而返回到做人的正路上来。音乐确实可以陶冶性情，但那是德音雅乐；不好的音乐，过度奢靡的音乐，不仅起不到好的效果，反而还让人放纵欲望，心灵空虚，甚至对情感不知节制。古人认为，音乐不只是为了娱乐，还要承担起教化人心的重要作用。《孝经》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子到了一个地方，他没有问这

个地方的政事办得如何，而是先听一听流行什么样的音乐，从音乐中他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民风如何了。

《吕氏春秋》中也有这样一段话，描述了乱世之乐的特点。乱世的音乐，如果演奏木制、革制的乐器，声音就像打雷；演奏铜制、石制的乐器，声音就像霹雳；演奏丝竹歌舞音乐，就像大嚷大叫。用这样的声音来扰人精神，震动耳目，放荡性情，倒是可以办到的，但是用来作为音乐演奏，绝对不能给人带来快乐。所以音乐愈是放纵奢华，人民愈是抑郁，国家就愈混乱，君主的地位就愈卑下。这也就失去音乐本来的意义了。

“五音令人耳聋”，是提醒人不要过分重视听觉的享乐。现在有的人喜欢听摇滚乐，喜欢去蹦迪，嘈杂刺耳的音乐对人的听觉伤害很大。

“五音令人耳聋”，也提醒人，如果过分地放纵于听觉的享受，就听不到自己和他人的心声，古人把这种声称为“无声之声”。但是如果外界很嘈杂，这个心声就难以被听到。

涵养口德，净守本心

“五味令人口爽”，五味是指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在这里也泛指各种味道，或者调和众味而成的美味食品。“口爽”这个“爽”字有伤败的意思。过度重视这些美味，也会伤害到自己的味觉。人如果特别喜欢辣、辛等味道重的食物，吃到最后，舌头都麻木了，味觉就不灵敏了。一些食物的原味，譬如说青菜原本的清香味就尝不出来了。人对食物的欲望愈淡、口味愈轻，他的味觉就愈灵敏，就愈能吃出食物的原味。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这个欲望也包括了食欲。

《群书治要》中批注说：“爽，妄也。人嗜于五味，则口妄，言失于道。”这个“嗜”就是嗜好的意思。人很重视、很喜欢美味的时候，食欲也会愈来愈重。而食欲一增加，可能会影响人言语上的态度，变得好说。

我们会发现，往往特别喜欢吃的人，在餐桌上也特别好说，而言多又必失。总之，心动言出，贪心、欲望扰乱了清净心，心一妄动，不合礼的话，如绮语、恶口就都说出来了。言出心随，不合礼的话一说出口，譬如说你骂人，愈骂愈生气，心也愈妄动，就会使心更加起伏不定。

“口为祸福之门”，与祸福荣辱事关重大。古人告诉我们，务要涵养口德，做到“非法不道”，才能保守本心的清净。《周易》中告诉我们，观察人，也可以从人的言语上来观察：“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讲话很少，时时养精蓄锐、谨言慎行的人，他的欲望也少，消耗能量也比较少，所以不需要吃太多。相反，一个人心里很浮躁，就特别爱讲话。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田猎”就是打猎。骑着马驰骋、打猎，追逐野兽，马又一直在动中，人会心神不宁，心性会被引发得比较狂野。在猎杀野兽的时候，人有杀戮之心，与人的慈悲心是不相应的。孟子说：“君子远庖厨，所以全吾恻隐之心也。”在厨房里经常杀小动物，杀生害命的事见得多了，就见怪不怪了，人的同情心、慈悲心就会愈来愈少。所以君子远离庖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恻隐之心。

唐太宗是武将出身，很喜欢打猎。有一次他外出打猎，途中突然遇上了大雨，他的雨衣被淋漏了。这时，他问谷那律关于雨衣的事。谷那律当时担任谏议大夫，他有一个绰号，叫“九经库”，是当时的名臣褚遂良给他起的。我们现在讲的“十三经”是宋朝以后确定的，在唐朝初年的时候，明经科，考“九经”（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九经”是指“三礼”“三传”、《周易》《尚书》《毛诗》，合起来称为“九经”。“三礼”是指《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是指《左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谷那律被称为“九经库”，说明他对于经典非常通达。

唐太宗问谷那律道：“雨衣怎么样做，才不会漏雨呢？”谷那律回答：“如果用瓦来做，肯定不会漏雨。”这怎么能够用瓦来做雨衣？那是不可能的，穿在身上也很重、不方便。“听思聪”，唐太宗一听就明白了。谷那律的言下之意是希望自己不要经常出来打猎，那就不会被雨淋着了。唐太宗对他的回答大为赞赏，赏了他50捆缎锦，还有一条黄金为饰的带子。从这里我们看到，唐太宗虽然喜欢打猎，但他也熟读经书，知道打猎的害处。当谏议大夫稍一提醒，他就高兴地接受了，并且鼓励人们给他提建议。

现代社会发展相对文明了，一般国家都禁止打猎。但是一些孩子以及成年人过度沉迷于电子游戏，而且游戏的内容带有暴力倾向，长此以往，也无益于人的身心健康。

拒贪财宝，克己守正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难得之货”是指很贵重的、难以获取的货物，譬如说金银珠宝、珍禽异兽、玉石古玩等，这些东西都会让人心浮动。“妨”是损害的意思，就是人看到这些金银珠宝、珍禽异兽、玉石古玩等起了贪心，想去追求。有些人一生都耗费在物欲的追求中，买房子、买车子、买奢侈品，最后连自己的孩子、家庭都没有照顾好，更谈不上个人灵性的提升了。

对物欲的极度追求，除了对自身的伤害之外，对社会风气的损害也很大。《淮南子》中记载，衰败之世的社会风气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就是重视远方而来的货物，珍视难得的财物，而不注重生活必需品，使天下质朴敦厚的风气日渐淡薄，以清为浊。

这种“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的风气一旦形成，人们就会去抢购、收藏这些东西，想方设法地获得这些东西。结果偷盗的现象也会愈来愈多。《论语》中记载，季康子患盗，就去请教孔子。孔子回答说：“苟

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如果你自己不贪图财物，即使你奖励人们去盗窃，人们都不会去做的。上行而下效，上边的人喜欢什么，下边的人就会跟着效仿。上边的人重视伦理道德，下边的人也会注重修身；上边的人重视这些难得之货，下边的人也会跟着去收藏、抢购。《老子》中说：“我无欲而民自朴者也。”如果在位者没有欲望，那么百姓之间的风气也就自然淳朴了。

《群书治要·尚书》中记载，在周武王的时候，西旅国来向周朝朝见时，献上了一种名叫“獒”的猛犬。太保召公得知此事之后，立刻撰写了《旅獒》一文，提醒劝诫周武王。这篇文章中写道，圣明的君王慎修德行，四方外族之邦来归顺朝见，不论远近都献上当地的特产，不过是一些吃穿器具之类。圣明的君王于是借此来显扬恩德与异姓诸侯国，使他们不要荒废了政事；又将宝玉分赐给同姓的诸侯国，以表达对亲情的重视。人们不轻看这些物品，因为它代表了君王的恩德。君王德行隆盛，就不会轻视、怠慢他人。君王若轻视怠慢了在位的君子，他们就不会尽心；君王若轻视怠慢了百姓，他们就不会尽力。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弄人就丧失了自己的品德，玩物就会让自己的志向丧失。不要做那些无益之事而耽误、妨害了有益的事，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看重奇异之物、不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犬马不是土生土长的不畜养；珍禽异兽不在国内繁育。不把远方之物看得那么宝贵，远方的人就会归服；看重的只是贤德之人，近处的人就会安心。要从早到晚无不勤奋。平时不慎重对待细微的行为，最终会损害大德，就像要堆起九仞的高山，却功亏于一篑。若能真诚地奉行这些劝告，百姓将安居乐业，天子才能世代称王。

古人“见微知著”，看到有人送了猛犬獒，立刻就担心武王沉溺于远方之物，把远方的贡品看得很珍贵，而丧失了自己的德行，所以马上就写了这篇文章来劝谏，防微杜渐。

如果人把心思都花费在追求远方之货、难得之财上，那么就不会注

重提升自己的德行。甚至他会问你，什么叫“明明德”？那对我有什么用？当然能这样问的人已经不错了，因为他还知道有一个“明德”需要“明”。有些人醉生梦死地沉溺于欲望的享受和满足之中，一天一天地堕落，自己却不知不觉，哪里还懂得“明明德”？

一位好的领导者会带动整个社会形成好的风气。古人说：“公门好积德。”一个人的影响力愈高、社会地位愈高、责任愈重，积德也就愈容易。一位好的领导者提倡重视家庭伦理，重视孝道，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有利于引导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第六讲

远离酒色声乐



五子之歌

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

——《群书治要》卷二《尚书·五子之歌》

这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帝禹的孙子，也就是启的儿子太康，虽然身居帝位，但是不务朝政，特别喜欢游乐、打猎，放纵自己的情欲，没有节制。百姓对他很怨恨，但他也不知道反省。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打猎，100多天都不回京都。这时，有穷国的国王后羿趁着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候，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回国。太康的五个弟弟也侍奉着母亲随从打猎。在洛水和黄河的交界处被拦住之后，几个弟弟埋怨太康不理朝政，才导致了今天的困境。他们五个人分别作了一首诗歌劝诫太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子之歌》。

大弟弟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成了中国民本思想的代表。“惟”是“是”的意思。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是全、都的意思。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能够战胜我。“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明”是指显露的、明显的。“图”是图划、谋划的意思。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该在尚未显露的时候就有所谋划。“予临兆民，懔乎若

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弗敬？”“临”是治理的意思。“兆民”指民众、百姓。“懔”同凛，畏惧。“朽索”是腐烂的绳索。我治理民众，危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马之车。“为人上者”，就是作为民众的君主，怎么能够不时刻保持敬畏和警惕呢？

二弟弟说：“训有之。”我们的老祖宗大禹早就有这样的教训：“内作色荒。”在内兴起迷恋女色之风；“外作禽荒”，在外又兴起游猎的风气；“甘酒嗜音”，喜欢饮酒没有节制，还迷恋歌舞、靡靡之音；“峻宇雕墙”，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还雕绘着图饰。“有一于此，未或弗亡”。上述情况有一种出现了，就没有不灭亡的。“此六者，有一必亡，况兼有乎！”以上所说的这6种情况有一种出现了，就必定会灭亡，更何况这6种情况全都出现了呢？

三弟弟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陶唐”是指尧帝。“乱”就是扰乱。因为有了尧帝，才占有了冀州这块地方；如果丢弃了尧帝的治国之道，扰乱了尧帝的法纪纲常，就会招致灭亡。

四弟弟说：“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荒墮厥绪，覆宗绝祀！”“典”是指经典。“贻”是传留的意思。“绪”是事业的意思。“宗”是祖庙的意思。我们十分圣明的祖先是众多邦国的君王，有万世不易的经典和治国的制度、法则，把这些都遗留给子孙，可我们现在却荒废了前代人的事业，倾覆了宗庙，断绝了祭祀！

五弟弟说：“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世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畴”是谁的意思。“郁陶”是哀伤的意思。“忸怩”是指羞愧的样子。我们将何以回归呢？我的内心怀着深深的悲伤。普天下的人都怨恨我们，我们还将依靠谁呢？我的内心充满了哀伤，脸皮再厚，也隐不住内心深深的羞愧。平日不慎修自己的品德，虽然后悔，难道还能追回吗？

通过这个故事，人们可以感受到古代这些君王，一旦骄奢淫逸、不理朝政，身边的忠臣，甚至是贤明的弟弟们，都会劝告他。

英雄一定能过美人关

“内作色荒”，“色荒，惑嬖宠也”。“惑”就是迷惑，“嬖宠”就是宠爱。在内迷惑于受宠的女色。“荒”是指纵欲迷惑、逸乐过度的意思。

中国有一句古话：“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句话有待商榷，因为真正的英雄一定能过美人关。如何才能过美人关？难过的美人关，大多数都是因为自己所喜欢的人，是出于情感上的需要或心灵上的爱慕。对于这种情况，首先要区别爱与情的不同。

中国古人把爱称为慈悲。因为爱是理智的，是出于智慧，是不变的；而情是感性的，它表现为情执，是可变的。今天说着海誓山盟、海枯石烂永不变心，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甚至成为冤家对头。爱是清净的、无私无求的；而情是有求的，往往和欲望联系在一起。爱是平等的，甚至可以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对一切人、一切众生，都是相同的；而情则是有等差的，通常指向特定宠爱的对象。

爱是真正为对方着想，繁体字的“愛”，表达爱是用心感受对方的需要，特别是要帮助对方提升境界。所以爱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带给人心性的提升。而情的希求是从对方那里获得欲望的满足或者至少是心灵的慰藉，因而它带有索取、占有、控制的性质，一旦满足不了，就容易由爱变成恨了。如果一个人沉溺于欲望的享乐，整天卿卿我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往往会使丧失意志力，志愿不能坚定，也提不起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终将一事无成。所以情不仅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和寿命，而且还会使人的灵魂堕落。历史上很多皇帝寿命都很短，就是纵欲所导致的。

我们认识到爱和情的区别，就要把这个情执转变为真爱。一个人一生中能够遇到与自己投缘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与人之间的善缘可遇不可求，一定要懂得珍惜。要做到相识、相知、相惜、相爱，这个爱不是沉溺于欲望的满足，而是相互帮助、相互成就，否则既辜负了今生人之为人、提升心性的机会，也辜负了对方为自己的种种付出；这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对方不负责任，那就不是爱，而是害了。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真心爱一个人，怎么忍心带着他一起堕落呢？

“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另外一种情况，更多的是受欲望的控制而不能自拔。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明理，知道欲是深渊。古人在这方面讲得很多，如“色字头上一把刀”，这一把刀，把所有的功名利禄削得平平的，让人一无所有。《尚书》中也说：“天道祸淫最速。”天道就是自然的规律，它给淫乱的人、放纵的人带来灾祸是最迅速的了。要认识到色欲的危害，要发起羞耻心、畏惧心、勇猛心来改过，特别是要多读有益的书。

所以英雄一定要过得了美人关，过不了美人关的人不配称作英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英雄不仅能够战胜千军万马，而且也能够改正自己的毛病、习气，克制自己的欲望。

古人提醒我们，可以把这些漂亮的女子视为自己的亲人，譬如把她们视为自己的姐姐、妹妹等。这样就可以以礼相待，做到“发乎情，止乎礼”。

“外作禽荒”，“禽荒，耽游乐也”。耽是沉湎、沉溺的意思；“荒”是迷乱的意思。也就是在外沉湎于过度的游乐。

上一讲讲到“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讲到了过度沉迷于电子游戏对人的不良影响。其实，在现代社会还有一种游戏，就是飙车，具有危险性、刺激性，和打猎一样，能够令人心发狂。《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古人提倡，对于危险的游戏应避之唯

恐不及，不要让身体受到损伤，让父母担心。

饮酒的过患

“甘酒”中的“甘”是美的意思，就是以酒为美，喜欢饮酒。《群书治要》最后一卷中《抱朴子》上有一篇《酒诫》，把饮酒的危害描述得淋漓尽致。

“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豪锋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渺不及祸。”“醴”就是甜酒。酒和醴的味道接近，都是致病的有害之物，对人没有丝毫的益处，却有像山丘一样的大害。君子因为它而败坏了德行，小人因为它而招来罪过。沉迷于酒醴之中的人，很少有不惹祸上身的。

“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绝，又不肯节，纵口心之近欲，轻召灾之根源，似热肠之恣冷，虽适己而身危”。世间人都知道饮酒的危害，但是很少有人能戒除，也不肯有所节制，放纵内心和口腹之欲，轻视了就是招致灾祸的根源，好似人内热时喝冷饮一样，虽说一时适意，身体却受到了伤害。“小大乱丧，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湎”。小到个人的祸患，大到国家的灭亡，无不是由酒所造成的。然而世俗之人却依然畅快地饮酒，沉溺于其中。

《酒诫》后边还描述了酒后乱性的癫狂场景，呈现了各种酒徒的不同丑态。有的和人争辩求胜，有的哑哑独笑，有的自言自语，有的呕吐得几案座席到处都是，有的跌倒爬行、行路踉跄，有的摘下帽子、解开腰带。平日操守好的人，也变得像华督那样四处乱看；平日性情怯懦的人，也模仿大力士庆忌那样显示能耐；平日性格稳健的人，变得如飞蓬旋转，四处叨扰；平日端庄严肃的人，却像鹿跳鱼跃一样闹腾不已；平日不善寒暄的人，也都会拊掌来附和叫好；平日谦恭而于世无争的人，也变

得趋炎附势，去同地位高的人交往。这样，廉耻的礼仪毁弃了，而荒唐错乱的毛病出现了；卑鄙的品性显露，傲慢凶狠的态度产生了；精神错乱，善恶颠倒。

如果邪风吹入腑脏，会使人精神恍惚，患上这种病，没有人不担心害怕的，忍受着痛苦，总想着疾病赶快痊愈。喝酒造成的恍惚错乱，跟这又有什么区别？人愿意独居密室以躲避邪风，却不愿意抑制欲望以节制饮酒。如果人们畏惧饮酒像畏惧邪风、憎恶酒醉如憎恶生病一样，那么放纵、沉湎于饮酒的毛病就能够戒绝，并且可以避免因留恋美酒而导致的种种过失。邪风给人带来的疾病尚且需要治疗，更何况酗酒造成的病变，只在呼吸之间。醉酒之时，神志不清，能把泰山看成弹丸，把沧海看成盘盂，仰面大叫天要塌下来了，俯地呼喊地要陷落了，睡在地上等待虎狼来临，乃至投入井里、跳入火堆也毫不惧怕。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身体尚且如此，又怎能以珍惜恭敬的礼仪来防备喜怒无常带来的过失呢？

古时候发明酿酒技艺的仪狄因向大禹进献美酒而被疏远，夏朝因此而兴起；酒糟堆成山，酒浆满池，结果夏桀、商纣因此而亡国。丰侯获罪，是因为头上顶着酒樽，口中衔着酒杯；刘表政事荒废、衰败，是因为他珍藏着伯雅、仲雅和季雅三个酒爵（酒杯）。赵武失去民众，子反被杀戮，灌夫被灭族，季布被疏远斥退，子建被免官黜退，徐邈被禁言，都是因为酒。但是社会上的人们喜爱饮酒并以饮酒为乐的人很多，而戒酒怕酒的人却很少。乐之者众，戒之者少，劝诫的箴言又怎能生效呢？只希望君子能够节制饮酒。这一段话把饮酒的过患描述得淋漓尽致，如果那些喜欢饮酒的人看到这样的描述，都应该引以为戒。

很多人说，“饮酒可以减轻压力”，其实这一句话似是而非。饮酒就是麻醉自己。有痛苦的时候才需要麻醉。人为什么会有痛苦？很简单，就是因为人该承担的责任没有承担好，没有读书明理；追名逐利，所交的都

是酒肉朋友。古人说：“有酒有肉好兄弟，急来何曾见一人？”“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大家都是以利益来交往，利益没有了，交情就疏远了。所以古人经常有“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的感慨。

正是因为不明理，整天追名逐利，所以人生过得空虚，感觉没有可信任的人。病痛的根源没有解除，问题就不能够得以解决。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学习圣贤书，明白唯有以道相交，才能够天长地久的道理。古人说：“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人唯有承担起责任，把“五伦”关系处理好，人生才会愈走愈充实，不会觉得空虚。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而不需要用酒来麻醉自己，躲避痛苦。

《左传》中记载，鲁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动乱，太子御寇被杀。公子陈完流亡到了齐国，齐桓公想任命他做卿。陈完辞谢说：“我是流亡到齐国的人，大国公收留我，就是对臣下很大的恩惠了，怎么敢接受这么高的官位呢？”最后齐桓公任命他做工正，也就是主管工匠的官职，陈完接受了。随后陈完请齐桓公喝酒，两人喝得很高兴，不知不觉喝到了晚上。齐桓公说：“我们点上灯再接着喝吧。”齐桓公喝得这么高兴，如果是普通人，一定会答应他的要求，但是陈完没有答应。他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我只是选择在白天来招待您，没有选择在夜晚招待您，所以不敢听从您的命令。这就等于把齐桓公的要求直接拒绝了。陈完陈述了拒绝的理由：“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中国人说“无酒不成席”，酒是帮助完成礼仪的，但决不能没有限度地喝下去，只有这样才符合义，才是适宜的。能让君主完成礼，同时又不饮酒过度，这才是对君主真正的爱护。话说到这种程度，齐桓公当然不好意思再继续喝下去了，一场酒席也就到此结束。从这里我们看到，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过度，都要有分寸，要符合礼的节度。即使是君主的要求，臣子如果觉得不符合礼仪，

也要婉言拒绝。

佛经上告诉我们，饮酒有十种过失。第一是“颜色恶”。饮酒的人，容貌面色因常常饮酒而变得不正常，没有好的相貌。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一般的酒色之徒脸色都发暗，而且眼睛里有一种不正的神情。第二是“下劣”。饮酒之人，酒醉之后东倒西歪，站都站不稳，威仪不整，动作轻薄，容易被人轻视厌恶。第三是眼视不明。经常饮酒会使人眼睛昏花，视力下降，看不清楚眼前事物。第四是现嗔恚相。饮酒之人不能控制情绪，容易对亲属或贤善之人发脾气。特别是当他有抱怨的时候，酒后神志不清，把所有的话都说了出来。《群书治要·六韬》中记载，观察一个人能不能胜任将军之职有一个方法，就是“醉之以酒，以观其态”。让他喝醉酒，看看他酒后是否失言，是否失态。第五是坏田业资生。人酒醉的时候谈生意，很容易出麻烦，如果真的签了约，可能会后悔莫及，给自己的事业造成障碍。第六是致疾病。人饮酒过度，身体失调，会导致患慢性病、急性病等。常常饮酒的人，身体不可能健康强壮。第七是“益斗讼”。人醉酒发狠，与他人争竞，怨恨发作，这叫嗔毒。人在没有饮酒的时候还能控制住自己，饮酒之后自制力下降，难以控制自己，最容易引起争斗，甚至会因为好勇斗狠而不惜生命。第八是恶名流布。常常醉酒之人，舍弃善法，没有人赞美他，反而恶名流布，远近皆知。第九是智慧减少。人饮酒昏迷，颠三倒四，愚痴狂悖，记忆力下降，聪明智慧也日渐减少。第十是命终堕恶道。

饮酒有这么多的过失，人们确实应该下决心远离酒、戒酒。

靡靡之音的危害

“嗜音”，“嗜”是特别爱好的意思，音乐是刺激感官与情绪最剧烈的艺术。无论是制作音乐的艺人还是欣赏音乐的人，都应格外注意，不能嗜

好令人狂乱的音乐，或者靡靡之音。

孔子在《论语》中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声，是郑国的音乐，也就是“淫声之哀者”。“雅”，是正的意思。宫、商、角、徵、羽五声，什么时候用什么乐，都有一定的规矩。“雅乐”，是先王的雅正之乐，中正和平，能够调和性情，与人的本性相应。“郑声哀以思”，郑国的音乐淫哀，容易使人心妄动，不得性情之正。当时有很多人都喜欢听郑声，却不知雅乐，结果是以淫乱雅。

音乐对心灵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毕达哥拉斯提出，教育的目的是灌输一种对和谐的爱。通过欣赏音乐的美，人与人之间可以变得和谐。音乐不仅是娱乐，在教育中，音乐是被用来传授道德的。因为它可以控制品格中欲望的和富于侵略性的部分。所以他通过音乐教育来塑造弟子们的品格。毕达哥拉斯相信，人的实际追求，是通过对感官的反复灌输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追求什么，通常是因为我们经常接触什么。我们的耳朵经常听什么，眼睛经常看什么，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最后就成为我们的追求。中国古人记载，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在怀孕的时候，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表明中国古人对胎教也早有认识。所以通过使人看美好的事物形式、形态和听美妙的韵律曲调，可以实现人对美的追求。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第一位通过韵律和曲调的形式建立音乐教育的人，说明人们改掉坏的习气和达到对激情的控制，以恢复人心原初的和谐状态是可以通过音乐达成的。在这些曲调中，他还设计了检查和治疗各种身心疾病的方法。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运用所谓的“神的启示”而设计的曲调，很容易地改变并控制了众弟子出现的各种精神上的激情和欲望等，譬如沉溺在痛苦中的愤怒，还有遗憾、嫉妒、创伤性的恐惧、食欲不振，以及松弛、懒惰和狂热等。适合的音乐，就像精心调制的药一样，能把这

些受困扰的人恢复为拥有和谐美德的人。史书中有记载，毕达哥拉斯曾经对着一个醉汉吹奏不同的曲调，制止了他的疯狂行为，使他的头脑恢复了清醒。

这说明音乐通过节奏和乐调，能够进入人心灵的最深处。一个孩童从小就受到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在他的心灵深处就牢牢地生了根，他自然会变得温文尔雅；如果受了坏的音乐教育，结果就恰恰相反。柏拉图也说：“一个真正受过音乐教育的人，在他的心里会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表现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会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在社会交往中，由于心灵的统一作用，对同道必然会气味相投，一见如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对于浑身不和谐的人，他避之唯恐不及。正确的爱就是对于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一种有节制的、和谐的爱，这与纵情任性截然不同。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就是达到对这种美的爱。通过音乐教育，可以使人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因此，好的音乐可以在人的内心培养起和敬的态度，这才是音乐教育的根本，而这种和敬的态度一旦养成，人的行为也自然会表现出仁义礼智信的品质。

“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中国儒家非常重视音乐对人心的影响，主张音乐应该有益于人的教化，认为以道为主导的音乐，有益于人心性的提升；而以满足感官刺激为主导的音乐，则会导致社会混乱。《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中国古人认为，音和乐是有所不同的。低层次的音，悖逆天道中庸的原则，对人性的宣泄毫无节制，会引导人走向颓废或者暴戾的极端，最终毁灭人性，也被称为亡国之音。而高层次的乐是天道的体现，使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是入德之门。换句话说，只有符合于道的音才称为乐。《乐记》说：“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

乐。”唯有有道的君子才懂得真正的乐。懂得音而不懂得乐的，是一般的众庶。只有受过音乐教育的君子，才懂得乐的道理。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乐对于平衡人的内在情感和外在行为，达到社会的和谐，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礼记》中记载了魏文侯与子夏的一段对话，说明了音和乐的区别。魏文侯问子夏道：“我正襟危坐，穿着朝服，戴着礼帽来听古乐，却唯恐要睡着，昏昏欲睡。但是当我听郑卫之音的时候就不知疲倦。请问为什么听古乐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听新乐却令人不知疲倦？”春秋时期，有了古乐和新乐之分。所谓的古乐，是指自黄帝、尧舜以来，圣贤相传的雅乐，譬如说舜的《韶》、禹的《夏》等。节奏缓慢庄重，富有寓意。而新乐则指当时人所做的淫声乐曲，如郑卫之音，恣意放荡。

子夏回答：“古乐齐退齐进，整齐划一，乐声和谐，平正宽广，弦匏笙簧等乐器应之以节，以鼓表示开始，以金铙来结束。君子通过乐舞可以互相交流心得，谈古论今，述说的无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正是演奏古乐的意义。而新乐的乐舞进退都弯腰屈体，参差不齐，奸邪之声泛滥，使人沉溺而不能自拔，并且不时地有倡优侏儒侧身其间，男女混杂，尊卑不分，犹如一群猕猴相聚。乐终之后也没有什么获益，更不能联系历史事实给人以启发，这是演奏新乐的后果。现在您所问的是乐，而所喜好的却是音。乐和音虽然相近，其实并不相同。”

魏文侯问：“音和乐到底有什么不同？”子夏回答：“古时候天地和顺，四季有常，民有道德，五谷丰盛，疾病不生，又没有凶兆，全都是恰到好处，这称为‘大当’。”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太平盛世。“然后圣人出现了，确定了父子君臣的名分纲纪；纲纪一确立，天下才真正安定了；天下安定之后，端正六律，调和五声，以琴瑟之弦，演奏歌唱颂扬功德的诗歌，这就是德音，德音才能称为乐。而现在您所喜好的是滥无节制的溺音。譬如说，郑国的音乐，音调滥无节制，使人心志放荡；宋国的音乐过于安逸，

使人心志沉溺；卫国的音乐急促快速，使人心志烦乱；齐国的音乐狂傲邪僻，使人心志骄逸。这四种音乐是‘淫于色而害于德’，都是过分地放纵情欲，对人培养美德有害，不能称之为乐。所以祭祀的时候也不能用它们。”这说明这些音乐败坏了中正之气。

最后，子夏还提醒魏文侯说，作为国君，一定要谨慎选择自己的好恶。因为国君喜好什么，臣下就会做什么；上层干什么，百姓就会跟着干什么。《诗经》中说：“诱民孔易。”“孔”在这里是很、非常的意思，意思是说诱导老百姓很容易。其实，就是上行下效，上层喜欢什么，就会带动整个社会兴起这种风气。

乐之所以具有平衡人的内在情感、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是因为乐源于天地自然的和谐与秩序。真正伟大的音乐能够成功地模拟自然的和谐。《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音乐的普遍流行，可以在人民中间建立起一种平和的气氛。“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是先王立乐之方也”。音乐在宗庙中演奏，君臣上下一同听这样的音乐，就无不和谐恭敬；在宗族乡党中演奏，长幼一同听这种音乐，就无不和谐依顺；在家门之内演奏，父子兄弟一同听这样的音乐，就无不和睦亲密。音乐是为了和谐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而使万民归附亲顺的，这正是古代圣君立乐的宗旨所在。总之，音乐的目的就是达到和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倡导学习传统文化。比如，学习京剧艺术对于陶冶人的性情、培养人的浩然正气特别有帮助。学京剧的小孩非常稳重、落落大方。而且京剧里的戏文内容大多宣讲“五伦八德”的道理。古代的妇女受到民间戏剧艺术的影响，虽然没有读多少圣贤书，但是她们大多懂得忠孝节义，懂得孝敬公婆，懂得对丈夫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对于社会风气的倡导，音乐确实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人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确立音乐的好坏的？是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中国古人认为，人性都是平和的，好的音乐一定与人的本性相符，对于明德有帮助的。《礼记·乐记》中讲，人性原本是平和安静的，但是由于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人才起了种种的贪欲之心。当这些欲望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以及人的觉心被物质世界所扰乱的时候，人就丧失了自我，被欲望所淹没，从而才会去叛乱、违抗、欺骗，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因此，社会才出现了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弱肉强食、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无所养的局面，这是乱世的表现。

由于音乐是源于心灵的内在运动，因此，能够渗透到心灵的最深处。好的音乐是能够引发人进行心灵的反省，让人心平气和。《礼记·乐记》中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音乐是圣人之所乐的，不是一般的人为了寻求感官刺激之所乐的。它可以使民心向善、感人至深，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所以古圣先王特别重视音乐的教化。音乐教育是培养道德素养、维护社会和谐最有效的途径。

作为领导者，如果喜欢听靡靡之音，就会意志消沉，萎靡不振，沉溺于享乐，不务正业。他们的正业是如何把人民教导好，如何把政事处理好，使社会安定和谐。

第七讲

治理国家要以道德为上



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

曾国藩在家书中曾教导子孙：“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人败离不开一个‘逸’字，讨人厌离不开一个‘骄’字。”有的领导者在走上坡路时，突然开始走下坡路了。他们的人生转折点就出现在自认为奋斗得差不多了，可以享受一下人生时，慢慢他们就开始过上骄奢淫逸、不思进取的生活。所以人败离不开一个“逸”字。

《后汉书》说：“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弊。”在上者对在下者的影响，像风能够把草吹倒一样，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如果在上位者不去奢从俭，在下位者必然会有纵欲之弊。

《史记》中记载：“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尧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他的房屋非常简陋，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也没有砍削，没有过多的装饰，非常质朴。

在《群书治要·墨子》中，针对建造宫室专门有一段论述：“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圣王建造房屋是便于生活的，而不是为了让人观赏的；制作衣服、腰带、鞋子，也是为了有益于身体，不是用来显示奇异的。“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圣君自身节俭，并以此教育人民，因此天下的百姓都可以得到治理，财物用度都得到满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如今的君主建造宫室，与此完

全不同了。“必厚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他们一定会向百姓大量征收财物，凶残地掠夺百姓用于衣食的资财，用来建造宫室台榭、曲直交错的景观和彩绘雕刻的装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国君建造这样的房屋，左右亲近的臣子也都纷纷效仿。“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这样做导致的结果是国家的财物不足以用来防备饥荒、救济孤寡，所以国家贫穷，百姓难以治理。墨子最后得出结论说：“君诚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如果国家领导者确实想要天下太平，憎恶天下混乱，那么建造宫室就不能够不节俭。

墨子的这一段论述，把建造宫室的节俭与奢华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成败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点也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历史上的君主一旦出现这方面的奢侈，臣子都会极力劝谏。《周语·楚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灵王建造了章华台，建造得很奢侈，和伍举一起登上楼台，问道：“这个楼台美吗？”伍举回答道：“臣听说，国君以尊敬、任用贤人为美事，以安定人民为乐事，以听从善言为耳聪，以能够招致远方的民众为贤明。还没听说过是以建筑物的高大庄严、彩绘雕刻的考究精致为美的。先君庄王建造匏居台，高度能观望预示吉凶的天象就够了，大小仅能够容纳宴用的食器和餐具；所用的木材不妨碍城郭守备之所需；所用的经费不由府库支出；百姓不会因此而耽误农时；官吏不必改变上朝的常规。庄王因此能够平定动乱、战胜敌人，而不被诸侯所憎恶。如今，君王建造这座高台，劳民伤财，致使五谷不丰、官吏烦劳，历时几年才建成，臣不明白它究竟美在何处。所谓美，应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都没有害处，这才称得上美。如果是看起来美观，但将财钱用尽，还要盘剥百姓应有的利益，使自己富有而使百姓贫穷，怎么能算得了美？作为一国之君，要领导百姓，并且与百姓共处。如果百姓都瘦了，君主又怎么能独肥？先王建造榭、台，不过是用来讲习军事、观望显示吉凶

的天象而已。建造台榭选择的是贫瘠坚硬、不适合耕种的土地，用的是加固城防剩下的木料；官员、属吏是在政事之余，才到现场去参与，利用百姓四季的农闲时间来完成。建造台榭，是为了使人民得到利益，没有听说是用以穷尽百姓资财的。如果君主认为这楼台美观，把建造楼台视为正事，那么楚国就危险了。”

读《群书治要》会使人们建立一种共同的荣辱观和道德观。那到底什么是荣、什么是耻？是以建造奢华的办公大楼为荣，还是以勤俭为荣？大家读了之后，就达成了一致。所以《群书治要》没有太多的具体的政策、制度、方法，它讲的就是道理。道理明白了，人们就可以达成共识，自然知道该怎么做。古人说“理得心安”。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就是因为他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知道“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道理。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可以成为有文化的领导者。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这个“文”是文字、文章、礼乐之意。譬如说，读了这篇文章，从不知道节俭的人变得节俭了，从不知道感恩的人变得感恩了，从不知道孝亲尊师的人变得孝亲尊师了，这就叫以文化人。通过阅读文章，改变了人的气质，提升了人的品德，这就是文化的本质。

谁都不愿意被称为暴发户，都希望别人称自己是贵族。读了《群书治要》之后你就能知道，暴发户和贵族的区别何在。暴发户就是有钱有势之后，拿着钱去骄奢淫逸，买名牌衣服、名牌轿车、名牌配饰、名牌的化妆品，还买名牌的手提包，不知道钱该用在哪里。贵族是即使有钱有势之后，过得仍然很俭朴，拿着钱去兴办教育，去救济贫穷的人。早年下南洋的那些华人，他们身上都有贵族的气质。他们辛辛苦苦创业起家，挣了钱，事业有成之后，仍然保持着勤俭的作风，还慷慨资助国家的建设，特别是建设了学校，能够资助贫穷的孩子上学，这才叫贵族。

唐太宗崇尚俭朴

圣明的君主读了《群书治要》之后，他们的做法和没有学习的人就完全不同。《贞观政要·论俭约》记载着唐太宗的很多故事，以下举两则。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大兴土木，都必须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凿九山，通九江，耗费人力巨大，却没有人抱怨。因为这是民心所向，反映了百姓的意愿。秦始皇营建宫室，人民都反对，因为秦始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违背了民心。朕现在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木等都已经准备就绪，但想想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再兴建了。古人曾说：‘不要做无益的事情而损害了有益的事。见不到引起贪心的东西，心就不会被扰乱。’由此可知，见到那些诱人之物，心很容易被污染。像那些精雕细镂的器物，珠宝玉器、服装玩物，如果纵情享受，灭亡的日子立刻就会到来。”他还要求自王公以下，宅第、车服、婚嫁、丧葬等，如果用度超过了规定而过于奢华，都要一律禁止。自此二十多年间，社会风俗崇尚俭朴，衣服没有锦绣，物质富饶，没有出现挨饿受冻的情况。

贞观二年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有公卿上奏说：“依照《礼》，夏季最后一个月，可以居住在建在高台上的楼榭。现在暑天未退，秋季的连绵大雨刚刚开始，皇宫低下潮湿，请陛下营建一座楼阁来居住。”唐太宗说：“朕有气力衰竭的病，不适宜居住在低下潮湿的地方，如果同意了你们的请求，实在太过浪费。从前汉文帝想建一座露台，但是得知要花费相当于10户百姓人家一年的收入，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朕的德行比不上汉文帝，而耗费的财物却要超过他，难道这是作为民之父母的国君之道吗？”尽管公卿再三上书奏请此事，唐太宗终究没有答应。唐太宗确实是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知道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能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才创下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我们学习了“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

此，未或弗亡”，就要懂得克制欲望。现代人经常讲竞争，其实竞争绝不是和别人争，而是和自己的烦恼习气、坏毛病争。人在成为圣人之前，各有各的习气，有的贪财、有的贪色、有的贪名、有的贪利、有的贪吃、有的贪玩、有的贪睡、有的贪功，还有的人贪好的缘分，贪心就开始出现。习气各有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贪”字。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修行从哪里修起？就是要从克除自己的欲望开始，返回到礼的要求上来。一个人如果能够改正自己的毛病、习气，对于这些外在的财色名利等都不贪了，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大英雄，被称为圣人。一个人能够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才是无往而不胜的。

《贞观政要·论君道》中记载，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讐（dú）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唐太宗说：“朕常常想能伤害自身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是由于自身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良嗜好，才酿成灾祸。如果一味地讲究吃喝，沉溺于声乐女色，欲望愈多，损害也就愈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说出一些不合理的话来，就更加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朕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享乐、贪图安逸。”

魏徵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去请教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修身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修养好而国家却混乱的。陛下所明白的道理，实在很符合古人所说。”

从这一段对话中可以体会到，魏徵和唐太宗确实是同心同德，确实是古人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君臣能够齐心协力，创下“贞观之治”。

居高位而务于道德

故乱国之主，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五《文子》

“务”是从事、致力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能够给国家造成动乱的领导人，只注重扩大势力范围，而不重视仁义的教化；只追求高位权力，而不注重道德的修养。这种做法，是舍弃国家所能生存的条件，而造成灭亡的因素。

看到“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这两句话，我们联想到《弟子规》中的一句话，“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这个“势”不仅包括权势、政治上的威势，也包括经济上的势力，还有军事上的势力。古人把这个道理视为常理，被人们所信奉。

《淮南子》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赵襄子指挥军队攻打敌国大获全胜，他在吃饭的时候却面露忧色。他身边的人不解地问：“一天就攻下了两座城池，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现在您却面有忧色，是什么原因？”赵襄子说：“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江河发大水，不过三天就会退去；飓风暴雨，在一天中也不过是一会儿的事。如今我们赵家的德行没有积累多少，又一天攻下两座城池，恐怕衰亡会接踵而至了吧！孔子听了这件事情，评价说：“赵家要昌盛了。”因为赵襄子能够居安思危，认识到要积德，这反而能使国家昌盛；如果他获得了小小的胜利和成就便沾沾自喜，那很容易失败。打胜仗并不难，保持胜利成果却很难。在历史上，齐、楚、吴、越四国都曾经是战胜国，然而最终都衰亡了，原因是他们不懂得如何保持胜利的成果。只有有德行的君主，才能保持住胜利的成果。《大学》中说：“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这个“财”包括了人的财富、声名、地位、权势，当然也包括了个人地盘。

德行是根本，人应该从德行入手，培养深厚的德行，这样才能够厚德载物。一个人的地位愈来愈高，德行却没有愈积愈厚，这就叫“德不配位”。“德不配位”在古人看来就会出现突如其来的灾祸。

由此可知，中国古人倡导的是“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王天下”就是《大学》开篇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主修好身了，百姓修好身了，全国就能和谐安宁，别国的使臣来访，都非常羡慕，愿意来学习，这叫“王天下”。

历史上，“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商汤的地盘方圆 70 里，他成为天下诸侯国效仿的榜样。文王所统治的地区不过是百里之地，他却使所有的诸侯国都臣服，这是因为文王有德行。譬如，在周文王还是诸侯的时候，有虞、芮两国的国君因为田畔产生了争执，他们请求周文王裁决。结果他们一进入周文王治理的国境，看到全国上下和谐安宁，没有人争吵，惭愧得不好意思再争执了，于是就回去了。天下人听说这件事之后，归附周的有 40 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臣服于周的原因，就是他们为周文王的治理所折服，愿意主动向周学习以德义为核心的的文化。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对邻邦乃至世界各国产生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外国人来中国参观考察之后，看到中国人与人之间交往彬彬有礼，“五伦”关系和谐、稳定，社会安定，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就非常羡慕，把中国誉为“华夏之族”“礼仪之邦”，把中国的皇帝尊称为“天可汗”，就是天下公认的领导者。他们心甘情愿地来学习、接受中华文化。中国人自童蒙教育，就明白“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即使是在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君主也没有搞

霸权主义。譬如，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他带领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每到一个地方，给那里的国家和人民带去了茶叶、丝绸、瓷器、先进的造纸术和造船术，而没有侵占别的国家一寸土地。所以直至今日，郑和仍然受到东南亚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崇敬和纪念。

《群书治要·新语》中有一段类似的阐述，几乎是用不同的话阐述了一个相同的道理。“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道者尊，贫而有义者荣。夫酒池可以运舟，糟丘可以远望，岂贫于财哉？统四海之权，主九州岛之众，岂弱于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贫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义不加于下也。故察于利而惛于道者，众之所谋也；果于力而寡于义者，兵之所图也”。

这段话讲的是，治理国家要以道德为上，处理事情要以仁义为根本。对于职位高贵但缺乏德行的人要贬黜；对富有财产但不讲道义的人要处罚；对地位低下但珍爱德操的人要使其尊贵；对家境贫寒但讲求仁义的人要使其富裕。商纣王的酒池可以用来划船，糟丘可以登高远望，这难道还能算是贫困吗？拥有统领四海的权柄，主宰着九州岛的百姓，这难道能说是武力弱小吗？然而论功业却不能够保全自身，论威势却不能守住社稷，这绝对不是国家贫困、弱小的缘故，而恰恰是自身缺乏道德、对百姓不够仁义的缘故！

商纣王天资聪颖，口才很好，办事敏捷，力气也超过常人，能空手和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应对臣下的劝告，他的言辞也足以用来掩饰自己的错误。但他骄奢淫逸，不听劝谏，每日和妲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有忠臣来劝谏，他还给以严惩，最后没有人敢劝谏了。周武王吊民伐罪，最后导致他穿着宝玉为饰的衣服投入火中、自杀身亡的命运。

身为一国的国君，商纣王拥有辽阔的国土，也拥有强大的军队，却制造非常残酷的炮烙之刑来残害百姓。他没有道德，不讲仁义，最终逃不

过灭亡的命运。这些历史经验教训，都给我们阐述了“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的道理。所以人要使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国家能够长远地保持昌盛不衰，必须讲求道德、讲求仁义，这是决定国家、企业、个人兴衰成败的最重要因素。

第八讲

好名之患



领导者爱好虚名的祸患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则群臣知所要矣。

——《群书治要》卷四十八《体论》

领导者的祸患没有比爱好虚名更大的了。一旦领导者爱好虚名，下属就很容易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投其所好。“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修而名自随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美名是为了褒扬善行的，自身注重修养，美名自然会随之而来，并非是个人喜好追逐美名就能得到。《论语》中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不要担心自己没有一个好的位置发挥才能，这不应是我们所担心的重点，应该担心的是要有什么样的德行、能力，来立功、立德、立言于社会，甚至传承千古。要能有后世子孙值得学习的地方，给他们以启示和教导；不要担心自己的名声不够显扬，而应该追求足以使名声得以显扬的德行和能力，做到实至名归。

《群书治要》中记载着邹穆公的故事。邹穆公做国君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吃不讲究美味，穿不讲究衣饰华丽，对老百姓也非常宽厚，爱民如子，对待百姓就像慈父关爱自己的儿女一样。邹国虽然很弱小，但是像鲁国和卫国这样的大国都不敢轻视它，齐国和楚国也不能够威

胁它。当邹穆公过世的时候，邹国的百姓非常哀伤。邹国四邻的百姓，听说邹穆公过世，全都朝着邹国的方向表达哀思，连琴瑟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因为人们觉得这么好的一位国君过世了，都没有心思欢乐了。直到穆公过世一年之后，人们才重新听到了琴瑟的声音。贾谊评论：“故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能够以仁爱之心对待别人，别人回报他的也是仁爱。如《孟子》中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能够给天下人带来福祉的人，自身的福气也自然会到来。

“苟好之甚，则必伪行要名，而奸臣以伪事应之”。君主如果过分地喜好美名，贪图虚名，就一定会用虚假的行为来求取美名，那么奸邪的臣子也会以虚假之事来应和，下面的人也会弄虚作假来附和上面的好名之心。如果君主喜欢虚名，自然就会喜欢听恭维的话、赞叹的话、肯定的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所感召的臣子也是谄媚、巴结、阿谀奉承之人，也将听不到臣子批评自己过失的言论，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群书治要》中记载着齐宣王好射的故事。齐宣王很喜欢射箭，而且特别喜欢听别人夸自己能够使用硬弓，显示自己的臂力过人。其实他所用的弓，拉力不超过三石（一石相当于120斤，三石就是360斤）。齐宣王把弓拿给左右的侍从们拉，左右的侍从都假装着尝试，但是拉到一半就停止了，好像自己拉不动，还说：“要拉开这样的弓，力量至少不下于九石，除了大王您，还有谁能使用它？”于是，齐宣王一辈子都认为自己所用的弓拉力是九石，这难道不是很可悲的吗？这说明一个君主、一个领导者好大喜功、贪图虚名，就会招引阿谀奉承的臣子来投其所好。

学习传统文化要身体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应该把弘扬传统文化落实在哪里？应该落实在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上。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是能够把道弘扬起来的。那就是自己首先要对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理解，能够身体力行传统文化的教诲，让社会大众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学习传统文化的益处，这才是“人能弘道”。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想培养一个德才兼备的老师谈何容易！缺少老师是因为根基扎得不够牢。第一是学术上的根基。我们从小没有经过童子功的训练学习古文，文字的功底、文言文的功底都不够。第二是德行的根基，这是更重要的一个根基。

弘扬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从自身做起。

“一人而受其庆，则举天下应之矣。君以伪化天下，欲贞信敦朴，诚难矣。”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弄虚作假、谄媚君而受到了褒奖，那么普天之下的人就会起而效法。君主以虚伪来教化天下，还想要人正直、信实、敦厚、质朴，的确是太难了！领导者如果好大喜功，下面就会出现浮夸风。

“虽有至聪至达之主，由无缘见其非而知其伪，况庸主乎？”即使是最聪敏、最明达的君主，也常常不能看出问题而知道其中的虚假，更何况是一般的君主呢？

“人主之高而处隩，譬犹游云梦而迷惑，当借左右以正东西者也。”“隩”字有两个读音：一是读“玉”，一是读“奥”。读“奥”的时候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室内的西南角，“与其媚于隩，宁媚于灶”；另一是“深”的意思。在此句中取深、隐的意思，指君主深居高位又处于深宫之中，好像在容易迷路的云梦泽游玩一样，需要左右之人来指正方向。所以选取左右之人非常重要。

“亲君子，远小人”，事业就会发达；相反，“亲小人，远君子”，事业就会衰败。如何辨别小人呢？《韩非子》中说得很简单：“凡是奸臣和小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顺着君主的意思去说话。君主认为什么好，他们一定跟着赞叹；君主认为什么不好，他们一定跟着诽

谤。”“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矣！’今日闻斯论，明日闻斯论，苟不校之以事类，则人主嚚然自以为名齐乎尧舜，而化洽乎泰平也。”“巍巍”是非常崇高伟大的意思。《论语》中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君主左边的人说，圣上的功勋真是伟大啊！“赫赫”是声威显扬的意思，圣上的声名真是显赫啊！今天听到臣子这么说，明天还是听到臣子这么说，如果不用事实加以考察对照，君主就会洋洋自得，认为自己可以与尧舜齐名，自己的教化已经广播，实现了天下太平。

《尚书》中有一段话，讲述如何选用身边的臣子，包括侍御、仆从。侍御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司机等服务人员，太仆正就是专门用来教导侍御、仆从的职位。周穆王任用大臣伯冏为太仆正时说：“伯冏，昔日文王、武王的聪明睿智合于圣道，所任用的臣子无论大小都忠心耿耿、诚实善良。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即使挑选一个侍奉左右、驾马车的人，甚至仆役，也都是品行端正之人。以这样的人朝夕侍奉、辅助君王，君王的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整肃的；发号施令没有不合于仁义的。百姓恭敬顺服，万国皆称其美。只有寡人一个人缺少德行（这是君主自己说的），寡人自己不够贤明，实在需要依赖左右前后在位的君子，匡正寡人的不足，纠正寡人的错误，矫正寡人不正确的想法，使寡人能够继承先祖的功业。现在寡人任命你担任太仆正之职，教导这些侍奉君主左右的人，使他们不敢奸佞诈伪，都要勉励君主修德，一起修正君主的不足。你要谨慎地选择部属，不要任用那些巧言令色、阿谀奉承的小人，只能选用品德优良的人士。”

“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如果侍从、近臣都是中正之士、正直的人，那么君主也会保持中正。如果仆从、近臣都是谄媚巴结之人，君主会自以为圣明。“后德惟臣，弗德惟臣”。君主有德在于臣下，君主失德也在于臣下。君主有德，是因为有群臣的辅佐，经常提醒他的不足，纠正他的错误，才成就了他的德行。君主无德，是因为臣子没有能够尽职尽责犯颜直谏，才误导了君主。所以不要亲近奸佞小人，不要让

这些人担任充当君王耳目的要职，以免诱导君王违背了先王之道。

“群臣琰琰，皆不足任也。”如果领导者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话，好大喜功，喜欢虚名，那么任用的人就是这里所说的“群臣琰琰”。“琰”同琐，是细小的意思，形容人品卑微、平庸、渺小。群臣个个卑微平庸，“皆不足任也”，都是不称职的。君主好大喜功、贪图虚名，臣子愿意来到他的身边，以获取私利，那些正直的人是不会来侍奉这样的君主的。君主好名，就感召不到真正有德之人的辅佐，感召的臣子也都是谄媚巴结之人。

《群书治要·晏子》中记载，晏子去世之后17年，齐景公宴请大臣饮酒，大家兴致很高，又去射箭。齐景公射出了一支箭，箭脱靶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大厅之中饮酒的诸位大夫异口同声地说：“好箭法！好箭法！”像出自一个人之口。齐景公一脸怒气，大声叹息，把弓抛开了。齐景公生气，是因为自己的箭射得都脱靶了，臣子们还赞叹他的箭法好，阿谀奉承到极致了。

齐景公对刚走过来的弦章说：“弦章，寡人失去晏子已经有17年了，再也没有听到有谁能指出寡人不对的地方。今天寡人射箭脱了靶，但叫好的声音却整齐划一，如同出自一人之口。”弦章很有智慧，他回答：“这是诸位臣子没有才德！以他们的才智，不足以明察君主的过失；以他们的勇气，不敢触犯君主的龙颜，才出现了众口一词的情况。但臣也听说，君主喜欢穿的，臣子们就喜欢穿；君主喜欢吃的，臣子们也喜欢吃。尺蠖（一种像毛毛虫似的无脊椎动物）吃了黄色的叶子，身体就发黄；吃了青色的叶子，身体就发青。可能君主您还是喜欢听谄媚之言吧！”齐景公听了说：“你的话很有道理！”他静下心来认真反省，知道今天的局面和自己有关系，是因为自己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言语。

“尧舜之臣，宜独断者也。不足任之臣，当受成者也。以独断之君，与受成之臣，帅讹伪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尧舜的臣子都善于

独立决断，而不称职的臣子，只会依君主的命令行事，不敢有自己的主张。靠这些独断的君主和凡事照办的臣子，会引发社会出现讹诈和虚假的风气，如此却能使天下得到大治，是从未有过的事。古人看问题很深刻，说得也很中肯。如果臣子们看到问题都不敢犯颜直谏说实话，都是唯马首是瞻，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好名的表现

一个人好名有很多种表现。人好名的心很微细，不像好利那样，直接贪图钱财。好名是无形的，人要懂得认真地去反省。一个人喜欢出名，有什么表现呢？

第一是没有赞叹就没有做事的动力。如果自己做了事没有人肯定、没有人夸奖，做事的动力就不足。换句话说，名闻利养的心在推动着人们努力地去做事。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一件事既没名也没利，还有多少人去做呢？

第二是听不进批评和忠言劝谏。有些人没有学过《弟子规》，不知道“闻誉恐，闻过欣”这一说，对别人的批评很难听进去，一般的人不敢来给你指正问题。只有身边至亲之人，看到问题，担心你走弯路，才愿意批评你。但是你已经习惯于听赞美了，即使是至亲之人对你的批评建议，你也不能够听进去，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群书治要·吴志下》中有这样一句话：“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都喜欢听别人谈他的过失，而使国家混乱的君主都喜欢听别人赞美他。喜欢听别人谈自己过失的人，他的过失会一天一天地减少，那么福分就慢慢地来到了。而喜欢听别人赞誉自己的人，他的声誉会一天一天地减损，那么灾祸也就慢慢地来到了。

要想让能够犯颜直谏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身边，经常指正自己的过失，必须自己培养起“闻誉恐，闻过欣”的雅量，听到别人讲我们的过失要非常欢喜。孔子的弟子子路是“闻过则喜”的典范，听到别人指正他的过失，就非常高兴，愿意接受。大禹就更进了一步，“禹闻善言则拜”，听到别人给他进谏，指正他的过失，都会给人家行礼，表示感谢。所以大禹能常常看到自己的过失，改正自己的过失，福分自然就到了。如果你做事情不圆满，别人给你指出了缺点，你却没有虚心受教，那就是因为你的好名之心太重了。

《孔子家语·六本》中也有类似的教诲：“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良药虽然吃起来很苦，却有利于治好病；诚恳的劝告听起来觉得刺耳不舒服，却有利于为人处世。汤武的臣子都能够直言不讳，犯颜直谏，所以商汤、周武王时期国家就兴盛起来了。夏桀王和商纣王的臣子大都是唯唯诺诺，不敢犯颜直谏，即使有犯颜直谏的，也都被他们处决了，余下的臣子都不敢再提建议，国家在他们的手上就灭亡了。如果君主、领导者没有勇于直谏他们的属下；做父母的，没有敢规劝他们的儿女；做兄长的，没有规劝他们的弟弟；做士大夫的，没有敢指正他们的朋友；这些人却不犯过失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一个人认识自己是最难的，很多时候人的眼睛都是向外看，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过失，很少反省自己。有人说，人生中背着两个包袱：一个包袱上写着他人的过失，另一个包袱上写着自己的过失。我们在走向人生之路时，往往把写着他人过失的包袱放在了胸前，一低头就能看到，而把写着自己过失的包袱放在了背后，怎么看也看不到。对症的办法就是把两个包袱调换一下，这样可以更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孔子告诉我们，当你看别人过失的时候，马上反省自己，“见不贤而内省也”，看到别人有这样的

问题，马上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反省之后，才知道它是来提醒我们的，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否则这样不如意的事情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另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要有善友，有可以规劝你的朋友、兄弟姐妹，来指正你的过失。但这就需要自己心量大，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而不是一味地找借口、找理由拒绝别人的批评。

一个好名的表现，就是做了一点点好事、取得了一点点成就、获得了一点点奖励，就生怕别人不知道，希望尽人皆知，尽量宣传自己，这也是好名的突出表现。

好名的表现还有喜欢高高在上，希望被人尊敬、被人赞美。一旦没有受到足够的尊敬，就会不高兴，甚至生闷气。我们要体会自己有没有好名的心，其实很容易。譬如，你去讲课，下课后突然有人和你打招呼，你心里有没有一丝丝的高兴？心里可能会想，你看，别人都认识我。这个心一起，你就要警醒自己“好名的心”。当别人说：“教授，我们能不能照张相留作纪念？”你心里就很高兴，心想：你看我名声这么大，别人都要纷纷跟我合影。这也是“好名的心”的表现。

不能够正确地面对挫折，也是一种好名的表现。像有的人学习很好，考试总是得第一名，一旦考第二名，就觉得是很大的失败，患得患失的心特别重，生怕自己做得不够完美，不能够正确地面对挫折。

还有一种好名的表现就是嫉妒心特别强，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名声比自己大的事实，不能够接受别人比自己更受领导重视的事实。当领导在表扬某位同事的时候，你的心是“见人之得，如己之得”吗？别人所取得的成就，就如同是你所取得的成就一样为之高兴吗？恰恰相反，也许就像条件反射一样，你的嫉妒心、愤愤不平的心就生起来了，心想：我做得比他还好，为什么领导就没表扬我，而去表扬他了？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就没有被领导重视呢？这些好名之心非常敏感细微。

一个人特别喜欢名声，患得患失的心就特别强，还会特别在意别人

的看法。譬如，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不是那么自在，担心话讲得不好，不知道别人评价如何，这都是好名的表现。好名的心确实很微细，也非常难以克服，需要时时提起警觉。“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在世间享有很盛大的名声，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人，如果名不副实、德不配位，名声和他的实际言行不相匹配，那就多有意想不到的、突如其来的灾祸。因此，我们要小心谨慎、战兢惕厉，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第九讲

节欲者安



欲是深渊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

——《群书治要》卷十四《汉书二》

汉文帝即位之后，从自身做起，力行节俭，一心想着使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由于战国时期的动乱影响了汉初的发展，社会背离了“以农为本”的方针，很多人弃农从商。贾谊向汉文帝上书：“管子曾经说过：‘仓廪的粮食充足了，人们才懂得讲求礼节。’如果人民衣食不足，吃不饱、穿不暖，还想使国家得到治理，这是从古至今还没有听说过的。”接着，他就说了这句话：“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古人说，一个农夫不耕作，有人就会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有人就会受冻。“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屈”在这里读“绝”音，是尽的意思。万物的生长都是有时节的，若使用起来没有节制，物资势必会用尽。“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恃”是依靠、依赖的意思。古代治理天下达到非常细致周详的地步，所以国家有足够的积蓄可以依靠。

贾谊还说道：“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

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如今人们都背离了农业而趋向商业，不劳而食的人愈来愈多，这是天下的大害。奢侈浪费的风气日益严重，这是国家的大祸。《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中也有类似的阐述：“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人性和人情是不一样的，人性本来是清净无染的，没有任何的欲求，就像水很清澈，没有任何的污染。人的习气、人的习染，这些称为人情。喜欢荣华富贵、华美的服装、漂亮的饰品、铿锵作响的音乐、炫人眼目的光彩、香喷喷的佳肴美膳等，都是人情所喜好的。白天想着这些事，夜里做梦还是想着这些事，一心一意地想着吃喝玩乐，须臾都不离开自己的心，如同水往下流，瀑布会奔向深谷一样，自然而然。

中国古人对人的欲望看得很清楚，把“欲”比作深渊。如果人的欲望没有节制，任其发展，最后连自己都无法约束自己。古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制定了“礼”来节制人们不合适的欲望，甚至还希望防患于未然。譬如，古礼中的“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接递东西的时候，不要碰到手。

中国古人很早就告诫我们，不要太自信，不要认为可以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要看到那些可以产生欲求的东西，像美色等，看了之后容易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人克制自己欲望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这样才可以远离污染。当然更高等的功夫，是人见了金钱、美色等引起欲望的事物，也不会沾染，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普通人还是远离为好。

弃农从商令人忧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中说，现在市场上都卖华丽的工艺品，商家也卖僭礼的服饰，百工也可以做奢侈品。人们看到这些能够满足自己欲望

的东西，经受不住诱惑，肯定会购买。而商人之流，家家户户都超级享受，奢靡无度。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天之下的人都会去追求奢侈浪费、违背礼仪的生活。这是时势潮流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因而这是天下最令人忧心的事情之一。人们放弃了农业，而争相从事商业，为什么值得人忧虑呢？可以概括出4个原因。

第一，会导致天下的财产缺乏，甚至导致全球的环境危机。贾谊说，“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哉”。“生之者甚少”，生产的人，特别是生产粮食的人愈来愈少。“而靡之者甚多”，浪费的人、不参与生产的人、不劳而食的人愈来愈多，奢侈浪费的风气也愈来愈严重，天下的财产怎么会不枯竭？《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增长财富有大道可循：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创造得疾速，使用得舒缓，那么财物就能长久保持富足。

第二，会导致衣食储备不足，无法应对突发事件。贾谊接着阐述：“世上有荒年和丰年，这是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即使是在夏禹、商汤时，也都遭逢过。如果不幸遇到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拿什么来救济百姓呢？如果边境突然发生紧急的军情，几十万的兵众，国家拿什么来供给？战争、旱灾接踵而至，天下物资匮乏，有勇力的人就会聚众、蛮横打劫，进而发动徒众争相起事，到了这时才惊慌失措地设法应对，还能够来得及吗？所以储藏粮食等物资，是天下的大事。如果粮食多而财资充裕，做什么事不成功呢？”“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近，何招而不至？”凭借着这样的条件，攻城就能够成功，守城也能稳固，作战能够获胜，以此怀柔敌方，使远方之人前来归附，还有什么人召之不来呢？如今应该让百姓回归农业，着力于国之根本，让天下的人各食其力，使从事工商业和四处谋生的人转行来从事农业，那么积蓄就会充足，百姓也就能够安居乐业了。

汉文帝被贾谊的谏言所打动，他开始设天子的责任田，并且亲自耕种以勉励百姓回归农业。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富有的观念就是衣食无缺，有足够的衣食储备来防备天灾人祸就可以了，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奢侈无度、挥霍浪费的生活。

《礼记》中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九年的粮食储备，是不富足；没有六年的粮食储备，这叫危急；如果连三年的粮食储备都没有，国家就不称其为国家了。《礼记》中还说，如果耕种三年，确保储备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确保储存三年的粮食。倘若三十年一以贯之，即使遇到凶年和水旱之灾，民众也不致挨饿。没有了后顾之忧，天子每天用餐的时候就可以奏乐了。

第三，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深。《群书治要·汉书二》记载，晁错曾经上书汉文帝说：“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百姓，在于君主用什么方法来管理。他们趋从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并不在乎流去的方向。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然而大家都认为它贵重，那是因为上层的人喜欢用，底层的人会效仿上层的人，争相去抢购。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中说，世间奢侈的风气愈来愈重，服饰都违背礼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愈来愈昂贵。譬如，古玩、字画、奢侈品、石头等，这些东西愈来愈昂贵，而农业这个本业却愈来愈低贱。务农的人、栽桑的人很勤苦，收入却都很微薄；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安逸，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这些导致农民都放下了锄头去雕花刻镂，织女也放下了织机去学习刺绣。如此一来，耕种的人愈来愈少，从事末业（古代的商业、手工业）的人愈来愈多。虽然有荒地开垦，但是因为人们并没有把心思放在种地之上，没有尽心尽力地去耕种、收割，怎能会有丰收的年景

呢？财富都集聚在少数商家的手里，百姓穷匮，很多人沦为奸寇、盗贼。国家的仓库愈来愈空虚，监狱却人满为患。一旦年景不好，五谷不丰登，受饥挨饿、流亡过世的人就数不胜数。从上到下都很穷匮，也没有办法做到互相接济。

“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国家都是以百姓为根本，而百姓是以粮食为命根的。粮食没有人去耕种，百姓不能够保命，国家的根本当然就削弱了，整个国家就会陷入危难，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古人提出，“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贤明的君主把五谷看得很重，把农业看成是国之根本，而不看重金银珠宝。

晁错还通过农民与工商业者生活的对比，说明其中的道理。他认为，现在的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砍伐薪柴，非常辛苦，还要服徭役；春天不能避开风尘，夏天不能避开暑热，秋天不能避开阴雨，冬天不能避开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日可以休息；私下里还有送往迎来、吊问死者、探问疾病、养育孤儿、抚育子孙等事，其中包含了多少辛苦。另外，自然灾害、暴虐的政治、赋敛的不适时、朝令夕改等也会加到他们的身上。农民所拥有的东西，可能因为市场上太多了，不得不半价出售，而自己缺乏的东西，可能要用两倍的价格来获取。结果很多人卖了田地、住宅、儿孙来偿还债务。这就是农夫的生活。

与此相对，商贾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大的商人积储了很多东西，价格高的时候可以加倍地获得利润；小的商人在摊上贩卖，手里有一些别人没有的货物，每天在市场上游荡，趁着上面征敛急迫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卖出去，得到加倍的利润。这些商人，男的不用亲自去耕种，女的不用亲自去养蚕织布，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他们没有农夫辛苦，土地生产出来的东西却被他们所享用。因为家产丰厚，他们结交了很多王公大臣，他们的势力甚至可以超过官吏。他们到很远的地方游逛，冠盖相望，不绝于路。这就导致商人剥削农夫，农夫流离失所。而一旦农民

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就可能作奸犯科。

第四，会导致贫穷者奸邪，富足者淫逸，作奸犯科屡禁不止。《群书治要·说苑》中记载，魏文侯曾经问李克（有的地方称他为李悝）道：“刑罚产生的根源在哪里？”李克说：“是生于百姓邪曲不正、放纵奢侈的行为。凡是人们的奸诈、邪曲不正的心，都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才生起的。而放纵奢侈的人，都是把心思耗费在文饰之上。”古代的奢侈品是精雕细刻的玩物，佩有锦绣的绶带。一旦人们把这些看成是很有价值的东西，男的将会放弃农业，从事雕纹镂花；女的也会放下织机，去学习刺绣。农事受到妨害，是饥饿的根源；纺织受到妨害，是寒冷的根源。

“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百姓饥寒交迫，吃不饱、穿不暖，还能够不作奸犯科、不做邪曲不正的事，这是很少的。“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男女都互相炫耀衣服饰品华丽漂亮，却不奢侈放荡纵欲，是从未有过的事。“故上不禁技功，则国贫民侈；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因此，如果上面不禁止机巧之事，奇技淫巧的事情会愈来愈多，奢侈品的生产愈来愈多，导致国贫而民侈，国家贫困，人民愈来愈奢侈浪费。贫穷的人就会想出一些奸诈的、邪曲不正的方式，来追求富裕的生活。富足的人则会互相攀比，过上更加放逸纵欲的生活。这就等于驱使人民去做邪曲不正的事。

“民已为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为民设陷也”，当百姓被驱使走上了邪路，用刑罚来诛杀他们，这就等于是为百姓设置了陷阱。“刑罚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伤国之道也”。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它的根源，而只是在枝节上进行督促，这对国家是有损害的。

可见，古人思考问题很深远，能考虑到根本，而不是就事论事。农民付出多、收入少，工商业付出少、收入却很丰厚，导致了贫富差距加

大。贫穷的人就会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就会做纵欲放荡之事，这样作奸犯科的事情会愈来愈多。一旦人们养成奢侈放纵、浪费的习惯，国家的资源也会愈来愈枯竭。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农业的话，耕田的人愈来愈少，人们的衣食都得不到保证，那么遇到灾荒的时候，国家就没有办法接济百姓了，也应对不了突发事件。

节欲而富民

唐太宗秉持了节欲而富民的理念。《贞观政要·论君道》中记载，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啖腹，腹饱而自毙。”为君之道，必须先使百姓能够生存，安居乐业。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这就像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一样，肚子确实饱了，但是终究会亡身。

《群书治要·政要论》中也有类似的阐述：“服一彩，则念女功之劳”，穿一件丝织品就想到织女的辛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进用一粒粮食，都要体恤农夫劳作的勤苦。做君主的应该念念体恤百姓的不容易，虽然身居高位，也不能够奢侈浪费。

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创办的企业是如何培养后继人才的呢？他们从古圣先贤的教诲中汲取经验。有一篇文章叫《松下商学院的一天》，其中有这样一段：7点10分的时候开始吃早饭，用餐前全体学员都正襟危坐、双手合十，口里念诵着这些话语。

第一句话：“此膳耗费多少劳力。”看似一碗普通的饭端到我们的面前，实际上这一碗饭不知道有多少人付出的汗水在其中。“择菜不留青，胜似诵藏经。”看到一片菜叶掉在地上了，都要把它捡起来。即使是一片菜叶，也不能轻易浪费。人要懂得感恩、懂得惜福，能够做到的话，“胜似诵藏经”。

第二句话：“自己是否具有享用此膳之功德。”要考虑自己的所做所为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贡献，有没有功德来享用这一碗饭。

第三句话：“以清心寡欲为宗。”不敢骄奢淫逸，放纵没有止境。

第四句话：“为走人之正享用此膳。”吃这顿饭是为了走人间正道。

《松下商学院的一天》描述了学员在用餐前后的情景。我们看了之后，就知道他们学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俭者节欲

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

——《群书治要》卷四十七《政要论》

“要莫大于节欲”，“要”是重要、主要的意思。“莫不阶于俭约”，“阶”是凭借、根据的意思。修身治国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礼记》中说：“欲不可纵。”古往今来，取得成功的君主，无一不是勤俭节约的；亡国败家的君主无一不是奢侈纵欲的。勤俭的人节制欲望，奢侈的人放纵欲望。放纵欲望的人危险，节制欲望的人安全。

“尧舜之居，土阶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宫室而菲饮食。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历史上，尧舜所居住的地方只有三级土台阶，夏天穿着粗布编织的衣服，冬日也只穿着鹿皮制成的大衣。禹也同样，他的宫室低矮简陋，饮食非常微薄。这几位帝王并非生来就不讲究衣食住行，而是他们最大限度地做到了节俭。也正因为节俭，他们才能使天下太平。

什么是天下太平？就是老百姓都衣食无缺，能吃饱饭、穿暖衣服，

少欲知足，安分守己，安居乐业。这样就可以“刑措不用”，刑罚可以搁置不用。天下的百姓都知足常乐，没有太多的欲望，也没有人去作奸犯科。

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的出现，都是因为皇帝有这样的认识，能够带头力行节俭，即《老子》中所说的“我无欲而民自朴”。汉文帝时，有人进献了一匹千里马，汉文帝颁诏说：“鸾旗车在前先行，随班的车在后紧跟着，吉日出行一天行五十里，军队行军一天行三十里，朕骑千里马，独自先到哪儿去？”于是，将千里马归还，并且付给献马的人行程费用。他又下诏说：“朕不接受进贡，可下令四方之人不要再进献了。”汉文帝对这些远方之物、难得之物都不认为贵重，闲游的娱乐禁绝了，珍奇美丽的赠礼杜绝了。汉文帝的谥号为“文”，因为他是真正有文化的人，懂得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欲不可纵

古人告诫我们“欲不可纵”，欲望一旦被引发出来，是没有止境的，而且是愈放纵愈满足不了。

《群书治要·新语》中有一段很好的论述：“夫怀璧玉，要环佩，服名宝，藏珍怪，玉斗酌酒，金罍刻镂，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怀里揣着璧玉，腰间系着环佩，穿戴名贵的衣服，上面还有珠宝的装饰，收藏珍奇怪异的物品，用玉斗斟酒，在金杯上刻镂花纹，这些都是可以在小人面前夸耀的东西。“高台百仞，金城文画，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修筑百丈的高台，在坚固的城墙上绘画，这些是导致老百姓筋疲力尽的因素。

“故圣人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不损其行以好其容，不亏其德以饰其身。”所以圣人住着低矮的宫室却高扬道德，穿着极差的衣服却勤行仁义。他们不因为装扮容貌而损伤操行，不因为装饰外表而亏缺品德。“国不兴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贡献也。”

国家不兴办无益的功业，家中也不收藏不实用的器物，借此减少民众的劳役，节省他们的赋税。

“璧玉珠玑不御于上，则玩好之物弃于下；瑣琢刻画之类不纳于君，则淫伎曲巧绝于下。”如果君主不喜欢璧玉珠玑，那么玩好之类的东西也会被百姓抛弃；君主不收藏雕琢刻画，那么淫巧之类的物品也会被民众弃绝。“夫释农桑之事，入山海，采珠玑，捕豹翠，消筋力，散布帛，以极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岂不谬哉！”放弃农业、蚕桑等重要事务，上山下海，采集珠玑，捕猎禽兽，消耗民众的劳力，浪费国家的资财，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一时的愉悦，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这难道不是谬误透顶吗？

富不过三代

古人说：“富不过三代。”第一代创业的人，往往是白手起家、兢兢业业、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下了家业。到了第二代，虽然条件好了，还能耳闻目睹父辈创业的艰难，知道克勤克俭，使事业发展壮大。但是到了第三代，一出生就过着奢华的生活，不知道祖辈、父辈创业的艰难，不懂得什么是励精图治、克勤克俭，反而学会了骄奢淫逸、铺张浪费，久而久之，就把祖辈、父辈打下的基业败光了。

“富不过三代”的循环，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据统计，在美国只有30%的家族企业到了第二代还能够延续，到了第三代就只有12%了，继续往下发展，四代以后仍然能够存在的家族企业只有3%。西班牙的说法是“酒店老板，儿子富人，孙子讨饭”；葡萄牙的说法是“富裕农民，贵族儿子，穷孙子”；而德国人则用“创造、继承、毁灭”来形容这些家族企业在三代里的发展情况。

司马光曾经说：“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试问哪一个父母不爱儿女？如果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教导他，只是一味地满足儿女的欲望，就变成了溺爱，恰恰是把孩子害了。

古人说：“遗金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如果儿孙有德行、有能力的话，他会自己去创造财富，留钱给他有什么用呢？如果儿孙没有德行、又没有能力，把钱留给他，他迟早也会败散掉。所以把钱留给儿孙，儿孙就会觉得家里有这么多钱，用不着去劳作，吃几辈子都吃不完，生活没有了目标，也就丧失了斗志。

中国古人告诫“欲是深渊”。一个人的欲望一旦打开，就没有了边际。《大学》中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做起。“格物”即格除物欲，人要在财色名利的面前如如不动，把持住自己，这样才能够涵养智慧。“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人把心放正了，才能够治国、平天下。而要想做好君主、做好领导者，最重要的就是修身。而修身从戒贪做起，所以我们吃穿住行都要力求俭朴，不能奢侈浪费。

第十讲

官者要有仁爱之心



禁令不明，而严刑以静乱；庙算不精，而穷兵以侵邻。犹斲禾以计蝗虫，伐木以杀蛣蝎，减食以中蚤虱，撤舍以逐雀鼠也。

——《群书治要》卷五十《抱朴子》

“禁令不明，而严刑以静乱”。“乱”，《说文解字》解释为“不治也”。“静乱”就是平定乱事。“庙”是朝廷的代称，“算”是谋划的意思。“庙算”就是朝廷对国事进行的谋划。“穷兵”指竭尽武力。“斲禾”，这个“斲”是割、劈、砍的意思。“蛣蝎”，“蛣（蠹）”和“蝎”都是木中的蛀虫。“中”是击中、杀害的意思。

就是说禁令不明确，却用严刑来平定乱象；朝廷对国家大事的谋划不当，却竭尽兵力去侵犯邻国。这就好像割掉禾苗以消灭蝗虫，砍掉树木以消灭蛀虫，吞下毒药以杀死跳蚤、虱子，拆除房舍以驱逐麻雀和老鼠一样。这些话告诉我们，人如果抓不住解决问题的根本而意气用事，结果让怒气做主，嗔心一生起，就失去了冷静，从而看不到事实的真相，所采取的措施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还损害了自身。

这段话运用在君道修身上，就是告诉我们，修身就是要修心，让我们的内心时时刻刻保持水平如镜的状态，波澜不兴。如果我们的这颗心起了大风大浪，就像一个人在暴怒的时候作出的决策一定是偏激的。当我们看人不顺眼，对谁不满意，或者起了小小的嫉妒之心时，就像水起了波纹一样，对外界的映照是不如实的。只有恢复到水平如镜的时候，面对任何事情都

沉着冷静，即使是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这样的修心才算有了功夫。

禁令不明的原因

“禁令不明，而严刑以静乱。”这个“乱”就是不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乱象？国家为什么得不到治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禁令不明确，人们不知道应当提倡什么、禁止什么。禁令就是规矩。有人把《弟子规》比作人生的“交通规则”，就像我们开车，如果没有交通规则，就会出现车与车相撞的事故。做人以及国家治理没有规则，也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混乱。

禁令不明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就是没有礼法可依，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无法可依，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不明确，没有行为准则。就是《墨子》中所说的“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一个人的时候，有一种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两个人的时候，有两种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有10个人的时候，就有10种不同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结果“我高兴，我愿意”就成了人们行为的理由，人人都根据自己的意思去做，怎么能够不混乱呢？

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政权取得之后，大概不超过5年就要制礼作乐，整个国家都有制度可循，一切都有了标准，这样社会才得以安定。譬如说，我们经常讲做人要遵循“五伦”“八德”。在我们学习“五伦”“八德”之前，一些人认为自己有孝心。有一个小偷被抓进了派出所，警察对他说：“你偷东西，违法乱纪，你这个人很不孝。”结果他很不服气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孝？我这个人有孝心，对父母很好。”不学《弟子规》，不知道“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都被抓进派出所，违法乱纪了，他还认为自己有孝心。这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做人的标准、孝的标准是什么。

禁令不明的第二种原因就是朝令夕改，政令没有连贯性。就像我们

有了交通规则，如果这个规则经常变化，今天是左侧通行，明天又改成右侧通行了，老百姓就无所适从了。

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传承了两千多年，这是因为儒家讲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性德，是自然而然的。它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适用。五常“仁义礼智信”，为什么称为常？就是因为它是常道，亘古不变。如果我们对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没有继承这些道德规范，反而制定了很多新的规范，而且还经常更改，这样就很难使禁令明确。

禁令不明的第三种原因是禁令太多，导致老百姓迷惑。《群书治要·盐铁论》中说：“道径众，民不知所由也；法令众，人不知所避也。”道路多了，人们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法令过多，老百姓不知道应该怎样避免触犯法禁。“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旷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因此，圣明的君主制定法令，如日月一样昭明，民众不会迷惑；像大路一样通达，民众不会困惑。“幽隐远方，折乎知之；愚妇童妇，咸知所避”。即使是偏僻幽隐的遥远之地，也能曲折地闻知；愚昧无知的妇女儿童都知道应该怎样避免犯法。“是故法令不犯，而狱犴不用也”。因此就没有人违犯法令，监狱和刑具也都用不上了。

“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烂捌焦不能禁。”过去秦国的法令比秋天的荼草还繁多（荼草在秋天长得特别茂盛），法网比凝结的油脂还细密。然而上下都能逃过制裁，奸诈虚伪的事情层出不穷，有关部门要惩处，就像挽救腐烂之品、分开烧焦之物那样困难。“非网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这并不是因为法网松弛、罪犯漏网所导致的，而是因为废弃礼义、滥用刑罚的结果。

“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群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现在制定的法律政令就有100多篇，章目繁杂，罪名众多而且重复，各地施行起来或多或少都感到疑惑。“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愚民乎？”定罪或轻或重，连通晓法

律的官吏都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更何况普通的百姓呢？法律和政令的典籍被尘土覆盖，束之高阁被蠹虫蛀坏，连官吏都不能全部过目，何况无知的百姓呢？“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这就是造成要判决的案件愈来愈多，而百姓犯法也日益增多的原因。

“亲服之属甚众，上附下附，而服不过五；五刑之属三千，上杀下杀，而罪不过五。故治民之道，务笃于教也。”这是用丧服来作比喻，在有丧事的时候，亲属们应该穿的丧服种类有很多，但按亲疏关系上下推算，也不会超出五服；五刑的条例多达3000多条，但上下比较、归类，也不过5种刑法。所以治理百姓的根本方法，还是在于务必加强礼义道德的教化。

法令过多让人们感到迷惑。出现法令过多是因为人们在认识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不知道社会乱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以为是法律不够严密，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导致的。其实社会诸多乱象的产生是因为伦理道德教育的缺失导致的。因此，就把精力放在制定法律法规上，而忽视了道德教育。譬如，有些人认为，西方国家没像我们那么重视道德教育，它们就是靠民主法制，不是把国家治理得挺好吗？我们把它们的反腐制度搬过来，腐败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其实，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法制建设的一面，而忽视了西方的民主法制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西方历史上看，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统。它的政治制度维护了公平正义，但是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宗教来教导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社会治理也是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

好的制度需要好人推行

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是有德行的人，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他都不会做出危害国家的事；如果领

导者是自私自利、以权谋私的人，再健全的制度，他也会想方设法地钻空子来获取私利。

西方著名美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追寻美德》，另一本是《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在《追寻美德》这本书中，他讲了这样一句话：“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法律和规则是谁制定的？是人制定的。如果制定它的人没有正义的美德，只想到自己部门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就不可能制定出公平合理的制度。规则制度制定出来了，由谁来推行？当然还是由人来推行。如果推行的人没有正义的美德，他也不可能把这个好的规则推行好。所以麦金太尔提出：“伦理学的任务不是去设计正义的规则和制度，而是要回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把培养美德作为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他的这一个观点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普遍关注，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样的观点，其实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人的著作中就有所反映。《群书治要·孙卿子》中有这样一句话：“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认为，法不能够独立存在，有了正人君子、圣贤人，它才能够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圣贤君子，没有正义美德的人，它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所以法律和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而圣贤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大家都在争论一个问题，到底是制度重要，还是人更重要？《群书治要·傅子》中讲“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这句话把制度和人之间的关系讲明白了，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着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但是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实行。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必须还要由好人来推行好的制度。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古人并没有否定制度的作用，但是也不认为只要有了好的制度、礼法规则，就能达到社会和谐。

道德教育治理人心

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时，都曾经出现天下大治的局面，特别是“成康盛世”。周成王和周康王统治的时期，监狱40年没有犯人，把社会治理得很好。这些礼法也都记载在典籍之中，可他们的后代子孙却不能身体力行这些教诲，没有按照这些礼法去要求自身、治理天下，最后导致了夏、商、周的相继败亡。

我们要清楚社会乱象的根源，究竟是无法可依、法规不健全，还是法规、法律都已经制定好了，但是人们却明知故犯？如果认为社会乱象产生的原因是法律的不健全，只是在法制的层面解决问题，就会导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现象。也就是法律条款、规章制度一天比一天地更全面、更具体、更细致、更严密，但是违法乱纪的人却愈来愈多，社会并没有安定和谐。这样的治理是治标而不是治本。

要使社会安定和谐，还要注重人心的治理。《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中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如果不能制止人们作奸犯科的心，那人的良心就都泯灭了，欲望高度膨胀，为了一点点金钱，可以不顾别人的生命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以刑罚来处分，甚至判处人死刑，那么即使每一天都在刑场执行死刑，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可见，如果只重视法令的严苛，而不重视人心的治理，社会不仅治理不好，还会出现《汉书》中所描述的情形，“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法律的条文刚刚颁布，命令刚刚下达，欺诈的行为、奸诈的行为就产生。人们会想方设法逃避法律的制裁，逃避制度的惩罚，这样问题会愈来愈严重，就像扬汤止沸、抱薪救火一样。

相反，如果重视道德教育、重视人心的治理，即使制度不是很完善，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呢？《史记》记载，汉朝兴起之后，将秦朝

的严刑峻法都破除了，力求宽宥；把那些过分雕琢的东西也废弃了，力求质朴。当时的法网疏忽得可以把吞舟之鱼都漏掉。就是说法网并不是很严密，有很多疏漏之处，但是当时的汉朝因为重视了道德教育，结果“吏治烝烝，不至于奸”，官员的道德素质是不断提升，没有人作奸犯科，黎民百姓被治理得很好，生活也非常安定。这些论述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我们看到，虽然严刑峻法对反腐败确实也有效果，但是治标不治本，只是让人们暂时不敢去腐败，而不是从心底不愿意去腐败。如何才能让人从心底不愿意去腐败呢？那就要治理人心。

法治德治相结合

中国古人是通过教育来达到治理人心的效果的。《论语》中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如果没有教导百姓做人的道理，没有让百姓树立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意识，而人的欲望一旦被引导出来，那么人们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去贪污腐败，就被处以刑罚，这就是虐政。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就是因为它只有严刑峻法，而没有道德教育。当然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提倡依法治国的同时，特别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中华传统美德的教育，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些都是正确的。

《群书治要·盐铁论》中说：“古者周其礼而明其教，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罚中，民不怨矣。”古时候，规定周全的礼仪，昭明教化。礼义完备，教化昭明，对不服从的人再按照其违法犯罪的程度，处以不同的刑罚。刑罚得当，老百姓就没有怨言了。“今废其德教，而责之礼义，是虐民也。”现在废除了仁德的教化，却责求百姓遵守礼义，这是虐害百姓。

孔子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身居上位的人没有教育、

引导百姓，没有教导他们走正道、行孝悌，结果百姓犯了罪，就对他们处以刑罚，甚至把他们杀掉，这是不符合情理的。“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不教导百姓培养起孝心，却用孝的标准来审判，这是杀害无辜之人。“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全军溃败不可以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可以惩罚百姓。“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这是因为身居上位者没有实行道德教化，罪责并不在百姓的身上。“夫慢令谨诛，贼也”，法令松弛不严谨，却诛杀甚严，这是残害百姓。“征敛无时，暴也”，横征暴敛没有一定的时节，这是暴政。“不诫责成，虐也”，不事先教化百姓，却苛求他们尊礼守法，这是虐政。“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如果能够杜绝了这三个方面的政事，那么才可以用刑。

孔子接着讲应该怎么样教导人，给人以道德的教化，这也是有步骤的。孔子说：“既陈道德，以先服之。”首先要给人们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并且以身作则，让人们信服。人们明白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就不会轻易地去作恶了。

如果宣讲了道德之后还是不行，就要“则尚贤以劝之”，要尊重贤德之人，劝勉百姓向善。有德行的人能够身体力行，又能够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讲解出来，让大家都去学习效仿，社会就会安定和谐了。所以古人特别尊重老师、尊重贤德之人。“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憚之”，还是不行，就要废弃罢黜那些不能遵守道德规范的人，让人们生起畏惧之心。“若是，百姓正矣”，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百姓行为自然就会端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倘若还有一些奸邪之徒顽固不化，最后才给他们以刑罚的制裁，这样民众就都能够明理而知耻，而羞于犯罪了。“是以威厉而不诚，刑措而不用也”，于是就不需要使用严厉、苛责的政令，而刑罚也可以搁置不用了。

“今世不然，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然而现在的社会（指当时的社会）却不是这样，现

在的社会教育混乱，刑罚繁多，使人迷惑，人们不知不觉地犯了罪，于是又用刑罚来制裁他们。刑罚愈来愈繁多，但是犯罪的人却数不胜数。“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社会风气由盛转衰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刑法，老百姓能不越轨犯法吗？这一段的阐述非常明确，它告诉我们先要教化民众，如果民众因为没有伦理道德的教化而做了邪曲不正的事，就应该给予宽恕。但是宽恕了之后，一定要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让民众知道做人的本分。

道德教育是首要

《汉书》记载，董仲舒向汉武帝上书的时候，提出这样一句话：“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圣王都是承顺天道来从事政治。天道是好生恶杀，有仁爱之心，所以圣王一定是把道德教育作为首要任务，而把刑罚设置得非常简单。现在废除了古圣先王的道德教化，单单用执法之吏来制裁人民，却还想让道德的教化遍及四海，这是很难完成的。

《群书治要·列子》中记载，晋国有很多的盗贼，晋侯为这件事很苦恼。恰好他们国家有一个叫郤雍的人，他能够通过察言观色，辨认谁是盗贼，曾经辨认了上千人都没有错过一次。晋侯非常喜悦地说：“我得到了这样一个人，哪还用得着很多人去侦破案件呢？用这一个人就足够把这些盗贼治理好了。”赵文子听了之后，很担忧地劝说：“大王，您用这个人来指认盗贼，不但不能够尽除盗贼，反而使这个人的下场也不会很好，他会必死无疑。”晋侯没有当回事。

过了不久，一群盗贼聚在一起商量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走投无路，都是因为郤雍的缘故。”于是，他们偷盗了郤雍的财物，把郤雍杀死了。晋侯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惊惧，这才知道赵文子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

于是就把他找来商量：“果不其然，郤雍被盗贼害死了，我还能用什么办法来捕获这些盗贼呢？”赵文子说：“周朝有一句谚语：‘能够看清深潭中游鱼的人是不吉利的，能够洞察隐匿之情的人是有灾殃的。’您现在要想去除这些盗贼，不如举荐那些贤良之人来办理朝政、兴起教化之风。人人都有了廉耻之心，谁还会去做盗贼呢？”这一次晋侯听了他的话，让随会来兴办道德教育。最后这群盗贼纷纷逃离晋国，跑到秦国去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单单用执法之力惩治百姓，国家是很难治好的，根本的还是要培养起人的廉耻之心。为什么要设立刑法？就是期待它能起到威慑的作用，不是要用刑罚去制裁人。虽然刑法设立得很严格，但因为兴起了道德教化，轻易用不到刑罚。孔子也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我判案件和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也是根据案情给予人制裁。但是我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让人们不要起争讼。为什么人们能不起争讼？是因为兴起了道德教育。

恩及刑人，仁恕树德

《群书治要》告诉人们，如果抛弃了圣人的治国法纪纲常而不予伸张，毁坏了圣人的礼义而不能防止百姓犯法，使百姓陷入法网而被抓起来惩处。这就好比是打开栏圈放出禽兽，而又用毒箭去射杀它们，不射杀就不罢休！曾子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当政的人失去了正确的治国之道，民心早已离散。如果了解了这样的情况，就应当怜悯他们，而不是沾沾自喜。不忧虑为什么没有把百姓治理好，反而夸耀自己能抓到坏人，这就像捕鸟的人，看到鸟陷入自己设置的罗网就喜出望外一样。

孔子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故民乱反之政，政乱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润穷夫。施惠

悦尔，行刑不乐也。”对于不仁的人，憎恨得如果太过分了，也会招致祸乱。百姓动乱，就应回过头来从朝政上找原因；朝政乱了，就要回过头来反省执政者自身。如果自身能够端正，天下才能安定。所以君子赞美鼓励善行，又能怜悯不能为善的人；对受刑的人也要给予恩惠，对于穷人要施行仁德；施恩惠时感到喜悦，而实施刑罚时则感到难过，这才是为人父母官的仁爱之心。如果对受刑之人行刑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同情之心，还可以得到案件的实情沾沾自喜、邀功请赏，这哪里是为人父母官应有的表现呢？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中记载着孔子的弟子季羔的故事。季羔在卫国当司法的狱官，曾经亲自判处一个人断足之刑。后来卫国有了动乱，季羔逃跑。而被他砍掉双足的人，这时候正好在守护城门，他对季羔说：“这墙上有一个人缺口。”季羔说：“君子不跳墙。”那人又对季羔说：“里边有一个洞。”季羔说：“君子不钻洞。”这个人又说：“这里边有一间房屋可以藏身。”于是，季羔就躲进去了。当追赶他的人都走了，季羔要离开的时候，便向这个被他实施了断足之刑的人问道：“我不能够违背君主的法律，所以亲自判刑，把你的双足砍掉了。现在我遇到了危难，正是你报怨的时候，但是你不仅没有报怨，反而帮助我逃跑，这是什么原因？”这个人回答说：“砍掉我的双足是因为我犯下了罪过，您是无可奈何的事。当时我看您用法律惩治我的罪行的时候，您是先判了别人的罪，然后才判我的罪，是希望我能够得到减免，这一点我看出来了。在我被判定了罪行，将要行刑的时候，您面带忧愁，伤痛之心形之于色，这一点我也观察到了。您这样做并不是对我有什么偏袒，而是有仁德的君子自自然然的表现。君子看到百姓犯罪，会有哀怜之心，他会想，这个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结果今天才被处以刖足之刑，这是多么可怜的事、多么值得同情的事！这就是我之所以爱戴您、帮助您的原因。”

孔子听了这件事之后说：“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

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其子羔乎！”作为一名好的官吏，虽然是依法办事，但是心存仁恕之心。心存仁恕之心树立的是德行；太过严厉苛暴，树立起来的就是怨气。既能够秉公执法，又能够体现德行，还有关爱百姓的心，能这样做的不就是子羔（高柴，姓高名柴，字子羔，又称季羔）一样的人吗！

同样是做司法工作，但是不同的人对待罪犯的心态不一样。有的人看到百姓犯罪就发怒，用残酷的刑罚来对待他们，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严，且以此为荣耀；有的人却心存怜悯之心。

要改变社会的乱象，就必须秉持“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因为“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我们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是可以教导好的。《说文解字》中，“教”字释义为“上所施，下所效也”。上面的人做好了，下面的人自然会跟着做好。

第十一讲

仁义道德好于功利强权



刑罚积则民怨背

禁令不明，而严刑以静乱。

——《群书治要》卷五十《抱朴子》

“禁令不明”的重要原因是法律条文太多，使人迷惑，不清楚其详细的内容。法律条文太多的一个原因，是人们误以为社会诸多乱象的出现，是由法制不健全而导致的，所以把设计规则和制度作为治理社会乱象的重点，从而忽视了道德教育这一根本。《汉书》中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用礼义治理国家，积累起来的就是礼义；而用刑罚治理国家，积累起来的就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刑罚用多了，人民就会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会和睦亲爱。“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本来世代君王想让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都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用以使人们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相同。“或导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的，德教和谐的时候，人民的精神状态表现出欢乐；用法令来驱使的，法令严酷时，民风也就呈现出哀怨的景象。

《汉书》中记载着酷吏严延年的故事。严延年身材矮小，精明强悍，

办事灵活敏捷，胜过以精通政务著称的子贡、冉有。作为一郡长官，凡是下属忠诚奉公的，他都会像对待自家人一样地优待、亲近他们，一心为他们着想，居官办事也不顾个人的得失。因此，在他所治理的地区内，没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但是他过分地痛恨坏人、坏事，所以被他过度惩罚的人很多。严延年擅长写狱词及官府的文书，凡是需要诛杀的人，他都亲自写奏折上奏。大家觉得他的狱词写得很有道理，所以上面会很快核准判定犯人的死罪。到了冬天要行刑的时候，严延年命令所属的各县把犯人都押解到郡上，集中在郡府一起处死，一时间竟血流数里。因此，郡里的人称他为“屠伯”。“伯”在这里是老大的意思，说他是杀人的老大。在他管辖的地区，“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全郡上下一派清明。

有一次，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来看他，本来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礼的。严延年母亲到洛阳的时候，正好碰上他在处决犯人。她看到血流了好几里地，非常震惊，就住在了道旁的亭舍里，不肯进入郡府。严延年出城到亭舍里拜见母亲，他的母亲却关门不见他。他在门外脱帽叩头，过了好一会儿他的母亲才让他进去。他的母亲斥责道：“你有幸当了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但是没有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让他们平安，反而利用刑罚大肆杀人，以此来建立威信。难道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应该这样行事吗？”严延年赶紧向母亲认错，重重地叩头谢罪，还亲自为母亲驾车，把母亲迎回郡府居住。

祭祀完毕之后，母亲对严延年说：“苍天在上，明察秋毫，岂有乱杀人而不遭报应的？想不到我人老了，还要看着壮年的儿子身受刑戮。”他的母亲在这个时候已经预感到，严延年以后的结果一定不是很好。他的母亲又说：“我走了，回到东边的老家去为你准备好葬身之地。”严母回到家乡见到严延年同族兄弟时，又把以上这些话讲给了他们听。一年后，严延年果然出了事。这时，东海郡的人没有不称颂严延年的母亲贤明智慧、

深明大义的。

古人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所谓的“民之父母”，本应该爱民如子。《群书治要·盐铁论》中写道：“故为民父母，似养疾子，长恩厚而已。”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对待百姓应该像父母对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样，要做的不过是增施恩惠、宽容厚待罢了。哪有父母官对儿女屠戮的道理？如果把百姓，包括犯罪的人，放在自己的对立面，把能够捕多少人、杀多少人、给了多少人以刑罚作为自己的功绩去称颂，而毫无怜悯之心，这是与天道不相符合的，结果一定不会好。所以古人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和天道相应，据此就能够评判出他的兴衰成败。

《群书治要·新序》中记载着“臧孙行猛政”的故事。臧孙因为实施严苛的治理措施，受到子贡的批评。臧孙觉得自己做事很严明，也没有私心，子贡不该批评自己。于是，他向子贡请教：“我没有奉公守法吗？”子贡回答：“你是守法的。”又问：“我不够廉洁吗？”子贡说：“你也很廉洁。”臧孙又问：“我没有执政能力吗？”子贡说：“你也很有执政能力。”臧孙接着问：“这三者我都唯恐自己做不到。既然这三者我都能够做到，为什么您还批评我？”子贡回答：“你虽然守法，但是好以法来损害人；你虽然很廉洁，但是因为廉洁就很骄慢；你虽然有执政能力，却以此来欺凌属下。”

子贡接着说：“为政的人就像调琴瑟一样，如果大弦上得太紧，小弦就会崩断。有尊位的人，德行不可以浅薄；官阶高的人，管理不可以琐碎。如果事必躬亲，他就没有时间、精力去策划大的谋略。所以能够分出去的杂事，要分给手下人去做，这样他才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大事。辖地广阔的人，制度不可以偏狭；管理众多人口的人，法律不能够严苛。这是自然的法则，是自然而然的规律。所以‘罚得则奸邪止矣，赏得则下欢悦矣’。如果你的刑罚得当，邪曲不正、作奸犯科的事就能够得到制止。如果你的奖赏得当，属下的人都应该欢心喜悦地拥护你。但是你现在却不是这样。”

子贡又说：“你有没有听说过子产是怎么治国的？子产治理郑国的时候，他把法律监督机制设立得很严密、很合理，但是他并没有止于此，还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子产治国的时候，他是用仁爱礼义来教导人们，政事非常宽松。对于奖赏的多少，难以确定的时候就从重；对于刑罚的轻重，难以判断的时候就从轻。在他实施了这样宽松的治理七年之后，社会风俗非常良善，国家也没有需要用刑罚处罚的人，监狱都空了，没有人违法乱纪。

“子产过世之后，百姓都痛哭流涕，非常哀伤。百姓说：‘子产已经死了，我们还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吗？我们能把安定的生活寄托给谁呢？如果能够让子产重新活过来，用我们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换，我们都愿意。’子产活着的时候，受到人们爱戴；死了的时候，人们都为他感到悲伤。做官的人在朝廷上哭泣，商人在市场上哭泣，农民在原野上哭泣，姑娘在内室里哭泣。整个国家都听不到琴瑟的声音，大夫的玦佩都不戴了，妇人把簪子、耳饰等装饰品全都摘下来了，人们在大街小巷痛哭流涕，这就是因为子产行了仁恕之道的缘故。

“而现在是什么样呢？听说你有病了，百姓都非常欢喜，互相祝贺道：‘臧孙子病了，最好他能够死去。’而你的病刚刚有一些好转，百姓都非常恐惧地说：‘臧孙子的病又痊愈了，我的命运太不幸了，为什么臧孙子没有死？’你病了的时候，人们都非常欢喜，互相祝贺。你生活在这个世间，人们都因你而恐惧。可见百姓被你伤害得有多深了！你怎么能够不受到批评？”

臧孙子是一个很明理的人，觉得子贡的这番话很符合道理，他就主动把官职让给别人了。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虽然臧孙赏罚分明，也很廉洁，但是如果对待百姓过于苛刻，百姓也不会感恩戴德，反而还会怨声载道。子贡这样总结：“盖德厚者报美，怨大者祸深。”德行深厚的人，回报给他的也是很美好的；

与人结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有灾祸。可见，最大的德行莫过于“仁”，最大的祸害莫过于苛刻，因而为政要宽和、要行仁恕，而不能过于苛刻。

西方民主选举的弊端

庙筭不精，而穷兵以侵邻。

——《群书治要》卷五十《抱朴子》

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是，对国家大事谋划不当，为了缓解或转嫁国内的危机，竭尽兵力去侵犯邻国。例如，美国由于采取高福利、高保障的政策，造成财政透支，直接导致了高消费、高浪费现象的快速蔓延。为了保持高消费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借债过日子。结果到了2011年的时候，美国国债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这也是触及美国国会所允许的上限了。为什么借了这么多的国债而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那是因为西方的制度是所谓的“民主选举”。为了争取选民、获得选票，任何政党都不愿意采取增加税收、降低福利的改革办法，因为这样会影响到选民的利益，选民就不投他们的票了。

西方现代社会的“民主选举”至少有几个弊端是难以避免的。

以言取人

“民主制”主要是通过候选人的演讲来选举领导人的，这样的程序会导致中国古人所说的“以言取人”的倾向。

《论语》中有很多关于言语的经典之谈。譬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花言巧语，专攻好听的言辞，而伪装出和善的面目，一味地去取悦别人，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之心。“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在言语上应该很迟缓，但是在行为上要敏捷、雷厉风行。正是因为

一个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君子不以言举人”，君子不因为他说得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况且“有言者不必有德”，他的言语很好听，但是他不一定有实际的德行。所以我们选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群书治要·中论》中也有一段关于言语和德行的论述：“夫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辩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不倦，谍谍如也。”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细小的环节，他的言辞也非常巧妙、很有修饰，他的伶牙俐齿足以应对急切的追问，他的反驳也足以让世俗之人断除疑惑。但是他喜欢言谈，不知疲倦，喋喋不休。“夫类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达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然而在世间，那些可以按类归纳推理、明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钝的、容易被蒙蔽的、不通达的人是多数的，谁知道他说得正确不正确？虽然他的口才很好，甚至还有很高的学历，讲出的话头头是道，一般的世俗之人很容易相信他的话，但是他所说的可能是有违大道的。“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这就是他之所以没有什么用处却不被废弃，虽然很低贱却不被人遗弃的原因所在。

“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者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浇乱至道也。”古圣先王的法律规定，巧说诡辩而曲解法令、混乱礼法和名分使其失去原意、行为邪僻却坚持不改，言语虚伪、能言善辩的人，要处以死刑。就像孔子当了大司寇不久，就诛杀了“行僻而坚，言伪而辩”的少正卯。少正卯口才非常好，能言善辩，致使很多跟着孔子多年的弟子都被吸引去听讲，对于这样的人，只有把他杀掉。因为他的言辞会使民众产生疑惑，而且使治道混乱，让民众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

《汉书》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张释之时任廷尉，和汉文帝一起出行。文帝登上了虎圈（饲养虎的地方），向上林苑的主管询问关于禽兽簿

上的各种事情。结果他问了10多个问题，上林尉左顾右盼，一个都回答不上来。而旁边有一位官职很低的啬夫，代替上林尉回答了这些问题。皇上所问的有关禽兽簿上的问题他都非常清楚，而且为了让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问必答、滔滔不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对禽兽簿很熟悉，口才也很好。文帝看了之后，果然很欢喜，这个时候也忘记了孔子的教诲“巧言令色，鲜矣仁”，于是就说：“当官吏的难道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甚至准备下诏任命这个啬夫为上林令。上林令是管理上林苑的最高长官，比上林尉的职位还要高。

张释之看到之后，赶忙上来劝谏。他问文帝道：“陛下觉得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呢？”周勃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西汉的功臣，因为他被封在绛县，所以被称为绛侯。文帝说：“他当然是长者了。”长者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年纪很大，德高望重。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呢？”张相如也是因为有战功才被封侯的，他在西汉的143位功臣中列居118位。文帝回答说：“他当然也是长者。”张释之说：“绛侯、东阳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但是他们两个人在上书言事的时候，竟然说不出话来。陛下现在越级提拔这个啬夫，那不就是想让人们都效仿此人喋喋不休的口辩之才吗？秦国任用了只会舞文弄法的刀笔之吏，官吏们争着以办事迅疾、苛刻督责为能事，然而这样的流弊在于徒然具有官样文书的表面形式，而没有怜悯同情的实质。因此，秦始皇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秦朝逐渐衰败，到了秦二世的时候，就土崩瓦解了。现在陛下您因为啬夫伶牙俐齿，就越级提拔他，臣恐怕天下臣子会随风响应，争相去追求口舌之能，而不求实德。况且下级顺从上级，他们的速度就像响之应声、影之随行一样迅速。因此，陛下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谨慎小心。”文帝听了之后，称他说得好，于是取消了要任命啬夫为上林令的命令。

《群书治要·傅子》中说：“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如

果君王喜欢的是德行，那么属下就会纷纷地去修养自己的品行；如果上面的人喜欢言谈，下边的人就会争相地修饰自己的言辞，向能言善辩方向去发展。“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如果人人都重视修养，重视道德和品行，天下的仁义之风就兴起来了；人人都去学习能言善辩，虚伪的风气就会兴起。“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德行的成就是很难的，也很难被发现；而言语很容易被撰写，也很容易取悦于人。“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古圣先王都知道，想让口才很好、演讲术很高、文章写得很漂亮是很容易办到的事，而且爱听好话的人很多，所以并不崇尚言谈。“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渺矣。”如果不通过尊师重道、通过举荐和褒奖善人教导百姓向善，却只以言辞动听、能够取悦于人来选用人才，那么天下将会背弃道德，只以言辞浮华、伶牙俐齿来博取君主封赏的人就不会少了。

“德难为而言易饰也。”德行很难修养、很难成就，但是言语却很容易粉饰。当然这个容易也是相对于德行的修养而言的，其实锻炼很好的口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它相对于德行的修养是容易的。所以古人看到了这些问题，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言语讲得很动听，就对他委以重任。

结党营私

《论语》中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如果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去观察，为什么他被人厌恶，不能轻易相信众人的意思。有的人被众人所喜爱，大家一谈起来都赞美他，也不要轻易相信，也要考察一下，他为什么被人赞美？子贡曾经向孔子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乡人皆好之，何如？”全乡的人都赞美他好，这个人怎么样？能不能判断他就是一个善人呢？孔子说：“未可也。”还不一定。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

何如？”如果全乡的人都厌恶他，可不可以判定这个人就是个恶人呢？孔子说：“未可也。”也不一定。“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不如全乡里善良的人都喜欢他，不善良的人都厌恶他，这样才能够判断出这个人的善恶。

《群书治要·史记》记载，齐威王即位后的九年间，诸侯都来讨伐他，致使国家得不到治理。于是，齐威王就招来即墨的大夫，也就是治理即墨的地方官。齐威王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之后，寡人每一天都能够听到毁谤你的言语。但是寡人派人去即墨视察，发现田野都得以开辟，人民都丰衣足食，官府也没有积压的公事，齐国东部地区因此得以安宁，这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的缘故。”于是，齐威王封了1万户的食邑给即墨大夫。接着，他又召来了阿地的大夫，对他说：“自从派你去驻守阿城，每一天都能够听到赞誉你的声音。但是寡人派人到阿地去视察，田野没有得到开辟，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赵国攻打甄地的时候，你不能出兵去救援；卫国取得薛陵的时候，你居然连这件事都不知道。这是由于你善于以重金巴结寡人的左右以求取声誉所导致的。”所以当天齐威王就烹杀了阿地的大夫，而且把曾经赞誉他的人也一起烹杀了。这样一来，齐国上下都感到很恐惧，人人都不敢文过饰非，做事务求真实，尽自己的本分，最终齐国得到了治理。诸侯听到这件事，再也不敢轻易和齐国打仗了。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有很多人称赞一个人好，也要考察一下这些人是不是受了他的贿赂，所以才帮他说好话。即使这个人受到很多人的毁谤，也要考察一下，是不是这些人都贪污受贿，只有这一个人廉洁自守，不愿意同流合污。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为什么难得糊涂？因为当时官场大多数人都是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郑板桥是一个读书人，他明理有道义，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但是又改变不了当时的风气，所以只好难得糊涂。

《群书治要·六韬》中讲：“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

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如果君主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为贤德的、有智慧的人，将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称为是不肖之徒，将导致党徒多的人、喜欢结党营私的人，往往被举荐出来。而不愿意结党营私的人、党羽少的人就会被罢退。这些邪曲不正的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真正贤德的人被埋没了。忠臣还可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虚有的声誉取得了领导位置。这个世间的乱象就会愈来愈严重，国家也就免不了要危亡。

西方“民主制”依靠众人的意思，依靠一人一票的选举，往往可能把那些喜欢结党营私的人选举出来。特别是候选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让更多的选民了解和支持自己，必须依赖于大财团进行宣传。一旦当选之后，就必须考虑回报他们，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所以选举基本上是被大财团所掌控，而财团的性质就是唯利是图。因此，在西方所谓民主制度之下，结党营私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也是导致西方国家的政策虽然出现了病态，但却不能改变的原因。

遗漏人才

西方所谓的“民主制”鼓励的是竞选，这种选举方式往往导致最上等的人才被遗漏。

《晏子》中记载，齐景公向晏子问求贤之道。晏子把人才分为三个等级：“夫上，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最上等的人才，是很难举进的，而且他轻易地就会退位而去；次一等的贤才，他很容易出来当官，同时也很容易罢官而去；最下等的人，是最容易被举荐出来，但是也最难以被罢退的人。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没有私心，没有功利之心。就像古人所说的，“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是进是退完全看缘分，有缘分、有条件，有德

行的人就出来用自己的所学、自己的德行来为社会、为人民做贡献。条件不成熟，就退而独善其身，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品德。所以古人说：“人到无求品自高。”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刘备要三顾茅庐。诸葛亮看到刘备很有诚意，才愿意出来辅助他，才愿意出来做官。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出来做官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想帮助刘备这样的君主治理天下，让天下的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提倡竞选，那就不能避免竞争应聘者急功近利、为利而来的现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竞选、竞争上岗往往选不出像诸葛亮、颜回这样最上等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是不愿意出来竞争的。愿意出来竞争的，很多都是有一些私心的。古人任用贤才有一个办法，就是任用那个最谦虚、最礼让的人，重在让而不在于争。

自赞毁他

西方所谓“民主制”选举带动的是争斗风气。竞争向上提升就是斗争，竞选者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不惜想方设法去谋算别人。竞选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自赞毁他，称赞自己，抨击别人。所以家和万事兴。一个国家也像一个家庭一样，如果大家不是互相欣赏、互相激励，而是互相竞争、尽拆别人的台、说别人的不是，这个国家怎么能够治理好呢？上行下效，上边的人怎么做，下边的人就怎么效仿。如果整个社会充满争斗的风气，这个社会确实很难治理好。

王道文化与霸道文化

许多西方国家近几百年来奉行的都是霸权文化，提倡科学和竞争。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对比了西方的霸道文化和东方的王道文化，他在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这样讲道：“专就最近几百年的文化

讲，欧洲的物质文明极发达，我们东洋的这种文明不进步。从表面的观瞻比较起来，欧洲自然好于亚洲。但是从根本上解剖起来，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①

正如《淮南子》所说的：“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如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万乘之国无破亡者矣。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现在有人认为只要强大就可以制胜，于是便丈量本国的地域、计算本国的人口；认为只要富有，国事就顺利，所以热衷于计量储存的粮食、称量金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有千辆马车的君主无不可以称霸诸侯，有万辆马车的大国更是永远不会灭亡。所以国要亡，即使很大也靠不住；施行王道政治，即使很小的国家也不可轻视。由此看来，国家得以存在，是因为有道，而不在于其大；国家所以灭亡，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其小。

东方的文化是王道文化，西方的文化是霸道文化；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而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①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5页。

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中还指出：“现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国、美国有少数人提倡仁义道德。至于在其他各野蛮之邦，也是有这种提倡。由此可见西方之功利强权的文化，便要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这便是霸道要服从王道，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趋于光明。”^①

^①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8—409页。

第十二讲

不因私怒而损害国家公义



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

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

——《群书治要》卷十七《汉书五》

“度”是打算、度量的意思；“功”是公义的意思。这句话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匈奴请求和亲，朝臣议论这件事时韩安国说的。

御史大夫韩安国建议不要出击匈奴，应该同意和亲。在与其他臣子辩论的时候，他引用了汉高祖的一个故事。“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臣听说高皇帝（汉高祖）在进军匈奴的时候曾经被围困于平城，7天吃不上饭，天下人作歌传说，但是在解围返回之后，他却没有愤怒之心。接下来就说了这句话：“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圣人都是以天下百姓的利益为考虑的人，不会因为自己个人利益产生的怒气而伤害天下的公义。“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所以汉高祖派遣刘敬送给匈奴黄金千斤，与匈奴和亲，避免了战乱，至今已经历五代，人们仍然从这件事中得到好处。

这句话告诉我们要避免意气用事、感情用事、任性而为。特别是领导者，不能够因为私人之间的仇怨产生的怒气，损害了国家的公义，要有理智，顾全大局。试想当时汉高祖如果忍不住这一股怨气，发动战争攻打

匈奴，双方百姓都会因此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也因此不得安宁，浪费大量财力、物力，疲惫不堪。

不因己私怒而伤害国家的公义，首先体现在荐贤、任贤上。举荐一个人不是考虑喜不喜欢这个人，这个人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和自己投不投缘，而是考虑他是否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一个人一心想为团体好，想为国家好，他就可以放得下私人的喜好、私人之间的仇怨而秉持公正。

举荐人才，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所举荐的人不仅有才能，而且还要有德行，更重要的是要有使命感、责任感，勇于担当。

《左传·襄公三年》记载，祁奚请求告老还乡，晋悼公问他：“谁可以接替你的职务？”祁奚荐举了解狐，而解狐是祁奚的仇人。晋悼公正准备任命解狐的时候，解狐却一病而死。晋悼公又问祁奚：“谁可以接任？”祁奚回答：“我的儿子祁午可以胜任。”很巧，祁奚的副手羊舌职也死了。晋悼公就问祁奚：“谁可以接替羊舌职的位置？”祁奚回答：“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就可以。”于是，晋悼公任命祁午为中军尉，任命羊舌赤来辅佐他。

君子称赞：“祁奚在这件事上真是能荐举贤人！”推举其仇人不是为了谄媚，推举自己的儿子不是为了家族，举荐他的副手不是为了结党，真的是在举荐贤人！后边还说：“唯有贤者，才能举荐同类之人。”自己是一个贤德的人，才能够举荐公正，把那些德才兼备的人举荐出来。

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具备公正无私的品德，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人恩怨而伤害了公义；也唯有把公正无私的人选拔到高位，才能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感召更多公正无私的贤人聚集到团队中。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晋国的栾盈逃奔楚国，范宣子杀了他的同党羊舌虎，并且软禁了羊舌虎的哥哥叔向。这时，乐王鲋主动来见叔向，说：“我去为你求情。”叔向没有理会，旁边的人都埋怨叔向。叔向说：“只有祁大夫能够救我。”祁大夫就是祁奚。他的管家听了这话就说：

“乐王鲋在君王面前说的话，没有不被采纳的。他主动提出去请求君王赦免您，您却不理会，不领他的情。而我认为这是已经告老还乡的祁大夫无法办到的事，而您却说必须依靠他，这是为什么？”叔向说：“乐王鲋这个人只会顺从君主所说的话，而祁大夫为国家举荐人才，对外不遗漏他的仇人，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人，难道会遗忘我吗？《诗经》中说：‘有正直的德行，天下的人都会跟从。’而祁大夫正是这样正直的人。”

后来，晋侯果然向乐王鲋问起叔向的罪责，乐王鲋说：“叔向不背弃他的亲人，同谋的事恐怕还是有的。”乐王鲋曾主动要求向君王求情，可当君王问起叔向罪责的时候，他却这样说。

当时的祁奚已经告老还乡，但当他听说叔向被囚禁的事，赶紧坐上驿站的马车来见范宣子，问道：“《诗经》中说，给予我恩惠无边的人，他的子孙后代都应该永远记着。叔向善于谋划而少有过失，不知疲倦地给人很多有益的教诲，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是国家的柱石。即使他10代的子孙犯了罪都应该宽宥，好以此鼓励那些有能力的人为国家办事。而如今，却因为他弟弟犯罪一事而使叔向牵连获罪，这不是太糊涂了吗？从前鲧被诛杀，他的儿子禹却被重用，后来还被拥立为夏代的第一位君主。管叔、蔡叔因为造反被杀，他们的兄长周公却仍然辅佐成王。您为什么因为羊舌虎之事而抛弃国家的栋梁，罪及叔向呢？只要您肯施行仁政，谁还敢不竭力为国呢？何必要多杀人呢？”

范宣子听了这一番话很高兴，于是他就和祁奚一起乘车去见晋平公，晋平公赦免了叔向。事情结束之后，祁奚没有见叔向就回家去了，叔向也没有向祁奚致谢，直接上朝去了。为什么？祁奚为国家爱惜人才，他为叔向求情，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这在忠臣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本分，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事成之后“不见而归”。因为他不是施私恩于人，根本不希望别人报答。而叔向获救之后，也“不告免而朝”，没有向祁奚致谢，是因为他深知祁奚具有一心为公、正直无私的品德，不需要他去道谢。

可见，君子是以道义相交，志同道合的人才能成为朋友。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虽然淡如水，但是天长地久，经得起考验。相反，大多人都是以利害相交，而古人说：“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彼此是以利益来交往，当利益没有了，交情就疏远了；“以势交者，势倾而交绝”，彼此是以权势相交往的，当权势倾覆了，交情也就结束了；“以色交者，花落而爱渝”，彼此是以美色相交往的，男的喜欢女的漂亮，女的喜欢男的英俊，但是有一天年华不在，脸上起了皱纹，彼此之间的爱也就终止了；“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唯有以道义相交，才能天长地久，经得起任何考验。

有的人因为私怒伤害了公义，表现在对人的赏罚不当，不该赏的赏，不该罚的罚，特别是怒气生起的时候，对人的惩罚往往不当。《汉书》中记载，有一次，汉文帝经过一座桥时，突然有人从桥下跑了出来，驾车的马受到了惊吓。汉文帝下令逮捕那个人，交给廷尉张释之惩办。张释之上奏：“这个人犯了禁止通行之令，按罪应处以罚款。”文帝很不高兴地说：“这个人跑出来惊了朕的马，幸亏这匹马脾性温和，如果换了别的马，朕不早就摔伤了吗？而廷尉却仅仅处以罚款！”

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所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加重治罪，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况且如果抓到这个人的时候，皇上直接派人把他杀死也就算了。如今既然交给廷尉治办，而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廷尉一有偏差，天下使用法律的人都会在处理案件时可轻可重，那老百姓将如何按照法律办事？汉文帝想了一会儿，说：“廷尉的处罚是对的。”汉文帝确实不愧为一代明君，虽然在生气的时候说了一些过分的话，但是一经提醒，也能将自己的怒气克制下去。

《韩诗外传》中说：“治心术，则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矣。”要修治自己的心术，这样就不会胡乱喜怒。不胡乱喜怒，赏罚就不

会偏颇，就不会因喜而赏、因怒而罚，导致赏罚失当。有些人高于法的情况，也就是因为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就不处罚或者处罚得轻；而对于自己仇怨的人就可能加重处罚。这样就有失司法公平，上行下效，整个社会也就失去了公正。

《晏子》记载，有一次齐景公让马夫喂养自己最喜爱的马，这匹马却得急病死了。齐景公大怒，命令侍卫拿刀肢解马夫。这时晏子正好与景公在一起，看见侍卫手握钢刀向马夫走去，他制止了侍卫，并且问景公道：“请问古时尧、舜肢解活人，先从身体的哪一部分开始？”景公听了这一问，猛然恐惧起来，尧、舜哪里会肢解活人呢？仁君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怎么能够随意这样下令肢解活人？于是，他下令停止，说：“把他交给狱吏来治罪。”

晏子接着说：“请允许臣数说他的罪状，让他知道自己的罪过，然后再交给狱吏治罪。”景公说：“可以。”晏子对马夫说：“你的罪状有三条：君主让你养马，你却将马养死了，应当判死罪，这是第一条；而你养死的是君主最喜爱的马，当判死罪，这是第二条；由于你养死了君主的马，使得君主为了一匹马而杀人，百姓听了之后一定会怨恨我们的君主，诸侯听了以后一定会轻蔑我们的国家，这是你应当被判死罪的第三个原因。所以应把你交给狱吏治罪。”齐景公在旁边一听，若有所悟，叹了一口气说：“把他放了吧！”

人的脾气一上来，往往容易失去冷静，做出错误的判断，说出偏激的话，做出错事。古人告诫我们，“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利刃割体痕易合，恶语伤人恨难消”“火烧功德林”“覆水难收”。所以古人都把惩愤制怒作为修身的基本功。中国古人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一个人嗔心一起来，就会控制不住自己，话是怎么难听怎么说，做出的事也很偏激、很过分，最后醒悟过来后悔莫及，却已经悔之晚矣。即使以前你帮了别人很大的忙，甚至为对方两肋插刀，非常重义气，但是

在盛怒的时候，由于你说了几句伤害人心的话，人家就记住了，耿耿于怀，再也不能原谅你。所以脾气不好的人，很少能交到朋友，也很难和人保持好的人际关系。我们既然知道了愤怒有这么大的危害，就应该想方设法地改正。怎么改正？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怒气要生起的时候，要开口骂人的时候，马上提起正念，把你的怒气、嗔心平息下去。

三人行，必得我师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在《论语》通行本上，这句话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而在《群书治要》这个版本里讲的是：“我三人行，必得我师焉。”“我三人”就是三个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人。“行”，有的批注解释为言行的行，有的解释为行走的行。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第一种说法是，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善人，一个是不善的人，这两个人都是我的老师。从善人身上学他的善，从恶人身上学避免他的恶。所以无论是善人恶人，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老师，这种讲法很耐人寻味。我们一天从早到晚也许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是善人，有的人是恶人。如果我们善学的话，无论是好人坏人、善人恶人，都有我们可以学习提升的地方，都可以做我们的老师。

《论语》中也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贤德的人，不是嫉妒，而是向他学习、向他看齐；看到不那么贤德的人，不是嘲笑、轻视，或者心里和他对立起来，而是马上反省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有类

似的过失。

第二种说法是《论语集解》何晏注：“言我三人行，本无贤愚，择善从之，不善改之，故无常师。”我们三个人本来没有贤愚之分，“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的本性都是纯净纯善的，因为后天的环境不同、熏染不同，才使有的人看起来贤德，有的人显得愚钝。“择善从之，不善改之，故无常师”，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对这句话作了这样一句解释：“何注似以‘行’为‘言行’之行，三人之言行，本无贤愚，其有善不善者，则随事所见，择善而从之、改之，非谓一人善，一人不善也。”这种解释就更加圆融。他认为何晏的批注把“行”，不是解释为行走的行，而是解释为言行的行。三个人的言行本来没有贤愚之分，所谓的善和不善都是随事所见，有的时候他作善，有的时候他也作恶。也就是说，这是就一个人的善和不善而言，所以实际上没有绝对的善人与恶人，每一个人既可能有善行，也有可能有恶念，这个说法就更好了，是论事不论人。我们看到他善的行为，就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行为，就反省自己，避免这样恶的行为。这个讲法是最好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不会全好，也不会全不好，我们从每一个人身上都学习他的善，避免他的恶，所以说没有固定的老师。

最后一种说法是，在两个人之中，对于善者，我们要跟着他学，对于不善的人，我们要改正他。这种说法不可取，因为朋友交情深才能去帮他改正，交浅不可以言深。《论语》中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已也。”朋友之间要首先建立信任的关系，然后看到他的过失才能够去劝告他。如果两个人的信任关系还没有建立，看到他的过失就去劝谏他，他会认为你是在诽谤他，他不仅不能够接受，还会和你结下仇怨。并且，中国人修学、做学问最重要的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的修养不够。真正修行人，他不是看不到世间人的过失，不明白世间人的过失，而是即使看到了也不把这些放在心

上，污染了自己的清净心。所以真正修学人是把功力、心思、精力集中在改正自己的过失之上。哪能可以看到别人的过失而去指正别人呢？看到别人的过失应该是马上反省自己，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过失。把别人的过失当作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看到别人的过失，马上就反省自己，这样就能够时时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可见，凡、圣的区别就在于会不会学，善不善于学。

《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骄满会给自己招来损失，因为骄满的人认为自己都是对的，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聪明，他就不会再有好学的心。这就像桌子上有一杯水，水已经满了，想往里边倒，水会溢出来。骄满的人在修学上很难有进步、很难有成就，就是这个道理。自满的人不知道，其实从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老师。这句话告诉我们，面对别人的成就或者不足、缺点的时候，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当看到别人做得好，做得比我们强，不要嫉妒，而要诚心向他学习，努力做得和他一样好。当看到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若嘲笑他、轻视他，甚至在心里和他起了对立，这就是错误的心态了。

“择其善者而从之”，我们真的学习到了吗？譬如，我们都有自己最佩服的人，想一想我们最佩服的人身上有什么优点、长处，我们是否学到了。我们最佩服的人大多都是我们身边的人。譬如，我的母亲就有很多优点，但是我没有继承下来。我母亲非常孝悌，现在我们学孝，提倡回家给父母洗脚，可以把这个作为行孝的开始。其实那一代人给父母洗脚是很自然的现象。我的姥爷是一个农民，家里很贫穷，每一次到我们家来的时候，他的脚可能很长时间没洗了，总是厚厚的一层灰，我母亲就很自然地端来水给我姥爷洗脚，洗出几盆黑水，她也没有任何嫌弃。

我母亲对兄弟友悌，自己有好东西，舍不得吃、舍不得用，首先拿给兄弟来吃、来用。因为在她很小的时候外婆就过世了，她和两个弟弟相

依为命，她是大姐，靠自己的勤劳，养活两个弟弟生活。有一次，其中一个弟弟得了重病，我姥爷认为这个孩子已经死了，就要拖出去，放到山林里去处置了。但是我母亲抱着弟弟不肯撒手，觉得他还能够活过来，还给他喂水、照顾他。后来这个弟弟真的活了过来。古人说“孝感动天”，我母亲做到了“悌感动天”。所以她每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她的弟弟对她都特别尊敬。

我母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勤劳、节俭，特别能吃苦。即使以后富裕起来了，别人送给她很多好的衣服、好的东西，她也从来不浪费，都是把好的先拿给别人去用。母亲特别讲恩义、情义，经常教导我们说：“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相报。”别人对我们有一点点的恩惠，一定要想着记着，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回报。特别是在对待朋友上，这种恩义、情义、道义就体现得更加明显。

母亲还特别自强自立，家庭没有任何背景，出身很贫寒，她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从我上初二开始，就是我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三人带大，而且把每一个孩子都送进了大学，靠的都是她一个人微薄的收入。特别是我和哥哥同时上大学的时候要缴学费，对我们家庭来说很艰难，但是我母亲克服万难，坚持让我们兄妹三个人都完成了学业，还将我供到博士。

母亲还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不谄富，不骄贫”。对于富贵的人不谄媚巴结，对弱小的人特别同情，具有平等心。而且我母亲非常有志气，即使在贫穷的时候，也没有做过任何不道德的事情。做到了《孟子》中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无论是富贵的时候，还是贫贱的时候，都没有丧失做人的道德，都坚守自己的气节。

我母亲不贪财，她经常告诫我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不义之财，绝对不能够贪取。”在我小的时候，母亲有一次在旅店里捡到了一个装满钱的书包，她就一直等到丢书包的人回来找。后来知道书包里的钱

是一所学校所有教师的工资。丢书包的年轻人刚刚到学校任职没多久，如果把这笔钱丢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我母亲把这些钱如数奉还。

我母亲没有名利之心。她把三个孩子全都供到大学，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被保送的，很多记者想采访她，但是我母亲都拒绝了。她说：“这都是国家、老师培养的，我们对国家非常感恩，对老师非常感恩。”我上大学的时候，母亲告诉我要积极地入党，但是要端正态度，入党是为国家、为人民着想，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现在每当我拿出上大学时母亲写来的信看，都非常佩服母亲的境界。她这一生做了很多事，把儿女个个培养成才，但是从来不居功，而且做到了知恩报恩。

母亲处处为对方着想，从来不愿给别人添任何麻烦，能自己做好的事就自己做好。母亲还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她每天都看《新闻联播》，有古人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

母亲还特别尊师重道。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英语老师说我们这些学生的发音不太准确，有方言味儿，所以上课的时候经常纠正我们的发音。很多家长认为，考试又不考口语，纠正发音有什么必要？他们觉得这很浪费时间，在家长会上经常给这个老师提批评意见。我母亲却说：“老师是有经验的人，按照老师教的没有错，你就按照老师教的去做吧。”结果因为这些家长对老师有意见，这些学生对老师也丧失了信心，本来英语成绩很好的同学，后来成绩都下降了。我因为母亲的教导，对老师很恭敬，成绩也不断在上升。

我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有特别正确的观念，经常告诉我们说：“惯子如杀子。”当时我们觉得母亲对我们太过严厉了、不够温柔。现在才体会到，其实母亲的慈就体现在“严”字上，她不希望我们以后走弯路。想到母亲身上这么多的优点，自己继承下来的却很少，可见“择善而从之”确实不容易做到。

有过不改是真正的过错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一个人有过而不改，那就是真正的过错。什么是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人都有光明的性德，具备一切知能，但因一念之动，不觉失明，便为过失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除了圣人无过以外，其余人都不免犯过，有这一念之动就是过。改过就像《大学》中说的“格物致知”。汉儒批注，“格”是来了的意思。来了事情，包括来了念头，这叫“格”。“格物”就是来了念头。“致知”就是“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一觉悟，就消灭。念头一来，马上就能觉悟，把它消灭，发现本有的明德，这就叫“明明德”。所以改过便能明明德，成就圣人。虽然这种“格物致知”的功夫不是普通人所能有的，但是人能够不起害人害物的念头，或一起这样的念头就予以克制，也是能够日日改过的。

有过不能觉察，不能改，是真有过。如果大家能够真正明白这句话，可以悟道，能够改过，就能够恢复本来的面目。

能改过者为真英雄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所犯的错，人人都看得见；改正了，就像日食月食消失后重现光明一样，人人都敬仰。”这句话告诉

我们，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何在。小人有过一定是文过饰非。君子是勇于改过。君子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不掩盖自己的过失，进而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

《尚书》中记载：商汤的孙子太甲登上上帝位之后，不明道德仁义，也不听从伊尹的劝诫，在为父亲居丧期间，不遵循礼法。于是，伊尹把他安排在桐宫，让他为父亲守陵。太甲住进桐宫之后，终日面对列祖列宗，很自然地就处于一种忧思愧责的氛围中。后来由于他能够经常追念先王的种种风范与教诲，终于成就了自己真实的德行。

太甲继位的第三年，伊尹将太甲迎回国都。太甲向老师伊尹真诚地跪拜说：“是弟子不明于道德，才招致了种种不善；放纵欲望，败坏礼法，给自身招来罪过。上天造成的灾祸，还可以避开；而自己造成的灾祸，不知道悔改，那就逃脱不了。过去，我违背了老师的教导，不能从一开始就很严格要求自己，今后还需依赖您匡正扶助的恩德，亡羊补牢，力图能有一个好的结局。”这些都是他发自内心的忏悔，改过自新的话。

伊尹还礼，说道：“注重自身修养，说到做到，使诚信之德自上而下形成风气，这才是明君。先王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穷苦之人，使他们都能够有所依靠。所以百姓听从他的教导和号令，没有不欢喜的。奉祀祖先，必须心存孝敬；接近臣民，必须心存谦恭。能够看得长远，叫作目明；能够听从有德之人的善言，叫作耳聪。大王能够这么做，我等蒙受大王的恩惠将没有止境。”

太甲复位之后，沉痛地接受教训，终成一位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韩子》中说：“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是荣是辱都在于自己，是自作自受，而不在于别人。小人不知修身，不知道成圣成贤都是自己的事，而与他人无关；不懂得为自己负责，做错事之后总想方设法地找借口为自己开脱。君子则能够“知耻而后勇”，勇于改正自己的过失，成就圣贤，为人所尊重，乃至于垂范后世。

第十三讲

知过改过



圣王知过的机制

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

——《群书治要》卷十七《汉书五》

人要想改过，首先得知道自己的过失。

“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古代圣王的制度，由史官在面前记载君主的过失。《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右史官负责把君主的言论和行为都一一记载下来，特别是要记载君主所犯的过失。这相当于一种独特的监督机制，让君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

“工诵箴谏”，乐工要读诵规劝的谏言，使听者提起警觉。

《群书治要·说苑》中记载，魏文侯在乐师鼓琴的时候，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并且唱道“让我的言语没有人违背”。这位乐师是一位盲人。古代的乐师大部分都是盲人，因为盲人的听力特别敏锐，担任乐师非常适合。

这位乐师听魏文侯这样说，就顺着声音，拿琴去撞魏文侯。结果没有撞到，只是将魏文侯帽子上的玉串撞散了。魏文侯很生气，问左右的人道：“做臣子的居然敢撞他的君主，该当何罪？”左右人说“罪当烹”，应

该被烹杀。说着左右的人将这位乐师拉到下面去受刑。刚走下一个台阶，只听这位乐师不慌不忙地说：“我马上就要死了，在我死之前，可不可以听我再说一句话？”魏文侯说：“可以。”乐师说：“从前尧舜做君主的时候，唯恐自己只能听到赞美的声音，没有人给他提不同的意见。而桀纣做君主的时候恰恰相反，唯恐自己的言语被违背，刚愎自用。而我刚才好像听到了桀纣在说话，所以我撞的是桀纣，而不是我的君主。”

魏文侯听了之后，理解了乐师的一片苦心，于是说：“放了他吧，这是我的过失。”魏文侯不仅认识到自己的过失，还让人将这把琴悬挂在城门口，作为自己可以改过自新、接受进谏的凭证。魏文侯觉得帽子上的玉串也不用修理了，一看到撞散的玉串，就能提醒自己不要做像桀纣那样的君王。古代有些君主，能够知过改过，这是其可贵之处。

为民众表达合理意愿开设合法渠道

“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政的得失，做生意的人在市场上也可以议论朝政。要让民众有合适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使民情上达。从民众表达的意愿之中，为政者才能够看到其施政得失，国君也才能够听到他自己的过失。听到过失之后，重要的是能够改过。见到正义的、符合道义的就应该听从，顺着去做，才能够永久地拥有天下。所以这里说：“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

《管子》中记载，齐桓公有一次向管仲请教，说：“我想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天下，得到权力而不丧失权力，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管仲回答说：“你要认真地考察百姓所厌恶的，从而引以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衡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在黄帝的时候，他设立明台让群臣在这里议论国事；尧设立衡室，为的是让下情上传，主动去问百姓有什么意见；舜在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旌旗；禹王在

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鼓；汤王设立了一个能够使街头巷尾的议论、意见都能汇总的庭堂。这些制度是干什么的？“以观民诽也”，都是用来听百姓的批评建议的。“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这就是古代英明的圣王之所以能够拥有天下而不丧失天下、得到权力而不丧失权力的原因。管子劝谏齐桓公效法古圣先贤，主动听取民众的批评建议，这样才能够清楚自己的得失，不会失去天下。

齐桓公是否按照管仲的建议去做了？《新序》中记载，齐桓公去见一位名字叫稷的百姓。结果他一天跑了三次都没有见到稷，跟从他的人说：“作为一国之尊、万乘之主，见一个平头百姓，一天来了三次都见不到，应该就此作罢，不要再去了吧！”齐桓公说：“你说得不对，有德行的士大夫、读书人轻视爵禄，因此他们也会轻视君主。而那些不想称霸天下的君主会轻视有德行的士大夫、读书人。纵然这位先生轻视爵禄，可是我怎么敢轻视称霸天下？”意思是说，我还是想称霸天下的，所以我不能够轻视有德行的士大夫、读书人。结果齐桓公一连去了五次，才见到了稷。其他人听说了这件事，都说：“齐桓公对布衣之士都能够如此尊敬，那对一般的诸侯国、对一般诸侯国的国君，肯定会更加尊重。”诸侯国听闻都纷纷前来朝拜。可见，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绝非偶然。

对于高高在上的君主而言，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手握权力，自然就会有很多人为了争宠、争权夺利纷纷来谄媚巴结，君主每天都能听到阿谀奉承及赞叹肯定的话。而这些话听得过多，人就会洋洋得意，自以为圣明。再有人来指出他的不足和过失，他就很难接受了。贤明的君主要明白这一点，不仅要让百姓说话，表达他们的意愿，而且还要主动地去求取谏言、了解民情，通过这些方式充分认识到自己施政的得失。

《后汉书》中记载了杨震的一段话：“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

负薪，尽极下情也。”我听说在尧舜的时候，用于进谏的鼓、可以批评的木牌都立在朝门之外，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殷朝和周朝的圣哲君王，对百姓的怨言乃至责备都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才能使自己耳聪目明。他们开放言路，让人们无所忌讳，即使那些砍柴的平民百姓的意见也能下情上传。可见，圣明的君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听取、采纳民众的意见，根据民众的意见来判断施政的得失，采纳好的建议，以此来完善自己的施政措施，从而使国泰民安。

宣王纳谏，丑女建功

《群书治要·新序》中记载，齐国有一位女子，长得奇丑无比，人称“无盐女”。她的头像捣臼，眼窝深陷，身材高大，骨节粗壮，朝天鼻子，喉结突出，脖子肥胖，头发稀疏，腰部弯曲，鸡胸突出，皮肤黑得像涂了漆一样，30多岁了，还无人娶她为妻。有一天，这个丑女去见齐宣王，先对负责传达的人说：“我就是那个齐国嫁不出去的姑娘。听说大王德行高尚，我愿意到大王的后宫服侍大王。”传达人员把这件事报告给齐宣王。当时齐宣王正在渐台大宴宾客，左右的客人听了之后，没有一个不捂着嘴笑，都说：“这真是脸皮最厚的女人。”

但是齐宣王却召见了这位丑女。只见她睁大眼睛，咬着牙齿，举起手来拍打着胳膊肘，说：“危险！危险！”如此重复了四次。齐宣王说：“寡人愿意听听你有何见教。”无盐女说：“现在大王治理的国家，西有实行连横的秦国造成威胁，南有强盛的楚国与我们为仇，就外部讲，有这两个国家发难。从国内看，聚集着一大批奸臣，使得民心离散。大王已经40多岁了，还不给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确立名位，不替儿子们操心，而是把精力用于收纳众多的姬妾上，看重喜爱的人，而轻视应该依靠的人，一旦大王御驾归天，国家必然大乱，这是第一种危险。渐台高达五层，黄金白玉、翡翠珠玑等贵重的装饰品触目皆是，而万民却贫困至极，这是第二种

危险。贤能之士都隐居山林，阿谀逢迎之徒拼命朝大王的身边靠近，奸邪虚伪的人成了朝中的权贵，要进奉忠言的人却怎么都见不到大王，这是第三种危险。大王沉迷于饮酒作乐，夜以继日，歌伎、舞女、小丑毫无顾忌地在宫廷里喧闹。对外不谋求与诸侯的关系，对内不关心国家的治理，这是第四种危险。所以我说‘危险！危险！’”

齐宣王听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今天寡人听了无盐君的一席话，才明白了自己的危险，寡人差一点就要国破家亡、性命不保了。”于是，他立刻下令拆掉渐台，解散伶人班子，罢黜逢迎拍马之徒，不再使用华贵的器物，并且挑选壮士、良马来扩大兵力，充实国家的府库及钱粮的储备，招纳直言进谏之士而不分门第的高低，并且选择吉日册立太子，拜无盐女为王后，齐国因此国泰民安。史书上评价说，这都归功于这位丑女。这位丑女的功劳何在？就是她的一席话如当头棒喝，把齐宣王打醒了，进而让齐宣王从骄奢淫逸、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中回过头来，把心思放在治理国家上，使得齐国大治，所以君主身边有能指正自己过失的人很重要。当然，君主也要知过改过，这样才能使国家转危为安。

有过不改的四个原因

大忌知身之恶而不改也，以贼其身，乃丧其躯，有行如此，
之谓大忌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一《鬻子》

人生最大的忌讳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身上有过恶却不能够改正，这会伤害自己的身心，乃至丧失生命。一个人有这样的行为，实在是人生的大忌。人有过而不改，确实会给自己招来灾祸。

人知过而不能够改过，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没有认识到过恶的严重危害。《周易》上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大学》告诉我们：“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富、名声、地位全都是枝叶花果，根本在于一个人积累了深厚的德行。所以善行不积累不足以成名于天下；罪恶不累积也不足以自灭其身。当我们看到一个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突然锒铛入狱的时候，大家都会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各执己见。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古人早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多行不义必自毙”“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但是小人就会认为做小的善事没有什么益处，就不屑于去做；做一些小的恶事，无伤大体，便不改过。结果罪恶日积月累，以致达到了无法掩盖和不可解救的地步。可见，灭家亡身都是有过失而不能改所导致的，所以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曾子》把为善分为三个境界：“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为，可能也；色勿为，不可能也；心勿为，不可能也。”君子对于不好的事，自己不去做，这是能够做到的。譬如我们有嫉妒之心，突然觉得，我们都学圣贤教诲了，如“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我怎么还有这样的心呢？所以嫉妒之心就打住了，没有因为嫉妒心，而去中伤别人。这是“身勿为”，是可以做到的。“色勿为，不可能也”，神色上也不表现出来嫉妒之心，对于君子来说就不太可能了。因为君子在修道过程中，还没有成为圣人、成为贤人。有时你听到老师表扬别的同学，心里可能就会有点嫉妒之心，在神色上也就表现出来了。“心勿为，不可能也”，听到老师表扬别人，心上都为他赞叹、为他高兴，对于君子来说，更难做到了。“太上乐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也”。为善最高的境界是喜欢做善事；其次是安于做善事，做善事使自己心安；其下是能够勉强做善事。

从去恶的角度，或者说从改过的角度看，人的修养也是有几个境界的。“太上不生恶，其次生而能夙绝之，其下复而能改，复而不改，殒身

覆家，大者倾社稷。”最高的境界是不发生恶的行为，其次是做了恶的行为，能早早地去除，其下是恶行复发之后能够及时改正。恶行反反复复地做了之后还不知悔改，就会亡身败家；更有甚者，会使国家倾覆。他接着说：“是故君子出言谔谔，行身战战，亦殆免于罪矣。”因此君子言语正直，行动戒惧，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样才能免于犯过失。

“昔者，天子旦思其四海之内，战战唯恐不能乂也。诸侯旦思其四封之内，战战唯恐失损之也。大夫旦思其官，战战唯恐不能胜也。庶人旦思其事，战战唯恐刑罚之至也。”从前的天子日日考虑天下之事，谨慎小心，唯恐天下不能安定。诸侯日日考虑国内之事，谨慎小心、战战兢兢，唯恐自己的国家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大夫日日考虑自己的职责，谨慎小心，唯恐不能胜任。平民百姓日日考虑自己的职事，谨慎小心，唯恐触犯刑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是故临事而栗者，鲜不济矣。”所以人面对各种事情都能够谨慎小心、战战兢兢，便很少会犯过失、很少有不成功的。

第二，因为志向不坚定，所以改过的愿望不迫切。立志就是发愿。苏轼在研究古人之所以有成就的原因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也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首先立志。这个志就像目标一样，人生有了目标，才不会被诱惑。就像我们去登山，登上山顶是目标，我们就不会在山路的行走过程中，看到鲜花很好看，就停下来去欣赏，被这些事物所诱惑。

那么，应该立什么样的志向呢？清代思想家唐甄曾说：“其为志也，以至于尧孔而不少让。”要立像尧帝、孔子这样的圣贤人的志向，也就是说要把成圣成贤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所以改过的关键就在于是否确立了人生的目标。

我们知道本具纯净纯善的本性，人生的意义就是要明德，要

把所有与明明德不相关的东西都放下，与此不相应的东西都改正。譬如自私自利、是非人我，等等。不放下这些东西，受损失最大的还是自己，是辜负了此生人之为人的机缘。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勇于改过。

曾国藩终其一生，都在教导家人和后世子孙要铭记迁善改过的重要性。他在年轻的时候，“自负本领甚大，每见人家不是”，自己才华横溢，感觉了不起，就看不起他人，经常挑剔他人的过失。30岁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不足，立志学做圣人。他改正自己过失的方法就是写日记，通过日记记录自己一天的言语行为。到晚上的时候，回忆这一天，我的言语哪一点说得过分了，哪一点不符合圣人的要求了，然后加以反省、自责，并且公开自己的日记，让身边的好友来监督自己。

第三，身边没有好的榜样。古人说选择一个好的修学环境，有个好榜样，对自己的修行特别重要。“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蓬草虽然很软，但是麻都是往上长的。如果蓬草生在麻中，没有人扶它，也会向上生长，长得很快。要懂得亲师择友，亲近善良的、贤德的老师，选择善友，这比什么都重要。古人还说：“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和那些善良的有德行的人交往，就像在雾水中、露水中行走一样，虽然打湿不了你的衣服，但是你时时能够蒙受他们德风的滋润，不知不觉地自己也被熏陶成了一个有德行的人。所以对于好的老师、善友，以及好的修学环境要特别珍惜，这样才能够“德日进，过日少”。

第四，没有提起孝敬之心。孝是中华文化的根，敬是中华文化的本。

经过调查发现，曾经成为高考状元的学生大多是家庭条件非常贫寒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为了供他们上学历尽千辛万苦。这些孩子不忍心辜负父母的期望，所以拼命读书，非常勤奋，最后才得以成为高考状元。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有体会。在上初二的时候，我从县级中学调到一个市级中学去读书。这个市级中学的学习进度很快，我不是一个很聪慧的人，第一次参加数学考试，满分是120分，我只得了58分，这在我的学习生涯中

从来没有过，不仅不及格，分数还少得可怜。看到这样的分数，我很难受，伤心地落泪。到初三毕业考试的时候，120分的卷子，我得了120分；还有一个100分的卷子，我得了98分。一年的时间，学习成绩提升得这么快，原因就是我不忍心让母亲失望。母亲供我们读书历尽了千辛万苦，用她一个人的退休工资，供我们三个孩子读书。为了不让母亲失望，我就非常刻苦地学习，结果在一年之后，我的成绩大幅度地提升，最后我考上了我们省的重点高中。

很多人之所以能够戒酒、戒毒、戒色，弃恶从善，吃苦耐劳，就是因为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后，把孝心提起来了。他们不希望父母再为自己担忧，所以把多年养成的习气改正，将一般人看来不可能克服的问题，全都克服了。

第十四讲

改恶迁善



乐知其恶者难，以恶告人者难

先民有言，人之所难者二，乐知其恶者难，以恶告人者难。

——《群书治要》卷四十六《中论》

古人曾说，人难以做到的有两件事：一是乐于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并加以改正；二是把别人的错误指出来，告诉对方。

在《群书治要·中论》中有一段话是关于如何修养德行的：“人之为德，其犹虚器欤！器虚则物注，满则止焉。”修养德行就像用一个器皿装东西一样，如果这个器皿是空的，就可以装入东西；如果器皿满了，就装不进东西了。就像杯子一样，如果已经盛满了水，再往里边注水，水就会溢出来。

《中论》中说：“故君子常虚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视彼犹贤，自视犹不肖也。”君子经常虚怀若谷，态度谦恭，不因为自己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而凌驾于众人之上，也不必总是觉得别人很贤德，自己不够贤德。“故人愿告之而不厌，诲之而不倦”。因此，人们愿意指正他而不觉得麻烦，愿意教导他而不觉得劳累。君子有谦恭好学的态度，他也能够接受别人的教导。

“夫才敏过人，未足贵也；博辩过人，未足贵也；勇决过人，未足贵也”。才智聪明过人，不是最重要的；博识多闻且言辞善辩，这也不足为

贵；勇敢果断过人，不足为贵。“君子之所贵者，迁善惧其不及，改恶恐其有余”，君子最可贵的地方是一心向善唯恐不及，改正过恶唯恐有遗漏。正如《论语》中孔子所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对于德行不能修正，学问不能够学习讨论，听到、看到合乎义理的事情，不能立刻转移到这上面来，有了过失不能够改正，这是我所担忧的。孔子期望学生成圣成贤，而成圣成贤必须在这四件事上实实在在地用功，假如学生荒废了这四件事，那就不能够成为人才，离圣贤也越来越远了。

这说明圣贤人所担忧的事和一般人所担忧的事不一样。一般世间人担忧自己钱不够多，官位不够高，房子不够大，车不够豪华，等等。圣贤人最担忧的是自己有过不能改，听到合义理的事、该做的事，却没有去做。

《中论》中还说：“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与善也，将以攻恶也；恶不废则善不兴，自然之道也。”所以君子寻求交往的朋友，不单单是赞美自己的人，还要是能够帮助自己改掉毛病习气的人。恶不除则善不长，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君子所结交的朋友是那些肯直言不讳指正自己缺点和过恶的人。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孟孙厌恶臧孙，但是季孙却很喜欢臧孙。孟孙去世的时候，臧孙在灵堂哭得十分悲哀，流了很多眼泪。臧孙出来之后，他的车夫问：“孟孙生前非常讨厌您，您却哭得如此悲哀，如果欣赏您的季孙死了，您又将会怎样地哀痛呢？”臧孙回答：“季孙虽然喜欢我，却犹如给我增添了疾病；孟孙虽然厌恶我，却犹如给了我治病的药石。使脸色显得好看的热症，不如外表不美的石针。”一个人发烧的时候，脸上看起来红扑扑的，很美观，实际上其对身体是有损伤的。石针，虽然外表看起来不美观，但是可以治病。“如今孟孙死了，我的死期也为时不远了。”言外之意是孟孙过世了，没有人能时时指正自己的过失，看

不到自己的过失，所犯的错误一定很多，臧孙因此而感到惊慌。

《弟子规》中说的“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读过它的许多人也做到了，那些愿意直言不讳指正你的缺点的人，就被感召到身边，成为朋友了。

“先民有言，人之所难者二：乐攻其恶者难，以恶告人者难。夫唯君子，然后能为己之所难，能致人之所难也。”古人说过，一般人难以做到两点：一是乐于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二是把他人的错误告知对方。只有成为君子之后，才能既乐于别人指正自己的错误，也能使人愿意指正自己的错误。“己之所难”就是指一般人听不进自己的错误，但是君子能够乐于别人指正自己的错误。“致人之所难”，人之所难是把别人的错误告诉对方。但是君子能够让别人愿意指正自己的错误。

赵简子泣周舍

《韩诗外传》上有一则赵简子的故事，赵简子就做到了乐于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和把他人的错误告知对方这两点。有一次，臣子周舍在赵简子的门外站了三天三夜，赵简子派人问：“你有什么祈求？为什么在门外站了三天三夜？”周舍回答：“我别无所求，就是想做一个能够犯颜直谏的臣子，每日跟在您的身后，把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特别是您的过失，一一记录下来，每天都有记录，每月都有汇集，一年下来看一看有什么效果。”

赵简子很高兴地同意了周舍的请求。从此以后，赵简子走到哪里，周舍就跟到哪里，果然很小心谨慎地把赵简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记了下来，特别是把他的过失记得更详细。

周舍过世后，有一次赵简子和群臣在洪波台饮酒，大家喝得正高兴的时候，他却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诸位大夫一看，不敢再饮酒了，纷纷离开自己的座席，请教道：“我们知道自己有过失，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

自己错在何处，还请明示。”赵简子这才止住了哭声，对大家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叫周舍，对我说过这样的话：1000张羊羔皮，不如一片狐狸腋下的毛皮有价值。1000个唯唯诺诺的臣子，也不如一个犯颜直谏的臣子对我有帮助。从前，商纣王的臣子都闭口不言了，商朝就灭亡了。而周武王的臣子都可以直接给他提出建议，结果周朝兴盛起来了。自从周舍过世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有人指出我有什么过失。所以我知道自己离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才会哭泣。”

魏文侯从谏

和赵简子相似的是魏文侯，魏文侯的可贵之处就是知道自己错了，马上就能够承认并改正错误。有一次，魏文侯问诸位大夫道：“你们看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啊？”群臣都说：“您是仁德的君主。”只有翟黄说：“您并不是仁德的君主。”魏文侯问：“你为什么这样说呢？”翟黄答：“您去征伐中山国，讨伐之后没有把中山封给您的弟弟，而是把它封给了您的长子。从这件事情上我就知道了，您不是一位仁德的君主。”魏文侯被这句话触怒了，下令把翟黄逐出了厅堂。

魏文侯又问任座道：“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啊？”任座回答得很巧妙：“您当然是一位仁德的君主。”魏文侯问：“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任座答：“我听说君主仁慈，他的臣子说话才会很直接，才敢犯颜直谏。刚才翟黄的言语非常直截了当，不惜触犯龙颜。从这件事上我就知道了，国君是一位仁德的君主。”魏文侯一听，知道自己做错了，如果自己不能容纳犯颜直谏的臣子，怎能称得上是仁德的君主呢？他领悟过来后又把翟黄召了回来。

魏文侯还比喻说：“夫酒食人之所爱也，而人相见莫不进焉。不吝于所爱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忠言甚于酒食，人岂其爱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酒食是人们都喜爱的东西，相聚的时候没有不以

酒食来招待的。人们之所以不吝惜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是因为对方也喜爱的缘故。假设人们喜欢忠言胜于喜欢酒食，那么人们怎会吝惜进献忠言？人们之所以不肯把忠言进献出来，是因为没有遇上真正喜欢听取忠言的人罢了。《诗经》中写道，“匪言不能”，并非我不能进言，“胡其畏忌”，为什么还会心里有所忌讳？还是由于怕人家不能够接受。虽然是为了对方的提升而指出他的缺点，但是担心让他心生不快，甚至是心生痛恨，所以人才瞻前顾后，不肯把话说出来，不敢犯颜直谏。

恩义源于孝亲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形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吕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孔子说，天子真正亲爱自己的父母，自然也不敢厌恶别人的父母；真正尊敬自己的父母，也就不敢轻慢别人的父母。天子竭尽爱敬之心去侍奉父母，将这样的德行教化推行到百姓身上，全国都能看到德教产生的良好影响，这就是天子的孝道！《尚书·吕刑篇》说：“天子有爱敬父母的善德，天下万民就都会仰赖他，国家便能长治久安。”

中国自古是以孝治天下，提倡百善孝为先。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要提倡百善孝为先？为什么要提倡孝治天下？

首先，我们看一篇文章——《哪一个是我》。

那个一进门就喊“肚子饿了，饭怎么还没做好”的人是儿女；那个一进门衣服都来不及换就下厨房烧菜的人是父母。

那个一会儿说粥烫了、一会儿嫌菜咸了的人是儿女；那个哪怕就一点点青菜、豆腐也要精心烹饪、力争做出滋味的人是父母。

那个整天抱怨作业多、实在太累的人是儿女；那个累了一整天毫无怨言、洗衣打扫卫生后再陪读的人是父母。

那个动不动就开口要钱、不给就生气的人是儿女；那个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却从不在教育投资上吝啬的人是父母。

那个记不住家人的生日、可一到自己生日就早早召集同学朋友聚会的人是儿女；那个记不住自己的生日，可是却用心为家人准备生日礼物的人是父母。

那个早上赖床还不停抱怨家人叫他的人是儿女；那个深夜入睡、黎明即起准备早点的人是父母。

那个受了一点儿委屈、回家把苦水倒个不停以求得同情和安慰的人是儿女；那个在外面受了再多的气回家后却强作欢笑的人是父母。

那个有牢骚就发、有烦恼就怨，把家当作坏情绪“宣泄所”的人是儿女；那个把苦埋在心中，生怕自己的不良情绪会影响家人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以学业、工作忙为托词，很少往家里打电话问候的人是儿女，那个在电话里嘘寒问暖、总为儿女牵肠挂肚的人是父母。

那个一开口就将家里的积蓄“借”走、舒舒服服住大房子的人是儿女；那个劳累了一辈子、到老还住在破旧小屋里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羡慕别人家多么有钱、自己家多么寒酸的人是儿女；那个退了休还不“安分”，起早摸黑挣钱的人是父母。

那个宁愿把大量闲暇时间放在娱乐和朋友聚会，却不愿回家看看的人是儿女；那个只要看到儿女，哪怕就一会儿，都神清气爽的人是父母。

那个娶了媳妇忘了娘、嫁了老公忘了爹的人是儿女；那个为儿女操了一辈子心，老了还帮儿女带小孩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以自我为中心、从不把家人太当回事的人是儿女；那个从不

把自己当回事，却总以子女为荣、四处炫耀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喜欢把爱挂在嘴边，却很少付出行动的人是儿女；那个从不把爱说出口，却将爱播撒于生活每一块土壤中的人是父母。

或许，只有等到儿女也做了父母，而父母慢慢变老时，我们才会回忆起生活里这些点点滴滴，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孝。

看了这篇文章，我们能够体会到父母对儿女的关爱和付出，是无私无求、不讲条件的。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最好的朋友，帮了你一个小忙，或者他借给你多少钱，你一定会对他感恩戴德。我们的父母从小到大为了抚养我们，付出了多少的辛劳、精力、金钱和时间，我们有没有感恩戴德过？我们都习以为常了，还经常挑剔父母服务得不到家、想得不周到，买的东西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的爱能够超过父母对儿女的爱。一个人如果不孝敬父母，那么这一生最重要的处事原则——恩义、情义、道义就没有树立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利害为原则的处事方式。这件事对自己有好处，就会全力以赴；当这件事由利变成害的时候，往往有的人就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

当领导下班之后说：“今天有没有事？不要回家了，有一个重要的客户要见，你和我去应酬一下。”我们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地跟着领导去应酬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父亲母亲说：“好几天都没有去超市买东西了，我们能不能一起去超市买东西？”我们的回答总是：“我还有一大堆事，你和你那些老朋友一起去吧。”《孝经》教育我们，一个人不爱他的父亲母亲而去爱别的人，这是与德行相悖离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亲母亲而去尊敬别的人，也是和礼相悖离的。

孝悌之心与一体之仁

看了《礼记·内则》讲到的儿女应该怎样侍奉父母，就能明白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没有恭敬心了。《礼记·内则》教育我们，善事父母，首先心要在父母身上，要懂得服侍父母。儿女侍奉父母，应该是鸡刚刚啼鸣，就起来洗脸漱口，梳头戴帽，理好饰物，系好帽缨，穿上端服（正式的礼服），套好蔽膝，系上大带，插上笏板（古人觐见言事的时候拿的板子，上面可以写谏言）。左右两边还要佩戴一些父母可能需要的东西。然后去父母、公婆居住的地方，平心静气地询问他们需要什么，恭敬地送上，和颜悦色地嘘寒问暖。父母如果有过错，要心平气和，低声劝说，态度要温柔，容颜要和悦。如果劝说父母，父母听不进去，就要更加恭敬、更加孝顺，待父母高兴的时候再次劝说；如果父母发怒不高兴，甚至把儿女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敢厌恶埋怨他们，还要更加恭敬、更加孝顺他们。

中国古人的礼教通过礼仪的设计，培养了一个人的和顺之心。

《弟子规》中说“挞无怨”，提倡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和他人发生对立，连对立的心都没有了，怎么会和他人起冲突，产生矛盾呢？所以家庭教育确实是一个人一生教育的开始，从对父母的态度上开始教导，不和任何人对立的心就培养出来了。心和道是能够相应的，中国古人有开悟之人，体会到宇宙人生的大道，即人和我是一体的。从“孝”字看，“孝”上面是一个“老”字，下面是一个“子”字。这个字告诉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的关系，密不可分。为什么儿女和父母会有代沟？大概就是因为儿女没有尽心尽力地去和父母沟通，为人子之道没有尽好。

《弟子规》中说：“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儿女应对父母很恭敬、很有礼貌。有一个孩

子，父母叫他，无论他在干什么，都会马上放下手上的事，恭恭敬敬地跑到父母的面前，甚至还鞠一个躬说：“请问爸爸妈妈有什么事吗？”其实，从对父母的态度上就可以培养一个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态度。

仁爱之心的“仁”字从人，从二，体现人是一体的。如果有“两个”观念，那么“仁”就已经不存在了。古人经常讲“一体之仁”，既然是一体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能够以对立的、逆反的、冲突的心去解决问题。而这样的心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它是和心性相背离的。只有用真诚心来感化，才能够化解冲突、达到和平。

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怎么样进行道德教育才能有效果？我们看现在的社会很提倡道德教育，但是我们不能搞一阵风似的教育，“三月来了四月走”。而是把道德教育这座大厦从地基开始就要筑牢。如果连根基都没有建好，孝亲尊师都没有做到，我们就提倡其他的道德教育，道德大厦就会像空中楼阁一样，没有根基。很多人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老百姓需要教育，领导干部就不需要教育了。《说文解字》上把“教”字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上面怎么，下面就跟着怎么效仿，那才是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古代国家最高的“上”、最高的“领导”就是天子。天子行孝，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才能够带动营造整个社会孝亲、友悌、尊师的风气，所以天子行孝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才能把天下治理好。

我们的爱敬之心就是从对父母有爱、有敬培养起来的。“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一个人真正爱敬自己的父母，爱敬之心培养起来了，看到所有的老年人，都会像爱敬自己的父母那样去关心、去尊敬。一个人真正对父母很恭敬，他也不敢对其他的人产生傲慢之心。

爱敬之心没有生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厌恶之心、傲慢之心。古人说“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当一个人对父母有了爱敬之心，对其他人的爱敬心也会相应地培养起来。

养父母不仅仅是养父母之身，还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养父母之志重要的就是能够把父母的精神品质传承下来，满足父母的期望。父母培养我们，不是希望我们在他们面前端茶倒水，伺候他们，而是希望我们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成为一个对民族有益的人，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时时以此鼓励自己，在德行上、学业上就会有所进步，做一个真正有利于国家、社会、人民的人，这就是在养父母之志。所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是非常正确的。

第十五讲

敬身为大



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也。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支也，敢不敬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也；伤其本，则支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则大化忾于天下。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妻子”是指妻子和儿女。“亲之支”是指父母的支派。《礼记》上，“支”作树枝的“枝”讲，就是分枝的意思。“亲之支”，意思是父母的分支。“百姓之象”的“象”就是效法和仿效的意思。“大化”是广远、深广的教化。“忾”是满的意思。

夏商周三代的圣明君主是尊重、爱护妻子与儿女的人。妻子是祭祀祖宗、照顾父母的主妇；儿子是祖先的后代，怎能不尊重呢？所以君主对于妻儿没有不尊重的。谈到尊重，最重要的是尊重自己。自身是父母衍生的支派，怎能不尊重？不自重，就是伤害父母；伤害父母，就是伤害了根本；伤害了根本，枝干就随之枯亡。这三者，自身、妻子、儿女，百姓和君主同样拥有，百姓自然以君主为榜样来效仿。珍重自身推及珍重百姓；亲爱儿女推及亲爱百姓的儿女；尊重妻子推及尊重百姓的妻子，君王做好这三件事，教化才能推广到普天之下。

从《孔子家语》中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不敬妻子，更没有歧视妇女。中国人讲男女有别，完全是根据天地自然之道提出的。中国人特别强调“道”，道是什么？道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况和规律。古人认为，用自然规律指导人生、治理社会，人生才能幸福，社会才能安定。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说什么话了吗？天并没有用语言的方式和大家交流，但是我们可以从四季的变化中，从万物的自然生长中，观察到规律的存在。这个规律是自然而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适用。所以把它称为“道”，用“天道”来形容。“天”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

自然而然的道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一般人没有注意到，只有圣人观察出来了，记在经典上，我们学习经典就是在学习道。所以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能告诉我们如何趋吉避凶。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按照这个道去做，帮助你的人就愈多；反之，帮助你的人愈少，甚至至亲之人都会离你而去。

敬妻有道

古人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按照这种自然而然的规律去处理人际关系，首先要处理好夫妻的关系，即“男女有别”。“别”字，并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别，而是指男女在职责上分工不同，“男主外，女主内”这种分工完全是根据男女的心理、生理的特点来安排的。特别是在古代农业社会，创造经济收入、养家糊口，使家人衣食无忧，这样重大的责任主要是由男子来承担的。这就要求做丈夫的要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不能因为自己在外面，接触的人很多，就可以随意地寻花问柳、见异思迁。妻子在家承担着教育儿女的责任，那就要求

她自身必须有良好的德行，这样才能够言传身教，把儿女教导好。

因而古代的圣王一定是敬重他们的妻子的，因为妻子是“亲之主也”，她要负责祭祀祖先、孝敬公婆、助夫成德、和睦妯娌、教育子女，她的责任无比重大。古人说，娶一个好的妻子可以兴三代，这话绝对不夸张。

为什么妻子能够受到特别尊重？因为古代的妻子大多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不图名、不图利，一心一意地把家照顾好，帮助丈夫事业成功，让他后顾无忧。丈夫对妻子怎能不感恩、不敬重？

中国有句古话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做女子的要效仿大地的德行。大地很安静、平稳。“安”字，上面是“宀”，代表这个家；下边是一个“女”字，女子在家，家就安、就幸福。女子还非常厚重，很沉稳，有大地一样的德行。比如，无论是将干净的东西还是肮脏的东西扔给大地，她都毫无怨言、一律接受，所以“地之秽者多生物”，大地污秽肮脏的地方，往往植物长得却很茂盛。女子效仿大地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对家庭有很大贡献，因而受到丈夫的敬重。换句话说，如果女子没有受到丈夫的敬重，也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反思自己对这个家是不是尽到责任了？

做丈夫的要有丈夫之道，做到“领妻而不管妻”，把妻子领到为人处世的大道之上，而不是事事都去管她。怎么样“领妻”呢？做丈夫的首先自己要走在做人的正道上，要立住“三刚”，“性刚无脾气，心刚无私欲，身刚无嗜好”。

“性情刚正”体现在什么方面？并不是说脾气很大，脾气很大的人被称为暴夫，很软弱的人称为懦夫。刚正恰恰体现在能克制自己的脾气，不随意发怒上。如果丈夫的脾气不好，身边的妻子、儿女，就会没有安全感，会感到很紧张、很有压力，不愿意和他相处。不知道他为何大发雷霆，让人战战兢兢，时间久了，周围人的神经都很紧张、很有压力。

“心刚无私欲”，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偏爱妻子、儿女而薄待父母。“身刚无嗜好”，做男子的要修身，要把自己的不良嗜好改掉，不抽烟、不喝酒，更不能赌博，也不能好色。丈夫修身修得很好，又能够创造经济收入，使家庭生活有保障，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妻子就会自然而然地佩服他，愿意听从教导。当然“教”主要“身教胜于言教”。所以做丈夫的敬重妻子，就体现在他对妻子很体贴，对妻子的付出非常感恩，还要让妻子有安全感、有依靠，生活得很踏实、很幸福。

什么是幸福？有些人追求幸福，但是方向、手段都是错误的，愈追求，离幸福愈远了。幸福就是充满喜悦的生活，并不是说有很多的钱，有很大的房子、豪华的轿车才叫幸福。现在很多人因为受到西方错误价值观的影响，产生很多错误的观念。譬如，电视节目中的一名女嘉宾，说了一句话，引起众多女子的共鸣，她说：“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一个人都哭了，还有什么幸福可言？但是她宁愿去追求那种虚荣，也不愿意去追求一个踏踏实实的幸福。这种错误的观念使很多人付出了很多，也很辛苦，但是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喜悦，心灵愈来愈空虚。

当然做丈夫的还需要懂得浪漫，比如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曾有人看到一对年轻的恋人在夕阳下散步，就很羡慕地说：“有什么比这更美的吗？”旁边的人听了之后说：“有！老夫老妻比这更美。两个人恩恩爱爱，互相付出、互相感恩，到老的时候还能够相伴在一起，感情愈陈愈香。”所以做丈夫的能够做到这样，才是一个好丈夫。

教子有方

按照“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道理，是处理好与子女的关系，就是“敬子”，因为子女是“亲之支”，是家族的血脉。但并不是孩子要什么

就满足什么，而是要把祖宗的德行，祖辈的精神品质、人生的经验、创业的教训传给子孙，让这些好的德行，以及好的家风、家道、家业代代相传，这才是真正的“敬子”。

古人总结出很多教子的格言。譬如，“孝悌为传家之本，勤俭为持家之本，谨慎为保家之本，和顺为齐家之本，诗书为起家之本”。我们如果多读一读圣贤书，在教子方面就会少走一些弯路。

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被惯成了“小皇帝”“小公主”？就是因为我们做家长的是“爱之不以道，适足以害之也”。哪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儿女？但是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教导他、引导他，反而是一味地满足他的欲望，这样做恰恰把孩子害了。“溺爱”的“溺”字是三点水加“弱”字，就是把孩子宠爱得能力、身体都很弱了，肩不能担、手不能提，没有自理能力，更没有任何承受挫折的能力。《孟子》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人要成才，必须得到各种各样的锻炼，让身体得到锻炼，让心智得到磨炼，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都能够坦然处之，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勤俭为持家之本”，要从小养成孩子勤俭的习惯。曾国藩说：“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人败离不开一个逸字，讨人厌离不开一个骄字。”如果家里有一个败家子，吃好的，穿名牌，享受得很奢华，还有很多不良嗜好，喜欢去赌博，好色，结果再多的家产也能被他在很短时间内败散掉。

“人败离不开一个逸字”，我们观察一个人，他以前都在走上坡路，突然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转折点何在？就在于，他认为自己的奋斗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享受一下人生了。这种观念什么时候生起，什么时候他的人生转折点就出现了。

“讨人厌离不开一个骄字”，为什么有些人无论走到哪里，甚至和人相处了几天，就起了对立，产生了矛盾？就是因为他们待人没有恭敬之

心，不为别人着想，傲慢无礼。《论语》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这句话还有一个前提：“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无论人走到哪里，对每一个人都很恭敬，为人处世没有过失，而且处处看到对方的需要，为别人着想，这样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自己的兄弟姐妹。

“谨慎为保家之本”，虽然家里很富裕，地位很高，但是为人处事仍要很恭敬、很谨慎，这样才能够长久地保持富贵。《孝经》上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虽然自己身居高位，但是没有骄慢的表现，因此身处高位，也没有被颠覆的危险；虽然自己很富裕，但是还很遵守法度、很节俭，一言一行很谨慎，不会背离礼法，因此很富有，也不会有败落的危险。这样才能使富贵保持长久。

“和顺为齐家之本”，看一个家庭能不能兴盛发达，就看他们的家庭成员能不能够团结、能不能够和睦相处。古人说，师徒如父子。同样的道理，同学就像兄弟，所以同学之间和睦相处、互相赞美、团结互助，就是孝敬老师，即“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一个真正有孝心的人，就能够和师兄弟们和睦相处，能够欢喜赞美同学的功德。

“诗书为起家之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贵在明理，理得心安，时时刻刻都走在道上，不偏离道，所以古代读书人受人尊重。

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古人的这些教诲，对于现代人教育儿女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如何敬？就是要以良好的教诲来引导孩子，而不是一味地满足儿女的欲望。正如古人所说的，“惯子如杀子”，“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养了儿子不教育，等他长大，像驴一样脾气不好，顶撞父母、不尊敬父母，甚至还会打爹骂娘，没有丝毫感恩之心。养的女儿只会吃喝

享受，到了婆婆家里，不知道孝敬公婆，不知道助夫成德，更不知道教育儿女，自己的责任都没有尽到。这不就像养猪一样了吗？

爱护身体

“敬”，最重要的是敬身，也就是敬重、尊重自身。《弟子规》中说“身有伤，贻亲忧”，自己身体有损伤，会让父母、家人担忧，所以首先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让父母、家人放心。其实，最无私无求、最关心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父母、亲人。

记得前些年，有一次我去陕西宝鸡分享传统文化的学习体会。三天讲了九节课，很辛苦，母亲劝我休息，我没有在意，她就采取了极端的方式，把我关在门外，说以后你再这么晚回来，别怪我对你不客气。那个时候我不能够体会母亲的用心，觉得自己很委屈，我在外面已经这么辛苦了，回到家还不能进门。这个时候如果做儿女的没有体会到父母关爱自己的用心，还在心里设防，矛盾就愈结愈深了，误解也就产生了。

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相信，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最无私无求的。尽管他们的方式可能会有些极端，但都是出于一种爱儿女的心。儿女只有体会到了这一点，误解才能够消除，才不会再和父母起对立。而不和父母起对立的时候，以一颗善心去和人交往，这种不和任何人起对立的习惯也就养成了。

人化解矛盾，靠的是真诚心的感化，而不是对立和逆反。当你和最亲近的人有对立、不能化解的时候，彼此的内心都很痛苦吧？同理，父母和儿女的心是相通的，有障碍了、有误解了，彼此之间谁都高兴不起来。做儿女的如果能够深深地体会父母的存心，就能够理解他们的一些极端的做法，进而能够感化父母，化解矛盾。

提升德行

除了对身体要注重保养、注重健康以外，我们还要提升自己的德行，让父母放心。《弟子规》中说“德有伤，贻亲羞”，如果我们修身修得不够完美，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还有很多的问题，处处成障，那父母也会很担心。所以一个真正能够让父母放心的人，那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了。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为什么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因为孝子时时刻刻不忘记父母，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希望自己能够更尊敬父母，而不是让父母蒙羞。孝敬父母的人，最害怕别人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很没有教养”。因为这句话不仅骂了自己，还侮辱了父母。我们在德行上没有亏欠，才能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才尽得圆满。

成就自身

对于一国之君而言，他要敬重自身，自己修身很完美，才能够使江山事业代代相传。鲁哀公问孔子：“请问什么是敬重自身？”孔子说：“国君发表错误的言论，民众就会起而说不正当的话；国君如果做了错误的事情，民众也会起而效法做错误的事情；国君的言论不可超越政令，行动不可超越规范。自己的言行不超越政令、规范，老百姓就会恭恭敬敬地听从国君的命令。如果是这样，就可以说是能够敬重自身了。能够敬重自身，就能够成就双亲的名声了。”

鲁哀公很好学，又问：“什么是成就双亲的名声？”孔子回答：“所谓的君子，就是成就了名声的人。能敬重自身的人，百姓会把他称为君之子，就是君子的儿子。这样就使他的双亲得到荣显，使他的双亲成为君子。这就是成就双亲的名声。”

孔子随后说道：“治理政事而不能够爱护民众，就不能够成就自身；不能够成就自身，就不能够安稳地拥有自己的国家；不能安稳地拥有自己的国家，就不能乐行天道；不能够乐行天道，就不能够成就自身。”

鲁哀公问：“什么是成就自身？”孔子回答说：“使自己无过错于天下，就称之为成就自身。无过错于天下就是国君的言行思想都符合于天道，一个国君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成就自身了。”要成为一个好的国君，敬重自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确实要做到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成为大众效仿的榜样，言行举止没有过错，都能符合于天道。

后面说敬自身，“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则大化忾于天下”。“身以及身”，就是敬重自身，进而推及敬重他人。一个人只有自爱才能爱人，自尊才能够尊人。《弟子规》中说：“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首先问自己希望不希望别人这样对你，如果连你自己都不希望别人这样对你，那你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方式去对待别人。这句话做到了，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敬爱自己的儿子，才会知道敬爱天下人的儿子。天下人的儿子也是父母所生，他们的父母培养他们也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个真正爱自己儿子的国君肯定不会轻易地发动战争。因为一旦发动战争，多少家庭的儿子要走上战场，丧失生命。

敬爱自己的妻子，也能敬爱他人的妻子。怎么敬爱？就是以礼相待。不希望妻子被别人欺负，自己也不能够去欺负别人的妻子。这种推己及人的做法才能够使自己的心胸开阔，进而做到襟怀天下，心系众生。当然一个人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十六讲

正心为立德之本



君主用法度制约亲属

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体虽贵，必禁之以度。

——《群书治要》卷二十四《后汉书四》

汉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刘悝存心险恶、行为乖僻、骄横无礼，常常触犯法度。当时任北军中侯的史弼担心渤海王会犯上作乱，于是上奏了一封密折：“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体虽贵，必禁之以度。”“隆”是深厚的意思，“威”指尊严、威严，“度”指法度、规范。君王对于亲属，虽然爱护深厚，但一定要有威严；亲属的身份虽然尊贵，但一定要用法度来制约他们。这样才能真正发扬和睦之道，骨肉之恩才能如愿维持。

史弼还举了历史典故：“昔日周襄王放松了对甘昭公的管教，孝景皇帝娇惯梁孝王，结果这两位弟弟凭借着皇兄的宠爱，傲慢悖逆，致使周室动荡、汉廷事变。我私下里听说，渤海王刘悝借着和皇室是至亲的关系，凭着特殊的宠爱，疏忽了敬奉皇上的礼节；在外聚集了一些违法乱纪的轻浮之人，在内放纵沉溺于美酒音乐，出入无常；结交的都是言辞伶俐，但没有真实德行的人，有被家庭唾弃的逆子，有被朝廷驱逐的臣子，恐怕将来会出现篡位或谋反的事情。面对这种状况，州官却不敢弹劾，傅相也不能够匡正辅佐，陛下因为兄弟情深而不忍心加以制止劝阻。这样发展下

去，危害将会愈来愈大。启请陛下公开臣的奏书，让百官传看，下令公卿判决勃海王的罪行。待依法定罪之后，再下发诏书予以赦免，以显示陛下不忍惩办兄弟的仁慈之心。这样做就既不会有讥讽皇上伤害至亲手足的非议，勃海王也将有福庆继续享有封国。否则，一旦勃海王谋逆，则大狱将兴，臣忧思愤懑，冒死上奏此事。”这封密折呈上之后，汉桓帝还是因为与刘悝是至亲兄弟的关系，不忍心将此事交付群臣讨论。后来，刘悝果然犯了谋逆之罪，被贬为瘿陶王。

《群书治要·文子》中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无为非者寡矣。”一出生就生活在有权势或富裕的家庭中，这样的子弟如果没有学“道”，不能够以“道”作为借鉴，却不为非作歹的人是很少的。

曾国藩在他的家书中也提醒，看一个家庭、一个家族能不能够兴旺发达，就看家族的子弟是否做到三件事。一是家中子弟早晨几点钟起床；二是家中子弟是不是自己的家事自己做；三是家中子弟是不是读圣贤书。虽然这几件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一家的子弟是克勤克俭、励精图治、艰苦奋斗，还是骄奢淫逸、铺张浪费。

第一，早晨几点钟起床为什么很重要？中国古人认为一年有四季，一天也有四季，而一天的春天是从早上三点钟开始的，春天主生发，我们就可以起床活动了。清晨五点钟是一天的惊蛰，惊蛰是小动物冬眠之后恢复活动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起身锻炼身体，一天都会精神饱满，健康也就有保证。

六点钟是一天的春分，所以最迟也不能超过六点钟起床，否则春天的一半过去了，也就错过了春天生发的时机。春天生得不好，夏天就不会很茂盛。夏天是早晨九点钟到下午三点钟，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会打瞌睡，就是因为该起的时候没有起，该睡的时候没有睡。

下午三点钟到晚上九点钟是一天的秋季，秋天主收，这个时候不要

做激烈的运动。晚上九点钟到早晨三点钟，这是一天的冬藏，也就是最好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十一点钟到一点钟，这是一天的冬季，严冬季节，这个时候最好是处于熟睡状态。中国古人按照自然节律来饮食起居，以确保身体健康，这才是最高明的养生之道。

第二，是否自己的家事自己做。曾国藩做到了四省的总督，但他仍然坚持要求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古人说“习劳知感恩”。如果孩子从出生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没有参加过劳动，就不知道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就可能不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骄奢淫逸。如果孩子能够种种菜，收拾一下屋子，做一顿饭，让他感受到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就会发自内心地珍惜粮食，不敢浪费。

第三，家中子弟是否读圣贤书。自北宋后，凡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都必须熟读四书五经。四书五经里有什么内容？“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君子忧道不忧贫”“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都是这样的教诲。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因为圣贤书都是和天道相应的，道理都写在圣贤书之中。譬如，《周易》中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书》中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学》告诉我们“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老子》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古代的皇帝想学习的时候，学什么？就是请一个通达儒释道经典的人，给他讲一段经书。譬如说，这个人是学《论语》的专家，就请他把《论语》讲一讲；那个人是学《周易》的专家，请他讲一讲《周易》；还有的人是学《道德经》的专家，请他讲一下《道德经》。皇帝对老师很恭敬，带着文武百官一起来学习，甚至把老师奉为国师，全国上下都看到，立刻就兴起了学习圣贤书的风气。

曾国藩在其家书中还写道：“京师子弟之坏，无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

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他提醒儿女、晚辈，京师子弟之所以会变坏，就是因为“骄奢”二字，没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你们和弟弟们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在心上，作为警诫。

他还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凡是出生于世家的子弟，吃穿用度、饮食起居都要与贫寒的读书人相同，这样才能够成大器。如果沾染上富贵习气，竞奢斗富，这就很难有成就了。因为人的欲望打开之后，是没有止境的。把心思用在这些方面，也就没有心思去求“道”了，心被污染了，就不能够有成就。

“凡人皆有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曾国藩虽然做到了四省总督，权倾一时，但是他不希望子孙做大官，而是希望他们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

对亲属不能搞特殊化

所贵于善者，以其有礼义也；所贱于恶者，以其有罪过也。

今以所贵者教民，以所贱者教亲，不亦悖乎？

——《群书治要》卷四十五《昌言》

“悖”是谬误、荒谬的意思。人们尊崇美好的行为，是因为它合乎礼仪；厌恶不良的行为，是因为它违背常理。现在用所尊崇的来教化百姓，却用所厌恶的来教导皇亲，不是很反常的吗？古人倡导“五常”“五伦”，讲“仁、义、礼、智、信”，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但是人们往往在面对自己亲戚的时候，就忽略了用这些道理来教导他们。在这方面，即使是明君也难免有所偏失。

唐太宗的女儿长乐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深受唐太宗喜爱。贞观六

年，长乐公主主要出嫁。唐太宗特别下令有司陪送的嫁妆，要比当年的高祖之女（唐太宗的妹妹）永嘉长公主的嫁妆多出1倍。

魏徵说：“以前东汉的明帝准备封赏他的儿子时说，‘我的儿子怎么能跟先帝的儿子得到同样多的封赏？参照先帝之子的一半去封赏吧。’这是符合尊卑之道的。史家对此大加赞赏，认为明帝做得很好，很符合尊卑的秩序。”魏徵接着说：“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义无等别。”他说，现在皇帝的妹妹称为长公主，而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既然在前面多加了一个“长”字，就说明要比公主的身份尊贵。可能在感情上皇帝是爱自己的女儿超过爱自己的姐姐，但是道理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公主的礼节逾越了长公主，道理上恐怕是不妥的，希望陛下三思。”太宗听了之后非常赞同，并且把这些话告诉了皇后。“后叹曰：尝闻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长孙皇后不仅没有生气，听完之后还非常赞叹地说：“曾经听说陛下对魏徵十分敬重，可是对于其中的原因却知之甚少，不知道陛下为什么对他这么敬重。现在听到他进谏的这番话，可见他能够用道义来抑制帝王的私欲，真是国家的社稷忠臣！”

长孙皇后说：“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曲蒙礼敬，情意深重，每将有言，必俟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她的意思是说：“妾和陛下情深义重，陛下对妾礼敬有加，妾向陛下劝谏的时候，还要待陛下和颜悦色、心情好的时候，才委婉地加以劝说。而魏徵作为臣下，能够直言进谏，真是太难得了。”

她还说：“故韩非谓之说难，东方朔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深所要急，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皇后引经据典把劝谏这件事说得非常难得。她讲道，韩非将此称为“说难”，就是“劝说”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东方朔将其

称为“不易”，给君主提出不同的意见，是不容易的，这非常有道理。“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拥有家国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能采纳这些忠言，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如果杜绝这些忠言，政局就会混乱不堪。妾希望陛下能够仔细体会其中的含义，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说完，长孙皇后还请求唐太宗派遣使者带着500匹的锦帛馈赠魏徵，对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大加赏赐。

长孙皇后为什么能成为史书上称颂的贤德皇后？就在于她熟读诗书，明德知礼，真正按照“道”去做，因此她劝谏唐太宗时引经据典，层层递进，唐太宗听了之后不得不信服。

现在我们倡导勤俭道德的社会风气，不知道勤俭道德于己、于自己的家人，是真正有益的，是使我们的家道、家风、家业，代代相传的法宝。历史上范仲淹是明理之人，诸葛亮也是明理之人，所以他们培养的良好家风代代相传。范仲淹的家风一直传承到今天，将近千年而不衰。有人统计过，到清朝的时候，范家做过大官的有70多位。这说明“成由勤俭败由奢”，对一个家族而言是如此，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荀子·王制》中有这样一句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水则覆舟。”唐太宗对此深信不疑，并时常用这句话教导太子。

唐太宗如此时常引导太子是因为他对这些道理深信不疑，认为按照这些道理去做，才能够使自己的位置坐稳，使天下太平，他的皇位才能够代代相传。所以读书的好处在于能够让人明理，理得心安，才不会像一般的人那样忙忙碌碌地去追求大房子、名车，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周易》中也说：“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领导干部如果学习《周易》

的这句教诲并身体力行，很多灾祸都可以避免。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不贪、不占，不贪财、不贪色、不贪名、不贪利，还有什么自由可言？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其实他们所说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是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而不能自拔，就像吸毒一样，愈来愈上瘾。

真正的自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如如不动。如果你在钱面前不动心，面对金钱就自由了；如果你对色不动心，在色面前就自由了；如果你对名利不动心，在名利面前就自由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喜欢贪财，就会有人用钱财来贿赂你，钱财就成为诱饵，你可能就会陷入深渊；喜欢贪色，有人就会用美色来诱惑你，你可能会因为色的诱惑而身败名裂。

儒家经常讲“人到无求品自高”。如果你有求，就会对人低三下四，哪里有什么清高可言？所以圣贤君子确实都是无求品自高。古人说：“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无论是进还是退，都是随缘而已，没有人用我，我就独善其身，这也很好。

把“我”能够放下了，“我贪、我爱、我痴、我慢、我疑”自然就没有了。如果还有一个“我”，就会有“我要控制、我要占有、我很得意、我讲得很好、我受到尊重、我要讲什么、我认为怎么样”。当一个人真正放下“我”的时候，才能够看到对方的需要是什么、众生的需要是什么、社会的需要是什么，而不是执着于“我”想做什么、我想讲什么。

心正则身修，国治天下平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
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

——《群书治要》卷四十九《傅子》

“尚”是超过、胜过的意思。君主树立品德的根本，没有比正心更重要的了。心正，自身言行就正；身正，左右近臣的观念才正；近臣正，朝廷的政治风气就端正；朝廷正，国家的运作就顺畅；国家正，天下起而归顺效法。

大家可能会想起《大学》中的几句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怎样正心？《大学》中的这几句话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心就不端正了。我们的心像水一样，平时应该是水平如镜、一尘不染，愤怒的时候像起了大风大浪，人一愤怒，说的话都是很过分的、很偏激的，这个心就不得其正了；有恐惧的时候，心就不能够端正；有忧愁的时候，心也不得端正；有贪图爱恋的时候，心也会不端正。心不端正，看问题就歪曲了，就会有失公正。心不能够端正的时候，“身”就没有修好。“身”不能够修好的话，左右的人的需要你看不到，虽然你可能心地很善良，想帮助他们，但是你所付出的并不是人家真正需要的。如果左右的人再有贪财、贪色、贪名、贪利的喜好，那就更加有失公正，甚至整个国家也就谈不上公正了。所以自己修身修好了，左右的人潜移默化地就会受到影响。正如《说文解字》对“教”字的解释——“上所施，下所效”。

《礼记》中也说，下级服从上级，并不是看上级所说的，而是看上级所做的，如果上级领导喜欢某一个东西，下级、属下一定有比他更加喜欢的。所以上级要做好表率，谨慎对待自己所喜欢和厌恶的。如果君主自身端正，他左右的人也会端正，左右的人端正了，朝廷的风气也会端正，国家的治理就会非常顺畅，这样才能实现国泰民安。

所以怎样构建和谐世界呢？就是先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譬如，外国人到中国旅游、做生意，如果看到中国人之间相处得彬彬有礼、和睦友

爱，人情味特别浓，他们看了会很羡慕，就会起而效法，学习中国的文化。世界各国人民也就能互相关爱、和睦相处，世界也就和谐了。

想使个人、家庭、企业、学校……国家都能够和谐，那么领导者自身就要有修身的功夫，这样才能使家庭、单位等和谐。而领导者修身，就要正心，修好自己的这一颗心，时时刻刻达到清净、平等。

第十七讲

自我反省



曾参受教传孝道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子名参，比孔子小46岁。孔子认为曾子能够通达孝道，又非常有恭敬之心，所以就传授他学业，并专门将《孝经》传授给他。《孝经》中记载，孔子和曾子对话的时候，首先提了一个问题：“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古圣先贤有至高的德行、至简要的道理，能够使天下和顺，老百姓之间都能够相亲相爱，上下之间没有怨恨。你知不知道这个至德要道是什么？曾子听老师问了这样的问题，马上“避席曰”，也就是赶紧恭恭敬敬地起身回答：“参不敏，何足以知之？”我不够聪敏通达，怎么能够知道这样的至德要道呢？我们从“避席”这两个字，就可以体会到曾子对老师的恭敬之心。老师一提问，他不是坐着不动，而是马上起身回答，正因为他有这样恭敬的态度，所以才能被孔子传以大道。

孔子说：“参也鲁。”说明曾子在所有的弟子之中，并不是最聪明的，他很鲁钝。有一次，曾子和父亲一起去耘苗，本该把草锄掉，结果不小心把苗锄掉了。曾子的父亲非常生气，情急之下拿着大杖就打在他的背上，

曾子没有躲避，结果这一杖打得太重了，曾子昏倒在地。等他醒过来之后，还向父亲请罪。为了让父亲安心，曾子还弹琴唱歌，歌声非常欢快。好让父亲知道，自己的身体并无大碍，请父亲放心。

大家认为曾子非常孝顺，孔子听到这件事后却非常生气。他说：“你们告诉曾子，不要再来见我了。”曾子是一个对老师非常信任、非常恭敬的人，既然老师这样说了，他就真的不敢去见老师，请人向老师请教原因。孔子说：“假如你的父亲在盛怒之下，一不小心把你打死了，就会陷你的父亲于不义之中。”孔子告诉曾子，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应该是“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如果父亲拿的是柳条这样小的、很轻的东西打你，你可以接受；但如果拿的是很重的，像锄头这样的东西打你，你就应该赶快跑，不要让父亲打到了。曾子自此才知道，孝并不是一味地顺从父母，一味地顺从父母，可能还会使父母陷于不义之中。

还有一个关于曾子尽孝道的典故，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启发。一位朋友来见曾子，恰好曾子有事外出，不在家。曾子的母亲非常有仁慈之心，可怎么才能让曾子知道家里来客人了呢？母亲在情急之下，就咬破了自己的手指。中国古人说“母子连心”，曾子是一个孝子，心中时时刻刻惦记着母亲，所以他的母亲一咬手指，他的心就痛了一下，马上感应到母亲在家出事。于是，曾子赶紧往家里赶。他赶到家里才知道，原来母亲安好，只是家里来了客人。听了这样的故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原因在于有些人并不是常常惦记着父母，而是常常惦记着怎样吃喝玩乐，怎样赚更多的钱，获得更高的官位，心被染污了，不够清净，也就关注不到父母的身体状况，也就看不到父母真正的需要了。

所以有些人事业很成功，在外面也受人赞叹，但是这却换不来家人的理解，家人对他怨声载道，自己也茫然不知所措，还觉得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为什么没有人理解自己。

当我们看不到自己家人的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很难体会到众

生、社会、国家的需要真正在哪里。有一位老师讲过：“努力会有结果，但不一定都会有好结果。”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历事炼心的过程。如果我们做这件事不仅没有使我们的心归于清净、平等、正觉，而是让我们的心更加慌乱，说明我们努力的方向错误了。

所以我们应该反省自己，是不是时时保持清净了，是不是忙乱的工作打乱了我们内心的清净，而看不到周围人真正的需要在哪里。如果家人有需要，我们却体会不到，这就是“麻木不仁”。原因在于心不够清净，对于众生的需要不能够感同身受。

三省吾身

“三省吾身”中的“三”，《说文解字》解释为“三，数名”。“三”是一个数字的名。阮元在《数说》中说：“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意思是说，古人的书都是写在竹简和木板之上，所以显得很繁重。传授学问都是以口口相传的多，即老师口讲，学生耳记，通过阅读书籍传授学问的情况比较少。“且以数记言，使百官万民易诵易记”，以数来记载人言论的好处在于能够使百官及百姓都容易记诵，也容易传达。譬如说，领导讲话的时候，经常概括说“我今天讲三个问题，一、二、三”，这样一列出来，条理分明，让大家很容易记住。《论语》以数记文者很多，譬如说，一言、三省、三友、三乐、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变、四教、绝四、四恶、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类，都属这种情况。“三省”的“省”字，郑玄的批注是“思察己之所行也”，就是反思、观察自己的行为。《说文解字》对“省”也有这样的解释：“视也。”视就是观察、看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省察、反省、反观的意思。

“三省”，就是从三个方面来反省。

第一个方面，“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个“忠”，《荀子·礼论》批

注：“忠，诚也。”“诚”和“实”的意思是一样的。“诚心以为人谋谓之忠”，也就是说，诚心诚意地为别人办事，就叫作“忠”。“五伦关系”当中讲到君臣关系，“臣事君以忠”，所以“臣之于君，有诚心事之，亦谓之忠”。臣子侍奉君主，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被领导者侍奉领导能够诚心诚意，把领导交给自己的事情办好，这就是尽到了忠心。所以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把“忠”解释为“尽己之谓”，竭尽全力地把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完成好，这就是尽到了忠心。

第二个方面，“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朋”和“友”，郑玄的批注是“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所谓的“同门”就是指“同处一师门也”，就是一个老师的弟子，同门的师兄弟就叫“朋”。“同志曰友”，郑玄注：“两人不共学而所志同也。”虽然两个人没有共同在一起学习，但是两个人志同道合，这样的人就称为友。“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信”字，《说文解字》中讲：“诚也，从人从言，会意。”这个“信”就是“诚”，说话诚实不欺，它从人，从言，所以“人言为信”，是一个会意字。这个字告诉我们，与朋友相交必须信实不欺。“人言为信”，说明人所讲的话必须守信用，否则那就不是人所说的话了。

第三个方面，“传不习乎”，“传”字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老师传给弟子的学问，弟子是不是在生活中去力行了。“习”就是练习的“习”。《说文解字》注：“习，鸟数飞也。”我们看鸟在学习飞翔的时候，屡次拍着翅膀飞，不断练习。我们从中体会到，“传不习乎”就是老师传授给我的学问，我是不是在生活中运用练习了、力行了。这是其中的一层含义。另一层含义，就是自己传授学问给弟子的时候，是不是把老师教给自己的学问温习了、力行了，心有所得，之后才去传授学问给学生。“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须经过自己领悟、体会后，才能把老师传授的学问再传给弟子。

郭翼在《雪履斋笔记》中说：“曾子三省，皆指施于人者言，传亦我传乎人。传而不习，则是以未曾躬试之事而误后学，其害尤甚于不忠不信

也。”郭翼的这句话意思是说，曾子提出的“吾日三省吾身”，这三件事都是从施于人的角度来讲的，这个“传”就是自己将学问传给别人，传给弟子。如果自己传授给弟子的学问，自己事先没有温习、没有力行、没有体会，那就是以自己没有亲身试过的事情来误导后学，它的害处比不忠不信更加严重。

焦循的《论语补疏》说：“己所素习，用以传人，方不妄传致误学者，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用我自己平时所身体力行的来传授给别人，这样才不会导致误传而贻误后学，这就是所谓的‘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的人才可以当别人的老师。”在古人看来，一个人要讲经教学，要带徒弟，为了防止以盲引盲，都是必须要开悟，才能够传授生徒的。所以我们在做学问的路上，迈出的步子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迈对方向。如果迈错了方向，虽然你很精进、很努力，但是南辕北辙。譬如说，我们从北京去哈尔滨，但是我们却乘上了去深圳的列车，你走得愈快，离我们的目标就愈远了。所以古人特别强调师承。弟子们没有开悟、没有获得真实的成就之前，不能离开老师，否则错了自己都意识不到。求学问，其实最快的方式就是向过来人求教，因为这条路他已经走过了，不用你再去试探，你再去试探，其实就是浪费精力和时间，多走了冤枉路。人生苦短，我们若能跟着一位过来人、一位好老师，依教奉行，很快就能够有所成就。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三句话是说，曾子每天以这三件事来省察自身。第一件事，就是省察自己为人办事是不是尽心尽力了；第二件事，就是反省自己与朋友相交往，是不是做到了诚实守信；第三件事，就是受的老师的传授，是不是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了。自己再去传授生徒的时候，是不是先练习了、温习了、躬行了，做到了忠信传习。这三件事都能做得不错，才能够安心地睡觉。所以这三句话体现了曾子为学的功夫。

从这里我们了解到，曾子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虽然他很鲁钝，但

是他坚持学习，锲而不舍，最后很有成就。《中庸》中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曾子是把这句话很好地力行在求学之中了。虽然他很鲁钝，不是很聪颖，但是他传承了孔子的学问，而被尊称为“宗圣”，成为一代圣人。我们从这里看出，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和他的天资聪颖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和他好不好学有关系，和他是不是老实、听话、真干有关系。

我们再看第一句话：“为人谋，而不忠乎？”“为人谋”从广义上讲就是做事，也就是服务大众，这件事情天天都要做。有些人说：“也没有什么人找我替他办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只要与人交往，我们就要对别人所委托的事情尽心尽力。无论我们从事哪一个职业，都有分内的事。譬如说，我们当老师的，在备课的时候，要尽心尽力把课备好，把学生带好，而不是为了拿一些工资、课时费，漫不经心地备了一点课，应付领导的差事。如果我们是公务员，每天朝九晚五地来到办公室，是不是喝茶、看报纸，混过了一天？自己应尽的本分、应负责的工作，是否尽心尽力地完成了？即使我们是一个店员，是不是按时上下班了？是不是为顾客尽心尽力地服务，让他们对我们的服务态度感觉到很满意？也许有些人没有正式的工作，只是家庭妇女，从早到晚是不是把家收拾得整整齐齐，对家庭每一个成员都尽心尽力地照顾到了？只有那些不和人接触的人，才不需要为人谋，不需要尽心尽力。所以我们学了这句话，应该怎样去力行？从广义上说，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就要想到为他人服务，为他人着想，这就是“为人谋”。

第二句话：“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从广义上讲，朋友就是和我们同辈分的、地位平等的人。和我们地位平等的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做到了言出必行、诚实守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ní），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一个人如果言而无信，就像这个车子（古代的时候是马车、牛车），大车（就是牛车），没有輗；小车（就是马

车），没有軎。用我们现在的话来比喻，如果我们言而无信，就像车子没有发动机一样，在社会上寸步难行。为什么？因为你说的话人家不相信，你做的事人家也有怀疑，对你生不起信心，所以做事就会有很多障碍。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个“信”字，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怎样才能做到有信？就是做“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妄语者”，这才是真正地做到了言而有信。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就会把虚幻的东西当成真理，然后去传播给别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求道，要明心见性，这样你所见到的是真实的，你所说的才不是妄语。

第三句话：“传不习乎？”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双关语。要反省老师教我的学问是不是做到了？还有我教给别人的学问，是不是首先躬行了？如果我将学问传授给别人，自己还没有力行，这样讲起来就没有说服力。

这三句话实际上是教导我们做好以下三件事情。

第一，“好学近乎智”。无论是求学还是求道，无论是求世间的学问，无论是传授世间的学问，都必须好学、喜学、愿学，这样才能有所成就。凡是在历史上有所成就的人物，都不是老师逼出来的，都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都是靠自己主动自愿地学习、废寝忘食地用功，这样才有所成就的。

曾子给我们做出了“好学近乎智”的榜样。《群书治要·曾子·修身篇》记载：“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君子能够“攻其恶”，责备自己的不良行为、自己的过恶。“求其过”，追究自己的过失而不是去看别人的过失；“强其所不能”，自己还不会做的或者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要加强，要勉励自己做得尽善尽美。“去私欲”，要克除自己的私欲。“从事于义”，做事情要按照义的标准来做。凡事，包括起心动念，都要符合义的标准，这才叫“从事于义”，这样做

才可以称得上是“学”。

“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这句话就是讲君子要珍惜时日来学习。古人学习非常珍惜时间，废寝忘食、挑灯夜战，“头悬梁，锥刺股”，发愤读书，才能够有所成就。“及时以行”，要适时地把自己所学的付诸行动，要在生活中去落实，历事炼心。难做的不回避，容易做的也不盲从，所要考虑的只是合不合道义。“旦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没其身，亦可谓守业矣。”每天早晨起来就攻治学业，到晚上一天要结束了，还要自我反省检点，看看今天自己哪一条做得不够好，这样一辈子都坚持不懈，才可谓坚守学业。这也是曾子自己的学习心得。我们看曾子说自己“吾日三省吾身”，确实做到每一天都是从这三个方面多次反省自己的，否则他也提不出这样好的体会和教诲。

“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学了之后，还担心自己学得不够广博。即使广博了，还担心自己博学了之后，没有很好地去运用。即使运用了，还担心自己不能真正地理解其中的意思，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即使理解了其中的意思，还担忧自己不能够付诸行动。即使能在生活中实行了，还担心在行动上做不到谦让。所以君子之学就是把这5个方面全都做到了。

《论语》中孔子也这样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只有10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就有像他那样讲求忠信的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我好学。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是靠好学成就的，所谓“好学近乎智”。为什么用“近”呢？好学和智能够接近，因为这个智慧是我们本性中自有的，像六祖惠能大师所说的“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智慧是本有的，本性本有，只不过被外物所蒙蔽了。通过学习就可以去除这些染污，把自己本有的智慧显现出来。

我们同在一个地方修学，有的人修学提升得很快，有的人修学却没有什么提高，或者提高得很慢，原因何在？就在于我们学习的态度不一样。秉着忠信的态度去学习，对于我们求学是至关重要的。有的人能够学有所成，而有的人却学无所成，主要就是求学态度不一样。

第二，“力行近乎仁”。我们学，不只是学知识、学道理，还必须在生活中去落实，去身体力行。《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如果没有力行，就体会不到力行的喜悦。《论语》中孔子多次赞叹弟子颜回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乐在何处呢？乐在道中。他学道有所得，每每把老师传授的东西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有所体会、有所提升，心中的喜悦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古人所说的“禅悦为食”，有这样体会的人，世间的其他快乐对他就没有吸引力了。所以我们“学儒”不是搞“儒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最后还有一个“笃行之”。如果没有力行，就体会不到学习的快乐。

第三，“知耻近乎勇”。反省自己的过失，进而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勇”就是勇于改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们都不是生而知之的，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圣贤人的，都是从一点一滴学成圣贤的。试问自己人生中哪一个人没有犯过错误？重要的是“不贰过”，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一个人能知过，并善于改过，没有比这更大的善了，所以说“善莫大焉”。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力行《弟子规》，改过自新，之所以有能够成圣成贤的自信，就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中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既然舜能够做到，我通过努力也是能够做到的。这就是《弟子规》中所说的“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

第十八讲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君子不重则不威

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

——《群书治要》卷十一《史记》

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有一次周成王跟叔虞开玩笑，把桐叶削成“珪”的样子赠给叔虞。“珪”是古代诸侯朝见天子的信物。周成王说：“用这个来封赐你。”史佚就请周成王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封叔虞为诸侯。周成王说：“我只是跟他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天子无戏言。”天子没有不慎重的话，没有开玩笑的话，话一说出口，史官就会记录下来，就要用礼仪来完成，用乐音来歌颂。于是，周成王就封叔虞为唐国之侯。“君无戏言”的典故就出自这里。

《论语》中说：“君子不重则不威。”作为一国之君，如果言行不庄重，就没有威仪，也不会让百姓生起尊重之心。汉代扬雄的《法言》上讲到修身时，提出人应该取“四重”，即“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言语庄重可以为人所效法，《弟子规》中的“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就是告诫人们不要说欺骗人的话、不诚信的话、粗鲁骂人的话。

古人说：“力贱得人敬，口贱得人憎。”一个人很愿意出力帮助别人，他会受人尊敬；一个人言语过多，说得又不是很妥当，就会遭人厌恶。

《周易》有言：“吉人之辞寡。”吉祥的人，言语是很少的，因为他心地清静，没有那么多的妄念。“躁人之辞多”，心浮气躁、思虑很多的人，表现出来的是言语很多。这提醒人们，在言语上要庄重、慎重。

在《弟子规》中还有一句话，也是对世人的重要提醒，那就是“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一个人经常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扬，如果被别人知道了，就会对他非常痛恨，无形中埋下了祸根。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扬，这也是一种恶，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能够做出来的。

中国古人提醒人们要厚道存心。厚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隐恶扬善，把别人的善事、好事，譬如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师长等事多多去宣传；而不能将那些儿女不孝敬父母的、兄弟互相争讼的、朋友之间背信弃义的、夫妻同床异梦的事情大肆去宣扬。《增广贤文》说得好：“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所以说什么、怎么说体现了一个的德行厚薄。

孔子以四个科目教导学生，首重德行，其次是言语，最后才是政事、文学。有人总结讲话的艺术说：“要多说鼓励的话，少说批评的话。因为鼓励激发潜能，批评造成隔阂。”有时，虽然我们是好心好意，确实是为了对方着想，但是说出来的话却很刺耳，让对方听了很难接受。所以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在为人处世的时候，要特别讲究说话的艺术。即使是劝导别人，也要有劝导的艺术。首先你要等对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劝谏他、指正他的缺点，对方才比较容易接受。在指出对方缺点之前，你还要先美其长，先要肯定他做得好的地方，赞美他的长处，然后再委婉地说：如果再怎样做，那就更完美了。这样的口气就让人比较容易接受。

“因材施教”。如果一个人本来已经很自卑了，没有自信，你对他的言语还很严厉、很苛刻、很挑剔，就会使他愈来愈丧失自信心。有时我们说了一句不经意的话、无心的话，但是别人听了之后可能会耿耿于怀，甚至与你产生隔阂。古人说“三思而后行”，我们说话也需要三思而后言，

要考虑到方方面面，不能顾此失彼。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们说一句宽慰的话、理解的话、体谅的话、鼓励的话，别人即使在寒冬腊月里，心里都感觉到温暖；但是如果我们恶语伤人，尤其是在盛怒之下口不择言，说了一些伤害对方的话，那么即使在炎热的六月，对方也会由于你这一句话刺痛了他而感到心寒。

“行重则有德”。我们的行为很庄重，就显得有德行，很稳重。《论语》中提到孔子教导弟子颜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我们的视、听、言、动都要符合礼的节度，不符合礼的行为，绝对不去做。

“貌重则有威”。我们的容貌庄重，让人感到有威严。中国古人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睡有睡相。”即使一个人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也要很慎重，不能放逸。孔子教导：“色思温，貌思恭。”表情要很温和，虽然很温和，但是很恭敬。这样就让人觉得你很好接近，很温和；但是在你的面前又不敢造次，对你非常敬重。他既想亲近你，又不敢造次，这就是因为你做到了“貌思恭”，自己有威仪，做得恰到好处。

“好重则有观”。“好”就是嗜好。中国古人从小学习的是琴棋书画，这些嗜好都很高雅，都有可取之处。这些嗜好可以教导我们在言、行、貌、好等方面要学其庄重。

古人教导孩子，“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这句话也提醒人们，慌里慌张，是导致出错的原因。《弟子规》中说：“事勿忙，忙多错。”《礼记·玉藻》中也说：“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

“足容重”，指我们行走的时候，一定要稳重，像大象那样四平八稳，非常缓慢。曾国藩曾教导弟子要“走路慢，吃饭慢，说话慢”，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稳重的作风。古人说“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一个人有

定力、很稳重，无论发生什么意外的、突发的事情，他都能够保持冷静，知道如何应对。

“手容恭”，指端坐的时候，手要敛。“起脚敛手”，走路的时候，不能甩着胳膊，手容要恭敬。

“目容端”，“端”就是平的意思，平视。我们的目光不要向上，也不能向下。目光向上或向下，都会让人觉得你很傲慢，或者显得很不屑。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我们傲慢或者刻薄，表现在眼睛上，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观察，如果有人在说话的时候，眼睛咕噜咕噜地乱转，说明这人的心思很复杂，心眼很多，不停地转动着念头。

“口容止”，这个“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吉人之辞寡”。说话不要太多，要懂得适可而止，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要说。孔子说过，随侍君子时容易犯三种过失：“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没到该你说话的时候抢着说，说明你心浮气躁；该你说的时候，你又隐而不说，这是隐匿之过；没有观察君子的神色，你就说话，这是不懂得说话的分寸，就像盲人一样。说话不看对方的神情，说了一些别人不喜欢听的话，别人都要发怒了，这是大为失礼的。所以言语要谨慎，要懂得适可而止。

“声容静”，指我们说话不要大声喧哗，像噪声一样。

中国在历史上被誉为“礼仪之邦，华夏之族”。这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封的，是邻邦的人到中国来访问，看到中国人彬彬有礼，相处得特别和谐，他们很羡慕，回去之后向国君报告，国君就派使臣到中国来学习，于是他们把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华夏之族”。像唐朝的时候，万国来朝，中国的皇帝被尊称为“天可汗”，即天底下公认的领导者。

“头容直”，“直”就是不要歪斜，要端正。我们和人交谈的时候，不能把头侧向一边。

“气容肃”，指我们喘气的声音不要太重，要给人一种肃静的感觉。

当一个人的恭敬心提起的时候，他就自然很注意这些细节，连呼吸都不敢出大气。

“立容德”，指站立的时候不要倚在一边，也要端正，这样会给人一种有德行的感觉。

“色容庄”，指色容要庄重，给人一种有威仪的感觉，别人就不敢轻慢你。

这就是孔子讲的“君子不重则不威”。

《群书治要·春秋左传》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春秋时，大臣赵盾的君主晋灵公非常不守礼，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赵盾作为臣子非常忠心，屡次犯颜直谏，晋灵公都不听，还觉得他很烦，并且起了恶念，派杀手去杀掉赵盾。这个杀手于凌晨时到了赵盾的家里，看到他的卧室门已经开了，赵盾已经准备好要去上早朝。因为时间还早，他就穿好了朝服，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闭目养神。他这种恭敬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杀手。杀手想，一个大臣在没有人的时候，还能够对国君表现出这样的恭敬，这个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于是，杀手心里暗自思量：“如果我把国家的栋梁杀了，我对国家、对人民就不义。但是我又接受了君主的命令，刺杀这个大臣，如果完不成自己的使命，对君主就是不信。”他思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最后自己触槐自杀了。从这则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个人以恭敬的态度居然可以起到这样的感化作用，把来杀他的杀手都感化了。所以古人告诉我们，要从言语、行为、容貌、嗜好等方面注意保持庄重，久而久之，自然会令人肃然起敬。天子就更需要注重这些细节，他的言行是百官和万民的表率。俗话说“君无戏言”，就是要求天子在言语方面要慎重，做到言而有信。

如何避开他人的怨恨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远”是避开的意思。王引之《经义述闻》说：“躬自厚者，躬自责也，因下薄责于人而省责字。”“躬自厚者”，对自己从重责备；“薄责于人”，就是对人从轻责备。这样做，就可以避开他人的怨恨。

在这个世间要做到没有人怨恨是一件很难的事。历史上，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有人怨，这是社会的常情。遇到别人的埋怨、诽谤、诋毁、误解等，需要多多包涵。能责备自己深一点，责备别人薄一点，怨我们的人就会少了。

看一个人是否有德，就看他责备的对象，责备自己就是有德，责备别人便是无德。所以有德和无德从这里就可以分辨出来了。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一位德行高尚的人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来自勉：“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炼了你的心志；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感激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了你应自立；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慧。感激所有让你坚定成就的人。”

“感激伤害你的人”，如果没有伤害过我们，我们可能就像温室里的花，禁不起任何风吹雨打。正是因为有人伤害过我们，所以我们才得以磨炼自己的心志。

“感激欺骗你的人”，如果没有欺骗过我们，我们会以为天下的人都是善良的人。正是因为有人欺骗过我们，才增长了我们的见识，原

来天下不仅有好人，还有这样的恶人，还有这样骗术高超的人。但是重点在于，不要因为别人的欺骗，就丧失了信任别人的能力，更不能因为别人欺骗过我们，我们就转而去欺骗别人。

“感激鞭打你的人”，有人鞭打我们，正好是在帮我们消除业障。

“感激遗弃你的人”，正是因为有人把我们遗弃了，我们才有了自尊、自立、自强的意识，因此学会了自立。

“感激绊倒你的人”，正是因为有人把我们绊倒了，才使我们认识到要增强自己的本领，更加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能力。

“感激斥责你的人”，当有人指着你的鼻子骂你，对你无理取闹的时候，你还能对他保持微笑、保持耐心，这才体现了你有真正的修养。

所以“感激所有让你坚定成就的人”，这是对我们的一种人生劝导，也是一种人生智慧，让我们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顺境比逆境更考验人

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处处是困难挫折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要随着恶的人际关系、恶的环境，但是没有抱怨之心，没有瞋恨之心。这样的话，我们的修养就提高了，而且借着挫折和困难，提升了自己的能力，提升了自己面对挫折的勇气。处顺境的时候，要随着顺缘、顺的人际关系，但是不要生起贪恋之心，如果生起贪恋之心就愚痴了。所以逆境是考验人，顺境也是考验人。在顺境之中淘汰人，其实比逆境更加厉害。面对财色名利等诱惑，你能够如如不动，把持住自己，这才是真正地有定力。如果处顺境、处逆境都能够自在，此人的修养才算初有成就。

在《格言别录》中有这样一句话：“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以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一般的人挑剔别人，看别人的毛病、缺点，都是一目了然、一清二楚，说起来也是头头是道。我们用责备别人、挑剔别人的心，来挑剔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的过

失就很少了；而以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别人，就能够保全交情。一般人犯了过失的时候，都会给自己找个理由开脱一下。所以古入说“律己秋气，待人春风”，就是提醒我们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不是相反。

领导者如果率先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就能够上行而下效。《格言别录》上也说：“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德行浅薄的人，心地刻薄傲慢，见到每一个人都有可憎恶的地方、可挑剔的地方、不如自己的地方。所以他眼睛中所鄙视的人、瞧不起的人就有很多。相反，“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行很深厚的人，心平气和，见到每一个人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值得赞叹的地方、值得肯定的地方。所以他口里所赞叹的人、认可的人就有很多。从这里，我们就能知道，自己是德薄者，还是德盛者了。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六韬》

君主不贤德，这个国家就会陷入危难，人民也会跟着动乱；君主贤圣，国家安定，天下也会得到治理。所以祸福都取决于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天时。

《尸子》记载，舜任用了禹、稷、皋陶等五个人之后，实现了无为而治，天下的民众都以舜为父母。尧就向舜询问治理天下的方法，舜仅仅回答了两个字“事天”。按照自然而然的规律、天道的秩序、自然之道去治理。舜举了一个例子，“平地而注水，水流湿”。就像我们在平地上浇水，水自然而然地就会流向潮湿低洼的地方。“均薪而施火，火从燥”。给木柴

点火，自然会先把那些干燥的木柴点燃。这是“召之类也”，就是感召的原因，自然而然的道理。

所以尸子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尧为善而众美至焉，桀为非而众恶至焉”。尧凭借着自己的美德，感召了许多人成为他的贤良臣子。而桀的品行败坏，所感召的人都是德行有缺失的，甚至奸诈狡猾的人来做他的臣子。这就是《周易》上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领导者是什么样的人，他所感召的属下往往就是什么样的人。《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领导者修身，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君贤圣与否比什么都重要。

君子从政先端正自身

《论语》记载叶公问政的事例。叶公请教孔子怎样处理政务。孔子对“政”下了一个定义：“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的政务就是要使人正。那怎样使人正？做领导的，自己率先做正当的事，率先端正自己，那谁还敢不做正当的事，谁还敢不端正？《论语》还记载了孔子的另一句话：“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领导者如果能够端正自身的话，对于办理政务又有何难处？如果领导者不能端正自身，怎么能够去端正别人？《群书治要·政要论》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若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于野。国无倾君，朝无邪吏，野无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君子从政以端正自身为先，以教育和约束为其次。如果君主能够正身于上，官吏就不敢不正于下；官吏正身于下，庶民就不敢不正于郊野。国家没有不正的君主，朝廷没有不正的官吏，郊野没有不正的庶民，而国政却办理不好，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我们学习西方式管理，发现西方人要管人、管事、管财、管物，而中国式管理，认为把自己管好了，就是最高明的管理。那么是不是只要把自己的身修好了，那些人、事、财、物都不用管，也真的能管理好？《大学》中有句话可以回答：“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有德此有人”，一个领导者，他是一个有德行的、受人尊重的人，自然而然会感召志同道合的有德之人来做他的属下，来到他的身边帮助他。如果一个领导者没有德行，即使有德的人来到身边，最终也会离他而去，因为他留不住人才。

“有人此有土”，“土”，古代指发展农业的基础、资源。我们现在要发展任何事业，都需要有基础条件，如需要人力资源，需要技术，需要各种各样的能力，还需要有执行力，等等。如果一个人有德行，感召了德才兼备的人来到他身边，这些条件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

《群书治要·说苑》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田忌离开齐国，来到楚国，楚王问他：“齐国和楚国经常想互相吞并，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田忌回答：“如果齐国任命眄子做将军，那么楚国只要发动5万士兵，派上将军率领他们，就能够带着齐军将领的首级凯旋。但是如果齐国换了申孺做将军，楚国即使发动了所有的兵士，即使大王您亲自率军出征，也仅仅能够免于不被擒获而已。”

结果，齐国一开始确实是派眄子做将军，于是楚国派了5万士兵，派上将军来率领。果然不出田忌所料，楚军凯旋，带着齐军将领的首级回来了。后来齐王就换了申孺做将军，楚王带上所有的士兵，亲自率兵出征，结果不出田忌所料，楚军大败而归。

楚王回来就问田忌：“先生为什么很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为什么此

战的胜负输赢被您预测得如此准确？”田忌回答：“眄子的为人有一个特点，侮慢轻视贤德的人，又瞧不起不贤德的人，所以无论是贤德的人，还是不贤德的人，都能够在为他所用，不愿意为他出力。但是申孺这个人恰恰相反，申孺对贤德的人很尊重，又怜爱那些不贤德的人，所以无论是贤德的人，还是不贤德的人，都能够为他卖命。这就是我能够事先预料到结果的原因。”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个将军有德行，就能够感召士兵为他全心全意地付出。这些士兵把自己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竭尽全力，队伍才有战斗力，打仗就能够获得胜利。相反，如果一个将军没有德行，还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不能容人，特别是不能够容纳贤德的人，那他带领的军队就很难获得胜利了。

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有土此有财”，意思就是说，资源、条件都具备了，大家众志成城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自然就能够创造财富。当然，这个“财”不一定只是“赚了很多钱”的意思，它还有“事业能够成功”“所办的事能够很顺利”等意思。

“有财此有用”，事业成功之后，譬如我们赚了很多钱，把这些钱用在哪里很重要。有的人事业成功了，赚了很多钱，拿着钱和别人竞奢斗富，比谁的车子更豪华，谁的别墅更大，谁的消费更奢侈。结果不仅自己的事业不能够维持，儿孙看到他这种骄奢淫逸的行为，也会纷纷效法。因此，富不过三代。我们虽然事业成功了，但仍然要保持谦恭有礼、勤俭持家的态度，对自己的欲望要有所节制。在自己的“德日进，过日少”上用功，这样事业才能够蒸蒸日上，才能够可持续发展。《大学》总结：“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也就是这里讲的“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君主有德行，他是圣贤人，就像树有根本一样，自

然能够得到臣下百姓的拥护支持，而枝繁叶茂、事业兴旺发达。

为什么中国人可以自信地说，不用管人、管事、管财、管物，只要把自己管好了，就会获得事业的成功呢？其实，根据就在于这一句话——“境随心转”。“境”包括我们的身体、人际关系、周围环境等，都是我们的心的一种反映，会随着我们的心的变化而转变。如果领导者自己有了德行，不用管这管那，这些事自然都能管好，这是“境随心转”的原因。所以你只要“反求诸己”，把自己的德行努力修好，这些东西不用操心，也自然具足。这也是《大学》中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首先要将自己的德行彰显出来，再帮助别人把他们自身的性德开发出来，从而达到圆满的程度。

第十九讲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这句话是商汤伐夏桀时的告天之辞。《尔雅·释诂》解释为：“朕，我也。”郭璞注：“古者贵贱皆自称朕，至秦世始为天子尊称。”远古时候，无论贵贱都可以自称为“朕”，但到了秦始皇时，“朕”成为天子的独有尊称。

这句话的意思是，商汤说自己有罪，请上天不要牵连万方之民；万方之民有罪，他们的罪责由我一人来承担。这是汤王为我们做了一个“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榜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句心法，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

各自责，天清地宁

为什么中国人遇到事情要“反求诸己”，而不是去挑剔、抱怨、责怪别人呢？第一个原因是“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这句话为我们指出了小到夫妻、家庭之间的冲突，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的根本原因及解决方法。将这一句话真正地做到了、落实了，所有的矛盾冲突就迎刃而解。

《周易》中有两个卦象：一个是泰卦，一个是否卦。我们经常说“否极泰来”，泰卦的卦象是地天泰。天本来是在上的，地应该是在下的，但是在泰卦之中，乾和坤的位置，也就是天和地的位置是互换的，寓意为天地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反省自己的不足，这就是“各自责，天清地宁”，结果就是吉祥安泰。而“否卦”恰恰相反，乾在乾的位置，坤在坤的位置。天地各居本位，要求对方、指责对方、挑剔对方，这就是“各相责，天翻地覆”。

夫妻之间有冲突，就是因为人们不懂得这句话。一个单元楼某层住着两户人家，一家是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而另一家，夫妻相处了二十几年，相敬如宾，感情像陈年老酒一样，愈来愈深厚。

时间长了，经常吵架的夫妻很羡慕对门的夫妻，主动登门拜访求教：“为什么你们两个相处了二十多年，感情像陈年老酒一样愈来愈深厚，而我们家却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呢？”对门夫妻中的女主人回答：“因为我们家都是恶人、都是坏人，而你们家都是好人、都是善人，所以我们家吵不起来，而你们家经常吵架。”这对夫妻一听更不懂了，又问：“你是不是在讽刺我们？我们家都是好人、善人，还经常吵架。你们家都是恶人、坏人，还吵不起来，这是什么道理？”

这个女主人看他们没有听懂，解释道：“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很容易就明白了。如某天，我丈夫要去上班，我很体贴他，给他端了杯水放在桌子上，丈夫穿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这杯水碰洒了。我马上走上来说：‘都是我不会做事，把茶杯放得太靠边了，所以才让你不小心把它碰洒了，都是我的错。’我拿起抹布来收拾残局。丈夫看了很过意不去，说：‘明明就是我的错，是我不小心把它碰洒的，怎么能够怨你呢？还是由我来收拾吧。’我们争夺抹布，一个说‘我来’，另一个说‘还是我来吧’。在这一争一夺之中，我们就体会到夫妻的那种互相体谅、互相承担、互相为对方着想的存心。所以我们的感情能愈来愈浓厚，没有因为这件小事影响了彼

此之间的情义。”

这样的情景如果发生在另一家，结果就完全不同了。丈夫不小心把杯子碰洒了，他就很不高兴，开始生气地斥责说：“你会不会做事？把水杯放得这么靠边，看我把它碰洒了吧。”妻子比丈夫更厉害，她说：“明明就是你的错，你不长眼睛把它碰洒的，怎么能怨我？真是岂有此理！”两个人因为芝麻大的小事，把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不愉快的事都翻了出来，吵着要去离婚。到了办理离婚手续的地方，人家问他们：“你们两个人最初是因为什么事吵起来的？”结果他们都忘了最初吵架的原因是什么了。

古人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各自责”与“各相责”，态度不同，前者使夫妻感情深厚，后者导致夫妻经常吵架。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要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也是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作为一国之君，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也必须有汤王那样的态度。孔子所赞叹的古圣先贤，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都是能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人。《说苑》中记载，尧帝看到有百姓挨饿，他就会自责：“这是我让他们挨饿的。”有百姓穿不暖，他也自责：“这是我让他们受冻的。”有百姓犯罪，他同样自责：“这是我使他们犯罪的。”这就是所谓的“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可见尧的治国之道就是先要宽恕百姓，然后再给他们以良好的伦理、道德、因果、圣贤的教育。

尧帝有一次出去视察，正好碰到两个犯了罪的人被押往监狱。看到自己的两个百姓犯罪，尧帝非常惶恐。他战战兢兢地走上前去问：“你们两个人为什么犯罪，为什么被押往监狱？”这两个人回答：“因为上天久旱不雨，我们没有东西吃，不得已偷了邻居家的粮食，被抓了起来。”尧帝听了马上告诉押解犯人的狱卒：“你们把他们两个放了，把我抓起来。”周围的人感到很惊讶，纷纷说，怎么能把国君抓起来呢？尧帝非常诚恳地说：“因为我犯了两个过失：第一，我是一国之君，我却没有德行，所以才感召了上天

久旱不雨；第二，作为一国之君，应该承担起君、亲、师的责任，应该把百姓教育好。这个责任我却没有尽好，才让他们犯了罪。”尧帝的话让两名罪犯惭愧不已，也令身边的人深受感动，这时，天空中也飘来了乌云，不久便下起了雨。古人感叹“天人感应”“境随心转”，尧帝一念真诚的反省之心，感召了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大旱之后降下了甘霖。

靠至诚心来感化人

中国人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第二个原因是“德未修，感未至”。如果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很长时间了，但是周围的人都没有受到感动，不仅没有感动，反而和我们愈来愈不能相处了，矛盾愈来愈大了，原因一定是在内而不在外，这说明我们的德行修养还不够，还不能够感化周围的人。

汉代有一个叫缪彤的人，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过世了，兄弟四人成了孤儿。缪彤是长兄，从小就担负起照顾弟弟们的责任，和三个弟弟生活在一起。在他的照顾之下，三个弟弟长大成人，而且都娶妻成家。但是这些弟媳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会有许多的矛盾，最后导致分家。

缪彤作为兄长，从小照顾、抚养弟弟，可是弟弟们娶妻之后，还要跟他分家产，不想和他一起生活了。缪彤没有指责自己的弟弟，他关起门来对着上天说：“缪彤，你一生读圣贤书，修养自身，谨慎自己的言行，想用德行改善社会风俗。但是现在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能够被感化，实在是愧对圣贤人。”他边说边痛哭流涕，自己还打自己。

他的弟弟、弟媳发现后，非常惭愧，赶紧推开缪彤的门，跪在地上说：“大哥，您别这样，是我们错了。”缪彤之所以能够感动弟弟、弟媳，就是因为他有真诚的反省之心，而完全没有指责的存心，触动了弟弟、弟媳的良心。后来，大家又团结在一起。所以经营家庭、和谐兄弟姐妹关系，也是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靠至诚之心来感通。

在《八德故事》中许止净先生对缪彤的故事评价道：“天地间，除自责自尽外，更无道理矣。”天地之间的道理、处世的态度，就是能够时时自我反省，事事竭尽全力。事情发生了，首先要问“我的不对在哪里”，就不会意气用事，不会情绪化。人一旦反省自己有不足，就不容易发脾气了。不仅要自我反省，还要尽心尽力想着如何去改善，怎么去付出。时时自我反省、竭尽全力，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对立、冲突和矛盾的产生。天下所有的道理都与“自责自尽”的精神是相应的。

历事炼心

学习传统文化要抓住根本，要抓住“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句心法。但是“念佛参禅似有悟，滚滚红尘又现形”，我们读圣贤书的时候，讲圣贤道理的时候，好像有所悟处，这个道理就明白了。但是在滚滚红尘中与人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这个烦恼习气又现形了，又控制不住了，该怎么发脾气还是怎么发脾气，该怎么生气还是怎么生气。

理可以顿悟，事需要渐修。从逻辑上说，没有任何人可以走进你的内心，那个让你生气的人是谁？其实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才会发怒，所以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历事炼心。我们每一天不仅要做事，还要在事上去炼心。炼清净、平等、正觉心。如果我们因为事情很多，就慌里慌张的，那就会“事勿忙，忙多错”。曾国藩提醒他的子弟：“做事要慢，吃饭要慢，走路要慢。”愈是做着急的事情愈要慢，慢下来才不会出错。愈是人多的时候，愈是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愈要稳住自己的情绪，这样才能够从容应对各种情况，提升自己的定力。

领导者以身作则

治理国家和管理团队、企业、学校的方法都是相通的。团队能不能带好，关键在于领导者是不是具备“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意识。遇到

了问题，看到下属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领导者能马上反省自己，是哪一个地方不够尽心尽力，给下属做了不良的示范，还是忽视了对他们的教育？这里的教育包括对他们的责任心的教育，还有提升他们做事能力的技能教育。领导者能够率先垂范，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并能以身作则，对于团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一些领导遇到问题就喜欢开会，但是开会往往解决不了问题，愈开愈误会。原因就是忘记了古圣先贤的教诲——“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我们想一想开会的内容是什么？可能都是在要求别人怎么做，很少有人能做到反省自己，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做？我哪里做得不足？怎样才能更好地提高效率，取得最佳的效果？如果大家都去指责别人，结果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影响同事之间的关系。

从汤王“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话中，我们体会到办政事的过程，就是使自己成为圣贤的过程，而且唯有圣贤人，才能够真正地把政事办好。有些团队、单位，为什么会出现管理的问题？就是因为最高的领导者还不是圣贤人，如果他是圣贤人的话，一定能够把团队、单位带好、管理好。所以古代的政治称为圣贤政治，整个政治制度就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圣贤君子，以及如何把圣贤君子选拔到领导位置上而设计的。

圣贤以仁义存心

圣贤有什么特点呢？圣贤就是以仁义存心。仁者爱人，仁者无敌，义者循理。唯有以仁义存心的人，才能够想出办法，既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也不伤害对方的利益。中国古人之所以能够协和万邦，形成万国来朝的局面，就是因为圣贤君子们有这种仁爱存心。他们不会采取对立的方式，认为自己要发展，就一定要打败对方，采取竞争、对立、发动战争的方式，他们明白这样做只能使矛盾愈演愈烈而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的文化以仁爱为根本，它不是一种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思维方式。

但是我们一些人放弃了良好的传统，盲目地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念。西方价值观念的核心就是“自我”，而这种“自我”被称为“占有性的自我”，就是把我所拥有的东西，如车子、房子、资产等作为评价一个人价值的标准。

坚定文化自信

现在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些人会觉得传统文化是封建的、落后的，现在重提弘扬传统文化，是不是在走回头路？包括我自己对此也有一个认识转变的过程，因为我们这一代所用的教科书，都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传统的历史、文化，认为儒家文化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阶级利益的精神鸦片，是愚弄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我们都是受这种教育成长起来的。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遇到一位学中国哲学的同学。这位同学说他要写一本书，要为孔子正名。他认为，我们对孔子的批判都是错误的，他要写的这本书，书名就叫《至圣先师——孔子》。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看到很多西方学者、汉学家，写了很多关于“四书五经”的研究论文，但是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往往是从经典出发，能够做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我后来到新加坡去做博士后，有幸参加了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很多讲演，一下子就改变了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走了这么多的弯路，我终于能够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信心。

中国人要坚定文化自信，希望大家多读一读汤因比教授的《未来属于中国》《在未来中生存》等几本著作。

明君治理好国家的原因

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二《管子》

“反”是归还、回的意思，“惧”是警戒、恐惧的意思。贤明的君主有了过错归之于自身，有了善行归功于百姓。有了过错反省自己，自己就会警惕；有了善行归功于百姓，百姓就会喜悦，这是明君能治理好国家的原因。

有过则反之于身

明智的君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里所说的“有过则反之于身”，有了过错就反省自己，归之于自身。

《群书治要·后汉书》中记载，鲁恭在中牟县做县令的时候，以道德教育来治理当地，不用刑罚，结果效果非常好。当时有个叫许伯的人，因为田产的界线问题和人发生了纷争，有关官员将此案拖了很久，也无法判决好。到了鲁恭这里，鲁恭耐心地教育他们，为他们评判是非曲直，结果双方都退堂自责，回去后暂时停下了田耕，互相推让田界了。

有一位亭长，从百姓那里借了一头牛，仗势欺人，不想还给人家了。这个百姓就找到鲁恭，鲁恭把这位亭长叫过来，三令五申地让他把牛还给人家，可是亭长依然不听从。鲁恭叹了一口气说：“这是教化不行的结果。”他就准备辞官不做了。鲁恭认为自己作为县令没有把人教育好，自己不称职。县内的吏员们一起哭着挽留他。亭长看到了，感到很惭愧，就把牛还给了人家，还主动要求到狱中去服罪。鲁恭赦免了他，不再追究。从此以后，无论是官吏，还是百姓，对鲁恭都更加心悦诚服。

建初七年（82年），鲁恭所在的郡发生了螟虫害，严重地危害了庄稼。但是奇怪的是，这些螟虫都没有进入鲁恭所在的中牟县。这件事被当时的河南尹袁安听到了，他觉得很奇怪，就派肥亲到中牟县视察，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鲁恭带着肥亲来到田间，坐在一棵桑树下面休息。正好有一只野鸡飞过来，停在旁边。在野鸡的旁边，还有一些儿童在那儿玩耍。肥亲问：“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去捕捉野鸡？”孩子们回答：“野鸡还要喂养它们的鸡娃，它们的鸡娃需要它们的母亲喂养。”所以他们都不去捕捉野鸡。肥亲听了之后，马上起身告辞：“我到此地的目的，就是想看一看您的政绩到底如何，现在螟虫不侵犯中牟县境，这是第一件让人感觉到奇异的事；教化施及于鸟兽，这是第二件令人感觉到惊异的事；即使连小孩子都有仁爱之心，这是第三件值得奇异的事。我再待在这里，会打扰贤者，浪费您的时间了。”于是，他回到府中，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袁安。

这一年中牟县还生产出双穗的嘉禾，这也是吉祥的景象。袁安上书给皇帝，汇报了这些情况，皇帝对这件事也感到非常惊异。实际上，我们学习了传统文化就知道，这不是什么惊异的事，因为境随心转，天人之间是有感应的，一个有德行的人住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危害，没有什么灾害。

有善则归之于民

“有善则归之于民。”《吕氏春秋》中记载着一则故事：卫灵公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要开挖一个深池，这个时候臣子宛春进谏：“天气这样寒冷还征发徭役，恐怕会伤害到百姓。”卫灵公说：“天气很寒冷吗？”宛春答：“您穿着狐皮大衣，坐着熊皮的垫子，所以您不觉得寒冷。但是老百姓的衣服破了得不到缝补，鞋子有了缺口也得不到修补。您自己感觉不到寒冷，但是百姓却能感到寒冷。”卫灵公说：“你说得太好了。”于是，他

就下令不再派征徭役。

但是这时候就有人来挑拨了，他说：“您开挖深池，不知道天气寒冷，但是宛春知道，由于宛春的劝谏，您才下令不再做这件事，恐怕现在福德都会归到宛春的身上，而怨气都会归到君主您的身上。”中国人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一件好事，被挑拨离间的人一说，就变味了。但是卫灵公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君主，听到这样的谗言并没有采纳。卫灵公说：“你说得不对，宛春不过是鲁国的一个匹夫而已，是我举荐他、任用他的，百姓还没有看到他的能力，也没有看到他的德行。现在让百姓通过这件事看到他的德行和能力，就如同让百姓看到我有善行是一样的，他有善，不就是我有善吗？”《吕氏春秋》评论，通过卫灵公谈论宛春的这句话，我们可以得知，卫灵公明白君主之道，明君是应该具备心量大的风范。卫灵公知道自己任用了臣子，臣子做的功德、做的好事、做的善事就是他自己做的。这就是“有善则归之于民”，这也是一个明君的风范。

第二十讲

行德爱人，厉行节俭



长民治国之本在身

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由是言之，长民治国之本在身。

——《群书治要》卷四十七《政要论》

“罪己”，引咎自责，归罪于己。“勃”，兴起的样子。“罪人”，归罪于人。《左传》中说，夏禹、商汤罪责自己，因此德行、智慧、能力不断提升，自然人心凝聚，他们的国家很快兴盛；夏桀、商纣怪罪别人，因此自身过恶不断增长，人心离散，他们的国家迅速灭亡。由此可见，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于君主自身。

禹有次出门，遇到了被押解的罪人，他下车询问状况后，为之哭泣。左右的人看了大惑不解道：“这是犯罪的人自己不走正路所导致的，君王您何必如此伤心？”禹说：“尧舜时期，人们都以尧舜之心为心，但是到我当了国君，百姓都以各自的私心为心。各自以自私自利的态度处事和待人接物，私心生起来了，我为此感到伤痛。”汤王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正是因为禹、汤这些圣王遇到事情都能够反求诸己，有这种责任意识，所以他们才能够把天下治理好。同样，我们的一个团队、一个企业，领导者遇到了问题，也要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来反省自己：我哪一

地方做得不够尽心尽力？我哪些行为给下属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下属的过失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领导者没有起到君、亲、师的责任。所以领导者是否能够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对于团队、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衰世之主，就是使国家衰落的末世君主，他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恰恰相反。《淮南子》中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夏桀王不关心朝政，放荡没有节制，汤王起兵，把他关在了焦门这个地方。到了这个时候，夏桀还是不能反省自己，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在夏台把汤杀掉。商纣王也是如此，不理朝政，一天到晚饮酒作乐，不关心百姓的疾苦，还制造了炮烙之刑残害百姓。后来，周武王把他困在了宣室。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反省自己的过失，而是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在羑里把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杀掉。这些末代的君主，走上绝路、遇到灾难的时候，还是不能反省自己的过失，而是在怨天尤人。所以是反求诸己，还是遇到事情怪罪别人？这是盛世之主和衰世之主的重要区别。在这里强调“长民治国之本在身”，一个国家没有得到治理，一个团队带不好，原因就在于领导者自身。

《中论》中提出：“故人君苟修其道义，昭其德音，慎其威仪，审其教令，刑无颇类，惠泽播流，百官乐职，万民得所。则贤者仰之如天地，爱之如亲戚，乐之如埙篪，歆之如兰芳，故其归我也，犹决壅导滞，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这句话比喻得很形象，意思是说，如果君主能够修明道义，彰显自己美好的声誉，谨慎自己的言语威仪，审慎地施行教化和政令，刑罚没有偏颇邪僻之处，恩泽广泛地流布，百官都能安于自己的本分，以尽职尽责为乐，万民各得其所、安居乐业。那么，贤德的人敬仰君主，就像敬仰天地一样，爱戴君主就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样，快乐得就像听到了埙篪合奏发出的美妙音乐，愉悦得就像闻到兰草的芬芳。贤德的人纷纷归附，就好像是刚刚开闸了的洪水流向山谷那样顺畅，哪有贤

德之人不来归附的道理？所以根本的问题还在于领导者本身是否具有美好的德行。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雠。”

——《群书治要》卷三十七《孟子》

“腹心”是指肚腹与心脏，是人体重要的器官。“国人”，就是路人、陌生人。“土芥”是指泥土与草芥，比喻为不足爱惜的贱物。“寇雠”指仇敌。

孟子告诫齐宣王说：“君主看待自己的臣属如同自己的手足，臣属看待君主就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属如同犬马，臣属看待君主就如同陌路人；君主看待臣属如同尘土、草芥，臣属看待君主就如同仇敌。”这句话，其实联系到我们现在的企业状况就非常好理解了。“君”就是领导者，“臣”就是被领导者。领导者把被领导者，或者老板把员工看成是自己的手足一样加以关爱，员工对老板的回馈会是什么呢？老板把员工视为家人，员工也会非常感恩、爱护他们的老板，整个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相亲相爱。

好领导的三重责任

古人说，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同时尽到三重责任——“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领导者不仅仅要领导员工、管理员工，还要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关爱他们，做他们的父母、亲人。父母、亲人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呢？当天气寒冷的时候，如果家境贫寒，父母宁愿自己挨冻，也要让儿女穿暖；父母宁愿自己挨饿，也要让儿女吃饱。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应该像父母对儿女一样关心、关爱。除此之外，领导者还要做被领导者的老师，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现在一些父母对儿女有求必应，但是儿女却没有感恩父母之心，反而认为父母的付出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些父母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导儿女，“爱之不以道，适足以害之也”。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当尽到这三重责任，才能把员工带好，把下属带好。

《吕氏春秋》中说：“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君主有德行，能够真心实意地爱人，人民就会亲附其上。人民亲附其上，就都愿意为君主效忠而死。

以心换心，真诚感召

《群书治要》中有这样一个典故，赵简子有两匹白色的骡子，他非常喜欢。阳城胥渠是广门的一个小官，一天夜晚来求见赵简子说：“我是您的臣子胥渠，现在得了病。医生告诉我说，如果能够得到白骡的肝，病就可以治好；如果得不到，就得等死。”禀告的人告诉了赵简子。赵简子说：“杀死一个畜生，可以救活一条人命，这不是仁义之事吗？”于是，他召来了厨师，杀了白骡，将取得的肝脏，送给了阳城胥渠。没过多久，赵国兴兵攻打翟族，这位广门的官吏带着左部700人，右部700人，奋勇登上城池，斩获了敌军将领的首级。这个小官之所以有这样奋勇争先的态度，就是因为他的领导者赵简子能够以仁爱之心对待他。

《中论》中说：“故明主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明智的君主得到贤才，是得到他的心，而不是得到他的身。如果“身在曹营心在汉”，那贤才对君主也没有太多的帮助。所以领导者对待下属，关键要做到用真诚之心来感召，而不是靠权谋等。

春秋战国时，豫让在晋国做智瑶的家臣。智瑶被杀了，豫让费尽心机地要替他报仇。朋友就问他：“以前您也侍奉过范氏，侍奉过中行氏，他们被诸侯灭亡之后，你并不想着去为他们报仇。现在智氏被人灭亡了，为什么你就一定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以前的范氏、中行氏，在我寒冷的时候不给我衣服穿，在我吃不饱的时候也不给我食物吃。他们只是以对待一般读书人的礼节来对待我，那我也是以一般士人的态度来回报对待他们。但是智氏就不一样了，在我吃不饱的时候，他给我食物吃；在我穿不暖的时候，他给我衣服穿；在朝会的时候，他特别地尊敬我。他是以国士的待遇来礼遇我，也就是以礼遇国家最高、最尊贵的读书人的态度来礼遇我，那我也一定要以最尊贵的读书人的态度来回报他，所以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当然，我们学了传统文化，心量要大，“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不要念念不忘与别人之间的仇恨，想着去报复，因为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使像豫让这样被称为国家贤士的人，也都是以君主对待他的态度来选择回报君主的方式。对于一般人而言，就更应如此了，而且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们一定要“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相报”。

尊敬举用贤德的人

《说苑》中有一个故事，也讲了类似的道理。有一次，孔子问弟子宓子贱道：“你治理单父，大家都感觉非常满意。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宓子贱回答说：“我对待百姓的父亲，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对待百姓的儿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同时，我还体恤孤儿，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譬如说有丧事的时候，我都为他们感到哀痛。”孔子听了之后，说道：“你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只做到这些还不够。”

宓子贱接着说：“我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的人有三个，像对待兄长一

样对待的人有五个，我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个。”孔子听后说道：“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的人有三个，可以教导百姓孝了；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的人有五个，可以教导百姓悌了。”“悌”，就是友爱兄长。“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个人，可以教导百姓好学了。”“朋友”，就是“同门曰朋，同志曰友”，那都是可以切磋琢磨道理的人。“但是做到这些还不够，这是中等的善事，只有中等的人会归附你”。

宓子贱听了之后，又说：“在百姓之中，比我贤德的人有5个，我对待他们非常恭敬，他们教会了我治理好国家的方法。”孔子听了之后，赞叹说：“想成就大事的人，秘诀就在于此了。以前尧舜都是非常谦恭地对待臣下，这样才召来了贤德之士帮助他治理国家。所以能够尊敬贤德的人、举用贤德的人，这才是百福的根本、贤明的关键。可惜你治理的地方太小了，如果你治理的地方大，那么你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与尧舜相提并论了。”

宓子贱靠什么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境界，把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其实靠的就是他尊敬比他贤德的人。他没有嫉妒之心，也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他是全心全意地想把单父治理好，于是他特别尊敬贤德的人。贤德的人自然也会竭尽全力地来回报他，这就是尊敬贤者的效果。

《韩诗外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宋燕在齐国做宰相，结果被驱逐了。回来之后，他便召集门尉陈饶等26个人，说：“诸位大夫，有哪些人愿意和我一起去投奔其他的诸侯国？”结果，陈饶等人都伏在地上，没有回答。宋燕说：“唉，太可悲了，为什么士大夫容易获得，但难以使用呢？”陈饶回答：“并不是士大夫容易获得而难以使用，而是您不能够正确地安抚他们。”宋燕说：“您这话怎么讲？”陈饶说：“我给您举几个例子，您给士人的薪俸是三斗的黍稷，他们连养家糊口都不够，您家的鸭子、大雁却有吃不完的粮食，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您家的果园里种满了梨子、栗子，后院的妇女用这些果子互相投掷，士人却从来没有尝过一

颗，这是您的第二个过失。您家的绫罗绸缎华丽地装饰在厅堂之上，随风而破败，士人却不能够用它们做自己衣服的绲边，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钱财是您所轻视的，而生命是士人所重视的。您不能够付出您所轻视的东西，却希望士人能够付出他们所重视的东西，这就好比您想做的是铅刀，铅质做的刀，它的刀质非常柔软、不锋利，却希望它有干将的用途。这不也是很难办到的吗？”“干将”就是古代的名剑，非常锋利。宋燕一听，就知道自己错了。因为他不能够和士人同富贵，没有很重视他们，生活上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供养，人格上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士人怎么可能和他共患难？

君臣一体

《典语》中将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做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良好的君臣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体的关系。“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古代的人把君主称为头脑，把臣子称为腿和胳膊，也就是四肢。这就表明大臣和君主是一体的关系，像头脑和四肢等一样组成了一个身体，谁也离不开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尧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强四支而辅体也，其为己用，岂细也哉？”尧帝能够明了辨别德才兼备的人，并且让德才兼备的人去职守官位。所以强健了四肢，也就能够辅助他的身体，这样对自己的帮助怎么会小呢？“苟非其选，器不虚假。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击身。安则共乐，痛则共忧。”如果一个人不符合选拔的标准，不是合适的人才，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德才兼备的人，那就毫不怀疑地任用他。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体信任他的手一样；臣子侍奉君主，也就像这个手触摸他的身体一样。“安则共乐，痛则同忧”，他们共享安乐，共同患难，确实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韩国的企业把这种君仁臣忠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结果企业员工和老板的关系非常和谐。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家也将中华传统文化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使企业变成了一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从而创造出更高的效益。

节欲中听则民富国安

景公问晏子曰：“富民安众难乎？”对曰：“易。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

——《群书治要》卷三十三《晏子》

齐景公问晏子说：“要想使人民富足安定，困难吗？”晏子回答说：“很容易。君主节制贪欲就会使人民富裕，公正判案就会使百姓安定，做好这两件事就够了。”

现代西方人处理环境问题，他们采取的方式有市场经济调节的方式，有法律调控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最后他们认为必须回到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来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必须改变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老子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就是仁慈。“俭”就是凡事要有节制，不能过分地放纵欲望、过分地奢侈。“不敢为天下先”，处处要谦让、退让、礼让。“俭”，仍然是我们现在能够处理好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

康熙皇帝曾经颁布了16条圣谕来教导百姓，其中一条就是“尚节俭以惜财用”。在这一条中，他尤其强调“开其源尤当节其流”。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去生产，聚集财富，还要懂得节俭，节其流，这样财富才“不可胜用也”，这个财富才用也用不完。

国奢则示之以俭

《礼记》中说：“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孔子谓礼：“与其奢也，宁俭。”如果这个国家奢侈之风盛行，就要教导人们崇尚节俭。如果这个国家太俭朴了，俭朴得有点过分了，就要让人们懂得符合礼的节度，也不能过分地节俭，过分地节俭会给人以吝啬的感觉。特别是有客人、外宾来访的时候，我们要待之以礼。平时我们自己可以很节俭，但是招待客人还是要符合礼的规定，这样才能让客人感受到受尊重，不失礼。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礼节与其搞得太奢华浪费，不如节俭。这是告诉我们节俭是礼的根本。

暴殄天物，必遭天谴

为什么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康熙皇帝的16条圣谕中提到：“暴殄天物则必遭天谴，好蠹民财则必招民怨，纵欲败度，殃祸立至。”对于自然界所生产的物品，不节俭而过分地消耗，结果一定是有灾祸的。领导干部应该要明白这个道理，节俭不仅对国家有益，对自己也有益。

明代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叫张牧之，他们家世世代代都为国家立下功勋，拥有的资产不计其数，他过着连王侯都比不上的奢华骄纵的生活。就连他的婢女都穿着锦衣绣服，奴仆也穿着绮罗，妻妾的穿着用度就更加奢华了。奢华到什么程度？拿绫罗绸缎来缠脚，用帛来做抹布，丝毫不觉得可惜。他家有一个聚景园，春天牡丹花一开，就用各种奇异的景观建成一个5亩大的棚子，用彩丝做绳，聚集了姬妾百余人来歌舞饮酒，还取名为“百花同春会”，姬妾每唱一首歌就获赠绢两匹。

有一位客人看了之后，劝告他说：“过去寇莱公身为宰相的时候，让歌姬陪酒，赏她绫一匹，有识之士讥讽他奢侈，作了一首诗：‘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机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意思是

说，歌姬唱一首歌，就赠给她一束绫，被赠的人还觉得这个馈赠太轻微了。有谁知道，这一匹绫是织女在织窗下拨动了多少次梭子才织成的？寇莱公听了这首诗之后很后悔。而明公您的爵位还不及寇公，用度不应该太过分、太奢华了。”

结果张牧之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莱公是一个穷酸汉，他哪里能和我相提并论？”傲慢已让他听不进良言相劝。到了冬天的时候，他“剪彩绸为花”，将彩色的绸子剪成花，挂在树枝上，待旧了之后再把它换成新的，每年的彩绸费用不可胜计。就这样没过几年，张牧之死后，家里被清算。最后他的妻妾都只能穿着破鞋，向人要一尺一寸的布丝儿，人家都不给她们。这就是“暴殄天物”后而得到的灾殃。

一个人一生的福分是有限的，该吃多少粮食，该有多少花费都是有限的。如果过分地奢侈浪费，就过早地把自己的福分消受掉了。

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譬如，蔡京在执掌国政的时候，他的饮食用度都非常奢侈。他用人乳喂猪，用芝麻喂鹅鸭，用绿豆喂牛羊，还经常用珍珠八宝煎汤做菜，煮沸过几次之后就扔掉，另换新的。每一次宴请客人的一盘菜，就值中等人家一家的全部家产。可是，蔡京还嫌不够美味，还不满足，觉得没有什么可吃的。

上行而下效，蔡京有一个幕僚叫翟谦，士大夫们都称他为云峰先生，他也是浪费无度，与蔡京差不多。有一次，他在年底宴请朝臣，客人约有500多人。厨师端上汤来，有一个客人随便说了一句：“鸭舌做汤，既鲜美又补养。”翟谦看了看左右，微微地示意了一下，他的下人马上心领神会了。没过多久，就为每一个人端上一碗鸭舌汤，每个碗里有三只鸭舌，客人看了之后都惊叹不已。和翟谦关系比较好的一位客人就戏言说：“这还不够，能再添一些吗？”翟谦回答：“既然有心请客，还怕大肚汉吗？”于是，他就派人快快添上，每个人又添了一碗鸭舌汤。这个时候有良心、有同情心的客人都不忍心再吃了，放下了筷子。翟谦这一次请客，因为客

人随便的一句话，就杀了两千多只生灵。后来蔡京被贬、被流放，翟谦的家产也被充公。金人骚扰汴京之后，翟谦到了贫无立锥之地的地步，最后沿街乞讨，饿死在街头。

人应该懂得节制贪欲，安贫乐道，过平淡的生活。因为人在平淡之中，才能够体会到求道的快乐。其实人生可以过得很简单，也可以过得很自在，不是愈有钱才愈幸福。像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我们应该向往和追求的境界。

中国古人知道奢侈既对自身不好，给自己招来灾祸，也对国家不好。所以凡是英明的君主、领导者都是率先垂范、厉行节俭的。

第二十一讲

处尊位而纳谏



英明的君主有三惧

明主者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群书治要》卷四十三《说苑》

“得意”就是顺心如意而有所成就，或引以为自豪。“至言”，指最美善的言论、最合宜的道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英明的君主有三种恐惧：一是身居高位而怕听不到别人谈论他的过失；二是事事称心如意而怕变得骄傲起来；三是听到天下非常有道理的话，而怕不能实行。这三种情形都是一个明智的君主所战兢惕厉的，君主时时要以这三句话来警醒自己。

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

“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处尊位的人，为什么不容易听到自己的过失？因为一个人高高在上，又掌握权势，很多人都会有求于他。这些人大多通过谄媚巴结的方式，让他高兴，从而帮他们做事。《群书治要·韩子》（《韩子》即《韩非子》）中告诉我们，一个明智的君主要能够判别身边的臣子，哪些是忠臣，哪些是奸臣。要任用君子，远离小人，事业才能兴盛发达。

什么样的人是奸臣？《群书治要·韩子》中说：“凡奸臣者，皆欲顺

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这就是奸臣、小人最大的特点。凡是奸臣都是顺着君主心意的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君主或者领导者的宠幸和信任。君主认为好的，他们一定跟着赞叹，也说好；君主认为不好的、所憎恶的，他们也一定跟着诋毁。假如君主身边任用的都是这样的人，事业就不可能兴盛了。这也是提醒君主、领导者要慎用人才，特别要小心这些奸佞之人。因为他们这样做，可能是有所企图，想获得利益。

《群书治要·新序》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齐国有一个田巴先生，他内在的修行非常好，所以声名在外。齐王听说田巴先生很聪明、很有智慧，就召他进朝，问他怎么样为政。这一天，田巴先生穿了一件新做的衣服，把胡须、头发都修饰得很整齐，戴上帽子，束好腰带，打扮一新之后，回过头来问他的宠妾道：“你看，怎么样？”宠妾说：“佼。”意思是美极了、很漂亮。他要出门的时候，又问他的侍从：“你看，怎么样？”他的侍从也说：“佼。”结果他路过淄水的时候，面对着淄水看自己的影子，愈看愈发觉其实自己长得很丑陋。

这件事让他深受触动。他去见齐王的时候，齐王问他应该怎么样为政。他说：“为政最重要的就在于正身，而正身的根本在于左右的群臣，就是大王任用的是哪些人。今天大王要召见臣的时候，臣穿了一件新衣服，把头发、胡须都修整一新，回过头来问我的宠妾，这样的装扮如何？宠妾因为爱臣的缘故，阿谀奉承地说‘很漂亮’。将出门了，又问我的侍从，侍从因为畏惧我的原因，也说‘很漂亮’。后来当我路过淄水的时候，看到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才知道自己实际上很丑陋。现在大王身边的臣子、宠妾，对大王阿谀奉承的人、畏惧大王的人、对大王有所祈求的人，可不止两个。如果大王能够面对淄水，察看自己的过恶，发现有过失，马上就改正，这样齐国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理了。”这个田巴的确很有智慧，早晨要去见齐王之前，发生了这件事，他就借题发挥，以此来劝谏齐

主要任用能够犯颜直谏、指正自己过失的人，远离那些阿谀奉承、谄媚巴结的人。

《后汉书》中总结秦朝灭亡的规律：“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秦朝为什么会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谏诤的人被诛杀，阿谀奉承的人受到赏赐，善言凝结于忠臣的口中说不出来，国家的命令都是出于谗邪之人的口中。

特别是在秦二世的时候，他身边的臣子赵高就是《韩非子》中所说的奸佞之臣。赵高看到秦二世喜欢恣意游乐、放纵自己的情欲，便趁机对他说：“当皇帝之所以尊贵，就是因为他能够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要让人们感觉他像神明一样。只有得到人民的仰望，君主才能够被尊重。我们看神明，神明是只能听说，而不能露面的，所以不能让大臣总是能够见到皇帝，这样才能够显示出皇帝的威严。”秦二世信以为真，此后就不轻易露面了，从而导致赵高专权。秦二世在亡国的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是被赵高蒙蔽了。一个人如果听不进指正自己过失的建议，就会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感激指正自己过失的人

我们在现代社会，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能够真正指正自己过失的人很少。那些能够直言不讳的人，往往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是我们最值得珍惜的人。他们经常直言不讳地指正你的过失，可能让你一听很难接受，但是细细想来，他们所说的话往往是一针见血，非常精辟。所以我们最应该感激谁？最应该感激的不是那些阿谀奉承、谄媚巴结的人，而是那些能够指正自己过失的人。

有一位朋友，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不好，他的妻子批评起他经常没完没了。学了中华传统文化之后，他遇到了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师，他向老师请教应该怎么办。这位老师对他说：“你妻子所说的话，

100句中有没有一句是对的？如果她批评了你100句，有99句都是错的，只要有一句是对的，你能够采纳接受这一句就好了，那99句都可以忽略不计。”从此他就采纳了这个方法。他的妻子一骂他，他就去听哪一句是对的，结果他愈听愈觉得她说得对，愈听愈觉得她指出的全都是自己的缺点，妻子把他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他愈听愈高兴。

又有一次，他的妻子骂了他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他不仅没有生气，还端了一杯水放在桌子上，对他的妻子说：“你休息休息，骂了两个小时也挺累的了。”他从内心感激妻子指正他的过失。这种态度让妻子感到很意外，她问：“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他很诚恳地说：“我确实非常感恩你多年对我的提醒，你所说的话点出了我的缺点，把我的毛病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他用这样一种不对立的、感恩的态度，终于感化了他的妻子。他们不仅没有离婚，而且现在夫妻感情还非常好，家庭和睦幸福。

我们身边有没有像上面这位妻子这样的人呢？我们的父母、妻子、丈夫、兄弟、姐妹、好友，看到我们的缺点就指出来，这是对我们的爱护和关心。他们往往不考虑你能不能接受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他们重视的是能够触动你的心，让你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并有所改正。

赵简子曾经说：“赵厥爱我，尹铎就不爱我。为什么？因为赵厥在向我进谏的时候，一定是在没有旁人的地方，而尹铎在进谏的时候，就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质问我，一定要让我出丑。”尹铎说：“赵厥顾惜的是君主的脸面，怕君主出丑，而不顾惜君主的过失；而臣是顾惜君主的过失，而不顾惜君主的颜面。如果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质问君主，怕君主不会改变。”

我们看了这个故事，不要认为赵简子分不清谁是良臣，谁是可以犯颜直谏的人，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一典故正说明了赵简子的贤德。因为古人说：“人主贤，则人臣之言刻。”如果这个君主非常贤德，他的臣子对他的要求才会非常严厉，对他的批评才非常彻底。赵简子有像尹铎这样能

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斥责他的臣子，恰恰说明了他的胸怀很宽广，能够任用犯颜直谏的人。

以理义督责属下

还有一则关于赵简子的典故。《吕氏春秋》中记载，赵简子把他的臣子栾黡沉到河里面了。为什么？他说：“我曾经喜欢音乐、美色，栾黡就把我这些给我送来了；我曾经喜欢宫室楼台，栾黡就把它给我建设好了；我还曾经喜欢良马和善于驾马的人，栾黡也给我送来了。而我现在喜欢贤士已经六年了，栾黡却没有给我推荐过一个贤人，这是在助长我的过失，减损我的美德。”能够以理督责臣子，就是能够用道义来督察他的臣子，可以说赵简子做到了。能够做到这一点，君主就可以和臣子共同做善事，而不会和他们共同做错事；可以和臣子一起做正直的事，而不会跟他们一起做邪妄的事。

赵简子的这个故事，说明他善于引导臣子去做正当的事。他认为臣子最重要的职责有两个：第一，能够犯颜直谏，指正君主的过失；第二，能够为君主举荐人才。在古代能够做宰相的人，并不是那个最能干的人，而是最不嫉贤妒能的人，他能够把人才任用到合适的位置上。能够给国家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政绩就愈好，愈能受到重用和提拔。

古代还设立了谏官制度，谏官的级别不高，一旦他所谏言的建议被君主采纳了，其官位就会迅速地得到提升。

史官制度对君主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君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由史官秉笔直言。秉笔就是将君主的言行，非常认真地记录下来，不能够文过饰非，这样的史官才能被称为正直的史官。

看了赵简子和栾黡的故事，我也受到了很多启发。我有一位朋友，他经常夸赞我。学了《群书治要》之后，我就告诉他，我要把你沉到河里去。他觉得很奇怪。我说你去看一看赵简子和栾黡的故事就明白了。他看

了这个故事后就变了，会经常给我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看到我有问题及时地指出来。所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己的朋友之所以喜欢夸赞自己，还是因为自己喜欢听这些话。很多问题其实不是出在朋友的身上，而是出在自己的身上。

争做先醒者

《贾子》上记载，梁怀王曾经问贾子，现在把能够得到天地之道的人，称为“先生”，这是为什么？贾子说，“先生”这个名号是一个泛称，大可以称国君，中可以称卿大夫，下可以称一般的平民百姓。如果为其正名的话，它不叫“先生”，而叫“先醒”，也就是说“先生”来自于“先醒”，就是先觉醒。有的君主没有学治国之道，终日茫然，不明得失，不知道治乱存亡的根本原因，每天匆匆忙忙，像喝醉了酒一样。而贤明的君主好学不倦，勤于治国之道而不觉疲倦，所以他很聪慧，较先地（就是比较先于他人地）明白了治国之道。治理国家时，他就知道怎样把国家治理好，国家还没有混乱，他就知道国家混乱的原因；国家还没有安定，他就知道如何使国家安定；国家没有危亡，他就知道国家危亡的根源何在。这样的人称为“先醒”，就是先觉悟、先觉醒。

我们学了《群书治要》之后也会有这样的感触，譬如一个企业，应怎样把它管理好？如何使它发展起来，它倒闭的根源何在？读了《群书治要》之后，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贾子》上接着说“世间的君主，有先醒者，有后醒者，有不醒者”，还分别举了三个例子。

首先是“先醒者”，讲的是楚庄王的故事。楚庄王与晋国交战，大获全胜。楚庄王回来的时候，路过申侯的封地，申侯为他进奉饭食。但是到了中午，楚庄王还没有吃饭，申侯就过来请罪。楚庄王说：“这不是

你的过失，寡人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君主是贤明的君主，又有贤师来辅佐，这样的人可以称王；君主是中等的君主，又有良师来辅佐，可以称霸；君主是下等的君主，而群臣又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这样的人一定会灭亡。’现在我就是下等的君主，而我的群臣之中又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而我也听说过，世间不会缺少贤德的人，天下有贤德的人却不被我所用，像我这样的人活在世上，还吃什么饭？”虽然楚庄王战胜了晋国这样的大国，他的道义能使诸侯顺从，但是他还在想着怎么样得到贤良的人来辅佐自己，到了中午该吃饭的时候，都吃不下饭去。像楚庄王这样的人，可以称为明君，即“先醒者”。

其次是“后醒者”，讲的是宋昭公的故事。宋昭公逃亡到了边境，喟然叹了一口气说：“唉，寡人知道国家灭亡的原因了。自从寡人称王之后，身边侍奉的人有数百人，没有一个人不说寡人是圣明的君主的。在内听不到人们谈论寡人的过失，在外也听不到人们谈论寡人的过失，所以才沦落到今天的地步。寡人今天有这样的困境也是罪有应得。”从此以后，他洗心革面，白天学道，晚上讲道，勤学不厌。两年之后，他的美名远闻，宋人又把他迎回来，使他复国，最后他成为一代贤君。在他死后，人们送给他一个谥号，称为“昭公”。这个例子就是说，宋昭公在失国之后才醒悟到国家灭亡的原因，所以他被称为“后醒者”。

还有一个是“不醒者”。虢国的国君骄纵放逸、自吹自擂、谄媚巴结的人都受到了重用，任人唯亲，犯颜直谏的臣子都被诛杀放逐，致使政治一片混乱，整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服从他了。后来晋国举兵讨伐他，虢君被迫出走。他逃到一个水泽地时说：“我渴了。”他的车夫就给他敬献了一杯清酒。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饿了，想吃饭。”他的车夫又给他敬献了一些肉干、干粮等。虢君感到很高兴，也很奇怪，问道：“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车夫说：“我已经储备很久了。”虢君问：“你为何要储备这些东西？”车夫说：“是为国君逃亡的时候在路上饥渴而准备的。”

虢君问：“你早就知道寡人有逃亡的这一天吗？”车夫说：“我知道。”虢君又问：“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劝谏寡人？”车夫说：“因为国君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话，而厌恶正直的话，如果我劝谏的话，恐怕早就没命了。”虢君听后勃然大怒，于是车夫赶紧谢罪说：“对不起，我的确有些言过其实了。”虢君问他道：“那寡人为什么会逃亡？到底是什么原因？”车夫说：“国君不知道自己之所以逃亡，是因为国君太贤明了。”虢君说：“贤明是可以使人生存的，寡人却落到了逃亡的地步，这是什么原因？”车夫说：“因为天下别的国君都不贤德，只有国君您贤德，所以才会逃亡。”虢君听了之后喜笑颜开，说：“唉，你看，是贤德使我落到了如此困苦的境地！”后来，他走到山中，又困又饿，很疲倦，枕着车夫的腿就睡着了。车夫趁他睡着时把自己的腿撤走，用一个石块替代，自己就离去了。而虢君就饿死在山中，最后被禽兽吃掉了。国家已经灭亡了，还没有醒悟国家灭亡的原因，这样的国君被称为“不醒者”。

这三个故事对比鲜明，告诉我们什么叫“先醒者”“后醒者”“不醒者”。车夫对虢君这样忠心，虢君逃亡的时候跟着他一起逃亡，还为他准备了清酒和干粮，确实是忠心可嘉。在逃亡途中，车夫还想劝谏君主，告诉他为什么如此落魄。君主却不愿意接受劝谏，仍然喜欢听逢迎巴结的话，最后，车夫看他已经不可救药，才不得不离他而去。所以并不是君主的身边没有贤明的臣子，而是君主不够贤明，不愿意闻听自己的过失。只有贤君才能够任用那些能够一心一意辅佐他，可以犯颜直谏、能够给他指正过失的人。

得意而恐骄

春秋时期，孙叔敖做了楚国的令尹，也就是楚国的宰相，不少官吏、百姓都来祝贺。到了最后，却有一个老人穿着丧服来表示哀怜。孙叔敖很谦虚，马上走上去请教道：“楚王不知道我德才不佳，才让我忝居高位。

现在人们都来祝贺，只有您来表示哀悯，有什么道理要告诉我吗？”老人说：“有。你今天身份高贵了，如果对人骄傲，老百姓就会遗弃你；你的官位很高了，如果擅用职权，国君就会舍弃你；你的俸禄很厚重了，如果还不知足（还要贪污受贿），那你的祸患就要来了。”这三句是多好的提醒。当领导者得意了，就容易骄傲起来，所以这位老者提醒孙叔敖不能傲慢、不能擅权、不能贪婪。

孙叔敖听到这里不仅没有生气，还马上对老者讲“敬受命”，恭恭敬敬地接受您的教诲，“愿闻余教”，还请您再接着把道理讲给我听。他有这种受教的态度，这位老者也就愿意再给他更多的教导。老者接着说：“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意思是说，位置愈高，态度愈要谦卑。官位愈来愈高，心思要愈来愈细腻、愈来愈谨慎，怕做错事。俸禄很丰厚了，要更加谨慎，不敢贪取。你能够守住这三点，就能够让楚国大治了。孙叔敖接受了老者的教诲，依教奉行，很快就把楚国治理得很好。

我们考察历史，发现那些凡是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好的君主，确实都能做到得意时愈来愈谨慎小心，愈来愈恭敬谦卑。《韩子》中记载着周文王的故事。周文王讨伐崇国，路过黄凤旧城的时候，他的袜带开了。他左右看了一看，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他系袜带的。周文王就自己把袜带系上了。姜太公看到之后就问：“君王您为什么要自己系袜带？”周文王说：“我听说，上等的君主，与他相处的人都是他的老师；中等的君主，所交往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而下等的君主，所交往的人都是他可以指使的人。我虽然不贤德，但是和我相处的人都是先君的旧臣，没有人可以被我指使、帮我系袜带的。”正是因为周文王谦敬礼让，才使臣下心悦诚服，为武王伐纣灭商奠定了基础。

周公理政，天下归心

周文王这种礼贤下士、尊重臣民的态度，被他的儿子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继承了下来。《史记》中记载，周公的儿子伯禽代周公去鲁地就任的时候，临行之前，周公反复地告诫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当今成王的叔父，对于天下人而言，身份也不低贱了。但是我在洗头发的过程中，还要多次停下来去接见贤才；吃饭的时候，也是因为接待贤士而多次被打断。即使这样谦敬谨慎，我依然害怕失去天下贤德之人。所以你到了鲁国一定要谨慎，不要因为你是国君的原因，就对读书人骄慢、对士人骄慢。我听说，道德品行宽广博大却又坚持恭谨的人才会荣耀；所拥有的土地广阔富饶却又坚持节俭的人才会安乐；高爵厚禄却又坚持谦卑的人才会尊贵；兵员多、武器精良但又保持戒惧的人才会获胜；聪明机智却又保持愚拙姿态的人才会受益；博闻强记却又保持浅陋态度的人才会更加广博。这六种操守，都是谦虚的美德。如果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是不谦虚，就会失去天下、败亡自身。桀、纣就是这样的人，能不谨慎吗？所以《周易》中说：‘有一种处世之道，大可以保住天下，中能够保住国家，小能够保住自身，说的就是谦。’”《周易》中说“谦卦六爻皆吉”，在所有的64卦之中，只有一卦是六爻皆吉的，这一卦就是谦卦。

《说苑》中记载，周公代理天子之位7年，在这7年之间，他以拜师之礼去求见的有10个人，以朋友之礼去求见的有12个人；在那些贫寒之士中，可以优先见到周公的有49人；他举荐提拔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有上百人，受他教导的读书人有上千人，而在驿馆中接待的前来朝见的有上万人。

假设周公因为自己高高在上，而表现出骄慢的态度，天下真正的贤士就很少来见他了，即使有来的，也是贪图财利、尸位素餐之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领导者骄慢吝啬，不可能感召真正的贤才，特别是像诸

葛亮那样“人到无求品自高”的贤才。刘备为了求得诸葛亮这样的贤才，带着礼物，非常恭敬地以见师之礼“三顾茅庐”，诸葛亮才愿意出来帮助他。因此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遗余力地帮助刘备治理国家，竭忠尽智。

像孔子这样的人，为了文化的传承，不惜放低自己的身段，去周游列国，四处奔波，始终为了人文正义而奔走呼号。这是圣人的作为，因为他没有自己，只是想着文化的传承、想着天下的太平。而且即使他终身没有受到明君的重用，也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怨天尤人的情绪，像《论语》开篇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虽然他有德行、有能力，但是别人都不理解他。当然，圣人心中不觉得自己有德行、有能力，虽然他的心胸不被人所了解，他的做法也不被人所理解，但是他没有任何怨怒的表现。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文化能够得到传承，仁爱的学说可以得到发扬，能够为国君所用，使国家治理好，天下太平，解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第二十二讲

力行至言，应对反常



孝是中华文化的根，敬是中华文化的本

刘向说：“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看到这句话，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时间比较长的人应该非常有感触。我们知道，孝是中华文化的根，敬是中华文化的本。想一想，我们的孝敬之心做得怎么样？是不是真正落实了？真正感恩自己的父母，就应知道天下的父母都不容易。而天下人也都是他们的父母所生养的，都需要关爱。所谓“爱亲者不敢恶于人”，一个真正孝敬自己父母的人，将孝道尽到了极致，就不会厌恶他人。真正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也就能够尊敬天下人的父母，对天下的父母所生养的儿女也就自然尊敬，正所谓“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哪还有什么傲慢之心？对任何一个人都恭敬有礼，这样做的结果是“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真正落实了孝敬之心的人，就没有自己恨的人，没有自己不能原谅的人，没有自己不爱的人，这样孝道就做到了圆满。家和万事兴，要养父母之身，更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那应该怎样养父母之心？《弟子规》中说：“兄弟睦，孝在中。”因为他的兄弟姐妹很多，都能够扶持他，如果兄弟之间能够相亲相爱、守望相助，父母就会很安慰，不会担心儿女中比较弱的，或者是地位比较差的那一个了。

同样道理，在一个师门之中，师兄弟像兄弟姐妹一样，应该互相关照、互相帮助、互相提携，真正能够做到“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

失，如己之失”。看到师兄弟们取得了成就，学问精进、学业有成，就像自己有成就、有收获一样高兴。我们想一想，对自己的兄弟姐妹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对同门的师兄弟也就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才克服了一个人的嫉妒之心。靠什么克服的？靠的是孝心。我们看一个家庭能不能兴旺，看一个团队能不能兴旺，就看它内部的人际关系如何，是不是“家和”，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夸赞，还是自赞毁他。

做人要厚道

做人要厚道，而厚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隐恶扬善，尽力地去宣扬别人做得好的地方，而对于别人做得不好的地方，要隐藏不说。譬如，《德育课本·悌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兄弟两个，弟弟叫周文灿，奉养着哥哥。他的哥哥生活没有着落，还特别喜欢喝酒。有一次哥哥喝醉酒之后，就把弟弟痛打了一顿。结果邻居都看不下去了，为周文灿打抱不平，批评他的哥哥。弟弟却对大家讲：“我哥哥又没有打你们，你们不要骂我哥哥。我哥哥很好，请你们不要离间我们兄弟俩。”之后，兄弟俩之间的感情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丝毫影响。

我们看一个人，人心厚道与否，古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借鉴、很多的观人之法。譬如，《格言联璧》中有这样一句话：“论人之非，当原其心，不可徒泥其迹。”论人之非，就是当我们谈论一个人做了错事的时候，甚至是做了恶事的时候，不要就他的行为而谈他的行为，应该追究产生这种行为的原因。当找到原因的时候，我们就会生起怜悯心、慈悲心、帮助他的心、提升他的心，所以“不可徒泥其迹”，不可以只是看到他的行迹，就行为论行为。

有一位老师在讲《弟子规》的时候，经常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孩子还没有成年，做出了很多悖逆社会的行为。譬如，看到豪车停在路

边，他不认识车子的主人，就拿着刀子在车子上面划两道，破坏了车子。如果我们是这个车子的主人，看到爱车被划，第一反应是什么？可能是火冒三丈，怎么会有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人呢？恨不得立刻把这个孩子绳之以法。

我们想一想，这个孩子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恶事？原来早年他的父母离异，父亲另娶了一个太太，成立了新家；母亲也再婚，他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个世间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他对人的态度就是对立的、冷漠的，所以做出了一些悖逆社会的行为。

我们再想一想，一般的父母亲对自己的儿女是怎么做的？会想方设法地关心呵护他、帮助他成长。譬如，听说《弟子规》不错，就送孩子去参加《弟子规》学习班的学习，听说哪个方法可以迅速地提高学习成绩，他们可能不惜重金也要送孩子去学习，对自己的孩子是这样呵护有加。反过来想想这个孩子，和我们自己的孩子相比，是不是十分可怜？我们得知了他的可怜之处，同情心、慈悲心、帮助他的心就生起来了，对立的心就淡化了。

再如，有很多人特别喜欢挑剔。其实喜欢挑剔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是通过挑剔来显示自己的权威，掩盖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其实还是源自于内心深深的不自信，来自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当别人批评我们、挑剔我们时，我们就不会跟他对立，反而能够体谅他，也知道他这种不安全感的来源。我们要想方设法地消除他的不安全感，不要让我们的存在给人家造成威胁。这就是“论人之非，当原其心，不可徒泥其迹”。

另外一点，“取人之善，当据其迹，不必深究其心”。当我们论一个人做了善事的时候，恰恰就事论事，他做这件善事已经很难得了，不要再去追究他做这件善事的居心、动机何在了。譬如，中国有很多富人捐钱资

助贫苦、资助教育，但是有人议论纷纷，说他们做这件事是为了出名、求利，等等。其实，人往往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看别人做事，往往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的，这样会看错了，这也就起不到鼓励人们去做善事的作用。善事没有人做了，这个社会还有好的风气吗？所以古人提倡不要就事论事，不论一身而论天下，不论这件事现在的影响，而是要看看它对未来的影响，有没有流弊。

再如，我们讲“仁爱之心”，“仁”从人，从二，是两个人相处之道，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对方。要“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任何事情我们让别人做之前，首先要扪心自问，自己不愿意做的，是不是强加给别人了。如果自己不愿意别人以这样的态度对我们，我们就不能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把这称为“行仁之方”，就是行仁的方法。这句话看似很简单，如果我们凡事都按着这个原则去取舍，看一看这件事应不应该做，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耶？使民疾耶？宫室荣耶？女谒盛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

——《群书治要》卷二十二《后汉书二》

“谒”是告的意思，“女谒”就是女子的进言，这里引申为宫中宠妃的进言。“苞苴”是礼物的意思，这里引申为贿赂，古人行贿都是用草苇把礼品包裹起来，以作包装掩饰之用。“谗夫”就是进谗言的人。“昌”通“猖”，就是肆意妄为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前成汤在社会遭遇旱灾的时候，便以六件事情自责：治理政事符合法度吗？役使百姓过度了吗？宫室是不是太奢华了？

宠妃进言干预朝政了吗？贿赂盛行了吗？进谗言的人太猖狂了吗？

成汤为什么要从这几个方面来反省自己？自然灾害和君主的德行、时政的得失有关系吗？这是不是迷信？实际上，我们通过历史可以发现，盛世的皇帝在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时，或者天象有异常时，无一不反省自己。

譬如汉文帝，他就是一个“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典型。公元前178年出现了日食，汉文帝就下诏书，写道：“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在这里，汉文帝把出现日食的原因，归咎于自己没有德行。实际上，在古人看来，天人之间有一种自然感应的关系。天象的变化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和人事的得失、施政的得失有密切的联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自然环境及其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因此，通过观察自然环境的变化，就能够知道人事的兴衰变化、人心的善恶。

《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天象，包括恒星、行星、彗星、云气、日食、月食，等等。这个天象就是自然界变化的现象。古人通过观察天文，发现自然现象的转变与人文的变化密切相关。

唐朝李淳风在《乾坤变异录·天部占》中写道：“天道真纯，与善为邻。夫行事善，上契天情，则降吉利，赏人之善故也……行其不善之事，则天变灾弥，日月薄蚀，云气不祥，风雨不时，致之水旱，显其凶德，以示于人。”观天象的目的，就是要知道人事的吉凶。古代帝王通过观天象、观自然灾害的变化，能够得知天象所预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变化。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天文机构是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周礼》的官制对这方面有详细的记载。在此之后尽管出现朝代更迭、外

族统治，但太史令的官职没有太多的变化。

《群书治要·汉书》中就载有董仲舒向皇帝的进言：“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国家即将失道或者衰败的时候，上天就先出现灾害来警示这个国家，特别是要警示这个国家的君主；如果还不能自我反省，又会出现怪异现象对他加以警告而使其害怕；如果还不知改变，那么伤害和摧残就会到来。由此可见，上天之心是爱人君的，而且想阻止其胡作非为。如果不是太过无道的朝代，上天都想扶持，并且使他的国家得以安定，事情就在于自强自勉罢了。奋发努力钻研学问，见闻就会广博而才智更加高明；努力行道，德政就会一天天兴起而大有功绩，这些都是可以迅速做到而且会立刻见效的方法。人君没有不想使其国家安稳存在而厌恶危亡的，可是政治混乱、国家危急的为数还是很多，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所遵从的也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如果所用的都是奸佞之臣，危害百姓，就会导致阴阳失和，灾祸也就可能发生了。如果不是按照古圣先贤的治国之道来治国理政，这个国家必然治理不好。

《汉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暮春的一天，丞相丙吉外出，遇见有人打架斗殴，路边躺着死伤的人。车夫看到这种情景，就把马车停了下来，他想丞相一定会派人了解斗殴的情况，然后再加以处理的。丙吉却不闻不问，好像没有看见一样，挥挥手让车夫继续前行。随从感到奇怪，毕竟人命关天，丞相看到人死在路上了，却不闻不问。

马车继续前行，刚出城，丙吉看到一个农夫正赶着一头牛往前走，

这头牛一边走一边喘气，还不时地把舌头吐出来。丙吉看到这种情形，马上让车夫把车停下来，并且对一个随从说：“你快去问一问那个农夫，他赶着这头牛走了多少里路了？为什么牛会喘气不止？”

随从对丙吉的行为很不理解，他问：“大人对刚才人命关天的事视而不见，现在看到一头牛吐舌喘气却停下车来询问，这是不是有点重畜轻人，不够妥当？”

丙吉听了之后回答：“你错了，市民斗殴伤人，这应该由地方官去处理。丞相的职责是考核这些地方官的政绩，到年终的时候，奏请皇上进行赏罚。作为丞相，没有必要事事都亲自过问，而应该关心国家大事，所以我没有停下车来去管那些打架斗殴之类的事情。”

随从又问：“那大人为什么如此关心这头牛？”丙吉说：“至于这头牛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还是春天，按理说天气还不太热，我看这头牛却热得吐舌喘气。如果说走了很远的路，也就不奇怪了，如果并没有走很远的路，而是因为天太热而导致牛吐舌喘气，那就说明今年的气节不正常。如果没有预备，恐怕会造成严重的伤害。三公的职责是什么？就是调和阴阳。这头牛在暮春的时候，没有走很远的路就热得喘气，这说明阴阳失调，与时节不符，关系到国家的大事，这才是丞相应该关心的事，所以我要停下来了解情况。”随从这才明白过来，非常佩服丞相知大节、识大体。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启示：其一，从领导艺术方面来讲，强调领导要知人善任，而不是事必躬亲；其二，用人用得很得当，自身就会很安逸，而不会劳苦奔波。《尸子》中讲：“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逸。”如果能够任用贤德之士，这个人既有德行又有能力，领导者自身就会很安乐，好的名声也自然跟随而来，事情少而功绩多，国家就得到了治理。

《说苑》中记载着孔子的两个弟子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孔

子的弟子子贱在治理单父的时候，很悠闲地弹着琴，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公堂，结果单父就得到了治理。而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巫马期，同样也治理过单父，但是他是披星戴月，事必躬亲，忙碌得不能安居，不过结果还好，单父也得到了治理。巫马期这个人很聪明，他问子贱：“为什么你能够弹着琴，很安逸地就把单父治理好了？”子贱回答：“我的做法是‘任人’，就是任用贤人；而你的做法是‘任力’，靠的是出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逸也”，出力的人肯定会劳苦奔波，任用贤德的人，当然自身就会很安逸，而且国家也能够治理好。

子贱属于后者，他能够知人善任，所以四肢安逸、耳目不劳、平心静气，就把事情全都处理好了。巫马期却不然，他付出了自己的休息时间，辛苦地亲自去教诲百姓，虽然单父也得到了治理，但是并没有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

最高的治理境界是无为而治，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领导者有德行，不嫉贤妒能；第二，他能够认人、识人、知人善任。他任用的人都得心应手，属下都把事情做好了，自己就会很安逸。所以信任贤德的人，对他们委以重任，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吕氏春秋》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古代那些会做国君的人，致力于选拔任用人才，而不去做应该是臣下做的事，这就是抓住了根本。而不会做国君的人，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结果还是治理不好国家，这就是因为没有抓住根本。

做国君如此，做领导也是如此。简单地说，要当领导者，他要能够“将将”，而不是“将兵”。“将将”就是管好几个他手下的主管，而不是直接去管那些兵，不是事必躬亲。

对做人而言，事必躬亲是一个优点，但是对领导而言，事必躬亲往往会导致很多弊端。道理很简单，如果你什么事都亲自过问，实际上是越俎代庖，那还要手下的人干什么呢？事必躬亲最大的危害就在于，你的下

级会感到不被信任，也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还会使你的下级的下级不听他们上级的话，而直接亲附于你。这样就造成了职责不明、政令不通、人际纠葛不清，甚至会产生矛盾。我们讲科层制，它是一层一层的，领导者是管着下面那几个主管的人而不是直接管理最基层的人。

所以丙吉问牛不问人，正是他知大节、识大体的表现。诸葛亮在晚年的時候，“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他的对手司马懿就曾不以为然地说：“食少事烦，岂能长久？”诸葛亮吃得很少，做的事情又很繁多，这样怎么能够保持长久？诸葛亮经常亲自考核文书簿册，他的属下杨颙，就直言规劝他说：“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杨颙说道：“治理国家要有分别，上级官员和下级官员的职责不能相互混淆。以一家之主来比喻：现今有一个人在这里，派遣奴隶执行耕种，让婢女负责烧火煮饭，公鸡负责早上报时，狗负责在盗贼出现时叫唤，牛负重耕犁，马载人长途跋涉，这些事情没有一件耽误的，所需要的都很充足，生活舒缓、无忧，主人需要做的就是吃饭、饮食而已。突然有一天，他想要亲自去做这些事，不再把这些事情交给别人去做，结果为这些琐碎的事务耗费自己的体力，使身体疲劳、精神困顿，最终一件事情也没有做好。难道他的智力不如奴隶、婢女、公鸡和犬吗？并非如此，而是因为他违背了作为一家之主的原则。古人称，坐着谈论道理的人为三公，起身去做事的人为卿大夫。丙吉不去理会路上因斗殴致伤的人，而担心牛因天热而喘气；陈平不会回答关于国家赋税的问题，自然会有人负责回答。他们这才是十分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如今你治理国家，还要亲自考核文书簿册，整天辛苦流汗，不也是十分辛劳吗？”诸葛亮对此表示非常感谢。

诸葛亮的忠心可嘉，他也有他的难处。他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意思是，我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受先帝的嘱托，责任重大，先帝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让我全心全力地去扶持他，我担心别人做这些事没有我尽心尽力。

诸葛亮的忠心确实让人佩服，但是他也因此过度劳累。这就是“丙吉问牛不问人”给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懂得知人善任，把自己繁多的工作分给属下去做，不必事必躬亲，为琐事缠身，要把时间留出来做更重要的事情。

当然，“丙吉问牛不问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与天人感应、阴阳失调的问题有关系。《幼学琼林》中讲：“丙吉问牛，恐阴阳之失时。”作为丞相，丙吉负有调和阴阳的责任，看到牛在初春的时候喘气，他就知道阴阳失调了，恐对国家发展产生严重伤害。

《孔子家语》记载，鲁哀公问孔子说：“一个国家的存亡祸福，确实是由上天注定，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吗？”

孔子回答：“存亡祸福，全在于人自己罢了。天时的反常现象、地上的怪异事物，是不能施加存亡祸福的。”他还举了两个例子，从前殷商的君主帝辛，也就是商纣王在位的时候，一只雀在城墙脚生了一只大鸟，这是一种吉祥的表现。商纣王认为有鸟雀的大德相助，便不整治国家政事，殷朝因此灭亡。这就是君主违背天时，将福祉转为灾祸的例子。

而商纣的先祖太戊在位的时候，政事衰败、法规不正，以致出现了灾异。桑谷共生于朝堂，七天就长得比一拱还粗大。太戊看了这种怪异的现象，惊恐万状，忧惧不安地修养自己的品行。结果三年之后，远方的小国都仰慕他的仁义。由于语言不通，要经过几层翻译来谒见的，就有16个国家。这就是君主违背天意，将灾祸转化为福祉的实例。

孔子得出结论，天降的反常现象与地上的怪异事情，都是用以警戒君主的；睡梦中的怪异征兆，都是用以警告臣民的。反常和怪异之事不能战胜良善的政治，梦中的怪异不能战胜良善的作为。如果能够知道这个道理，天下就能达到大治了，只有世上最贤明的君主才能做到这一点。

古代那些贤德的帝王、贤明的君主，看到天降的反常现象的时候，都反省自己，斋戒沐浴，检查自己的政事有什么样的过失。

《全唐文》中记载，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曾经上了一篇题为“贺太阳不亏状”的奏章。他提到，当时预测的日食没有发生，“臣伏以日月之行，值交必蚀，算数先定，理无推移。今朔之辰，应蚀不蚀。陛下闻日有变，斋戒精诚，外宽政刑，内广仁惠，圣德日慎，灾祥自弭”。由于陛下听说有日食，精诚地斋戒，对外使刑罚宽松，对内认真修养仁惠的品德，一天比一天谨慎自己的德行，这些灾祸的预兆自然就消除了。

这些论述，西方人很难理解，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四中写道：“古希腊的天文学家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他们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没有固定的关系。中国的天文学家则不然，他们和至尊的天子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政府官员之一，是依照礼仪供养在宫廷之内的。”对于不能够明了天人之间相互感应关系的西方人看来，这确实是很难理解的。

当然我们要明白，要使人心变善，还是要“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通过伦理道德教育，使人转恶为善，让每一个人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

第二十三讲

教学为先，至诚感通



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上”，指上位的为政者；“哀矜”，就是哀怜体恤。

曾子的弟子阳肤，要去任典狱官，在上任之前向曾子请教，怎样才能够胜任职责。曾子说了这句话：“在上位的人失去为政之道，民心离散已久。如果掌握了百姓犯罪的实情，就应该哀怜体恤他们，而不要为自己的办案能力沾沾自喜。”

曾子说的这一番话，是出于一片仁恕之心，最为可贵。他明了人与他人之间是一体的关系，所以他有同情心。看到别人痛苦，自己也痛苦，确实做到了“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当看到有人犯罪，人们要发自内心地表示哀伤。

国内有一些人受西方观念的影响，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对立的。他们认为，老板与员工是对立的，犯人和警察也是对立的。事实上，通过感化的方式来帮助人，反而能起到更好的效果，缓解人与人紧张对立关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看一个故事——“母亲的借据”。

母亲在中学教政治，爱教训人，爱板着脸讲大道理，不仅学生怕她

念紧箍咒，连家长也怵她。

15年前的一天，我和母亲从亲戚家借了钱后回家，为了省下坐车的钱，选择走小路。我们急匆匆地走着，谁都不说一句话。在过一个小桥时，我右脚上的鞋子掉了下来。借着穿鞋的工夫，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天已全黑，耳边再次响起亲戚的话：“年底治安乱，今晚别赶回去了。”但母亲谢绝了亲戚的好意，借到钱，我们很高兴地从亲戚家出来。母亲笑着说：“想吃巧克力吗？我明天给你姐俩称半斤。”

那件事发生时，我们离家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一声凶巴巴的“站住，别动”，两个男人像山一样堵住了我们的路。我哆哆嗦嗦地拽着母亲的手，母亲捏捏我的手心，轻轻说：“不怕，有妈妈。”

那两个男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棍子，夜色中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表情，我想他们脸上肯定杀气腾腾。我知道我们应该跑，可我也清楚，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无论如何都跑不过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我急得要命，母亲却低头望了望我。她神色平静，面色从容。

可怕的沉默之后，右边的男人说话了：“我只想要钱。”他似乎并不比我们感到轻松，我捕捉到他声音里的颤抖。母亲没吭声，男人继续说道：“我们真不想伤害你们，我们也没办法，辛辛苦苦打工一年，老板带钱跑了，我们必须拿钱回家过年，你们城里人好歹比我们容易些。”说话的人语气倒老实，可他的棍子凶神恶煞般地戳在那里。我很清楚，此时稍有不慎，我们就会受到伤害。

对峙片刻，母亲忽然叹着气，从口袋里拿出蓝色手绢，手绢里包的是刚刚借来的两百块钱。我记得那是四张崭新的票子，每张面额五十元。男人看到钱，自然地伸出空着的手。

“慢，”母亲把钱往怀里一缩，她说，“这钱不能让你们抢走”。那人手停在半空。母亲说：“如果今天你抢了我的钱，不管数额多少，你们都是犯了罪的。我知道你们有难言之隐，可法律不管那么多。不光法律会

判你们的罪，就是你们自己内心深处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犯的罪。”这个时候母亲竟讲起课来，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但她仍然不慌不忙地说：“我现在写张借条，不管你们多久还钱，五年也好，十年、二十年也好，甚至你们没钱还也好，只要记住今天你们没有抢，而是借我的钱。我希望你们以后也不要抢别人的钱。”

说完话，母亲从口袋里摸出纸笔，在黑暗中凭感觉写了张借据，她把钱和借据一起放在那个人的手里，说：“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至于你们的名字，回去后自己填吧。”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歹徒也感到惊愕。他们愣了片刻，互相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拿上钱和借据跑了。

余下的路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失望极了，母亲居然向两个手拿棍棒的劫匪，写下世间最愚蠢的借据。那个春节，尽管母亲还是给我们买了巧克力，可是我心里依旧很难过。关于那张愚蠢的借据，我始终无法释怀，我想这绝对不是母亲平日所说的勇敢。

两年后的一天，母亲从学校下班回家，她手里拿着一张汇款单，上面的数额是1000元，汇款人的名字却是陌生的，附言栏上这样写着：“谢谢您，没让我们走错路。”曾经被我认为非常愚蠢的、那张母亲写下的借据，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他们听了母亲的劝告，感到很惭愧，虽然在窘迫之下拿走了母亲的钱，但是等到他们有钱了会加倍偿还母亲的钱。

《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格言别录》中说：“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激之则君子可使为小人。”引起一个人的忏悔，即使这个人原本是小人，他也可以变成高尚的君子，做出高尚的事；相反，如果把他的坏事公之于众，这样就激怒了他，即使这个人是君子，他也可能变为小人。而这位母亲所用的就是“愧之”的方法，让两位歹徒感到惭愧，结果使小人变成了君子。

这位母亲特别难得，难得之处在于她有仁爱之心，即使遭到别人抢

劫，她都没有对歹徒生起对立之心。正是她拥有这种仁爱之心，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最后才改变了两个歹徒的命运。这位令人敬佩的母亲，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教育老师了。面对歹徒，她是那么镇定、仁慈和智慧，她救两人于罪恶之门，并感化他们悔过向善，实在是功德无量！

古人说：“公门好积德。”作为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如果都能以曾子的这番话存心、办案，对待服刑人员，不是带着对立的心、鄙视的心，而是怀着同情心去救助他们，相信我们的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好。

明朝时期，浙江宁波人杨自惩在县政府里当差，他心地厚道，奉公守法。有一次，县令严肃审讯一个囚犯，问他要口供。罪犯不说实话，还狡辩。县令就发脾气了，给这个囚犯用重刑，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可是怒气还是没有止息。杨自惩看到这种情形，马上跪下来替囚犯求情。县令说：“这个囚犯触犯法律，悖德悖理，叫人看了怎么能不生气？”

这个时候杨自惩就引用了曾子的这句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地方官员主持县政，没有把政治和教育办好，这叫失道，也就是说，没有能够尽到君、亲、师的本分，没有真正爱护老百姓。百姓犯罪了，是因为地方官员没有把他们教育好。地方官员如果知道了百姓犯罪的原因、动机，就要同情他们、哀悯他们，不能因为破了案而感到欢喜，而应想到这是由于自己没有尽到责任造成的。破案尚且不可欢喜，又怎么可以发怒？一经提醒，县令马上觉悟了，于是就息怒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杨自惩很有智慧和德行。所以他在“公门好积德”，能多行善事。

杨自惩家里很贫穷，他只是县政府里的一个小职员，但他不接受人家送礼，尤其是犯法的囚犯。他秉公处理案件，从不接受贿赂，十分清廉。

尽管杨自惩家境贫寒，却经常接济那些吃不上饭的囚犯。从前囚犯

在押解的路上常常没东西吃，杨自惩总是设法救济他们。有一次，新来的几个囚犯没有东西吃，很可怜。可是杨自惩家里的米也不多了。于是杨自惩就和妻子商量怎么解决这件事。妻子问：“囚犯从哪里来？”他说：“从杭州来。”囚犯戴着刑具、手铐脚镣，饿着肚子从杭州走到宁波，要好几天时间，很辛苦，很可怜。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用所剩不多的米煮粥，自己少吃一点，分出一半给囚犯。

杨自惩对囚犯的仁爱之心，被后人所称赞。

不教而杀谓之虐

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听”是裁决、断定的意思，“狱”就是诉讼案件，“不辜”就是无罪之人。这句话意思是说，在上位者偏离了为政之道，而诛杀下面的臣民，这是不合理的。不用孝道教化人民，使他们明理，而他们一旦犯错，就定他们的罪行，这是杀害无辜。

这句话出自一个典故。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的时候（大司寇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局局长），有父子两个人因为争讼来告状，孔子把这对父子关在了同一间牢狱，三个月也没有审判。后来，父亲提出撤诉，孔子就把他们释放了，没有再追究。鲁国的大夫季孙听了这件事情，很不高兴地说：“我曾经听您说过，孝是治国的根本。现在杀一个不孝之人可以警诫全国的百姓都行孝，您不把这个不孝之子杀掉，反而把他放了，这是什么原因？”孔子说：“在上位者没有教导人们走正道、行孝悌，结果下属、百姓犯了罪，就把他们杀掉，这不符合情理。不教导民众要有孝心，而用这个‘孝’的

标准来审判官司，一有人犯错，做不孝的事，就定他们的罪行，这是杀害无辜。”

我们从小到大，很少学过如何孝敬父母，而现在“孝”确实很少有人教了。过去孩子和父母、祖父母都住在一起，他们从父母如何对待祖父母的身教上，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如何对待父母、如何孝顺。我们现在一般都是三口之家，不和祖父母住在一起了。偶尔星期天回到祖父母家里去看一看，老人要提前好几天为迎接儿孙的到来做准备。儿孙来了之后，吃好的，喝好的，吃完之后杯盘狼藉。老人收拾起来，累得腰酸背疼。小孩子没有从自己父母身上学到如何孝顺祖父母，也没有人教育他如何孝顺父母，结果孩子就不懂得如何孝顺。

上行下效，至诚感通

对传统文化教育的信心是成功的关键。肯定人性本来的良善，是传统文化教育的起点和基础。人确实是可以通过圣贤教育教好的。所以中国古人一直秉持“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这也是传统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所秉持的信念。

就道德教育而论，上行下效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说到“教”，确实不是言教，而是身教。《晏子》中记载，齐景公向晏子请教道：“明王之教民何若？”圣明的君主是怎么样教导人民的？晏子说：“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养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于下者，不务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下从其教也。”意思是说，首先要使教育明确，法令也明确，君主要率先垂范，对待人民不能很苛虐，要用刑罚来防止他们作奸犯科。要求臣民做到的，君主必须首先做到；禁止人民做的，自己也一定不能做。这样，臣民才能够服从君主的教诲。所以领导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是教育成功的根本所在。

贞观初年，有人上疏唐太宗，希望朝廷能够罢免一些佞臣。唐太宗看了之后说：“朕所任用的都是贤者，你觉得谁不是贤者？”这个臣子说：“微臣从小在乡间长大，目前也判断不出谁是贤德的人，谁是奸佞的人，但是可以请陛下有一天故意装作很生气，然后讲一些不正确的话，看看有没有人敢不惧怕陛下的雷霆之怒，对陛下犯颜直谏，这样的人就是正直之人。假如陛下很生气，讲的话不正确，还有人奉承陛下，那这个人就是佞臣。陛下通过这个方法就能看出谁是奸佞之人。”

我们看唐太宗是怎样应对他的。唐太宗对当时的大臣封德彝说：“流水的清和浊就在它的源头，君主是政治清明的源头，臣子、百姓就像流水一样。现在朕这个君主，要先用诈术，那不是故意演戏吗？故意演戏，朕当君主的已经不正直了，还要测出臣子的正直，有没有这个道理？这就好比源头是污浊的，还希望流水是清澈的，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唐太宗很有正气，能够明辨是非。假如我们没有看到后面唐太宗的这些话，也许会认为这个臣子提出的方法挺不错。

唐太宗还讲到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譬如魏武帝，也就是曹操。唐太宗看了曹操的一些历史，觉得他诡计太多，很不认同他的做法，觉得上位者，作为一个国君，这样做事情很难教化百姓。曹操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个就不能学。当然，唐太宗也是很讲人情事理的，他对上书人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朕想用大信、诚信在天下立足，不欲以诈术来教化百姓，所以“卿言虽善”，爱卿讲的方法虽然不错，“朕所不取也”，但是朕不能够采用。他没有全部否定这个臣子，还是鼓励他提建议，而且他也借着这个机会教育了臣子，不能用诈术。我们看整部《中庸》强调的就是一个“诚”字。古人说“至诚如神”，至诚感通，而不是用诈术、诡计等方法获得成功。所以我们学了圣贤经典就能够明辨是非。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厚黑术、诡诈方法等，这都不是正道，都是枝末而已。

所以要教民，首先领导者要受教育。我们翻开四书五经，几乎没有看到哪一句话是教导百姓的，全都是劝导君主和领导者的。那么百姓怎么受到教化呢？实际上是从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学到的。古人说：“言教者讼，身教者从。”你用言语去教导他，但自己没有做到，他就会有争讼、有逆反，他会说你都没有做到，有什么资格教我呢？如果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都符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么下属就从你的身上学到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第二十四讲

除四患，崇五政



达到政治清明，先除四患

致治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无由行矣。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行矣；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群书治要》卷四十六《申鉴》

“致治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致治”就是使国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致”指达到，“治”指治世，也就是指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达到政治清明，先要摒除四种严重的祸患。“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先要除“四患”，然后才能接着推崇“五政”。

“四患”是什么？

“一曰伪”，“伪”的正面就是诚，人真诚，才能凝聚人心，虚伪就会失去人心。曾国藩曾经给“诚”下了一个定义，“一念不生谓之诚”。一念不生的状态，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的状态，也无所求、无所恃，众生有感就有应的状态，也就是《老子》中所说的：“圣人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什么道？得的就是真诚心、至诚心，这个真诚心与道相应，而且这个真诚心是我与众生共同具备的，是人与人相通的，是一不是二。真诚心一发，就能感动人，感动对方不分彼此来共襄盛举。

真诚心是从哪里培养起来的？从不妄语开始，讲每一句话都要发自真诚的心，没有任何的虚伪、应付，不自欺欺人。养成这样的习惯，慢慢地真诚心就能够显现。

人为什么会虚伪？为什么会伪装？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放不下私欲，明明有私心，还要把话讲得很好听，把自私自利伪装起来。但是伪装得再好，能够蒙骗一般的人，蒙骗不了有道德学问的人、心地清净的人，而且即使能蒙骗一般人，也只能蒙骗一时，而不能蒙骗长久，迟早有一天会被人看穿。

有的老师讲课特别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怎么来？主要看老师自己有没有真诚心，或者说真诚心有几分。我们参加传统文化论坛时，曾听过中学高级音乐教师靳雅佳老师讲授“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音乐课，听完这堂音乐课，大家都感动得泪流满面。因为靳老师是用真诚心来唱、来教的，所以和一般的歌手唱出来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为什么我们听传统文化课，每一次听，都有不同的感受？为什么我们读经典可以百读不厌？就是因为这些内容是人心性的自然流露，是从真心本性中流淌出来的，与我们的心性相应，而我们的真心透出一分，对经典的体会就会加深一分。

我们要看自己真诚不真诚，怎么看？我们可以对着镜子讲话，看自己的眼睛，有没有左顾右盼，或者不专注。大家练习练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平常的眼神、态度都不够真诚。那要练到什么程度，才算有真诚心

呢？对着镜子练讲话练到自己感动得掉眼泪，就能体会到自己的真诚。

“二曰私”，人一真诚，对待人都是念念为人着想，没有私心。这一念心提起来，你的办事能力、待人接物的能力就会迅速提升。很多人在讲课前会紧张，为什么会紧张？因为有“私”没有放下，有“我”没有放下。

我第一次到党校讲课的时候，是1997年。我刚刚研究生毕业，24岁。下面坐的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素质、高水平的领导干部，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都要比我长10岁左右，而且现在的党校学员很多都是博士、硕士毕业，甚至有的人是博士生导师，有的人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不仅有丰厚的理论基础，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我年仅24岁，就要给他们讲课。我们学校当时有一个规定，就是每一次上完课之后，都要请学员给老师打分，考察一下老师讲的内容对学员有没有启发等。我不是师范大学毕业，一上讲台就要面临这样的考验，怎么办？还没上讲台的前三个月，我就已经寝食不安了。

人为什么会有压力？当人有压力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个“我”放不下，还是有一个私心放不下。我们担心自己的课讲不好，最后成绩评出来，倒数几位，自己的面子过不去。一个人想到自己的面子的时候，就会有压力。

我当时很幸运，讲的第一堂课是领导心理调适，其中有一条就是压力心理调适。面对压力的时候怎么做？我在备课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关键的原则，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转向自身之外的人和事。受到这一个原则的启发，我开始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转而进行这样的思考：我这一堂课能够给学员带来什么？能够为他们今后的工作、生活带来怎样的启发？甚至是转变？当我这样去想的时候，我发现压力大大减轻了，因为注意力没有在自己身上，反而促使我翻看了更多的书籍材料，备课也备得非常充分，课后收获了学员的一致好评。这一经验告诉我们，人在自私自利、斤斤计较的时候，能力就很难大幅度地提升。“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

当你念念为对方服务的时候，看到对方需要的时候，你的办事能力、观察能力，会大幅度地提升。

在《论语》中，孔子讲：“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是学道之人，他能够助人为乐、成人之美，心胸坦荡。而小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心想着自己的利益，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还想方设法地谋算别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所以总是处于郁郁寡欢、患得患失的状态。

“三曰放”，放纵欲望，一旦一个人放纵欲望，沉溺于感官的满足，什么孝心、恭敬心全都抛之脑后了，也就没有了恩义、情义、道义可言了。对于国君而言，如果放纵欲望，心思必然不在治国理政上，他有欲望、有嗜好，也就容易被佞臣挟制。

《淮南子》中记载，齐威王的王后死了，齐威王想立一个新的王后，但是不确定到底立谁好，于是他就命令群臣商定此事。薛公田婴想要迎合齐威王的心意，给齐威王献上了10只玉耳饰，而且特别赞美其中的一个。第二天，田婴便问那只被赞美的玉耳饰在谁那里，知道在谁那里后，就劝威王立那位妃子为王后。齐威王非常高兴，从此之后对田婴格外器重。所以君主的意图嗜欲一旦显现于外，就会为臣子所挟制。

“四曰奢”，奢侈，我们以前讲了很多，“成由勤俭败由奢”“从俭入奢易，从奢返俭难”。一个人即使已经荣华富贵，生活条件很好了，也要保持简约的生活方式，这样生活简单容易满足，心地清净。古人说：“人到无求品自高。”范仲淹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每天就煮一锅稀饭，隔夜这锅稀饭就会凝结成块，他把这一锅稀饭划成四个格子，每顿饭只能就着咸菜吃其中两格子稀饭，就这样艰难度日。他有一位同学是留守的儿子，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同学的父亲很同情范仲淹，就馈赠了他很多美味佳肴。范仲淹却把这些美食都放在一边，没有食用。过了一段时间，美食全都腐烂了。留守的儿子看了之后很惊讶地说：“我父亲听说你生活清苦，所以特意赠给你这些美食，你为什么不吃？”范仲淹说：“我并不

是不感恩您父亲的美意，但是我吃粥、吃咸菜已经很久了，早习惯了，现在突然吃这些美味佳肴，我怕以后不能再回到吃粥的生活。”范仲淹保持了一种简约的生活方式，不奢侈浪费，生活上容易满足，也万事不求人。他把心思全都用在了求学、求道、治国理政上。

上面所讲的“伪、私、放、奢”，针对的是整个国家的治理，实际上治国和治家的道理是相通的。如果一个家庭，夫妻俩都不讲真话，虚伪、互不信任，同床异梦，这个家能够幸福吗？如果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想着自己的私利，私心很重，这个家能够和睦吗？如果这个家没有家规，全家都放纵奢侈，肯定会走向衰落。所以《群书治要》里面的智慧是小大圆融，小到修身、齐家，大到治国、平天下，都用得上。我们看一个家族，看一个团队、企业、国家能否兴盛，怎么看？就从这四点看。如果一个家族的家庭成员、一个团队的成员、一家企业的员工、一个国家的公民，彼此之间真诚相待，处处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又都严格地守规矩，不放纵自己的欲望，严格要求自己，生活节俭，不奢侈，这个家族、单位、团队、企业、国家就能兴盛。

“伪乱俗”，虚伪会扰乱社会风气，人们为了追逐名利，不择手段，做一些巧虚假、违背道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就会缺乏信任感，甚至人们对好人好事也缺乏信心。

“私坏法”，自私就会破坏法令纲纪，这个“法”必须公正，正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领导者有私心，和自己关系好的人都不守规矩，这个社会的正义、法令就乱了。一个团队要有团队的规矩，这个规矩就是领导者先守，如果领导者不守，团队的规矩整个就被破坏了。我们经常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了问题谁首先应该承担责任？领导者自己。如果领导者遇到问题都是推卸责任，那么整个团队也会是“各相责，天翻地覆”，一遇到问题就互相推卸责任。一个团队的规矩被破坏掉，往往是领导者自己没有率先遵守。

《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李离是晋文公手下的法官，他因为误听证词而杀了人，于是就把自己拘禁起来，以死谢罪。晋文公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面的办事人员有过失，这不是你的罪。”李离说：“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这句话，领导者要常常用来提醒自己。李离说：“臣的官位很高，没有让位于下属；接受的俸禄很多，也没有与下属分利。现在误听了证词而杀了人，却要怪罪下属，臣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他推辞了晋文公的赦免令。晋文公接着说：“既然你都自以为有罪，那我不也是有罪吗？”李离说：“法官要受法律的约束，判刑失误就要受刑，判死罪失误就要以死谢罪。国君因为臣能听微决疑，所以才让臣做法官。现在臣误听了证词而错杀了人，这是臣的罪过，应当死。”他不接受赦免，以剑自刎而死。由此可见，要秉公执法的人，首先要以法律约束自己，尤其是职位愈高，所负的责任也就愈大，愈应该率先垂范、承担责任，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李离的行为，确实是大公无私到了极致。

“放越轨”，放纵就会助长越轨的行为，人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逾越礼教，逾越礼教虽然不是犯法，但是礼教一破坏，整个社会就会物欲横流、人欲泛滥。古人把礼比作抵挡洪水的堤坝，如果认为抵挡洪水的堤坝没有用而把它废弃，必然导致洪水泛滥，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认为旧礼没有用而把它废弃，一定会导致人欲横流。古人制礼作乐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因为人的欲望一打开，就像洪水一样，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

“奢败制”，奢侈就会败坏礼法制度。在中国古代，什么级别的官员穿什么样的衣服、坐什么样的车，百姓看到了，就知道要恭敬而尽心相待。古人说：“爵一，齿一，德一。”意思是，让人们尊重有爵位的人，尊敬上了年纪的人，尊敬有德行的人，这是倡导一种尊贤、敬老、尊敬有德者的风气。如果人们争先恐后地追求奢侈，就会形成一切向钱看、唯利

是图的社会风气，从而败坏了礼法制度。

《韩诗外传》中说：“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这句话反映的是我们古圣先贤高度治国智慧。古人知道，人都有七情六欲，这是正常的。人们爱好发财，喜欢当官，喜欢受人尊重，这是人之常情。治理国家就要顺着这个人情去治理，人们才愿意接受。

《傅子》中说：“爵非德不授。”爵位是指领导的位置，没有德行的人就不能担任。这样的制度一设计出来，人们会主动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下面一句话是“禄非功不与”，“禄”指俸禄，没有功劳就不给予俸禄。这样的制度一实行，会激励人们去建功立业，为国家多做贡献。

《韩诗外传》中记载，“古者必有命民”。“命民”就是古代的君主亲自下诏封赏的平民百姓。“民有能敬长怜孤、取舍好让、居事力者，命于其君。命然后得乘饰车駢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皆有罚。故其民虽有余财侈物，而无礼义功德，则无所用其余财物。故其民皆兴仁义而贱财利。贱财利则不争，不争则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平民百姓之中，能够尊敬长辈、怜恤孤儿，在取舍上能够推让，做事尽心尽力的人，就会被君主下诏命加以封赏。可见，当时的制度都是顺着人情去设计的。

“取舍好让”，就是面对利益的时候，能够谦让为先、礼让他人。国家也不能让这样的人吃亏。如果是愈谦让愈吃亏，那人都会去争、去抢了。有一句话说：“不哭的孩子没奶吃。”如果是这种情况，大家都会通过哭闹去获得自己的利益了。所以人愈是推让、愈是谦让、愈是礼让，就愈不能让这样的人吃亏，愈是要给他封赏。有了这样的鼓励，人们就愿意谦让。

“居事力者”，就是做事很负责任、尽心尽力地把事情做圆满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君主要给他封赏，让大家向榜样学习。

“命然后得乘饰车駢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皆有罚。”“饰车駢马”，

就是两马并驾的一个车子，而这个车子还装饰得很华丽。也就是说，如果有上述这些德行的人，受到君主的诏命，给以封赏，那么他就可以乘坐装饰得很华美、两匹马并排拉的车子出行，这是特殊的荣誉。没有得到君主的诏命、封赏的人，即使再有钱，也不能随便乘坐这样的车子，乘了这样的车子就会受到处罚。

“故其民虽有余财侈物，而无礼义功德，则无所用其余财物。”所以一个人即使有多余的钱财，如果他不讲礼义，没有对国家建功立业，没有德行，那他也没有办法使用其他多余的财物。

设置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为了引导和鼓励人们向善、培养德行，让人们愿意去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让有德行的人受到尊敬，而不是把财放在第一位。如果事事都是金钱至上，以一个人拥有的金钱多少来评价这个人的价值，那么这样就会形成见利忘义的社会风气。

“故其民皆兴仁义而贱财利。贱财利则不争，不争则强不凌弱、众不暴寡。”所以人们把财利看得很轻，把仁义看得很重，就不会去争夺财物；不争夺财物，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众欺寡的事情。这些都是从制度设计上培养人们向善好德。

施行德政以除四患

“四者不除，则政无由行矣。”

——《群书治要》卷四十六《申鉴》

四患不除，德政是没有办法施行的。如果整个民心都在堕落，那么必须赶紧推行伦理道德、圣贤教育，才能亡羊补牢、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俗乱则道荒”，风俗混乱了，人们的道德就沦丧了，道德一沦丧，即使天地也不能保全人的本性。

“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礼法制度被破坏了，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的状态，即使是君王，也很难坚持守护这些法度。因为积弊已久，想要再扭转就很不容易。

“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行矣。”常规被超越了，礼义教化也会消亡，纵使圣人来了，也很难维护正道。

“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没有礼法的约束，欲望就会横行，而没有任何顾忌。虽然国家土地辽阔，但也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欲望和消费。

崇五政

“是谓四患”。这四个祸患去除了，还要“崇五政”。“兴农桑以养其生”，提倡农业生产，让人们衣食无缺，好好生养百姓。“审好恶以正其俗”，“审”就是明察，明察人们的喜好和厌恶，然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人们都喜欢什么？喜欢“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义妇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人们的喜好和厌恶，一定是和道相应的。通过明察人们的喜好和厌恶，来纠正整个社会的风气。“宣文教以章其化”，“文”就是文字、文章、礼乐、曲调等。我们现在特别提倡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提倡祭祖、祭孔，这都是“宣文教”。“以章其化”就是彰显整个国家实施教化的决心和政策。“立武备以秉其威”，建立军备来确保国家不被侵犯。古人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有了军备，别的国家才不敢轻举妄动。“明赏罚以统其法”，严明奖赏和惩罚来统理国家的法律。什么该赏，什么该罚，不能仅凭个人的好恶，要做到有法可依。“是谓五政”，这就是最重要的五种政治措施。

第二十五讲

得贤才而天下安



任贤关系国家安昌危亡

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
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三《说苑》

没有始终安定的国家，也没有恒常得治的百姓。得到贤人辅佐就安定昌盛，失去贤人辅佐就导致危亡。从古至今，没有不如此的。

能否任用贤才是国家能否治理的关键。所以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知贤、求贤、任贤。古代的宰相并不是最能干的人，而是能发现人才并把能干的人任用到合适的位置上的人。这就要求宰相有知人之明，而且要心量大、不嫉贤妒能，不能对人才心存疑虑。从历史上看，自古以来，凡是能够留名青史的领导人，都非常尊重贤才。

《新序》中记载，魏文侯每次路过段干木居住的巷子口时，一定会站起身来，扶轼致敬。也就是说，他一定要扶着车前的横木，向段干木居住的巷子方向行礼。他的仆人不理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这不是段干木居住的巷子吗？段干木是一个贤德的人，我怎么敢不对他致敬呢？段干木是因为有德行而荣光，我不过是因为土地广阔而荣光。段干木富有的是道义，而我富有的是财富。土地不如德行，财富不如道义，我理应尊重这个人。”于是，他拿出百万的俸禄给段干木，经常去向段干木请

教治国之方。魏国的百姓知道了都非常高兴。不久，秦国想发兵攻打魏国，但是司马唐且听到这件事之后，劝谏秦王说：“段干木是一个有德行的人，而魏文侯对他礼敬有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现在出兵去攻打魏国，可能还不是时候。”秦王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打消了攻打魏国的念头。

这说明，如果国君能够敬重贤德之人，就能够使天下归心，以德服人，其他国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新序》中还记载着一个与上面类似的故事。秦国要去讨伐楚国，在讨伐之前，先派使者去看一看楚国有什么宝器，探听一下虚实。楚王听说之后，就把令尹子西召过来，问道：“秦国要观一观我们国家的宝器，我们国家的和氏璧、隋侯珠是不是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看？”令尹子西回答：“我不知道。”楚王又把昭奚恤召来了，问他这件事怎么办。昭奚恤说：“秦国是想看一看我国的政治得失而另有企图。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宝器是贤德的臣子，像珍珠、玉器等这些玩好之物，算不上国家最宝贵的东西。”楚王听他回答得很有道理，就派昭奚恤来应对这件事。

昭奚恤在东面设立了一个高台，在南面建了四个高台，在西面也建了一个高台。秦国的使者到来时，昭奚恤对他说：“您是我们国家的贵客，请到东面的上位就座。”然后请令尹子西、太宗子敖、叶公子高、司马子反依次坐在南面高台上。昭奚恤自己坐在西面的高台上。他对秦国的使者说：“您想看一看我们国家的宝器，楚国的宝器就是贤德的臣子。能够治理百姓、充实仓库，使百姓各得其所，有令尹子西在这里；手里拿着珪璧出使诸侯，能够化解彼此之间的仇怨，结交两国之间的友谊，使双方没有战争的忧患，有太宗子敖在这里；能够保卫国土、谨守边疆、不侵犯邻国，邻国也不敢侵犯我们国家，有叶公子高在这里；能够治理军队，整修军器装备、抵御强敌，手里拿着战鼓激励百万的民众，他所任用的人都可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有司马子反在这里；能够缅怀先王霸业所成就的

功绩，并吸取治理动乱的经验，有我昭奚恤在这里，请您尽情观看。”

秦国的使者听完后，惊讶得无言以对，回去之后就向秦王禀告说：“楚国有很多贤德的臣子，这时候出兵攻打它还不是时候。”秦国就没有敢去征伐楚国。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明君都是以贤臣为宝，而不是以珍珠宝玉为宝，认为贤德的臣子是国家得以安定的根本。《盐铁论》中对此这样评论：“隋和，世之名宝也，而不能安危存亡。”隋侯珠与和氏璧，都是世间最名贵的宝物，但是它们并不能够使危亡的国家得以安存。所以“喻德示威，唯贤臣良相，不在戎马珍怪也”。要彰显自己的威德，只有靠贤臣良相，而不在于珍禽异兽、珠宝等。

所以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好，其根本不在于珍宝，甚至也不在于军事上是否强大，而在于是否有贤才辅佐，这是国家能否兴盛的关键。

《晏子》中记载，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子：“我的先君齐桓公，曾经率领兵车三百辆，九次会盟诸侯，统一天下。现在我率领的兵车有一千辆，大大地超过了齐桓公，我可以赶得上齐桓公的业绩，在他之后一统天下吗？”晏子说：“齐桓公率领兵车三百乘，九次会盟诸侯，一统天下，那是因为他左有鲍叔牙、右有管仲的辅佐。而现在您的左右全是倡优。”倡优就是歌伎、小丑。“谄媚、邪恶之人在前，阿谀奉承之人在后，怎么可能赶上齐桓公而成就霸业呢？”

在这里，晏子告诫景公，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他能够任用贤才、信任贤才。如果景公也想把国家治理好，进而称霸天下，不应效仿桓公拥有兵力，而应该效法他有任用贤人的智慧和度量。所以能否任用贤人，才是国家兴盛的关键。

《潜夫论》中说，国家为什么会动乱？怎么能够判断出国家将要混乱呢？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重视贤德的人。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君重视贤德的人，有的国君却不重视贤德之人呢？国君不重视贤德之人，一

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喜欢财货。《六韬》中说，如果在上位的国君喜欢财货，群臣也就喜欢获得利益，而贤德之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自私自利，甚至视钱财如粪土，所以财利对他没有诱惑，也就不能成为他出来做官的动力。贤德之人一旦遇不到明君重用，就会隐居起来，而一旦贤德之人都隐居起来，老百姓就没有人来教导了。因为国家没有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自私自利的风气就会愈来愈严重，国家的祸乱也就到来了。这就是《孟子》中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即从上面的领导者到底下的老百姓，人人都交相争夺利益，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用不世之臣，立不世之功

书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

——《群书治要》卷二十六《魏志下》

“不世”就是世上所罕有的、非凡的、卓越的、不经常出现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尚书》中说：“有卓越的君主，必能任用卓越的大臣。任用卓越的大臣，必然能建立卓越的功绩。”

下面一个故事，可以让人从中体会什么是“不世之臣”，也就是什么样的臣子才能够称为非凡的、卓越的大臣。

晋文公在逃亡的时候，陶叔狐跟从着他。晋文公返回国后，进行了三次封赏，都没有封到陶叔狐。陶叔狐就对咎犯说：“我跟从着君王逃亡已经13年了，面色都变黑了，手足都长了老茧，可是现在君主返回国，三次行赏都没有轮到我，是君主把我忘了呢，还是我有什么大的过失？”咎犯把他的这些话转告给了晋文公。晋文公说：“我怎么会忘了这个人呢？但是以我的认识，那些能够用道使我的精神专注，用义来说服我，使我的

名声得以显扬，使我成为德才兼备的君主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奖赏。那些能够以礼来规范我，以义来劝谏我，使我不能够为非作歹的人，应该受到次一级的奖赏。而那些勇猛的壮士，有难在前，就冲锋在前，有难在后，就留下断后，从而使我免于危难，应该受到第三等的赏赐。难道陶叔狐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吗？与其能为人效死，不如能保存这个人的生命；与其与人一起逃亡，不如能保存这个人的国家。三次行赏之后，就会轮到有劳苦功绩的人了。而在有劳苦功绩的人中，陶叔狐应该排在第一位，我怎么能把他忘记呢？”

后来周的内史听了这话，评论说：“晋文公要称霸了吧。”为什么会称霸？因为他深谙治国之道，懂得防患于未然的道理，任用大臣是任德不任力。在中国历史上，古圣先王任人都是“先德后力”，优先重视的是道德而不是劳力。晋文公做到了这一点。

这个故事说明，能够以道德引导国君、教化百姓、言传身教的人，应该受到国家最高的重视。因为他们可以使民风向善，国家安定。

田子方是一位有仁德之心的人，魏文侯对他礼敬有加。可以说，尊敬仁人贤士，正是魏文侯可以称霸的一个重要原因。田子方的仁德之心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韩诗外传》中记载，有一次，田子方外出，看到路旁有一匹老马。他长叹了一声，问车夫：“这是什么马？”车夫回答：“这是公家养的马，现在老了，不能再用了，就把它放了出来。”田子方说：“马在壮年时，用尽了它的力气，到马年老力衰时，就把它抛弃，仁者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他就花钱把这匹马赎了回来。穷困的土人听了这件事之后，就知道谁是他们可以依附的人了，显然应该归附像田子方这样有仁心的人。他对于有功劳的老而无力的畜生，都不愿意抛弃，更何况是对自己有贡献的人呢？

像田子方这样的仁人，在常人看来难免是有一些个性。因为“人到

无求品自高”，往往不像一般人那样喜欢谄媚迎合权贵，所以和一般人比起来就更正直。由于正直，就与常人格格不入，显得有个性。

《说苑》中记载，魏文侯从中山国急奔安邑。田子方在军队的后面，途中遇到了魏文侯的儿子，也就是太子击。太子击看到了田子方，便下车快步走上前去。结果田子方还是坐在那儿，像原来一样一动不动，并且告诉太子击说：“你替我告诉君主，在朝歌等着我。”太子击听了之后，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对田子方说：“不知道是贫穷的人待人骄慢，还是富贵的人待人骄慢？”田子方回答说：“当然是贫穷的人待人骄慢了，富贵的人怎么敢待人骄慢呢？如果君主待人骄慢，就会导致亡国；如果大夫对人骄慢，就会丧失地位；而如果贫穷的人傲慢，他不过仍然是保持贫穷罢了，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什么损失。”太子击听了之后，将田子方与他的对话转告给了魏文侯。

魏文侯听了之后，感叹地说：“如果不是你的缘故，我怎么能够听得到圣贤人的这一番话呢？因为我在仁德方面比不上子方，所以对他很礼敬，才和他成为朋友。自从我和子方成为朋友之后，君臣之间的关系愈加亲密，百姓愈加归附，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友爱贤士取得了功效。当我想攻打中山国的时候，因为我在用兵作战方面比不上乐羊，所以我对他非常礼敬，结果乐羊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把中山国打下来，献给我。那时我和武士交友，最终取得了功效。如今我之所以不能够有些进步，就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能凭智慧在我面前骄傲的人。如果我得到智慧超过我的人，那我的功绩怎么能够比不上古代的圣贤呢？”

魏文侯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对仁人贤士非常尊敬。田子方对太子这样傲慢，魏文侯不仅没有指责，反而还教导太子，要用仁爱之心去结交有德之士。

当然，田子方对待君上的这种态度，难免招致他人的批评。魏文侯的弟弟季成曾经对魏文侯说：“田子方虽然是一個贤德的人，但他并不是

拥有国土的君主，而您经常以君主之礼来对待他，如果有比田子方更贤德的人出现，您又会以什么样的礼遇来对待他呢？”

魏文侯回答道：“像田子方这样的人，不是你可以议论的。因为子方是有仁心的人，有仁心的人是国家的珍宝，有智慧的人理应被国家器重，知识广博通达的人应该被国家所尊崇。一个国家拥有有仁心的人，群臣之间就不会相争。”这是因为争起来不好意思。试想，大家都是推让、礼让，能够做到爱人如己，如果自己还在那里争，怎么好意思呢？“拥有有智慧的人，四邻的诸侯便不敢存窥视之心（不敢对你轻举妄动）；拥有广博通达的人，君主的地位就会愈来愈受到尊崇。”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魏文侯的明智。他任用贤才，即使别人对他所任用的贤才有不同的看法，他依然信任如故，这也是他能够成就霸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群书治要·孙卿子》中，在谈及用人的时候，把人才分成了几个等级。“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这些人口里讲的是圣贤教诲，又能够身体力行，就像孔子一样，他所说的，自己全都做到了，这种人被誉为国宝。“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这些人口里虽然讲不出圣贤的道理，但是能够身体力行仁义礼智信的规范，这种被称为国家的重器。“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这类人口里讲得很好，都符合圣贤的教诲，但是不能够身体力行。这里的不能够身体力行，并不是说他作恶，而是因为人还有一些习气，所以不能够行得很好，不能够做到圆满，这种人是国家的用具。“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这种人口里讲的全都是好话，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全都是恶的，这是国家最邪恶的人，被称为“国妖”。“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这句话提醒治国之人，应当尊敬“国宝”，爱戴“国器”，任用“国用”，除去“国妖”，除去邪恶之人。

当然，学习要懂得举一反三，这个“国妖”不仅是指国君身边的邪

恶臣子，其实在我们的集体、单位、企业和社会之中也都有类似的人。这类人身行的是恶，但是口里讲的是善，阳奉阴违，这就会让人不仅不会对传统文化生起信心，还因为其所作所为不恰当，对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这对社会、团体的危害是很大的。所以发心弘扬传统文化的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特别小心谨慎。弘扬传统文化的老师，以前做事可以随便、可以任性，现在要出来宣讲圣贤教育，分享传统文化的教诲，言谈举止就要特别小心注意，要做到恭敬谨慎。因为我们的言行都是在给世人做表率，可能我们微小的恶，或者是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就会让人对传统文化留下不好的印象，产生误解，丧失信心。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够把道弘扬光大，就要求讲道的人，要能够身体力行这些圣贤教诲，使人把自己视为践行传统文化的榜样。

《群书治要·尸子》中记载，对能够以言教身行教育社会大众的人特别尊重。书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假如你家的房屋着火了，有人赶来把火扑灭，你一定会对他感恩戴德。而那些年老、有经验的人很早就告诉你，要把墙的缝隙涂好，把烟囱做好，如果这样做了，你家就没有失火之患。但是一般人会觉得他很烦，不知道对他感恩戴德。如果你犯了罪，被关进了监狱，有人能够从监狱把你救出来，让你免于牢狱之灾，你家三族的人都会对他感恩戴德。因为你出来后，可以照顾妻子，孝敬父母，教育儿女。同样的道理，圣贤人教导人“仁义慈悌”的道理，如果你按照这些道理做，保证终身都不会有被关进监狱的灾祸，但是你不知道对这样的人感恩戴德。所以唯有拥有远见卓识的不世之君，才懂得防患于未然，能够把那些用道义教导民众的人推举为师，重用这些人教诲百姓。例如，在康乾盛世，皇帝都是礼请通达儒释道教育的人为国师，对他们特别尊重。结果上行而下效，全国的百姓看到皇帝对这些人都如此尊重，那么对这些人所讲的道理也会依教奉行。他们教导“仁义慈悌”，百姓都被教成善人，

没有人作恶，结果国家安定，天下太平。

从《韩诗外传》中的一段话，可以体会何谓不世之臣。这里把人才分成四个等级：一个人的智能像有源头的活水一样源源不断，他的行为可以做大众的表率，这样的人可誉为“人师”。他的智慧可以砥砺磨炼人，行为可以辅正人，这样的人可以称为“人友”。严格按照法律行事，奉公守法，忠于职守，不敢为非作歹，这样的人可称为“人吏”。在他人面前一味讨好对方，使人高兴，人家一呼喊他，他就连声答应，这样的人就像奴隶一样，被称为“人隶”。上等的君主以“师”为辅佐，中等的君主以“友”为辅佐，下等的君主以“吏”为辅佐，而使国家危亡的君主是以“隶”为辅佐。

观察一位君主或领导所任用的人，就知道他的兴衰成败了。“欲观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有同样敏锐眼光的人，才能够互相发现，有同样聪敏听力的人，才能够互相倾听，志同道合的人，才会相互跟从。

“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任使，有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也，可无慎乎！”不是贤德的人，就不能够重用贤人。这是因为，首先，他发现不了贤德的人，即使贤德的人在他身边，他也认识不到，更谈不上尊重。其次，心量不够，因为嫉妒心、怀疑心，使他不能够重用贤才。所以这里讲：“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

《吕氏春秋·尊师》中讲到，历史上有“十圣六贤”，这“十圣六贤”都有老师。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挚，汤师伊尹，文王师吕望，武王师周公，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楚庄王师孙叔敖、沈尹筮，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师范蠡、大夫文种。即使是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的圣王，能够建功立业、垂范后世，也是因为能够主动寻求明师。结果，辅佐他们的全都是得

道之人，这些人能够砥砺自己在德行上不断进步，进而施行教化，更好凝聚百官，为民服务，结果就是《大戴礼记》中所说的——“礼义积而民和亲”“德教行而民康乐”。

所以“不世之君”遇上“不世之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要特别懂得珍惜。贤明的君主一定能够抓住难得的机遇，重用“不世之臣”，创立“不世之功”。

敬重贤能

子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近臣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表”指表率、模范、榜样。“近臣”就是近臣，指在君主左右侍从的臣子。“道”是引导、指引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国君对大臣不可不恭敬，因为他们是民众的表率；近臣不能够不慎重选择，因为他们是民众遵循、跟从的先导。这里的“大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在企业里就是高管。怎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大臣？或者说，大臣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呢？

《潜夫论》中讲：“夫贤者之为人臣，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贤德的人作为臣子，不会通过迎合巴结而损害君主，不会为了苟且容身而阿谀奉承众人，不会听任私心而败坏公义，也不会因为畏惧权贵而歪曲法律。他的贤明能够明察奸邪，他的道义使他不结党营私。这样的臣子才配称得上是大臣。国君对于这样的大臣必须尊敬，因为他是民众的表率。

《后汉书》中记载祭遵曾经跟着汉光武帝出征黄河以北，被任命为军

市令。在光武帝的族中，有个小儿犯了法，祭遵按照法律，严格地把他处死了。光武帝听到这件事，非常生气，命人把祭遵收监。当时的主簿陈副进谏说：“陛下常常想让军纪严明，现在祭遵奉法不避权贵，这就是让军令严明，使法令得以实施。”光武帝听后，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就赦免了祭遵，并且任命他为刺奸将军。光武帝经常告诫将领们说：“要小心祭遵，我们家族中的一个小儿犯了法尚且被他杀掉，他一定不会对你们这些将领有所偏向。”光武帝平定了黄河以北之后，又把祭遵拜为征虏将军。

可见，贤明的君主都是用那些不徇私枉法的人。光武帝任用祭遵，并且给他很高的待遇。祭遵也严格要求自己，受到的赏赐都分给手下的人。他过世的时候，光武帝亲自去探望，看到他曾经坐过的车马，都痛哭流涕。祭遵过世很久之后，光武帝还经常对群臣说：“怎样能够找到像祭遵这样忠于职守、奉公守法的臣子呢？”从中可见，光武帝也很了不起，因为他能够任用、赏识祭遵这样的廉正之人。祭遵就是上面所讲的“不挠法以吐刚”的人，不因为畏惧权贵而歪曲法律。

《孙卿子》中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能够批评我，而且批评得很恰当的人是我的老师。“是我而当者，吾友也。”夸赞我，而且夸赞得很恰当的人是我的朋友。“谄谀我者，吾贼也。”我本来没有真才实德，但是一味谄媚、奉承我的人是贼害我的人。所以领导者要善于辨别自己所任用的人到底是师、是友，还是邪佞之人。

《群书治要·新序》中记载，楚恭王生了大病，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把令尹召过来，对他说：“常侍管苏与我相处时，常常用道义劝导我，我和他在一起就感到不安，见不到他，也不会思念他。虽然如此，他对我很有帮助，他的功劳不小，一定要重用他，给他很高的爵位。而申侯伯与我相处时，常常放纵我的欲望。即使我的行为肆无忌惮，他也不劝谏。只要我喜欢的，他就让我做，甚至劝我去做。凡是我喜好的，他都让我先去尝试。我和他在一起非常快乐，看不到他，就会有点忧戚，很想念他。虽然如此，

他对我却没有帮助，他的过失不小，一定要赶快把他打发走。”令尹听了之后说：“好。”第二天，楚恭王就过世了。令尹拜管苏为上卿，委以重任，而把申侯伯逐出了楚国。可见，阿谀奉承的大臣可能一时讨人欢喜，但对人的德行提升没有帮助，更不能帮助人安定国家。所以领导者不要选用阿谀奉承之人，而是要任用廉正之人，即能够以道义规劝自己的人。

慎择亲信，谨防“社鼠”与“猛狗”

《群书治要·体论》中讲道：“是以为政者必慎择其左右，左右正则人主正矣。”君主一定要审慎地选择他所亲近、所重用的人。如果他亲近的人正直，那就没有人不正直。君主亲近的人正直，国家也就会兴起正气。君主身边的人不正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仗势欺人、以权谋私；另一种就是进献谗言、嫉贤妒能、排挤忠正。这两种人被管仲称为“社鼠”“猛狗”。

《群书治要·说苑》中记载，齐桓公请教管仲：“治国最大的忧患是什么？”管仲说：“最担心的就是‘社鼠’。”齐桓公不明白什么是‘社鼠’，管仲解释：“社”就是指土地的神像。土地的神像是把很多木头捆绑在一起，然后在上面涂上泥巴做成的。因为神像的中间一般都是空的，老鼠经常以神像为栖身之所。如果用烟熏它，就怕烧了一整根的木头也烧不到老鼠；如果用水灌它，又怕把神像上面的泥冲坏了。老鼠之所以不能被消灭，就是因为有土地神像的缘故。所谓“社鼠”，就是借土地神像栖身的老鼠。齐国也有“社鼠”，就是君主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如果不正，就会蒙蔽善恶，让君主无法了解实情。而君主身边的人仰仗着君主的庇护，就会在百姓中夸耀自己的权势而鱼肉乡里。不诛杀他们，会给国家带来混乱；诛杀他们，他们又是君主所庇护的人，很难把他们诛杀掉，这些人正是国家的“社鼠”。所以治理国家，最担心的就是君主身边的人以权谋私、仗势欺人。

《说苑》中还记载了管仲讲的另一个比喻。有一个卖酒的人，他的酒

器非常干净，酒旗（也就是招牌）也悬挂得很高，但是他的酒就是卖不出去。他就问邻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他的邻居说，因为你们家有一只猛狗，当别人带着酒器买酒时，这只狗迎上去就咬人。结果想买酒的人都被吓得不敢过来买酒。

其实，国家也同样有“猛狗”，“猛狗”就是在国君身边仗势欺人之人。而且他不仅仗势欺人，还嫉贤妒能，那些有道德学问的人想来辅佐国君安定天下，而这些人却迎上前去对其进行诋毁、陷害、诽谤、中伤，这就是国家的“猛狗”。

这些比喻告诉我们，贤能之人之所以没有被任用，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国君身边所任用的人大多是嫉贤妒能之人。他们像“猛狗”一样，生怕贤德之人来到国君的身边取代自己的位置，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不择手段地造谣生事，恶意诽谤、中伤贤德之人。所以国君必须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要警惕身边的“社鼠”和“猛狗”。

正是因为古人能够认识到贤德之人是否被任用对国家安危成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也设置了一些防患于未然的制度。譬如，“进贤者必有赏，进不肖者必有罪”。如果举荐者举荐了德才兼备之人，这些人能够对国家建功立业，那么举荐他们的人就受到国家的赏赐。这样人们都愿意把自己手下德才兼备的人举荐出来，为国家重用。如果举荐者所举荐的人祸国殃民，做出了很多坏事、恶事，那么举荐者也会负有连带责任。这样就使举荐者在荐贤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他所举荐的人才必须是自己真正了解的人，这样才敢把他举荐出来。而不敢举荐人才的人，被称为无能之人。在古代如果一个官员好几年都没有为国家举荐人才，那么他的政绩是不合格的。所以古人考察一个官员的政绩，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看他为国家举荐了多少德才兼备之人。这样的制度一经实行，臣子们都愿意去推荐贤者。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们要有知人之明。

第二十六讲

诚以得贤



文王施仁，天下归心

文王好仁，故仁兴；得士而敬之，则士用，用之有礼义。故不致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疾则临视之无数，死则吊哭之，为之服锡衰，而三临其丧；未敛不饮酒食肉，未葬不举乐，当宗庙之祭而死，为之废乐。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

——《群书治要》卷十七《汉书五》

“文王好仁，故仁兴。”文王喜好仁德，整个国家的仁政就兴起，仁爱之风就盛行。这就是《大学》中讲的“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文王的仁爱之心达到了怎样的程度？《群书治要·新序》中记载：有一次，周文王令人建造灵台，在修建池沼的时候，人们挖地挖出了死人骨头。有官员把这件事报告给文王，文王决定要将尸骨改葬。官员说，那是无主的尸骨，找不到他的主人了。文王说：“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意思是说，拥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的主人。拥有一个国家的人，就是一国的主人。寡人本来就是他的主人，你还到哪儿去找他的主人？于是，文王命令那位官员备办棺

木寿衣，将这具尸骨改葬。

天下的人听到这件事后都说：“文王贤矣，泽及朽骨，又况于人乎？”文王真是一位贤君，连朽骨都能够受到他的恩泽，何况是人？《群书治要·新序》评论道，有人得到珍宝，但是给国家带来了灾难；文王得到枯骨，却以此表明他仁爱的诚心，因此天下的人纷纷归附于他；这就是文王的仁爱之心延及朽骨之上的表现。正是因为他有这种仁爱之心，所以使得当时天下归心。即使在他还在做西伯侯的时候，国君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也愿意来找他评理。

当时有虞、芮两国的国君，因为田地边界产生了纷争，很久都没有得到解决，他们相约到文王那里去评理。当时的文王还是西伯侯。他们到了文王治理的国境，看到耕田的人都是互相礼让田畔，行路的人互相让路；到了城里，看到男女分开走路，男女别途，年轻人主动帮助、照顾老年人，看不到头发斑白的老年人自己负重行走；到了朝廷里，看到被任命为士、大夫的人纷纷礼让，都推荐同僚之中更加贤德的人来担当高级的职位。

这两国的国君目睹了这些和睦礼让的事情，非常感动，生起了惭愧之心。他们说：“我们惶惶不安地为了追求利益而起了纷争，实在是小人的行为，小人怎么可以践踏君子治理的朝廷呢？”于是，他们不好意思再去找文王评理了，而且都坚持把自己所争的田产让给对方。结果让来让去，谁也不愿接受，最后就把所争的田产让为闲田。

夏、商、周三朝的统一不是靠军事，不是靠经济，也不是靠政治，而靠的是文化，是文化上的统一。他们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了，其他国家的人就主动、自觉地来学习。这就是《弟子规》所说的“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所以君王要用自己的德行来感化天下，以德服人，这样才能够化解矛盾冲突，成为“王天下”的榜样，令人“中心悦而诚服”。

天子居住的地方被称为“京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首都，是“首善之区”。各国诸侯到这里来朝贡也是为了学习这里的文化。文王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人与人之间彼此和睦礼让、相亲相爱、团结互助，像一家人一样，让人一看，自然生起羡慕、向往之情。所以天下归心，大家纷纷来学习，推举他为天子。这全是靠德行的感化，而不是靠势力、军事。

“得士而敬之，则士用，用之有礼义。”尊重士人，士人就会愿意为他效力。文王能以礼义态度相待，说明文王很尊重读书人，尊重士大夫的人格，这也是感激他们对国家的贡献的一种方式。而这份对士大夫们的尊重，换得的结果就是“敬人者，人恒敬之”，换得的是这些士人、读书人能够为国家所用，愿意为国家效力。而“用之有礼义”，就是强调在用读书人的过程中，对待他们要守礼节、讲情义，不能对他们不恭敬。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读书人都有气节，出来做官不是为了名利，如果对读书人不恭敬，他们就会离开；更不能以功利心对待读书人，对他们不讲道义。

现在有些老板对待员工很功利、苛刻，让底下的人尽力付出，却没有体恤员工的健康，关心到他们家庭生活状况，这就不是以“义”为出发点。结果，员工的身体、家庭都没有照顾好，作为领导者，就是没有顾及基本的道义。老板应该把员工当成家人一样来尽道义、情义，尽心尽力地爱护、尊重他们，不能够羞辱他们。这就是礼、义。所以《傅子》中说：“使用人如用己，恶有不得其性者乎？”如果使用别人就像使用自己一样，怎么会得不到人的真心？怎么会不令人真诚回馈？但是现在很多领导者的心理和方法，不是跟顺经典，而是随顺社会风气，企业的员工怎么能和谐、幸福？

“故不致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所以如果不对士人爱护、尊重，就不能够得到士人的诚心，就不能使他们竭尽全力发挥才能，也就不能成就功业。

桓公礼遇管仲

春秋时期，齐桓公之所以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管仲的辅佐。那么，齐桓公是怎样对待管仲的呢？在齐桓公刚刚任用管仲治国的时候，管仲说：“贱不能临贵。”意思是说，我是一个身份低贱的人，管不了那些身份高贵的人。桓公听了之后，就拜管仲为上卿。但是国家还是没有得到治理。齐桓公问：“我已经拜您为上卿了，可是国家还是得不到治理，这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贫不能使富。”我是一个贫贱的人，指使不了那些富裕的人。齐桓公听了之后，就把齐国市场上一年的税收全都赐给了管仲。结果国家还是得不到治理。齐桓公又问道：“为什么国家还是得不到治理呢？”管仲说：“疏不能治亲。”关系疏远的人，不能治理那些与您关系亲密的人。于是齐桓公就把管仲立为“仲父”，尊管仲如父亲一样，又给他很好的待遇。结果，“齐国大安”，齐国得到了安定，齐桓公也称霸天下。

孔子听了这件事，这样评论：“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即使像管仲这样的贤德之才，如若得不到这三种权力，也不能使他的君主面南背北称霸天下。所以中国古人经常感叹：“世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国君能够知人善任很难得。任用贤才后能够对贤才尊重、礼敬有加，才能帮助贤才树立威严，而且还要对贤才的话言听计从、毫不怀疑，这位臣子才能竭尽全力发挥才能，帮助国君把国家治理好。

尊敬贤能之人，贤能之人就会竭忠尽智。结果领导者自己安闲自在，甚至可以垂拱而治。所以做领导者的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能够知人善任，能够把合适的人才任用到合适的位置上，让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齐桓公任用管仲之后，出现了怎样的情形？《群书治要·新序》中记

载，“有司请事于桓公”，有官员向齐桓公请示一件事；桓公说，将这件事报告给仲父。“有司又请，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官员又有事情来请示，桓公还是说：“将此事报告给仲父。”这样的请示及回答一连好几次。“在侧者曰：‘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易哉为君。’”在桓公旁边侍奉的人就说，一次是报告给仲父，二次还是报告给仲父，国君也太容易当了。

“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则曷为其不易也。’”意思是说，我没有得到仲父的时候，当国君觉得很困难，什么事都得自己做、自己操心。得到仲父之后，怎么能不容易呢？“故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人”。所以当君主的人，寻求贤才时很辛苦，得到了贤才之后就轻松了。“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汤文用伊、吕，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众贤故也。”在历史上，舜提拔了很多贤能的人，主管各种事务，结果自己垂衣拱手，威严而坐，不用有所作为，而得天下太平。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太公，周成王任用周公、邵公，任用了众多贤能之士，这些圣贤人言传身教，兴起道德教化，以至刑罚搁置不用。

“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疾则临视之无数；死则吊哭之，为之服锡衰，而三临其丧；未敛不饮酒食肉，未葬不举乐，当宗庙之祭而死，为之废乐。”“爵禄”就是官爵和俸禄。“临视”，亲临探望。“锡衰”就是细麻布所制的丧服。“敛”，通“殓”，就是为死者更衣入棺。“举乐”，即演奏音乐。当时的君主对臣子，确实是做到了以诚相待，这里具体讲述了古代的圣君对臣子关心爱护的状况。古代的贤君对待大臣，尊重他们的官爵、俸禄并且爱护他们。大臣有病，多次亲自探望；大臣去世，则吊唁哭泣，并穿戴细布丧服，三次亲临丧葬。这个“三”其实有多次的意思。死者入殓前，君主不喝酒、不吃肉；死者下葬前，君主不奏乐娱乐。如果大臣正好是在宗庙祭祀的时候去世，则因为他而免奏宗庙祭祀

的音乐。

《群书治要·体论》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当臣子生病的时候，君主会多次去探望；当臣子过世的时候，君主会亲临大敛、小敛这样的丧礼，而且在丧葬期间都会减衣缩食，不奏琴瑟。这些表现其实并不是搞形式主义，君主的哀戚之情是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所以古人说，“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不自然”就是伪装、做作出来的，为了收买人心故意表演出来的，不是发自本有的真诚之心。这句话意思是说，世间没有不是出自于本有的真诚心而能够得到人的真诚之心的。“色取仁而实违之者，谓之虚”，如果表面上对人仁慈，内心里实际上有所违背，这就叫虚伪。“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君主、领导者不能以真诚心去对待自己的臣子，还希望臣子能够以真诚心侍奉自己，这是愚蠢的想法。这说明，如果要得到贤臣，只有以仁爱之心、真诚之心，才能够以诚换诚、以心交心，绝对不是靠什么权术、计谋、技巧等，这些总会被人识破，换不来他人的诚心。

孙权爱敬大将吕蒙

《群书治要·三国志》中记载着孙权对于他的大将吕蒙的爱护。吕蒙智勇双全，被拜为虎威将军。当关羽率军进攻曹魏的樊城时，孙权派吕蒙带兵去偷袭南郡。南郡太守投降，吕蒙率军进入南郡，占领了城池，并且俘虏了关羽的家属，以及关羽手下将士的全部家属。但是吕蒙给予这些家属比平时更加优厚的抚慰。这样做了之后，关羽的将士全都丧失斗志，纷纷离开了关羽，投降了吴军。结果，吕蒙平定了荆州。孙权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

这时，吕蒙的疾病发作了。当时，孙权还在公安（现湖北公安县），知道吕蒙得病，马上把吕蒙迎到自己的宫殿内住下，而且想方设法为他治

疗疾病。孙权还招募国内的良医，并下令说，谁能治好吕蒙的疾病，赏赐千金。吕蒙的病时轻时重，孙权也因此而悲凄忧伤。他想常常去看看吕蒙的容颜气色，又怕吕蒙要施礼而过于劳累，于是就在墙壁上凿了一个小洞，偷偷观看。如果看到吕蒙能稍稍吃点东西，孙权就非常欢喜，还回过头来与左右侍从谈笑；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长吁短叹、夜不能眠。吕蒙的病情好转一点儿时，孙权还专门为此下赦令，大赦百姓，并让群臣前来道贺。由此可见，孙权对吕蒙确实非常重视、非常礼敬。后来吕蒙的病情加重，孙权亲自到病床前探望。吕蒙去世后，孙权极度哀痛，就像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一样难过。

景公若元首，晏子如股肱

中国古代君臣之间的关系，既是君臣，又如头脑与手足。《蒋子万机论》中讲道：“夫君王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君王治理国家，必须有贤德的人来辅佐，才能安泰。因此，君主被喻为头脑，臣子被称为四肢，就像同一个身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他们彼此相互需要、相互协调，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这个比喻非常恰当、非常形象。“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所以古代君主对于他的臣下，可以说是极尽礼义；臣下不敢不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报效君主。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做君主的，一定要懂得以礼来对待臣子，不能把臣子当成是给自己打杂的人，什么事情都让臣子去代办。这就像现在的企业里一样，有总经理、副总经理，都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才。总经理就不能够把副总经理当成是打杂的人，随意支使，让他去做一些小事，否则，就很难留住人才。

《晏子》中记载：晏子陪伴着齐景公，早晨的天气非常寒冷，齐景公

便说：“请给寡人盛碗热饭。”晏子说：“我不是为君主端饭的臣子，不敢从命。”齐景公又说：“请给寡人准备衣服、裘皮褥子。”晏子说：“我不是负责为君主穿衣铺席的臣子，因此，仍不敢从令。”齐景公问：“那您能为寡人做什么呢？”晏子正色回答说：“我是社稷之臣。”齐景公问：“何谓社稷之臣？”晏子说：“能够稳定国家，区别上下各应承担的本分，使人们做事都合乎道理；规定百官的秩序，让他们各得其所；所言辞令，可传布四方，这就是社稷之臣。”从此以后，凡是按礼仪的规定不应该由晏子做的事，齐景公再也不让晏子去做了。

正是因为齐景公能够礼遇晏子，所以晏子才竭心尽力地来辅佐他，经常为他讲解治国的道理，并且不失时机地纠正他的错误言行。《晏子》中记载，有一年冬天下了大雪，三天都没有见晴。齐景公披着“狐白之裘”（穿着一件白色的裘衣），坐在堂上。这个时候，晏子来见景公，站了一会儿。齐景公说：“真奇怪，雪下了三天，也不觉得寒冷。”晏子听了之后说：“天气真的不寒冷吗？”被晏子一问，齐景公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晏子说：“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晏子的话很直接。他批评齐景公说：“我听说古代的贤君，自己吃饱的时候便想到还有百姓在挨饿，自己穿暖的时候便想到还有百姓在受冻，自己很安逸的时候便想到百姓的劳苦，可惜君主现在却感觉不到。”齐景公的表现也很难得，他觉得晏子说得对，马上赞叹：“善！寡人闻命矣。”他说：“寡人懂得了，寡人明白您的教诲了。”于是，他就下令取出仓库中的皮衣，同时开仓放粮，救济挨饿受冻的百姓。齐景公能够礼遇晏子这样的贤臣，所以在晏子的辅佐之下，他做到了循义而治。

读《晏子》这部书，看到齐景公和晏子之间的对话，可以体会到他们君臣之间的深厚情谊。齐景公对晏子非常礼敬，对他说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而晏子更是竭尽全力，来劝谏教导齐景公。

有一次，齐景公外出游览，向北仰望，看到齐国的都城，感叹说：“唉！假如自古以来没有死亡，该如何？”晏子回答：“以前，天地将人的死亡看成是好事，因为仁德之人可以休息了，不仁德的人终于可以藏伏了。假如自古以来都没有死亡，那么丁公、太公将永远享有齐国，桓公、襄公、文公、武公都将辅助他，而君主您只能戴着斗笠，穿着布衣，手持大锄小锄蹲行、劳作于田野之中，哪里还有工夫忧虑死亡？”齐景公听了之后很不高兴。

没过多久，梁丘据乘着六匹马拉的大车从远处赶来。齐景公看后说：“梁丘据是跟寡人很和谐的人！”晏子说：“他和君主只是气味相投。所谓的和，如果用口味来作比方，君主如果尝出甜味，臣子就应该尝出其中的酸味；君主觉得味淡，臣子就应该尝出其中的咸味。但是梁丘据却不同，君主说是甜味，他就说是甜味，这称为气味相投，怎么能称得上和谐呢？”晏子又一次拂了齐景公的面子，齐景公又不高兴了。

过了一会儿，齐景公向西望去，突然看见了彗星，于是便召见伯常骞，要他祈祷让彗星隐去。晏子说：“不可，这是上苍在教诲人们，用以警诫人不恭敬的行为。现在君主如果能够修文德、纳谏言，即使不祈祷彗星隐去，它也会自行消失。而现在君主却好酒贪杯、连日作乐，不整改朝政，纵容小人、亲近谗佞、喜欢倡优，这样下去，何止彗星，就连孛星也将会出现了！”意思是会有更不好的征兆出现了，齐景公听后就更不高兴了。

这件事过去没多久，晏子就过世了。齐景公走出门外，背靠着照壁而立，叹息说：“昔者从夫子而游，夫子一日而三责我，今孰责寡人哉？”晏子过世之后，齐景公常常思念晏子的教诲，说：“以前先生伴寡人出游，曾经一日三次责备寡人，现在还有谁来责备寡人呢？”

由此可见，爱之深，责之切。晏子感恩齐景公的信任，不希望齐景公犯错误，总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劝导他。如果一位领导者身边有幸

有一位老师般的人物，看到领导者有问题，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来，那么这位领导者的提升一定会很快，而且也不容易犯大的错误。所以古代的明君都以能够得到犯颜直谏的臣子为荣幸，甚至想方设法地引导臣子们指正自己的过失。

在现代社会，除了父母之外，很少有人能够直言不讳地指正我们的过失。就是因为父母爱子心切，他们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有问题而不去指正。看到孩子有问题，父母经常是不管孩子高兴不高兴，都要给孩子指正过来。但是我们做儿女的，却不能够体会父母的良苦用心，甚至还逆反，与他们对立。

《吕氏春秋》中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贤明的君主最重视的莫过于士人，之所以重视士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犯颜直谏。如果他讲话非常直接，那么这个君主就能够看到自己邪曲不正的地方，把自己的错误、过失都更正过来。

《吕氏春秋》记载，能意去见齐宣王，齐宣王说：“寡人听说你这个人‘好直’（就是喜欢直言不讳），有这回事吗？”能意说：“我怎么称得上‘好直’呢？我听说‘好直’的人，他的家不选在动乱的国家，也不会去见品德上有污垢的君主。而我的家安住在齐国，今天又亲自来见君主，怎么能说我‘好直’呢？”《吕氏春秋》评论，能意如果在君主之旁，一定能够做到不阿谀奉承君主。如果他不阿谀奉承君主，君主所得就不会少。这是为贤主所希求，而为不肖的君主所厌恶的。因为不贤德的君主厌恶直言不讳的人。

如果君主想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就要愿意任用敢于犯颜直谏的人。如果我们的脸上有一个黑点，出去之后怕人看见了丢面子，这时如果有人提醒我们，我们尚且对他感恩戴德。但是当我们做事有不足，人格上有欠缺时，有人为我们指正出来，希望我们做得更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这样的人感恩戴德呢？

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读书人都讲求道义，如果遇到了一位能够尊敬他的领导者，他就是肝脑涂地，也要报答君主的知遇之恩。而回报的最好方法，就是帮助君主提升，所以才会经常直言不讳。正如《周易》中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大王的臣子忠厚老实、犯颜直谏，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是想匡正君主的过失。君主有过失，是危亡的征兆。见到君主有过失而不去劝谏，就是无视君主陷于危亡的境地。而忠臣总是不忍心看着君主处于危亡的境地而置之不顾。所以爱之深，责之切。如果我们周围有能够直言不讳指正自己过失的人，甚至冒着“大不敬”的罪名，还能劝谏、提醒我们的过失，这个人就是真正为我们着想、最忠心的人。从晏子对齐景公的谆谆教诲之中，就能体会到晏子的忠心。

当然晏子的忠心还表现在很多处，《晏子》中这样评价：“晏子相景公，其论人也，见贤即进之，不同君所欲；见不善则废之，不避君所爱；行己而无私，直言而无讳。”晏子作为齐景公的宰相，他待人的原则是，看到贤德之人就推荐，不求与君主的想法相同；看到不贤德的人就罢免，不避开君主所宠爱的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存私心，规劝君主能够直言不讳。

还有一个故事，从中可以感受到晏子的无私。

晏子上朝的时候，坐着破车，驾着劣马。齐景公看到这种情景后说：“是不是先生的俸禄太少，为何乘坐如此破旧的车？”退朝之后，齐景公很关心晏子，就派梁丘据给晏子送去一辆大车，但是去了好几次，晏子都不接受。齐景公很不高兴，派人立刻召晏子进宫。晏子来了之后，齐景公对他说：“先生如果不接受寡人所赠的车马，寡人以后也不乘车马了。”

晏子说：“君主让我监督群臣百官，因此我节制衣服、饮食的供养，为的是为齐国的百姓作出表率。尽管如此，我仍然担心百姓会奢侈浪费而不顾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君主乘坐四匹马拉的大车，我作为臣子，也乘坐四匹马拉的大车，那么对百姓中那些不讲礼义、衣食奢侈而不考虑自己

行为是否得当的人，我便无法禁止了。”于是，晏子还是没有接受齐景公的好意。换现在的话说，齐景公想送晏子一辆豪华轿车，而且这辆车的级别很高，与齐景公自己乘坐的车子的级别是相等的。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很大的荣宠，那么高档的车，还是君主所赐，说明自己受到了君主的礼遇。但是晏子考虑到这样有违礼义，而且还会带动全国兴起奢侈之风，所以拒绝接受。

由此可见，晏子没有任何私心，对齐景公忠心耿耿，一心想辅佐他把国家治理好。所以晏子过世后，齐景公非常哀痛。

《晏子》中记载，“景公游淄，闻晏子卒，公乘而驱”。齐景公出游淄川，听说晏子逝世的消息，急忙乘车赶回。“自以为迟，下车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齐景公自以为车跑得慢，于是跳下车来奔跑，但是发现自己跑还是不如坐车快，又上车疾驰。“比至于国者，四下而趋，行哭而往”。到达都城之后，在路途上，先后四次下车奔跑，边跑边哭。“至伏尸而号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逸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赶到晏子家，趴在晏子的遗体上失声痛哭说：“大夫，您经常批评寡人的过错，大事小事无所遗漏。尽管如此，寡人仍然奢侈放纵而不知收敛，因此百姓对寡人有很多积怨。”“今天降祸于齐国，不加寡人而加之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乎？”他说：“如今上天降灾于齐国，却没有降在寡人的身上，先降到了夫子的身上，齐国的江山要危险了，百官之中还有谁能指出寡人的过失？”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齐景公的哀痛出于为君者对臣子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恩之心。在那一刻，齐景公回想起了晏子从前辅佐自己的时候，对自己点点滴滴的教诲，不失时机的劝导，苦口婆心的劝谏，忠心耿耿的付出。所以这种哀痛之情也是君臣之间深情厚谊的自然流露，这种深情厚谊正是君臣在多年相处的过程中累积起来的。

从这里看到，古人贤君忠臣之间的相处确实是以道义相交，天荒地

老。而不像现在的一些人，以功利与人相处，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而没有丝毫恩义、道义、情义可言。

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

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群书治要》卷十一《史记上》

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对于天下来说，我的地位不算低贱了。然而我洗头发的时候，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饭的时候也数次吐出口中的食物，起身去接见贤士，即使这样，还怕错过了天下的贤人。你到了鲁国，千万不要仗着国君的身份看不起人。”这句话提醒领导者，虽然自己身份高贵，但是要礼遇贤才，这样才能感召贤人协助治理好国家、企业。

刘邦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说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人杰也。吾能用之，吾所以取天下也。”

所以君主对于贤德之人，要尊重、礼敬、信任，还要重用，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

第二十七讲

任贤的十重难处



治天下的最高境界：三至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讦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贤臣不用，则国非其国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六《申鉴》

《孔子家语》记述孔子为曾子讲解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时，提到“三至”：“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至高的礼不需要讲谦让，天下就能够得到治理；最高的奖赏不需要耗费资财，天下的士人都喜悦；最高境界的音乐不需要发出声音，就能使天下的百姓感到满足而和睦相处。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够认真地实行这“三至”，天下的君主都会知道他的名声，天下的士人都可以做他的臣子，天下的人民都可以为他所使用。

曾子听后不太理解，问道：“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再详细解释一下？”孔子说：“古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古代明智的君主对天下贤德之士的名字都很了解。例如，现在一些企业家在各自企业学习《弟子规》，推行传统文化，甚至兴办道德讲堂，不但把自己的企业建

设成和谐幸福的企业，而且通过道德讲堂感化了成千上万的人，为社会风气的改善做出了很大贡献。

“既知其名，又知其实”，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还不够，还要去调查一下是不是名副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知道他们所做的事名副其实，确实不为名、不为利，无私奉献，目的就是使人们看到传统文化的效果，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是可以教得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仍然适用。知道这一事实，就要“以天下的爵位”来尊敬他，要给他一定的名位。虽然这些人做这些好事并不是图名图利，但如果国家能够尊重他们，必将带动一种尊贤的风气，引导大家向他们学习。“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这就是所谓的最高的礼不需要讲谦让，天下便能够得到治理。

“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用天下的俸禄，使这些贤德之士都富裕。国家愈认可、承认那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人，整个社会就愈知道应该学习他们、应该去做有利国家的事。“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这就是最高的奖赏不需要耗费太多资财。只要君主封赏的都是有德行的贤良之士，天下之人就都会非常喜悦，称赞领导者英明。

“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如果领导者能做到这些，天下赞叹的声音自然就兴起来了。人民都夸赞你、佩服你，当然愿意配合你的政策。“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即至高的音乐，不需要奏出声音，天下的人民都能和睦相处。

达到这种境界最重要的就是要求领导者贤明，能够知人善任，任用贤德之士。这样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使天下得到治理，而且也不需要耗费资财，天下的贤士都因能各得其所而喜悦。如果贤德之士在位，他们的言传身教就会使人民自然受到良好教化，彼此和睦相处，人民也会为国君所用。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

“惟恤十难”，“恤”，顾及、顾念。在考虑任用贤能之士方面有十难：一是不知贤；二是不求贤；三是不任用贤能；四是用贤而不能善始善终；五是因小小的嫌隙而否定可贵的品德；六是因小小的过失而抹杀大功；七是因小小的缺点而掩盖整体的美善；八是因奸邪之人的攻击而伤害忠正之士（“干讦”，在历代各本的《申鉴》之中多写作“奸讦”。“奸”是邪恶不正，“讦”是揭发别人的隐私，攻击别人的短处。“以干讦伤忠正”，就是因为奸邪之人的攻击而伤害忠正之士）；九是因邪说而扰乱了正规的法度；十是因谗言嫉妒而废弃贤能之士。这就是所谓的十难。这十难不除，贤臣就不能被起用，贤臣不被起用，国家也将不是国家了。

这句话说明，国家能否得到治理，社会能否安定，君主能否安逸，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是否能够任用贤能之士。

不知贤

“一曰不知”，即不知道谁是真正贤明的人，没有知人之明。《孔子家语》中记载，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应怎样任用鲁国的士人来治理天下，怎样选拔有德行的人？孔子为鲁哀公讲了“五仪”，即士人有五个等级：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君主如果能够审慎地辨别这五个等级，那么就完全能够明白治理的道理。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庸人心里没有存着要谨慎行事、善始善终的原则，口里也讲不出伦理道德的教诲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也不会选择贤人来托付终身。“不力行以自定”，更不会力行伦理道德来成就自己。“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在小事上明白，在大事上糊涂，不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随波逐流，没有主见。“此则庸人也”，这就是所说的庸人。世间的庸人很多，每

天谈论家长里短，损人利己，但是对于怎样谨慎地落实伦理道德的教育，怎样提升自己的德行，他们都不去理会。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士人心中有一定的目标，做事也有一定的原则。虽然不能够完全明白道德学问的根本，但是他一定有所遵循；虽然不能够做事尽善尽美，具备各种美德，但是一定有遵守的道德规范。“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所以他的智慧不务求多，但是对于自己所知的一定有审慎的态度；言语不务多，但一定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能够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的行为不务多，但是一定要知道行为的原因。“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通过智慧可以知道真理、原则，言语也能够表达清楚，行为也就自然依从，就像性命身体一样，不会改变。这就是心有所主，不会随意地更改自己的志向。“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富贵不足以让他更加骄慢，贫贱也不足以让他有所忧戚，这就是士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士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士人有明确的目标，能坚持不懈，还能做到宠辱不惊。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君子说话忠诚守信，心里没有埋怨；行为符合仁义道德，却没有夸耀自己的神态；思虑非常通达明了，言语却不专断。他信奉道义，而且身体力行、自强不息；他的所作所为是自然而然的，就好像你能够超越他，但终究赶不上，这样的人就是君子。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贤者也。”所谓的贤者，他的德行都符合礼法的要求，中规中矩；行为一定没有逾越；言论可以成为天下的标准，令天下人效仿，又不伤害到自身；他

讲的道可以教化百姓，也是因为他能够身体力行，所以也伤及不到本人；如果他富裕了，天下的人就不会积财丧道；因为如果他富裕了，就会惠施百姓，而不是把钱财积累在自己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就没有病贫的人。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圣者也。”圣者的德行合于天地，就像《周易》中所说的，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他不像贤者那样中规中矩地做事，随着时节因缘变通无碍，没有一定的执着，就像我们所说的“法无定法”，他会随缘不变；他能够穷究万世万物终始的规律和道理，能够使万物自然协调；能够把大道传布天下，使天下的人自然地改变情性，形成一定的道德品性；他的光明和日月同辉，他的教化影响也非常神速，就像神明一样。百姓不知道他的德行，即使见到他，也不知道他高深莫测，不知道他的境界到底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觉得他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实际上，他的德行、他的教化影响非常广泛，这样的人就是圣者。

你能够区别这五种人，就能够知道哪一种人可以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所以首先要知道如何分辨不同等级的人才。

不求贤

“二曰不求”，不知道用心去求取人才。《傅子》说：“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贤能之士，何世无之。”圣人确实不是世世代代都有的。古人说，“五百年而有王者兴”，五百年才出现一位圣王。但是贤德之士、有能力的人，哪一个时代没有呢？既然有，为什么领导者却得不到人才？

《傅子》中也有明确的论述：像虞舜、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圣人，他们想实行王道，贤臣就会出现来辅佐他们；齐桓公想称霸天下，管仲这样的臣子就出现了；秦孝公想富国强兵，商鞅这样的法家人物也就来辅助他

了。“欲王则王佐至，欲霸则霸臣出，欲富国强兵，则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得，唱无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天下并不是真正缺乏人才，如果想称王天下，辅佐想称王的人就出现了，如果想称霸天下，助力称霸天下的臣子就出现了，如果仅仅想富国强兵，帮助富国强兵的人也就来到了。只要追求，没有求不到的。至圣的明王一旦倡导，天下的贤人自然会应和。天下并不缺乏贤才，只看求与不求罢了，怎么还会忧愁天下没有人才？

《说苑》记载，齐宣王在殿中端坐，淳于髡在旁边侍坐。齐宣王说：“先生，请您谈论一下寡人有什么爱好。”淳于髡说：“古代的君王所喜欢的有四种，而大王只喜欢其中的三种。”齐宣王说：“您可以详细地说给寡人听一听吗？”淳于髡说：“古代的君王喜欢骏马，大王也喜欢骏马；古代的君王喜欢美味，大王也喜欢美味；古代的君王喜欢美色，大王也喜欢美色。但是古代的君王喜欢贤士，唯独大王您不喜欢贤士。”齐宣王听了后说：“国家没有贤士，如果有贤士的话，那我自然会喜欢他们。”淳于髡说：“古代有骅骝、骐骥这样的骏马，现在没有这样的骏马了，大王又从众多的马中去选取，可见大王您是真的喜好骏马。古代有豹胎、象胎这样的美味，现在没有这样的美味了，但是大王也会从众多的美味中去选取，可见大王也是真的喜好美味；古代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女，现在没有了，但是大王也会从众多的美女之中去选取，可见大王也是真喜欢美色。如果大王一定要等待尧舜禹汤时代那样的贤士出现才喜欢他们，那么尧舜禹汤时代那样的贤士也就不喜欢大王您了。”齐宣王听了之后默默无语。这则故事说明，天下其实并不缺少贤士，德才兼备的人很多，只是君王没有用心去求招罢了。

《韩诗外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晋平公到河里去游玩，很快乐，他说：“怎样才能让贤士和寡人共享这种快乐呢？”划船的人马上跪下说：“君主不喜欢贤士罢了。珍珠产自大江大海，玉器出产于昆仑山，它们都

没有长脚，但还是来到了我们的国家，原因是君主您喜欢它们。现在有贤士，贤士还长着脚，却没有来到我们国家，是因为君主没有真正喜好贤士的意愿。怎么担心没有贤士？”

平公听了之后说：“寡人的食客，门左有一千人，门右有一千人。早晨的食物不够吃，就派人晚上去征收赋税；晚上的食物不够吃，就派人早晨到市场上征收赋税。怎么说我不喜欢贤士呢？我养了这么多的食客！”划船的人说：“鸿鹄一振翅就能飞翔千里，所依靠的是翅膀上六条强劲有力的茎羽，而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增加一把不会让它飞得更高，减损一把也不会让它飞得更低。君主现在的食客不过是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罢了。”意思是，真正有用的、贤德之人少之又少。《诗经》中说，谋划的人太多，事业不能成功。所以不管是一个团队，还是一个企业，并不是人愈多愈好，而是要有真正贤德的、有能力的人。这也就是古人说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能求取贤才，关键在于领导者对于贤才要有恭敬、礼遇、真诚的态度。所以礼敬贤才、重视贤才与否，是评价一个领导者是否贤明的重要标志，更是一个领导者能否建功立业的根本保证。

《孔子家语》中记载，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当今的君主，您认为谁最贤明呢？”孔子说：“我没有碰到过贤明的君主，如果说有一位贤明的君主的话，那就是卫灵公吧。”哀公问：“卫灵公是怎么做的？”孔子说：“卫灵公有一个弟弟公子渠牟，他的智慧、信义可以治理千乘兵车的中等国家，卫灵公很喜爱他，并且非常重用他。卫国有一个士人王林国，如果发现贤德的人，一定会向上举荐，如果贤德的人被退黜了，他还要把自己的俸禄分给他，所以卫国没有被埋没的读书人。卫灵公知道了这件事，便对王林国非常尊敬。卫国有一位士大夫庆足，每逢多事之秋，他一定会出来辅佐君主国家。当国泰民安的时候，他便从官位上退下来，把位子让给那些贤德的人。卫灵公对他非常尊敬，奉为上宾。卫国还有一位

大夫史鳅，因为开始与卫灵公政见不合，便想离开卫国。后来卫灵公知道自己错了，在郊外住了三日，反省自己，连音乐都不听了，琴瑟不奏，一定要等史鳅回国之后，灵公方肯回朝。所以我认为卫灵公是一位贤明的君主。”由此可见，真正贤明的君主，一定非常重视求取任用贤德之士；而要求取贤德之士，君主必须非常尊敬他们，有礼贤下士的态度。这些德才兼备的人才愿意为君主付出。

《尸子》中说：“下士者得贤，下敌者得友，下众者得誉。故度于往古，观于先王，非求贤务士，而能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者，未之尝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尝见也。”礼贤下士的人能够得到贤才，能够对敌人礼敬的人可以化敌为友，能够对众人礼敬的人可以获得众人的称誉。纵观整个历史发展和古代圣王的治国经验，如果不依靠贤才，没有哪个先王可以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如果君主没有按照正道来求取贤才，贤才也招致不来。这说明领导者真诚、礼敬的态度非常重要。领导者对贤德之士有真诚恭敬的态度，才能得到贤能之士的真诚帮助，成就事业。

不任贤

“三曰不任”，就是不能任用贤德之士。《中论》记载：“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即使是末代的亡国之君，其朝廷中也不是没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其府库中也不是没有圣贤的典籍，但是他们最终免不了灭亡，原因在于“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有贤德的人，但是不被君主重用，有圣贤的典籍及治国的方法、策略，但是没有被君主推行。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孔子家语》中记载，子路请教孔子：“贤明的君主治国首先应该重视什么？”孔子说：“尊敬贤德的人，轻贱不贤德的人。”子路又问：“可

是我听说晋国的中行氏也尊敬贤德的人，轻贱不贤德的人，为什么他还是灭亡了？”孔子说：“中行氏尊敬贤德的人，却不能任用他们，轻贱不贤德的人，却不能够罢免他们。贤德的人知道中行氏不重用自己，就有怨恨之心，不贤德的人知道他轻视自己，就对他有仇恨之心。怨、仇这两种情绪并存于国家，而邻国的敌兵又在郊外作战，中行氏想不灭亡，怎么可能呢？”

所以对于贤德的人一定要重用，对于不贤德的人一定要宽容。如果像中行氏那样，有了贤德的人却不能重用，有不肖之人却不能罢免，这样就很难治理好国家，事业也很难兴盛。

《六韬》列举了七种贤者不能够被国君重用的具体原因：第一，“主弱亲强，贤者不用”。君主弱小，他的亲属势力强大，权力无法集中在君主的手中，即使出现了贤德的人，也不能被君主所重用。第二，“主不明，正者少，邪者众，贤者不用”。君主不够明智，而身边正直的人少，邪曲不正的人多，贤德的人也不会被重用。第三，“贼臣在外，奸臣在内，贤者不用”。贼臣在外诽谤，奸臣在内进献谗言，贤德的人也不会被重用。第四，“法政阿宗族，贤者不用”。法律政策总是偏向于自己的亲戚，导致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这样贤者就得不到重用。第五，“以欺为忠，贤者不用”。把欺骗自己的人当成是忠臣，贤者就不会被重用。第六，“忠谏者死，贤者不用”。忠臣发现国君有错误，不惜犯颜直谏，指正其过错。但是君主喜欢巴结谄媚、阿谀奉承的人，厌恶直言不讳的人，不仅不奖赏贤臣，反而会置贤臣于危险的境地，这样贤者也得不到重用。第七，“货财上流，贤者不用”。财货都流到上面去了，也就是君主贪财好利，而贤德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自私自利、贪财好利的心。君主有这种喜好，贤德的人当然不会得到重用。古人把这些贤德之人不被重用的情况都列举出来，警示后代的领导者引以借鉴。

任贤不能善终

“四曰不终”，虽然任用了贤德之人，但是不能善始善终。

《典语》中将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古代的人把君主称为头脑，把臣子称为大腿和胳膊，也就是四肢，表明大臣和君主原本是一体的关系，就像一个身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

“尧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强四支而辅体也，其为己用，岂细也哉？”譬如尧帝能够明了地辨别德才兼备的人，并且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官职，这样就如同强健了四肢，也就能辅助身体，对自己的帮助怎么会小呢？

“苟非其选，器不虚假。”“假”是授予、给予的意思。如果一个人不符合选拔的标准，不是合适的人才，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如果真正得到了德才兼备的人才，就要任用不可怀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击身。”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体信任他的手一样；反过来臣子侍奉君主，也就像手触摸他的身体一样。

“安则共乐，痛则同忧。”他们共享安乐，共同患难，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怎么能够互相怀疑呢？这就表明君主和大臣的关系就像头脑和四肢的关系一样，应该互相信任，而没有任何的疑虑之心，只有这样任用贤才才能善始善终。任用贤才不能善终的原因，就是对贤才起了疑虑，不能完全信任。

求全责备

“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这几条都是指在用人过程中的求全责备。

《袁子正书》中说：“故凡用人者，不求备于一人。桓公之于宁戚也，知之矣。”凡是君主用人，都不能对人求全责备。齐桓公和宁戚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宁戚想去齐桓公那里求得官职，侍奉桓公，但是他穷困潦倒，没有办法举荐自己。于是，他就为那些走商的人驾车，终于到了齐国，晚上住在城门之外。这时，齐桓公到郊外去迎接客人，晚上开了城门，让赶车的人都回避。宁戚正好在车下喂牛，看到了桓公，就赶紧敲响牛角，唱起了凄厉的商歌。桓公听到歌声后说：“这个唱歌的人可不是平凡之人。”由此可见，桓公也很了不起，他从一个人的歌声中，就知道这个人的不平凡。于是，齐桓公就命令把宁戚载进城去。

齐桓公返回城内，宁戚来求见，劝说桓公要统一整个国家。第二天，宁戚又来求见，劝说他要称霸天下。齐桓公听了他的进谏，非常高兴，就想任命他做官，委以重任。但是在这个时候，群臣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此人是魏国人，魏国离齐国不远，不如派人去打听一下，如果他确实是一个贤才，又有德行，再任用也不迟。桓公说：“你讲得不对！如果去打听他，恐怕因他有小的过恶，就忘记了他大的优点，这是君主之所以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而且人才本来就是难以用尺度去衡量的，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只要用他的长处就可以了。”桓公没有派人去打听宁戚的为人，而是对他委以重任，封他为卿。正是因为齐桓公的举动很得当，所以得到了贤士，能够称霸天下。

由此可见，大多数人都不是圣贤人，都会有一些小的过失、缺点、不足。如果希望他没有任何瑕疵，是办不到的。所以任人不能求全责备。

《文子》中说：“今人君之论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细行，而求其不善，即失贤之道也。”现在，当君主评论臣子的时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劳和贡献，而在他细小的行为上做文章，挑剔他小的不善、小的错误，这是失去贤士的原因。“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其小

故”。所以一个人有很高尚的德行，就不要在他细小的行为上做文章；一个人有很大的声誉，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这都是告诉我们人无完人，如果想求取十全十美、一点错误都不犯的人，是很难找到的。

《文子》中还说：“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自古至今，从历史上看，没有十全十美、德行无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责备于任何一个人。后面还做了两个很好的比喻：“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也。”夏禹佩戴的璧玉，也不是没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没有污点的。但是天下人仍然认为它们是宝贵的东西，不以小小的瑕疵来妨碍它们的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如今只记着他的短处，而忘记了他的长处，还想在天下求得贤才，这是难上加难。

古人讲：“任人之工，不强其拙。”任用人才就用他的特长之处就好，不应强求他做不到的地方，这是任人的大纲。这提醒领导者，任人不能求全责备，否则就会失去贤才。

用人而疑

“八曰以干讦伤忠正”，《刘廙政论》中说：“自古人君，莫不愿得忠贤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访之于众人也。忠于君者，岂能必利于人？苟无利于人，又何能保誉于人哉？”自古以来，做君主的没有不想得到忠贤之士而任用的。但是得到这些忠贤之士后，却又不免去向众人调查，问一问这些忠贤之士究竟如何。忠于君主的人哪里能够事事都有利于他人？如果因一件事得罪了人，没有为人带来利益，怎么能够让众人都称赞他，在众人中得到好的名声呢？

如果君主自己不贤明，就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忠贤之士。即便得到了忠贤之士，忠贤之士也已经到他身边来辅佐他了，君主也会怀着一种猜

疑之心，派人去调查。而调查的人又不一定都是贤德忠正之人。那么奸邪之人就会对贤德之士有一些偏颇的言语和评论。如果君主听之任之，就会对忠贤之士产生怀疑，从而不予重用。

《群书治要·体论》中记载：“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虑之，与愚者断之；使修士履之，与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任命了贤德之人做事，又让不贤德之人来议论他；让有智慧的人来谋划，却又让愚钝的人来决断；让有修为的人去履行某一件事，却让奸邪之人去怀疑他，这些也是君主经常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君主对贤德之人不能做到用而不疑，经常产生猜虑之心，结果使得贤才的才华不能得到充分施展，这也是失去贤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十八讲

任人唯贤，用人必察



以邪说乱正度

前一讲中提到在任用贤能之士方面有10个难处，其中第九个难处：“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就是以邪说扰乱正规的法度。这个法度，是指治国的常理常法，也就是常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等。

《群书治要》中记载，有人把酒酿造出来献给禹王，禹王尝了之后说，以后肯定会有人因为饮酒而亡国丧身的，对于饮酒这件事要特别谨慎。

古代人修身、教学是事无巨细，想方设法地提醒自己。譬如，汤王的洗脸盆上刻有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洗脸的时候，他提醒自己在德行上要有所提升，要改过自新。在他读书的桌子右侧，也有一句提醒自己的箴言，他所到之处看到的，全都是提起自己的正知正见的东西。

以谗嫉而废贤能

“十曰以谗嫉废贤能”，因为谗言嫉妒而废弃了贤能之士。《战国策》中“三人成虎”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魏国大臣庞葱很受魏王的器重。有一次，魏国的一位世子要到赵国去做人质，魏王派庞葱陪同他一起去。这说明魏王对庞葱的能力非常认

可，对他也非常信任。庞葱确实很有智慧，他知道国君很容易受左右人的影响，如果左右的人进奉谗言，久而久之国君很有可能就不信任自己了。所以临行之前，他向魏王讲述了一则寓言。他说：“大王，如果有人对您讲，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在闲逛，您会相信吗？”魏王想都没想，哈哈一笑说：“寡人当然不信，老虎招摇过市，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庞葱接着问道：“如果又有一个人从街市上回来了，告诉大王大街上有一只老虎，这回大王信吗？”魏王犹豫了一下，说：“这就很难说了，要考虑一下才行。”庞葱继续问：“如果第三个人也这样说，大王会信吗？”魏王肯定地点了一下头，说：“如果三个人跑来都这样讲，那肯定是真的了。”

这时候庞葱就说：“街上怎么可能有老虎？街上没有老虎是事实，那些说有老虎的人只是在互相传谣而已。可是大王您为什么会相信？就是因为说的人太多了，所以大王才相信。而现在我和世子要到赵国去做人质了，赵国远离魏国，比从这儿到大街的距离不知道远多少倍。大王对我们在那里的情况肯定不清楚，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进谗言，诽谤我们的人又不止三个，大王可能就会怀疑我们。希望大王您能够明察。”魏王听了之后说：“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庞葱告辞，陪着世子到赵国去做人质。但是他走了之后，毁谤的声音很快就传到了魏王那里。结果世子结束了人质的生活，回到魏国的时候，魏王已经不再信任他，也不想任用他了。由此可见，谗言的力量是多么可怕，即使魏王已经提前受到提醒，做过预防，但是仍然敌不过谗言的泛滥。

听信谗言，不仅会破坏君臣之间的关系，还会破坏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古人有一首《听谗诗》，说明了谗言对人际关系的危害。诗中写道：“谗言慎莫听，听之祸殃结。君听臣当诛，父听子当决，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君听臣当诛”，领导者听了别人的诬词谗言，可能在诬词的蒙蔽之下把忠臣给杀了；“父听子

“当决”，假如父亲听信了谗言，父子关系会出现障碍，可能父亲要和儿子决裂了。“夫妻听之离”，夫妻之间听信了谗言，可能要离婚了。“兄弟听之别”，兄弟之间听信谣言、谗言，兄弟之间也就分开了。“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朋友之间听信了谗言，关系就疏远了。古人说：“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这些都在提醒我们要有明智的判断，不要妄信谗言。

“谣言止于智者”，特别是领导者要知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真正希望我们幸福和谐的人，绝对不会故意制造矛盾，影响人际的和谐。人要不听信谗言，臣子才能不受灾殃，父子、夫妇才能够相保如初。

听信谗言的原因就在于“谗不自来，因疑而来”，谗言不是自己来的，而是因为内心先有了怀疑，才会感召而来。“间不自入，乘隙而入”，离间的话之所以会乘隙而入，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有一些嫌隙、误会，离间的话语才容易进去。所以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反求诸己”，要检讨自己是否疑心太重，对身边的人有成见、有嫌隙，才使得谗言趁机而入。

谗言都是出于嫉妒之心，一般人之所以会因嫉妒而进谗言，也是因为不明了嫉妒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恶果。

《周易》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嫉妒心让人心理失衡，还容易导致怨恨，甚至因此做出一些诽谤、伤害他人的行为。这种心态是一种恶的表现。

治国之道，知易行难

治国的道理讲起来很简单：只要秉持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的原则即可。但是这个原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是难上加难。例如，修身要从克服习气做起，戒除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方面只一个“贪”字就很难克服，

贪财、贪色、贪名、贪利之心都没有，戒贪才做圆满。要做到像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说，连一个恶的、不符合礼的念头都不能够有，谈何容易？

一个“贪”字，就是花上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工夫，也不可能完全戒除。再说“嗔”，嗔恚嫉妒，现在的孩子从小受西方教育的影响较深，竞争意识非常强，见人之得，如己之失，见人之失，如己之得。自然而然，要克服嗔恚嫉妒，也需要十几年、二十几年时间。再看愚痴，如懈怠、放逸、懒散、沉迷，都是愚痴的表现。再看傲慢，《群书治要·文子》中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为非者寡矣。”生来就又富又贵的人，特别容易傲慢。生在富贵之家，特别作为君王、领导者，如果不熟读圣贤经典、长时熏修，能不傲慢的、不做错事的人，都是很少的。贪嗔痴慢疑，这几方面要戒除一个都不容易，所以修身要奠定好根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教学为先”就是要尊重圣贤之人，但是圣贤之人虽然有，如果遇不到明君，也很难被重用。孔子在世的时候周游列国，就是希望自己的仁爱学说能够为哪一位国君所采用，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为天下的人做出良好的示范，让天下人都来学习，但他却遭遇了重重困难。

当孔子到达楚国的时候，楚昭王有意任用孔子，为了表示自己对孔子的敬重，还想把有居民的方圆700里的土地封给孔子。但是这时，令尹子西进谗言说：“大王您看看，在您出使诸国的使者之中，有像孔子的弟子子贡这样的人吗？”楚昭王一想，说：“没有。”子西又说：“大王的相国之中，有像颜回这样的人吗？有谁的德行能和颜回相比吗？”楚昭王又说：“没有。”子西说：“大王的将帅之中，有像子路这样的人吗？”楚昭王说：“没有。”子西说：“大王的各部长官，有像宰予这样的人吗？”楚昭王仍然说：“没有。”子西说：“楚国的祖先在周朝受封的时候，封号是子、男的爵位，封地仅有方圆50里。现在孔子修治三皇五帝统治天下的

道术，彰明周公、召公的德业，大王如果任用他，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住泱泱数千里的土地吗？周文王在丰地，周武王在镐地（周初国都，今西安西南），他们的领地方圆百里，是小国的国君，最后都能够称王天下。而现在如果孔丘占有700里的土地，又有贤能弟子的辅佐，这恐怕不是楚国的福分了。”意思是说，楚国要有危险了。

楚昭王听了之后，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放弃了给孔子封地的想法。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圣人之腹。孔子周游列国，并不是想升官发财，而是希望遇到一位明君，能够把自己的仁爱学说推广于天下，让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社会得以和谐，天下得以治理。但是这些国君、臣子往往以小人之心、狭隘的心理去揣度圣人的心意，结果圣人没有被重用。所以正如前面所讲，不世之臣要遇到不世之君，才能建立不世之功。卓越的臣子要遇到英明的君主，才能够建立不朽的功勋，否则即使如圣人孔子也难免被埋没。当然孔子晚年著书立说，从事教学工作，在对后世的影响上是历代君王都无法比拟的。这也显示了教育的重要意义。

欲霸王者，托于贤

“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贤臣不用，则国非其国也。”如果以上列举的十难不排除，贤臣就不能被起用，贤臣不被起用，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如果君主不能任用贤德之人、远离奸佞之人，或者是任人出于个人的爱好，任人唯亲，就必然招致国家的败亡。

《昌言》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如果君主任用的人，不是自己的亲

属就是自己宠幸的人，没有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任人出于自己的喜好；所爱的不是美女就是谄媚巴结的人；以和自己的观点相同与否作为评判好人坏人的标准，根据自己的喜怒来行赏罚。君主高兴了就赏，不高兴了就罚。喜欢美女就忽视朝政，不理国家大事，百姓被冤枉、残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对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毫不违背四时之礼，该祭祀的时候祭祀；审判案件都是严格地在冬日行刑，按照四时的规律处理国家大事。用于占卜的蓍草和龟甲，堆积于庙门之中。用以祭祀的纯色牲畜，都成群成对地系在竖石之上。占星的人坐在占星台上不下来，祝史跪在祭坛旁不离去。纵使做到了所有这些，也无益于挽救国家败亡。

这段话的教育意义深刻，告诉领导者要“任人唯贤”。贤德之人能够教导百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真正把人心转变了，社会、国家才能够治理好。相反，只是迷于形式，即使去搞占卜、祭祀等仪式，人心转换不了，也不能免于败亡。这是因为举办仪式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人心，而不是为了仪式而搞仪式。

国家治乱的安危，不在于找人来算一卦，就可以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即使算卦的人能够推断出灾祸，但是要避免灾祸，仍然需要改变人心、积德行善。积德行善才能使整个社会风气转好，人人都做有道德的事。当然上行下效，在上的人要率先垂范，任用贤德之人，用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百姓做出表率，这尤其重要。

关于任人尊贤的重要性，《说苑》中论述道：“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君主要想平治天下，使自己的名声不朽，必须任用贤德的人，礼敬读书人、士大夫。《易经·益卦》中说：“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身处上位的人能以礼敬的态度对待在下位的人，前途一片光明。《易经·屯卦》中又说：“以贵下贱，大得民。”虽然身处高位，但能够谦恭地尊敬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够大得民心。“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将怀远而致近也。”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够布施恩德，并且以谦恭的态度对

待地位卑微的人，就能够使远方的人得以安抚，使近处的人得以亲附。

“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如果朝中没有贤德之人，就像鸿鹄没有翅膀一样，虽然想翱翔千里，但最终也不能够达到。“是故绝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如果想横渡江海，就要依托于舟船；想走很远的路，就要依赖于马车；想称霸天下兴起王业，就必须依托于贤德的人。

“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如果所任用的不是合宜的人，而想成就功业，就像是在夏至那一天，期望夜晚更长一样；向天射箭以求能射到鱼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虽舜禹犹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这样的事情即使对于虞舜、大禹这样的人也是很困难的，就连他们都会陷于困境，更何况是一般的君主呢？可见，要成就霸业，把国家治理好，必须依托于贤明之人。

依托贤明之人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袁子正书》中说：“夫处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穷，兴天下之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之类而口不劳，兼听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贤乎？”想安处天下大道，而智慧无穷无尽；兴办天下的大业，思虑不会枯竭；能够统一百家之言，而不费口舌；兼听古今言论，而心智不感到疲倦，只有靠任用贤德的人才能实现。这就说明，只有任用贤德之人，才能使君主不费劳苦、自身安逸，国家还能得到治理。

用世俗之所誉，不得其真贤

文王问太公曰：“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世乱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也，无得贤之实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誉，不得其真贤。”

——《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六韬》

周文王问姜太公道：“国君致力于举荐贤才，而没有收到功效，社会混乱愈加严重，以致国家危亡，这是什么原因？”太公答：“选出贤才而没有加以重用，这是有举贤的虚名，而没有用贤的实质。”文王问：“那么错在哪里呢？”太公回答：“错误在于国君喜好重用世俗赞誉的人，而没有用到真正的贤才。”

文王又问：“好用世俗之所誉者何也？”太公曰：“好听世俗之所誉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或以非忠为忠，或以非信为信。”文王接着问：“喜欢用世俗所称誉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太公回答道：“相信世俗赞誉的人，很可能会把并非贤能的人当作贤能的人，把没有才智的人当作有才智的人，把不忠的人当作忠臣，也可能把不诚信的人当作诚信的人。”

太公接着分析了原因：“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如果君主把世俗之所称誉的人为贤德、有智慧的人，把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称为不贤德的人，结果党羽很多的人则被举荐成为领导者，而不愿意结党营私的人反而被罢退了。那些邪曲不正的人，因为结党营私，把真正贤德的人蒙蔽了，忠臣无罪而被处死，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虚有的声誉获得了领导者的位罝。世间这个乱象就会愈来愈严重，最后国家也就免不了危亡。

《晏子》中记载着一则故事给我们同样的启发。晏子奉命到阿邑去当地方官，结果他治理了三年之后，各种毁谤的声音就传到了齐景公耳中。齐景公听了之后非常不满意，就把晏子召回来要罢免他。晏子非常有智慧，他说：“君主，我知道自己错了，请再给我三年时间，让我重新回去治理阿邑，一定会让赞誉之声传到君主的耳朵里。”于是，他回去又开始治理阿邑，果然三年之后赞叹声不绝于耳。

齐景公很高兴，要给晏子封赏，晏子推辞不受。齐景公很奇怪，说：

“你治理有功，这个封赏应该接受，你为什么推辞？”晏子说：“三年之前刚刚到阿邑的时候，我非常注意修理小路，注意家家户户的防卫，使得那些邪曲不正的人不得其便。例如，那些人想去偷东西，由于百姓注重了门户的防卫，这些人就不能得手，所以这些人很厌恶我。我又提倡节俭，兴起了孝悌的教育，告诉人们要孝敬父母、尊重兄长，而且还惩罚那些偷懒苟且之人，懒惰的人就不高兴，并厌恶我。在判断诉讼的时候，我不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有所偏向，这些权贵、豪强之人就厌恶我，这是对外而言。对我身边的人，他们有什么要求，若是合法的我才同意，若是不合法的我就拒绝，结果我身边的人也厌恶我。那些权贵之人到阿邑来考察时，我严格地按照礼仪的规定来接待他们，没有给他们过分的招待，结果这些权贵之人也厌恶我。这样，有三种邪佞之人毁谤于外，有两种谗曲不正的人毁谤于内，所以不到三年，毁谤之声就被您听到了。

“当我重新回去治理阿邑的时候，我改变了做法。不再要求人们修整小路，也不加强家家户户的防卫，邪恶之人便高兴。不再提倡节俭，对那些懒惰之人也不再给予惩罚，也不教导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了，懒惰苟且的人也就高兴了。断案的时候，偏向那些富有的、有权势的人，这些豪强、有权势的人、有财富的人也就高兴了。对我周边的人，凡是他们要求的，我都满足，也不管是否符合法律，于是，我身边的人也就高兴了。那些权贵来访时，我超过礼仪的规定招待他们，给他们很高的待遇，结果，这些权贵之人也就高兴了。因此不出三年，赞誉之声就跑到您的耳朵里了。其实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您应该给予我奖赏的，而三年之后我所做的事，您应该给予我惩罚的。但是您现在却要给予我奖赏，所以这个奖赏我不应该接受，也不能接受。”

齐景公听到这里，深有所悟。于是，他提拔了晏子，委任晏子主持国政。由此可见，世俗之人所赞誉的人不一定就是贤德之人，世俗之人所毁谤的人也不一定是不贤德之人。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

必察焉。”如果大家喜欢他，要去考察他是否有真才实德，是不是大家都与他是同党，他被提拔后，他的这些同党也同样得到好处，所以大家才称赞他。如果大家都说他不好，甚至厌恶他，那也很可能是这个人不愿同流合污，别人都贪污受贿，他自己品性清高，特立独行，不愿与他们结党营私。

要想使民主制取得良好成效，是有条件、前提的，那就是公民要具备一定的理性能力和道德素质。如果公民的好恶之心、自私自利之心都很严重，或者没有足够的远见，看得不够长远，就不可能选出德才兼备的领导者。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是哪种政治制度，人的道德素质和理智都是使制度得以良好推行、发挥效用的根本所在。

古人重视读圣贤书，就是因为读书明理，读了书的人有一定的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这样于他个人而言，行为不会有大的偏颇，也知道要选择怎样的领导者，才真正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所以我们读《群书治要》，发现《群书治要》里并没有很多具体的治国方法，都是在讲道理。如果领导者明白了这些道理，自然就知道应该怎样做。

君主侮辱臣子的结果

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辩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辩者不为使，则使不通；勇者不为斗，则边境侵。

——《群书治要》卷四十二《新序》

赵简子走上一条崎岖的羊肠山路，群臣都下车光着膀子帮他推车，只有虎会不帮忙，自己扛着戟，还唱着歌。赵简子很不高兴地说：“群臣都来帮助推车，而虎会你单单扛着一枝戟，还唱着歌。身为人臣，侮辱

了君主，该当何罪？”虎会回答道：“作为人臣，侮辱了他的君主，罪过是死而又死。”赵简子就问：“什么叫死而又死？”虎会答道：“首先罪臣自己被处死，然后他的妻子和儿女也受到牵连，也被处死，这叫死而又死。”虎会接着说：“君主已经听到了臣子侮辱君主的下场了，还想听一听人君侮辱臣子的结果吗？”赵简子问：“那是什么结果？”虎会说：“君主侮辱他的臣子，有智慧的人就不会为他出谋划策，能言善辩的人就不会为他出使其他的国家，勇敢善战的人也不会为他去作战。有智慧的人不为他出谋划策，国家就危险了；能言善辩的人不为他出使别的国家，国家的外交关系就搞不好了；勇敢的人不为他去作战，边境就会受到侵犯。”赵简子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就拜虎会为上客，对他非常敬重。可见，赵简子之所以取得一些成就，并非偶然，与他对待贤士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

——《群书治要》卷四十四《潜夫论》

这段话的意思是，国家之所以能治理得好，是因为君主英明，而国家之所以败乱，是因为君主昏庸。君主之所以英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君主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所以君主内心通达、广听兼纳，圣德就会日渐扩大，偏信奸佞之言，昏庸愚昧就会与日俱增。

可见，为政之道非常重要的态度，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国

家能治理好是一个结果，根源就在于国君英明。国家之所以败乱，是因为“君暗”，也就是君主昏庸。“君之所以明者”，是因为他“兼听”，就是能够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能够客观地了解各种情况，这样就不至于误下判断。而君主的昏庸最主要的就是偏听、偏信。“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必”作“心”字。君主的圣心通达，就是因为他能广听兼纳，这样他的德行也日益提升、扩大，这样可以做到“德日进，过日少”。“庸说偏信”，就是偏听、偏信奸佞之言、一面之词，这样君主的昏庸、愚昧就愈加严重。

第二十九讲

忠言逆耳利于行



听忠难，从谀易

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谀蒙幸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

——《群书治要》卷二十三《后汉书三》

“蒙幸”就是受到宠爱。臣听说君王没有不喜欢忠诚正直而厌恶阿谀谗佞的，但是历代的祸患，没有不是因为忠诚正直的人获罪，谄媚的人受宠所致。这大概是因为忠言难听，阿谀之言容易接受。

从《后汉书》记载中可以看到秦灭亡的教训：“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谏诤的人被诛杀，而阿谀奉承的人受到赏赐。善言凝结于忠臣的口中说不出来，国家的命令都是出自谗邪之口。

《群书治要·说苑·反质》中记载，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大肆奢淫放纵。方士韩人侯生、齐人卢生聚在一起商量：看当今的时势，不能在秦国住下去了。“上乐以刑杀为威”，皇上喜欢用刑杀设立威严；“下畏罪持禄”，臣下惧怕加罪而只图保持俸禄；“莫敢尽忠”，没有人敢尽忠言。“上不闻过而日骄”，皇上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一天比一天骄横；“下慑服以慢欺而取容”，臣下畏惧、屈从，以怠慢、欺骗来讨好皇上；“谏者不用”，进谏之官不用；“而失道滋甚”，因而愈来愈背离正道；“吾党久居，且为

所害”，如果我们长久住在这里，恐怕会被他杀害，只有逃去。

秦始皇听到这件事之后果然大怒道：“我听说这帮儒生大多在制造妖言，惑乱百姓！”于是，他命令御史将这些儒生全部捉拿归案。当时儒生有400多人，统统被秦始皇活埋了。后来侯生被抓住了，秦始皇召见了他。侯生说：“陛下，肯听我一句话吗？”秦始皇问：“你想要说什么？”侯生说：“现在陛下奢侈而丧失根本，淫逸而追求末事，宫室、台阁接连扩建重修，珍珠、美玉等贵重宝物堆聚成山，侍奉的美女、歌伎、小丑，数以万计，钟鼓之类的音乐，放纵而没有节制，无休无止，车马的彩绘装饰华丽奢靡，五彩缤纷，不计其数。结果百姓资财困竭，民力已经用尽，但是陛下自己还不知道。又因为有人把这些指为紧急严重之事，于是就用威严制服臣下遵从，下层不敢讲话，上层不明事理，因此我们才要离去。我们不吝惜自己的性命，只是惋惜陛下的国家将会灭亡。现在陛下这样没有节制，超过了丹朱的万倍，是昆吾、桀纣的千倍，恐怕陛下有十条败亡的理由，却没有可以生存的理由。”

秦始皇听后沉默了很久，说道：“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不早点提醒我？”侯生说，“陛下自贤自健”，陛下自以为贤明，自以为强盛。“上侮五帝，下凌三王”，上对五帝轻慢，下对三皇不敬。“弃素朴，就末技”，抛弃素朴，追求末技。“陛下亡征久见矣”，陛下败亡的征兆其实已经出现很久了。“臣等恐言之无益，而自为取死，故逃而不敢言”，我们怕说出来也没有用处，只有自寻死路，因而宁可逃走，也不敢陈说。现在我认为自己必死无疑，所以才向陛下陈述这些。虽然这些话不能使陛下免于败亡，但愿能够使陛下明白原因。

秦始皇又问：“我还能改变这种局势吗？”侯生说：“形势已经造成，陛下只有坐等灭亡。如果陛下想改变这种形势，能像唐尧和夏禹那样吗？否则是没有希望的。”秦始皇听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放了侯生，没有杀他。

可见，秦朝正是因为秦始皇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最后才迅速衰败。到了秦二世的时候，秦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为什么忠言难听，谄媚的话好听呢？《袁子正书》中讲道：“夫佞邪之言，柔顺而有文；忠正之言，简直而多逆。”邪恶的、巴结的言语都很温柔、很顺从，而且很有文采，让人听起来很舒服、很乐意接受；而忠正的言语却很简单、直接，而且与常人的喜好不相符合。所以一般人都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言语，而不愿意接受那些犯颜直谏的人直言不讳指正自己的过失。

《贞观政要》中说道：“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君主昏暗，臣子又喜欢阿谀奉承。君主昏暗，不能够识别人才，而臣子一味地讨好、巴结，不敢指正君主的过失，危亡马上就要到来了。这些都是提醒君主要能够乐意听取谏诤之人的言语，这样才能免遭灭亡之患。

开敢谏之路，纳逆己之言

明主患谀己者众，而无由闻失也，故开敢谏之路，纳逆己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诚，虽事不尽，是犹欢然受之。

——《群书治要》卷四十九《傅子》

“逆己”，就是不顺从自己。英明的君主担心阿谀自己的人太多，而无法听到指正自己错误的言论，所以广开直谏的途径，听取反对自己的言论。如果说的话出于忠诚，即使所说的事情并非全部正确，也会欣然接受。

君主如果不够英明，也就是正心的功夫不到家，就会喜欢听谄媚的言语。《大学》中讲道：“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如果我们因听了

一些话而生气，这时心就偏了，忠言就难以听进来；如果我们听到谄媚巴结的言语，心里就很高兴，要想不偏信都很难。

所以《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在听批评的时候，能不能稳住自己的情绪？在听赞叹的时候，能不能够很冷静，做到“闻誉恐”，想一想别人所赞叹的是不是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吻合？这样就不会被谗言所蒙蔽。而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必须去掉好恶，要有理智。

《战国策》中记载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战国时候，齐威王有一个臣子邹忌，邹忌身高八尺有余，长得非常高大庄严。有一天，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自我感觉良好，于是就问妻子说：“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起来，谁比较英俊？”城北的徐公是当时齐国众所皆知的美男子。妻子回答道：“徐公比您差远了，还是您比较英俊。”邹忌听后很高兴。没过多久邹忌又问他的妾，说：“我跟城北的徐公比起来，谁比较庄严？”妾也很快地回答说：“他比您差多了，还是您比较好看。”邹忌听了又很高兴。有一天，邹忌的朋友来找他，在谈话当中，邹忌又问朋友道：“我跟徐公比起来，谁长得英俊？”他的朋友说：“当然是您了，他怎么能跟您比？”

过了一天，徐公来家里做客。邹忌很认真地观察徐公，心里想，人家比我英俊多了，我怎么比得过人家？等徐公走了之后，邹忌再在镜子面前一照，看来看去，觉得自己的长相比徐公实在差得太远了。后来他就想，明明我长得比人家差多了，为什么我的妻子、小妾，还有朋友都说我比较英俊？想来想去他想明白了，原来“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我的妻子太偏爱我，因为她有偏私，所以她看不清楚。这就是《大学》中所说的“身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情人眼里出西施，因为自己太喜欢这个人了，所以怎么看他就怎么喜欢，怎么看他就怎么漂亮，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也看不出有什么缺点。“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小妾之所以说我长得

英俊，是因为她害怕我不宠爱她，这就是“身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心里有恐惧了，看问题也就看不清楚。朋友又为什么说我比徐公还英俊？“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是因为他有求于我，所以才说我长得比较英俊。

有一天，邹忌将这些事情告诉了齐威王。齐威王觉得很有意思。邹忌突然话锋一转道：“国君，齐国有千里之地，有120多座城池，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您身边的女子，还有左右的近臣，每个人对您都有偏私，都讲好话给您听；我才有一个人妾惧怕我，但是朝廷所有的大臣都害怕您；我家里只有三个人迎合我，我就已经分不清美丑，自以为比美男子徐公英俊。而全齐国的人都有求于您，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能看得清事情的真相吗？还能不被蒙蔽吗？”齐威王很有智慧，赞叹道：“所言甚是。”然后，齐威王自省并提出了具体的做法：“从现在开始，臣子能当面指出寡人的问题的，受最高的赏赐；能够上书写奏章，指出寡人的问题的，受中赏；在公共场合能够准确议论寡人的过失并且传到寡人的耳中的，受下赏。”

齐威王的这些举措一公布，结果门庭若市，群臣百姓都纷纷来为他提不同的意见。过了几个月之后，提意见的人慢慢少了，偶尔还会有人来。一年之后，几乎没有人来了。因为齐威王的过失全都改过来了，老百姓和臣子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了。

一年之后，齐国附近的燕国、韩国、赵国、魏国，都派人来拜见齐威王。因为齐威王的德行好，国家强盛，别的国家不敢冒犯他，还要恭敬他。这就是所说的“战胜于朝廷”。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君王有德。他在朝廷中施行德政，善于听从属下的不同意见，明察自己的过失，改正施政的弊端。结果不动一兵一卒，就让别的国家佩服、敬畏。

试想，这么多人给齐威王提意见，其中，肯定有与他的想法、做法完全不一致的意见，但他都能够欣然接受，因此才出现了诸国敬服的景象。

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有位臣子进谏，批判了很多国事的是非后就出去了。站在唐太宗身边的臣子问道：“陛下，刚才那位大臣所说的，很多都不符合事实的真相，陛下为什么不制止他、打断他？”唐太宗说：“如果朕不听完他的话，打断了他，传了出去，有人就会说皇帝不肯听臣子的进谏，就没有人再愿意向朕提意见了。所以虽然他说得不对，朕也不能打断他。”唐太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胸、雅量，所以臣子都敢于直谏，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劝之使谏，宣之使言

舜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故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

——《群书治要》卷四十四《潜夫论》

“弼”就是纠正过失。舜说：“如果我有过失，你们要纠正我。不要当面顺从，背后却又去议论。”所以治国之道，就是鼓励臣民进谏，要引导人们敢于讲实话，这样君主就能明察真伪而通晓治乱的真实情况了。

古代臣子尽忠职守的一个标志，就是看到君王有过失，能够不惜生命犯颜直谏。因为他们没有私心，但他们不是不在意自己的利害得失，而是更在意君主的危亡、百姓的祸患。

《群书治要·后汉书三》中记载东汉阳嘉三年（134年），关中地区大旱，五谷遭灾。汉顺帝亲自主持策问，召集群臣听取建议。尚书周举说：“阴阳闭隔，二气就不通；阴阳二气不通，人事就不昌盛；人事不昌盛，风雨就不及时；风雨不及时，就闹水旱灾荒。陛下居于唐尧、虞舜一样的君位，却不能施行尧舜的政治；改变了文帝、光武帝的法制，而效仿亡秦的奢侈多欲之风；宫内积聚了很多不能婚嫁的怨女，宫

外却有很多不能娶妻的旷夫。当今皇室缺少后嗣，东宫未立太子，伤和悖理，是断绝人伦所造成的结果。而且现在不仅是陛下您这样做，宦官们，也都是虚有其表，侮辱危害良家妇女，把她们娶来禁闭在家中，以致白头到死，实际上都无配偶，这违背了上天爱人之心。古时候周武王取得殷商的天下，放出了充满内宫的怨女；成汤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列举了六件事来反省自己。”

“自枯旱以来，弥历年岁，未闻陛下改过之效，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诚无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请，昔齐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谏曰：‘不可。夫河伯以水为城国，鱼鳖为庶民。水尽鱼枯，岂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这些话说得很直接，对皇帝的批评确实非常中肯。意思是，自从闹荒旱以来，已经过了好几年，没有听到陛下有改过自责的举措，徒劳君上，暴露风尘，这的确是无益的。还下令各州郡祈神求雨。春秋时齐国遭受旱灾，齐景公准备祭祀河伯，晏子谏诤说：“河伯是以水为城国，以龟鳖为庶民。水尽了鱼鳖枯涸，难道河伯就不希望下雨吗？由此看来祭祀河伯也是徒劳的。”

“陛下所行，但务其华，不寻其实，犹缘木希鱼，却行求前也。诚宜推信革政，崇道变惑，出后宫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狱，除大官重膳之费。夫五品不训，责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纳言，学薄智浅，不足以对。惟陛下留神裁察。”陛下的作为都是华而不实，就像是缘木求鱼，自己不肯迈步行走，却希望能赶上前面的人。现今确实应推崇诚信，改革政事，崇信道义，改变迷惑，放出后宫没有配人的宫女，整顿天下冤枉的刑狱，取消大官海吃海喝的费用。……臣才薄智浅，不足以应对策问，只希望陛下能留心裁决考察。

周举说了这些建议之后，汉顺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任周举为司徒，司徒相当于如今的教育部部长。因此，要重视教育，兴起道德教化，改变人心，从而改变灾荒。这才是抓住了根本。

在听取谏言方面，唐太宗也做了很好的榜样。有一次，唐太宗问长孙无忌：“魏徵每次给朕提出建议，要是不采用，他就不答应。这是为什么？”长孙无忌还没有回答，魏徵就接过话说：“陛下，微臣之所以向陛下进谏，是因为陛下做错了。如果微臣顺从陛下的意思，没有坚持到底，就违背了微臣的初衷，陛下的错误也不能够改正，所以微臣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陛下接受为止。”唐太宗说：“那爱卿就不能表面上顺从朕，不要在群臣面前忤逆朕，给朕一点面子，然后在私下里劝谏朕吗？”魏徵说道：“当年舜帝曾经说，表面上顺从我，在背地里却阳奉阴违，诋毁我的过失，这不是一个忠臣所应做的事。所以微臣还是应该犯颜直谏。”魏徵就引用了舜帝的这一句话：“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即如果我有过失，你就要纠正我。唐太宗听了之后非常佩服他。

魏徵一生向唐太宗提了两百多次意见，唐太宗都非常诚恳地接受，这就使得唐朝逐渐兴盛，创下了贞观盛世。所以领导者一定要鼓励下属提意见，对于敢提意见的下属，还要给予表彰和奖赏。只有真正没有私心，一心想让领导好、团队好、国家好的人，才敢谏言献策，指正领导的过失，这完全是出于一片忠义之心，所以要褒奖他们。

乐闻其过，过日消而福臻

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

——《群书治要》卷二十八《吴志下》

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喜欢听自己的过失，荒淫败乱的君主，喜欢听赞誉。愿意听自己过失的君主，过失就会一天天消除，而福分就会到来。喜欢听赞誉的君主，德行就会一天天受损，灾祸也就很快降临

了。这说明，兴国之君和荒乱之主对待谏言的态度不同会招致不同的结果。

凡是受过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人都明白“闻誉恐，闻过欣”的道理。孔子的弟子子路“闻过则喜”，听到别人给他指正过失，就会非常欢喜。禹则更进一步，“禹闻善言则拜”，大禹听到别人为他进谏，指正过失，提出不同建议，就要礼拜，以示感谢。正是因为他们对谏言有这样的表现和态度，所以下属才敢于、也愿意为他们提建议。君主不是圣贤人，也会犯这样那样的过失，如果他有幸得到犯颜直谏的忠臣，那么就有机会改正自己的过失，进而成为明主。

《吕氏春秋》讲道，楚文王得到了当时有名的“茹黄狗”“宛路箭”，他到云梦泽去田猎，三个月都不回来，也不理朝政。他从丹地得到一个美女，每天和美女在一起歌舞升平，一年都没有上朝，不办理政事。后来他的太保申说：“先王曾经卜卦，认为我作为太保是很吉祥的，现在大王的罪理应受鞭刑。”楚王说：“能不能变换一个方法，不要用鞭刑责罚寡人？”太保申说：“我承继的是先王的法令，不敢废除。如果大王不受鞭刑，就等于是废弃了先王的法令。我宁愿获罪于大王，也不愿意获罪于先王。”楚文王听了之后说：“好吧。”于是，太保申把席子拉了过来，让楚文王趴在上面，把50根细细的荆条绑在一起，跪着把荆条放在了楚文王的背上，如此做了两次，说：“大王可以起来了。”

楚文王问：“既然都有了鞭笞的名义，您就痛快淋漓、名副其实地打寡人一顿好了。”太保申答：“我听说，对于君子，能让他感到羞耻就可以了；对于小人，才要让他感到疼痛。如果让他感到羞耻，他都不改变自己的行为，那让他感到疼痛又有什么帮助？”太保申说完之后，站起身来走出去，请求楚文王把他处死。他在觐见楚文王前，就已经做好了要被处死的准备，但是即使如此，他也不愿意看着楚文王犯过失而不去劝谏。楚文王说：“这是寡人的过失，太保您有什么过失？”后来楚文王改变了自

己的行为，把太保申重新召回来，杀了“茹黄狗”，折了“宛路箭”，把丹地的美女也放了回去，一心一意地治理楚国。最后楚文王兼并了39个国家，使楚国的国土非常广大。

楚文王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功业，是太保申犯颜直谏的结果。假设当时楚文王犯了这些过失，身边却没有像太保申这样的人敢于指正他的过失，那他就会一直沉迷下去，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

《昌言》中说，君主有五种情况，臣子不可以劝谏：第一是废除皇后、废除太子。废除皇后和废除太子，这肯定是皇帝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做出的决定，所以这种情况不能够劝谏。第二是对自己的情欲很放纵、不节制。他放纵情欲，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已经被欲望所控制。第三是专宠一人。第四是宠幸阿谀奉承的人。第五是骄贵外戚。以上这五种情况下都不能犯颜直谏，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犯颜直谏，君主很可能不会采纳臣子的建议，而直谏的臣子也会被处死。但是这位太保申，虽然看到楚文王不节制情欲，而且宠爱一个人，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去劝谏君王，可以说是极其忠义。正是因为他的劝谏才改变了楚文王，乃至整个楚国的命运。

禁戒谏言是国家的大患

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

——《群书治要》卷十九《汉书七》

“折”就是折损、挫败。“节”就是志气、气节、操守。折辱正直之士的气节，扎住敢谏之臣的舌头，大臣们都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可是不敢据理力争。天下人都以进献谏言为禁戒，这是一个国家最大的

祸患。

这段话提出的背景是，西汉时期的汉成帝把政事委托给大将军王凤，而京兆尹王章一向忠心正直，因讽刺王凤，被王凤杀了。群臣都不敢公正地说话，只有梅福上书进谏说：“京兆尹王章秉性忠直，敢于当面引证，当廷争辩，所以孝元皇帝提拔了他，用以激励那些尸位素餐之臣，以矫正朝廷的不正之风。但是到了陛下您手里，却诛杀了他。不仅如此，还连累到他的妻子儿女，就算憎恶坏人，也应该止于其本人，不应该连累他的家属。何况王章并没有反叛之罪，现在却殃及全家，这是挫伤正直之士的气节，扎住敢谏之臣的舌头。群臣都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却没有一个人敢争辩。天下人以进献忠言为禁戒，是国家最大的忧患。”《群书治要·汉书五》中记载，周初大概有1800个诸侯国，也就有1800个诸侯国的国君。他们役使民众非常轻微，每年百姓服徭役不超过三日，国君有剩余的财富，国库充实。但是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人民精疲力竭还服不完劳役，财富用尽仍供不上他的需求。结果“劳疲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无辜死刑者无所告诉”，疲劳的人得不到休息，饥寒交迫的人无衣无食，无辜被判死刑的人无处上告。人人与他结怨，家家与他结仇，所以天下就这样败坏了。

秦始皇居于灭绝之中，自己却不知道，因为“天下莫敢告也”，天下没有人敢告诉他实情。天下的人之所以不敢告诉他实情，是因为他“无养老之义，无辅弼之臣，无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他没有养老的恩义，没有真正辅佐的臣子，没有敢犯颜直谏的士人。大家都讨好、迎合、谄媚、巴结他。对于真正有利于他的话，以及忠臣提出的建议，他也不能采纳，并且骄纵恣意地实行诛杀，贬退了批评的人，杀戮了犯颜直谏的人。臣子们被吓得战战兢兢。“是以偷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这些臣子们投其所好，以求能够容身。比喻他的德行时，就说秦始皇比尧、舜还贤明；

称赞他的功劳时，就说秦始皇超过了汤、武。天下都已经溃败了，也没有人告诉他实情，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对他讲了，他也听不进去。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最后导致秦国的灭亡。

桀纣拒谏而亡

孔子曰：“药酒（通行本中药酒也写作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汤武”指商汤王和周武王。“谔谔”指直言不讳的样子。“桀纣”指夏桀与商纣。“唯唯”，恭敬的应答语、应答声。

孔子说，良药苦口难咽，却有利于治病；正直的劝谏听来不顺耳，但有利于自我提升。商汤、周武王因为广纳直言劝谏而国运昌盛；夏桀、商纣因为狂妄暴虐，群臣只能唯命是从，而导致国家灭亡。

夏桀王整天荒淫无度、喝酒作乐、不理朝政。他的臣子关龙逢来进谏，站在他的身边不走。夏桀王很生气，把关龙逢关起来，很快把他处死。由于夏桀任用的全是奸佞之臣，而不任用犯颜直谏的臣子，结果夏朝很快灭亡。

商纣王也是如此。《史记》记载，商纣王整天喝酒享乐，沉迷于靡靡之音，喜欢和女子饮酒取乐。他的手下也有一些忠臣，所任用的人才也并不少。他任用的“三公”是鄂侯、九侯、西伯昌（即周文王）。九侯有一个女儿长得很美丽，九侯就把她进献给商纣王。但是九侯的女儿不喜欢过度淫欲，商纣王很生气，就把她杀了。不仅如此，商纣王把九侯也杀了，并剁成了肉酱。鄂侯看到了就去劝谏纣王，用非常严厉的话语指正他。纣王很生气，把鄂侯也杀了，还把他做成了肉干。西伯昌听

到了这件事，不免暗暗叹气。纣王知道了，就把他关在了羑里。后来西伯昌的几个臣子为商纣王进献了一些美女、宝马、金银珠宝，商纣王才把西伯昌放了出来。

纣王的身边还有三个贤臣，微子、比干和箕子。微子曾经三番五次地进谏纣王，结果纣王不听，于是微子就逃走了。比干犯颜直谏，商纣王很生气，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三窍，我要看一看比干的心是不是和凡人的不一样？”他杀了比干，而且剖视其心。箕子看到纣王这样荒淫无道，非常害怕，知道自己去进谏也不会有效果，于是装作癫狂，沦为奴隶。但是商纣王还是不放过箕子，把他关了起来。结果，没有人再敢去进谏，商朝也很快灭亡。后来周武王吊民伐罪，商纣王穿着珠宝玉石装饰的衣服投入火中，自杀身亡。

这些历史典故提醒后人，但凡荒淫无道并且不愿意听臣子进谏的君主，下场都不好。因为自己的错误一天一天地严重，居功自傲之心愈来愈强烈，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不接受忠言劝谏，所以最终导致了灭亡的结果。因此，孔子提醒：“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人自己没有反省的能力，又没有善友的提醒，可能会一错再错，甚至错得很离谱时，自己还不知道。

一般人都喜欢被赞叹、表扬、肯定。当了领导之后，随着自己的地位一天天地提升，有求于自己的人愈来愈多，自以为是的傲慢之心不知不觉就日益增长。当自己已经习惯听谄媚巴结、奉承肯定的话后，突然有人来当面指正自己过失，就会很难接受，甚至还会与对方对立，这样就很难看到自己的过失，问题就会愈来愈严重。

《政要论》中记载，作为人君、领导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被人蒙蔽。不被人蒙蔽的关键，就在于使下面的言论能够传达到君主这里。“为人君之务在于决壅，决壅之务在于进下，进下之道在于博听”。而能够使下面的言论传达到君主这里的关键，就是能够广泛地听取众人的意见。

“博听之义，无贵贱同异，隶竖牧圉，皆得达焉”，要真正能够广泛听取大众的建议，关键就要做到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使得奴役、童仆，乃至于放牧、养马之人都能将他们的意见传达给君主。这样，就使君主所闻、所听、所见非常广博，那么臣子“虽欲求壅，弗得也”，即使有臣子想蒙蔽他，也做不到。

所以君主如果偏听、偏信，宠爱的都是谄媚巴结、顺情说好话之人，就很容易被蒙蔽。而被人蒙蔽的根本原因，就是自己的心不够清净，也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久而久之，问题愈积愈多，最后就导致事业失败和国家灭亡。

第三十讲

无为而治是最高境界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饰辩巧言之流起矣。

——《群书治要》卷四十九《傅子》

“饰辩”指粉饰巧言、浮华不实的言语。“巧言”指动听而不实在的话。听取言论而没有审慎地判断，就轻易断定善恶，容易颠倒是非，于是卖弄言语、巧辩的风气就会兴起。

“故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所以我们听一个人的言论，不如观察他所做的事情；观察他所做的事情，不如观察他具体的行为。“听言必审其本”，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审慎地考察他这样说的原因，用心何在。“观事必校其实”，观察他所做的事情，还要核查它是不是符合事实，是否真实可信。“观行必考其迹”，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也要考察他如此行为的原因。将这三者综合起来，对一个人进行全面考察，才会减少仅仅依据一个人的言语来判定是非善恶所导致的失误。这就是“三参”，即把观言、观事、观行合起来考察。

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当然谗言也是止于智者。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清醒，明白“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的道理。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来说是非的人别有用心，无中生有，故意进献谗言、谣言。

作为领导者，如果听到谗言，不分青红皂白就信以为真，往往会使好人蒙受不白之冤。因为好人也不知道别人在背后诽谤他，即使有人诽谤他，他也不会想着去辩驳。因此，只是听信了一个人的言语就做出判断，往往会导致好人被冤枉。当下属说别人是非时，不要轻易相信。也许这个人说别人的过失，是出于嫉妒同事的成就，或者因为他对一个位置很感兴趣，而恰恰这位同事与他是竞争对手，所以才来进献谗言，恶意毁谤。因此，不能不明辨事实真相就轻易信以为真，不然那就等于鼓励人们进献谗言。

第二，别人确实有过失，有人来讲给你听。这时要分几种情况，特别要看看这个人的存心：是为了帮助同事纠正错误，让领导者兼听则明、全面地掌握事实真相，还是故意扬人之恶，败坏人的名声，或者是挑拨人际关系？

“扬人恶，即是恶。”人心厚道的人都是隐恶扬善，即使别人确实有过失，也不会到处去张扬。因为我们都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想找到一个错误都不犯的圣人，确实很难。然而有的人故意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宣扬，这本身也是自己德行浅薄的表现。

《格言别录》中说：“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行厚的人，看每一个人都有可取之处，都有值得学习、肯定、赞叹的地方，所以他口里所赞叹的人、认可的人就有很多。相反，“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德行浅薄的人恰恰相反，看谁都有可挑剔、指责、不如己的地方，心地刻薄、傲慢，所以他眼中所瞧不起的人、鄙视的人就有很多。因此，我们观察一个人，可以从他经常夸赞、肯定别人，还是经常批评、挑剔别人中来判断这个人的德行高低。

第三，有人说别人的过失，很可能是因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他误以为别人有过失，往往指善为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

况？因为我们每个人常常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别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别人，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人都是依着自己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去看别人，往往会误解他人的善行。中国有一句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是每一个人常犯的过失，因为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做善事有时比较难，因为人们自私自利的习气比较普遍，甚至自私自利的行为方式也比较能够被接受。当一个人不以自私自利为目的做善事的时候，也往往被那些有私心的人误以为是有目的。所以“善人常得谤，善事常易败”。每个人看别人的行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的。当人戴上一个黄色的镜片，看这个世界的人、事、物都是黄色的；当人戴上一个墨镜，看这个世界的人、事、物全都是黑色的。所以判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心，是刻薄，还是平和。

善人有时会被误解，做善事有时也会不能顺利进行，原因很简单，就是社会似乎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然，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孔子一生不为自己，他培养了3000多名弟子，其中有72位贤人，而且在孔子的思想影响下，中华民族代代皆有贤人出现，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贡献巨大。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皇帝，不是每一个皇帝的名字都为人所熟知，但是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孔子。

现在人之所以不能够坦坦荡荡，无论贫富贵贱都身心不安，就是因为社会上流行着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如果人总是想着自己的利害得失，就会“小人长戚戚”。小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遇事常想：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应该从中获得什么利益，我有什么损失。一个人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就会与别人竞争，竞争向上提升就变成斗争，结果，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现象就会出现。

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系统考察了各国文明历史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这样的论断：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1988年，有一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开会，面对当时世界性的道德危机、环境危机、恐怖主义等，他们提出了一个共同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这些人都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富有科学精神，他们提出这样的呼吁绝非偶然。这说明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认同。这些都让中国人更加增强了文化自信。

人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开悟。”所以看人能够看得准，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己的心地清净。

佞臣乱政

夫人主莫不爱爱己，而莫知爱己者之不足爱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废也；忘违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七《刘廙政论》

“小臣”指职位低且德行不高的官吏；“佞”指花言巧语、谄媚巴结；“忘”，这里的批注为“疑忌”，《说文解字》中，这个“忘”的意思是“不识也”。君主没有不宠幸那些喜爱自己的人的，却不知道喜爱自己的人不应该被宠幸。所以迷恋于小臣的谄媚，而不能远离罢黜他们；感受不到不顺己意的人是有益于自己的，而不愿意任用他们。

“人主莫不爱爱己”，“爱己”指喜爱自己的人，特别指那些专门满足自己的欲望、讨好自己的人。用《韩非子》中的一句话来讲，爱己的人有这样的特点：“凡奸臣者，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大凡是奸臣、小人，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都愿意顺着君主的心思去做事。他们这样做的

目的是取得君主的信任和宠幸。所以君主认为好的事，他们一定会跟着夸赞，君主所憎恶的事，他们一定会跟着诋毁。《韩非子》中的这一句话让人很容易辨别自己身边的臣子、属下到底是忠厚之人，还是奸邪之人。

《傅子》中也指出：“正道之不行，常由佞人乱之也。”正道之所以不能够顺利地推行，是由于邪曲奸佞之人在作怪。在历史上，桀信任佞臣推役侈，诛杀了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关龙逢，结果夏朝灭亡。商纣王信任佞臣恶来，把犯颜直谏的臣子比干剖视其心，最后商朝也灭亡了。

历史上从古至今，奸佞之人，即善于谄媚、巴结、讨好领导之人，却大多受到重用。这是什么原因呢？《傅子》中说，奸佞之人善于养人的私欲，所以私利、欲望很重的领导者就喜欢奸佞之人。“唯圣人无私欲，贤者能去私欲也。”圣人没有私欲，而贤者也能够去除私利和欲望。“有见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矫之者，正人之徒也。”看到人存在私利、欲望，就用正道来矫正、劝告他，这就是正直的人。“违正而从之者，佞人之徒也。”如果违背了正道，顺从人的私利和欲望，看到人存在私欲，不仅不去劝告，反而还顺从，一味地满足其欲望，就是奸佞之人。如果领导者以这样的标准进行考察，就能辨别奸佞与正直之人。

历史上，有很多臣子为了取媚君主，特别善于观察领导者的喜好，并一味地投其所好。所以为什么贪官都无一例外地被人拉下水？就是因为人都有私心、私欲，都有喜好，喜欢财的就送给他财，喜欢色的就送他美女，喜欢字画的就送给他字画，喜欢什么就送给他什么，所以贪官无一例外都被拉下水。古人说“无欲则刚”。只要人有贪求，一样东西也放不下，就无法达到高尚的境界。所以“人到无求品自高”。如果人有贪求，就可能被人控制、蒙蔽。

管仲在生病的时候，齐桓公去探望，说道：“仲父的病变重了，如果发生不可避讳的事（古人说话很委婉，意思说一旦您病故），您有什么话要提前告诉我吗？”管仲很忠心，说道：“臣希望君主能疏远易牙、竖刁、

堂巫、公子开方。易牙擅长烹饪，厨艺很高，他用烹饪侍候您。他听说您唯有婴儿的肉没有尝过，不惜蒸了他的第一个儿子献给您。就人之常情而言，人最疼爱、最重视的就是自己的儿女，但是他居然对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怎么会爱您呢？您喜爱美色，但是后宫的女子互相嫉妒，钩心斗角很严重，竖刁就把自己变成了太监来替您管理内宫。就人之常情而言，谁不重视自己的身体呢？但是竖刁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怎么能够爱您呢？公子开方侍奉您，15年都没有回国去探望亲人。他是卫国的公子，结果来到齐国一住就是15年，在这15年里，他没有回家去探望过父母，即使他的父母病故，他也没有回去。他连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都不能够记在心上，连父母都不爱，怎么能够爱您呢？”桓公连连点头道：“你说得太好了，寡人一定谨记在心。”管仲去世之后，齐桓公就罢免了这四个人的官职。

但是驱逐了堂巫之后，各种杂症就不断地发生。把易牙驱逐走了之后，很多的美味就品尝不到，驱逐了竖刁之后，后宫的秩序开始混乱，驱逐了公子开方之后，朝堂管理变得没有秩序。这时，桓公就开始怀疑管仲的说法了，他说：“原来圣人也有谬误之处！”于是，他又恢复了四个人的官职。结果过了一年，这四个人作乱，把桓公拘禁在一间屋子里，10天都不能和外界沟通。桓公这个时候才想起了管仲的劝导，说道：“如果死后没有知觉也就罢了，如果有知觉，寡人还有什么面目见仲父于地下呢？”最终，齐桓公落得了死后凄凉的下场。

历史上评论，齐桓公之所以落得这样的下场，就是因为他没有始终如一地听从管仲的话，任用贤能之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任用了奸佞之人，最后也被这些奸佞之人所害。由此可见，领导者要远离奸佞之臣，任用忠正之人；领导者要端正己身，只有自己彻底放下了私心、名利、面子、欲望，才愿意任用那些敢于违背自己意愿、直言不讳的忠正之人。

富而不骄，功成身退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还自遗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四《老子》

“金玉满堂”，形容极为富有；“莫之能守”，“莫”指没有谁；“遗”指留下；“咎”指灾祸、不幸之事；“遂”指成就、成功；“身退”指退位，不再眷恋。

金玉满堂、丰富的物质生活，很难长久地保有。富贵时生活骄纵奢侈，就给自己种下祸根。功成名就之后，能够懂得不居功贪位，适时退下，才符合大自然的运行之道。

《大学》中讲：“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如果钱财是贪污受贿、坑蒙拐骗而来，最后东窗事发，自己锒铛入狱，不义之财也会被没收、被充公。此外，还有自然界的火灾、水灾，也会把不义之财焚烧掉、漂夺走。盗贼也专会偷盗、敲诈勒索为富不仁之人。最后，不肖子孙（如败家子、啃老族）也会把不义之财挥霍掉。所以古人把财富分为两种：吉财与凶财。如果财富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而获得的，一定也会以不正当、不好的方式败散掉。

历史上，被人们所熟知的极度贪财的官员就是和珅，他被称为中国古今第一贪。和珅出身官宦世家，祖上有战功，还受过封赏。到了他父亲那一代，因为为官清廉，而且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守卫边疆，因此家里并没有很多的产业。等他父亲去世之后，其家境就开始愈来愈困窘。按理说，这样一个出身官宦，又受过苦的人，为官之后更应该知道底层人民的疾苦，本应该为官清廉。而和珅为官期间，由于深受乾隆帝的信任，位极人臣，他一人便掌握了清朝用人、财政、刑罚、抚夷等几乎所

有重要部门的大权。于是，他开始利用职权肆无忌惮地大开受贿之门。他敛财的主要方式就是在用人方面收取贿赂。因为他能够任命那些有重要权力的官员，于是那些一心想要当官、想往上爬的人，就开始给和珅送大量钱财。而不向他献纳金银珠宝，或者与他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基本上没有办法做官。史书上把当时的情景描述为“和相专权，补者皆以赀进”“政以贿成”。能够去候补做官之人，都要给他送钱，政治地位是以行贿、受贿来成就的。

乾隆去世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将和珅革职下狱，没收家产。根据历史记载，在查抄和珅家产的清单上，金银珠宝、字画珍玩无所不有。被查抄的家产价值有11亿两白银，而清朝当时每年国库库银的收入是7000万两白银。也就是说，和珅的家产价值相当于清朝国库十几年的收入。所以当时有一句话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和珅的经历也证明了《大学》中的这句话，“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和珅虽然聚积了大量不义之财，但这些不义之财到最后都被查抄，自己也被赐自缢，祸患殃及子孙。

不仅不义之财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即使是正当行为所赚的钱财，也应该用在正当的地方。中国有一句话“积财丧道”，如果一个人自己很有钱，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是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结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会导致穷人的嫉妒和怨恨。

有人认为，其实一些富家子弟很可怜，因为他们穷得就只剩下钱了。这话说得不无道理。现在人应学习一下中国古代的繁体字，因为每一个汉字都有教育的内涵。例如，“錢”字，左边是一个“金”，右边是“戈戈”，即两把刀、两把枪。意思是，如果人没有智慧，把金看得太重，就会导致人们拿着两把刀、两把枪去互相残杀。现在社会中就出现了这种状况：有人因为争遗产，把兄弟告上法庭；有人因为争财产，夫妻同床异梦；有人

因为争房产，父子间起了冤仇。由此可见，如果人为了争财利而不择手段，忘记了恩义、情义、道义，确实就穷得只剩下钱了。金钱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安乐的生活，反而还令其走向腐败堕落。

中国古人说“富不过三代”，如今甚至说“富不过当代”。因为有些人在赚钱时，不是依靠勤劳致富、辛苦付出，而且一旦有了财富就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不懂得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结果自己这一生还没有过完，就已倾家荡产、身败名裂。

所以明智之人，愈富裕愈谨小慎微，愈要拿钱去做慈善事业，利益社会和大众。例如，美国微软公司的前董事长比尔·盖茨，在2008年的时候，就把58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捐到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并在遗嘱中宣布要拿出98%的财产捐给自己创办的这个基金会。这笔钱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并为世界贫穷国家提供援助。因为他有善心，所以愈施愈多，财富不断增长。

《周易》中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很多具有远见的成功人士，有了财富后，并没有拿着钱去竞奢斗富，而是把钱捐献给慈善教育事业。他们想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正在忍饥挨饿，很多贫困的学生缴不起学费，于是把自己富余的财物拿出来，雪中送炭，救人一命，解人急困。他们所得到的喜悦，比一时的挥霍所带来的满足更加真实、更加长久。

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提出“富贵而骄，还自遗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天地变化的规律，都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是自然而然的规律。

《说苑》与《孔子家语》中也都记载，孔子在瞻仰鲁桓公的宗庙时，看到宗庙中有一个欹器（一种容易倾斜易覆的器皿）。孔子就问看守宗庙的人道：“这是什么器具？”看守宗庙的人回答：“这可能就是叫作‘宥坐’的器物。”孔子说：“我听说过‘宥坐’这种器具。当它里面空的时

候就倾斜，当装水适中的时候就端正，当装满水的时候就倾覆。贤明的君主以此来警诫自己，所以放置在座位旁边，叫‘宥坐’。”孔子回头对学生们说：“来，我们试着往里面装水看一看。”结果他们把水灌进容器里，当水装到一半的时候，容器就直立起来，装满了，容器就倾倒了。孔子看了之后，非常感叹地说：“万物之中，哪有一个东西是满而不覆的呢？”

弟子子路问：“想要持满而不倾覆，有什么办法吗？”孔子回答道：“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道也。”意思是说，聪明能干又有智慧，就要用愚笨的态度来保持。功盖天下，就要用推让的态度来保持。勇力震撼当世，就要用胆怯的态度来保持。拥有四海的土地财富，就要用谦逊的态度来保持。这就是所说的“损之又损之道”。换句话说，就是“谦退再谦退”“低再低”的方法。

老子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意思是说，功成名就，就要懂得退位。后面的批注还讲道：“言人所为，功成事立，名迹称遂。”名声显扬起来了，“不退身避位，则遇于害”，这个时候还不懂得急流勇退，就往往容易遭人陷害。因为名和利是人之所必争，如果名声显扬但不懂得退后，就会令人产生嫉妒心，这些人可能就会进而毁谤、陷害他，所以要懂得退。“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乐极则哀也”，这些都是大自然给人的启示。所以有的人欢喜，欢喜太过分了，乐极生悲。有多少欢喜，往往也就伴随着多少苦痛。人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心就平和了，不再追求刺激的生活、过分的欢乐。弘一大师编辑的《格言别录》中讲道：“物忌全胜，事忌全美，人忌全盛。步步占先者，必有人以挤之。事事争胜者，必有人以挫之。”这些教导人如何为人处世的道理，都是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规律中推论而来。

听察广博，明辨邪正

夫听察者，乃存亡之门户，安危之机要也。若人主听察不博，偏受所信，则谋有所漏，不尽良策；若博其观听，纳受无方，考察不精，则数有所乱矣。

——《群书治要》卷四十八《体论》

“听察”指听取和考察各种意见。“门户”，比喻事物的关键。“机要”也是关键的意思。“无方”，没有方法。“数”就是策略的意思。听取和考察各种意见是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假如君主不能广泛地听取和明察各种意见，只接受亲信者的言论，那么谋划必定有疏漏，采用的不都是上好的策略。假如君主能广泛地听取和明察各种意见，但采纳的方法不对，考察又不精确，那么策略必然会混乱无章。这句话是提醒领导者，要广泛地听取各种意见，但是听取建议的时候，还要认真地去考察，不能什么话都听从。

《群书治要·体论》中说，为什么君主要靠忠臣谋士帮助处理很多的政务？为什么要广泛地听取和考察各种意见？因为君主如果不广泛地听察，就一定会有很多细微之处注意不到。君主之所以尊贵，就在于他能够随顺自己的志趣调养自身。当他想享受欢乐时，就有高雅的音乐充盈于耳，古玩珍宝足以悦目，美丽的姿色满足他的欲望，漂亮的衣服符合他的身份。当他想要登高远眺、极目展望的时候，就可以登上耸立入云的高台。当他想逍遥自在的时候，就可以在有飞阁的楼观间从容穿过，嬉戏于碧水清池，游览于桂林芳园，戏射野鸡与大雁，跟踪飞鸟，追逐走兽。当他出行的时候，有佳丽为伴，回宫的时候，与美女共处。像这样的生活，又怎能体会到穷困、忧愁的悲哀，了解鳏寡孤独的困苦呢？

用餐的时候，有蒸煮食物的钟鼎、用以切肉的砧板，美味佳肴多种

多样，五味俱全。珍馐美味摆满厅堂，音乐声起开始用餐，鸣钟之后撤去宴席，一道一道美食交替而上，口中的美味不断，又怎能感受到饥饿的苦楚、困窘的难堪呢？

天热的时候，盖上薄如云雾的绉纱，穿上细葛布做的衣裳，居住在有华丽帐幔的高大房舍，安处于有重重浓荫的北向庭堂，揭开美丽的丝帐，迎来清凉的微风，破开凝冻的冰块，遏止轻微的暑热，侍奉起居的人摇动着粉扇，主管衣物的人更换薄衫，飘飘然似有秋日的凉爽，又怎能体会到炎夏的酷热，怎能知道酷热的难耐呢？

寒冷的时候，则身着棉袍，套上柔软的皮衣，盖上锦绣的被子，铺上貂皮褥子，还有层层叠叠的垫子。处于幽深的居室之中，身在重重的帷幕里，房角有红红的炭火以提高温度，玉杯盛着的美酒抵御寒气，暖乎乎犹如夏日的温热，又怎能体会到隆冬的惨烈，知道严寒的难耐呢？

因为君主生活安逸，处于深宫之中，确实有很多无从得知之事。由此可见，还有很多隐微之事，和这些情况一样，必定会被君主遗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忠心的臣子来帮助君主开阔视听，使他醒悟。

君主身处万人之上，日理万机，要关心的事情很多。君主享受着荣华富贵，而且被服侍得很周到，自然会遗漏很多细小之事，不能体会到一般百姓的苦楚。所以要依靠贤明臣子的辅助，君主才能洞察百姓的疾苦。

唐太宗智对谗言的故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听察广博，明辨邪正的含义。贞观时期，尚书右仆射（尚书右仆射、左仆射相当于宰相）杜如晦上奏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了一篇奏折‘拔士论’。奏折里讲道，人的思维是有限的，一个人不能担任好几个职务，所以应当多选拔一些人来担任这些工作，不能一个人身兼数职。”接着他又说：“这一段话应该是针对我们这些兼任了好几个国家重要职位的人。”

唐太宗听了之后，对戴胄说：“朕是以至公来治理天下，不是因为这几个臣子跟朕关系不错就委以重任；不是因为他们是跟了朕很长时间的旧

臣，朕才偏向他们，而是因为他们都具有真正的才能和德行。所以陈师合这么讲，其实就是在毁谤这些大臣，刻意地离间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过去三国时期的蜀后主虽然昏弱，南北朝时期的齐文宣虽然狂悖，但是因为蜀后主信任诸葛亮，齐文宣信任杨尊彦而没有丝毫的怀疑，才使其国家得以安定。今天我也是因为有杜如晦、房玄龄等这些大臣，才能使国家得以治理。”于是唐太宗下令把陈师合流放到岭南去了。唐太宗虽然引导群臣要直言不讳、敢于劝谏，但是他在接受劝谏的时候，也会明辨是非邪正。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他听闻古代帝王上合天心，都能以上天的仁慈之心来治国，因而能让天下太平。同时，这些帝王除了有仁爱心之外，关键还在于有这些股肱大臣的辅佐。他体会到这一点，于是广开直言之路，鼓励臣子劝谏。唐太宗广开言路的目的，是要了解政事得失，避免百姓之中有被冤枉的。但是近来他发现，这些上奏言事的人都在揭发别人的隐私，谈论百官的缺点，而且非常琐碎，与国家的安定和谐根本没有关系。大多数人都在利用皇帝广开言路的机会揭发别人的隐私。

唐太宗接着说，他考察历史上的很多皇帝，都是因为一些人攻击臣子的隐私，造成君主怀疑臣子，对臣子不再信任。而一旦君主不再信任臣子，下情就不能上达。臣子“欲尽忠极虑”，臣子想竭尽全力地为国家出谋划策，也做不到。中国人非常讲中庸之道，没有偏颇一边。虽然鼓励人们犯颜直谏，提出不同意见，直言不讳，但是也要辨别谄媚之言，诽谤之言以及不符合公义之言，不能听之任之。不能因为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专门告发别人的隐私，进献谗言，而去怀疑臣子，搞乱君臣之间的关系，这对国家没有丝毫帮助。所以唐太宗下令，从今以后，假如有人上书攻击别人的阴私小恶，就要定进谗言的罪。

唐太宗一方面广开言路、听取谏言，另一方面能够明察、分辨这些劝言的谏正，从而做出正确的决定，使谋划、策略不至于出现大错。

选拔人才，以德为先

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故圣人之施舍也，不必任众，亦不必专己，必察彼己之谓，而度之以义，故举无遗失，而功无废灭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四《潜夫论》

“专己”，固执己见，独断专行；“度”，考虑、推测；“举”，推荐、选用。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仔细考察详情；众人都厌恶他，一定要仔细考察详情。所以圣人的定夺取舍不一定都听取大众之言，也不一定非要固执己见，而是一定要全面考虑自己和别人的想法，并以道义来衡量，所以选拔贤才时没有遗漏，政事就不会败坏丧亡。

“众恶之，必察焉”，大众厌恶某个人，这个人不一定可恶，必须认真考察他是否确实可恶。同样，大众都喜欢一个人，这个人不一定就真是好人，也必须认真考察他是否确实值得喜欢。孟子也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大王左右的人都说这个人好，不可听信。甚至所有的大夫都说这个人贤德，也不可信。乃至于全国的人都说他好，也要认真考察，如果他确实可用，才举用他。依王肃的批注，或许某人特立不群，因而为众人所恶。而且见识卓越通常会为一般世俗人所不解，甚至厌恶。自古英雄在不得志时，大众都看不起他。譬如，韩信虽然是将才，但是一般人不能识别。刘邦用兵10万，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所以一般人看不出这种卓尔不群的人才，必须英雄慧眼识英雄。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世俗大众都有贪心，自私自利，又没有足够的慧眼，他们所选的人可能都是“乡愿”般的老好人或平庸之才，而那些英雄人物、卓越人才就很可能被埋没。所以“众恶之，必察焉”。

“众好之，必察焉”，或许是因此人结党营私，为他的同党所喜好，因为他可以为同党带来利益，这些同党之人自私自利，所以他们才喜欢他。因此，众好众恶都不可不察。

“而度之以义”，这个“义”就是要用道义来衡量，看这件事是不是合情、合理、合法。这样才能“举无遗失”，举荐时没有遗漏人才，使“德者在位，能者在职”，政事才能推展好。“度之以义”，就是选拔人才一定要用道德的标准来考察。古人用人也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为什么要以德为先？《孔子家语》中有这样的比喻：“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也。”弓必须经过调整之后，才能成为强劲的弓；马也必须经过驯服之后，才能成为良马；士必须首先具备谨慎、诚实的品格，才能要求他有智能。如果士没有诚敬之心，即使多才多艺、能力很强，就像对待豺狼一样，不能与其亲近。

古人的比喻非常好，现在也有人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有德有才是正品”，既有德行又有才能之人，是社会、团体所急需的人才，就如正品。第二，“有德无才是次品”，有德行，没有才能之人，经过培养，还是可以任用的，虽然不像正品那样好用，但是也不至于给国家、团队造成损害。第三，“有才无德是毒品”，有才能、聪明，但是没有德行之人，就如毒品，会对国家、社会、团队造成很大的危害。比如电脑黑客，去“黑”别人的网站，为别人制造障碍，这样的人，虽有才能，但对社会的危害比较大。第四，“无才无德是废品”，当然这样的人属于少数。

《韩诗外传》中记载，孔子说，士有五种：有权势的士人，家庭富裕、资财雄厚的士人，天资勇猛、强悍的士人，智慧聪敏的士人，相貌美好的士人。这五种士人，拥有五种美好的禀赋。但是如果家里有权势的士人，不用尊贵的权势爱护民众、实行道义，反而以尊贵的权势横行无忌、暴戾傲慢。家庭富裕的士人，不用财富赈济穷苦，反而凭着财富，过

着奢侈糜烂、没有节制的生活。天资勇猛、强悍的士人，不去勇敢地保家卫国、攻城野战、建功立业，反而因为勇敢而欺凌百姓，甚至挑起私人之间的争斗。智慧聪敏的士人，不用智慧为国家出谋划策，反而用聪明做邪恶之事，掩饰奸诈的行为。相貌美好的士人，不用美貌统御群臣、治理民众，反而用美貌蛊惑女子，以满足私欲，这些士人就丧失了他们各自的美好禀赋。

由此可见，虽然一些人很有优势、才能，但因为没有道德，不为国家、人民做贡献，反而对国家、人民造成危害。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领导者任用人才，要以公义为出发点，不能够出于私心用人，结党营私。能够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政事才能办好。

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六《中论》

“大道”，指最高的治世原则，包括伦理纲常等；“远数”，指深远的谋划。君主最大的弊病，莫过于详察小事而忽略了治国的重要纲领；只看到眼前的事物，却忽略长远的谋划。从古至今，只要如此，没有不灭亡的。

隋文帝很勤奋，而且常常从早晨到太阳落山了都在理政。那些侍卫站了一整天也无法离开，还得让别人送饭给侍卫吃。唐太宗很多臣子都评价隋文帝很勤奋。但唐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很勤奋，但那是因为当时他对北周的周静帝以及对周静帝的母亲，不够善待，没有仁厚之心。但他又担心自己的做法会引起臣子的不满，所以很多事情都由他亲自决定。因此他事必躬亲，当然要从早忙到晚了。”唐太宗

又说：“假如他一天决定了10件事情，耗费了自己全部的心力，他可能有5件事判断得很不妥当，每天都有判断不对之事，那么国家迟早会败乱。所以国君应该知人善任，依靠群臣的智慧来治理国家。”这就是唐太宗和隋文帝的不同之处。作为君主或领导者，不要事无巨细地亲自处理，而应该把重要的事情分派给大臣们去处理。

人君的大患，“莫大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即在细微的事情上很明察，却忽略了治国的重要纲领。愈是身处上位之人，愈要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上位者的工作就是以身作则，教化人民，而且还要做好决策，任用国家的栋梁，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他管理的事情过多过细，精力就会被分散，哪有时间静下心来做决策呢？《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要知止才有定，有定才有智慧，才能够做好决策。作为领导者，特别是团队中最高领导者，管理的事情绝对不能太多，否则决策一定会有偏差。

很多领导者怕下属说他不认真，所以每天做很多事情。其实这样做，并不是尽本分。愈是身居高位，责任愈是重大，领导者就愈是要做好决策。不能因为担心被人说，做的事情还没有下属多，就凡事亲力亲为，那就等于跟下属抢事做。结果事情都被领导者做了，下属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了。所以领导者应该充分地授权，让下属去做事，以促进他们的成长，这样领导者就能有更多的时间静下心来提升智慧，做好决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仅管四个人：海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还有就是参谋总长。他每天空闲下来，常常去打高尔夫球。假如你是士兵，就不能说：“我们都在前线冲杀，你怎么还去打高尔夫球呢？”因为他是下决策的人，必须保持放松、冷静，否则做错一个决策，可能伤亡的就是数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他放松了，才能考虑好事情，如果他每天杂事很多，神经紧绷，就考虑不了重要的事。现在很多领导，都误以为做很多事才是勤奋努力，这种想法是错

误的，因为每一个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不同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发现和任用人才，像乔治·巴顿、詹姆斯·奥尔沃德·范佛里特等一大批名将，都为他所用。所以领导者的重要任务是知人任人，而不是直接做事。

关于这一点，《慎子》中有一段记载：“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臣相处的道理和原则是什么？百官各司其职，臣要去做事，而君主用不着去做具体的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君主安逸享乐，臣子勤奋工作，臣子要尽智尽力把事情做好，而君主不需参与具体事务，仰仗臣下成功就可以了。这样，国家政事没有治理不好的。“人君自任，而务为善以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君主如果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而且务求比臣下做得还好，这就是代替臣下承担责任而承受劳苦，臣下反而安逸了。“故曰：君人者好为善以先下，则不敢与君争为善以先君矣。”君主如果喜欢抢在臣下之先把事情做好，那么臣下就不敢抢在君主之前去做好事。“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有过，则臣反责君，逆乱之道。”如果臣子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隐藏起来，国事一旦有失误，臣子反而会责怪君主，这是使臣子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的做法。

“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下，则不赡矣。”君主的才智不一定是群臣中最贤明的，不是最贤明的，还要自视为最高明，从而掩蔽臣子之谋，就会力不从心。“若使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反于不赡之道也。”假使君主的才智是最贤明的，但是仅凭君主一个人的智慧，而把臣下的智慧全都掩盖了，就会导致自己过于劳累。劳累过度就会使身体产生疲倦，身体产生疲倦也会使才智枯竭，才智枯竭又会回到力不从心的道路上去。

“是以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矣”，所以君主、领导者如果事必躬亲，那么臣下就不必去做事了。“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

矣”，这就等于君主和臣子交换了位置。君主本来应该是做决策的，很清闲。臣子应该是去做事情的。结果领导者把事情全做了，臣子、下属反而安逸、无事可做，这就成了君臣易位。君主和臣子的位置交换、颠倒了，就会导致混乱。

“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则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不可不察。”君主如果放手将具体实事都交由属下做，而不事必躬亲，臣下就会尽职尽责地做事，臣下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聪明智慧也就能发挥出来。这是关系到君臣和顺、治乱区分的大事，君主不能不明察。这就是所谓的“任人者逸，自任者劳也”，如果能够任用人才，调动大众的积极性，领导者就会安逸；如果凡事亲力亲为，领导者就会很劳苦。

《淮南子》中说，古代虽然设立了法律，但没有人触犯刑罚，并不是因为该惩罚时没有惩罚，而是因为百官都能各守其责，所以各种政绩都兴盛、成功，各项事业都能治理得很好，礼义道德都建立起来了，也就没有人再去触犯法律了。

任用贤德的人，具体的做法就是把天下最贤德之人举荐出来，任为三公，把国家中最贤德之人举荐出来，任为九卿，把一县之中最贤德之人举荐出来，任为二十七大夫。把一乡之中最贤德之人举荐出来，任为八十一元士。根据他们德行、才能的高低大小，授予适当的官职，让他们承担与职位相当之事。这样，道德教化由天子达至百姓，以位重之人来制约位轻之人。上面倡导什么，下面的民众就跟着应和什么。四海之内同归一心，共同背弃贪婪鄙陋，而心向道义。所以古代贤明的君主任才都是根据德行才能的高低进行取舍，而非任人唯亲，或者徇私枉法，也不是根据个人好恶和关系亲疏任用人才。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中讲：“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于己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则其臣不思其所以为国，而思其所以得于君，深其计而浅其事，以求其指㧑。”君主之所以尊

敬人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并加以信任，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们，他们就能够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保住太平。如果君主多疑，凡事亲力亲为，臣子就不再思考怎样可以治国，而是思虑怎样可以得到君主的欢心。这样就使得他们想方设法地讨君主欢心，而不是思考怎样把事情办好。换句话说，大家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这是因为君主对于所任用的臣子心存怀疑，所以事必躬亲，不想真正放手让臣子去做事，于是造成了过多干预。结果臣子也比较聪明，他不想着怎样把事做好，因为做得太好，君主、领导可能还会嫉妒他，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地投君主所好，君主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君主爱好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君主对他也就不再疑虑和防范。

而如果领导者总是注重这些小事，而忽略了做决策、任贤使能等治国的大事，就会导致“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只看到近处的东西，却忽略了长远的谋划。导致“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本末倒置，只顾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的流弊。

《大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男女青年在择偶的时候，往往看重家庭条件、出身、财富等，而忽视对方的德行。有些人做决策的时候，往往只看到其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它给道德人心和社会风气带来的消极影响。如果人人都见利忘义、急功近利，社会问题就会层出不穷，社会管理成本也会大大增加。

中国古人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是要求把人心的治理，以及伦理、道德的教育放在首位。从这句话中，领导者可以学习体会古人决断的深谋远虑，避免“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

第三十一讲

君主离其民陨其国之常行



国贫而好大

景公问晏子曰：“古者离散其民而陨失其国者，其常行何如？”对曰：“国贫而好大，智薄而好专；尚谗谀而贱贤人，乐简慢而轻百姓；国无常法，民无经纪；好辨以为智，刻民以为忠；流湎而忘国，好兵而忘民；肃于罪诛，而慢于庆赏；乐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怀人，政不足以匡民；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防非。此亡国之行也。今民闻公令如寇雠，此古之离其民陨其国常行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三《晏子》

齐景公向晏子提了一个问题：“古代离散百姓而丧失其国家的君主，常见的行为是怎样的？”晏子回答说：“国贫而好大。”意思是说，国家贫穷却好大喜功、好虚荣、爱面子。国家已经很贫穷了，还常常挥霍，这个国家怎么能够持久？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小到一个家庭，中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破败的原因是人们过惯了奢侈浪费的生活，入不敷出。正如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中记载，子产在刚刚治理郑国的时候，制定了严格的礼法制度，公卿大夫中凡是忠贞俭朴的，都给以适当的奖励。凡

是骄横奢侈的，就要依法给以严惩。但子产执政一年，众人都不满，这样唱道：“收取我的衣帽来贮藏，收取我的田地编伍又丈量。谁去杀了子产，我愿意帮忙！”为什么人们这么痛恨子产？因为人们以前挥霍已经成为习惯，用国家的收入大吃大喝、奢侈浪费已经习以为常。而子产来到这里后，要对这样的行为予以严惩，不让大家再用公款吃喝，人们就难以接受，怨声载道。

到了子产执政第三年的时候，众人都体会到了勤俭节约的好处，于是都这样唱道：“我有子弟，子产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使它繁盛。子产如果死了，有谁可以继位？”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到了勤俭节约对儿女教育、对家庭、对国家的益处，纷纷支持子产的政策了。可见，积非成是，当人们把错误积累多了的时候，就会认为错误是正常的，而正常的反而觉得不正常了。一个国家虽然已经很贫穷了，但是仍然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爱面子，讲排场，过度挥霍，那么，这个国家肯定难以持久稳定。

智薄而好专

“智薄而好专”，人的智慧有限，却喜好自专自大，这是傲慢心在起作用。《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在教学中，哪一种人最难受教？一个人可能很懒惰、贪玩，但这些都不是最难教的。最难教的人是傲慢之人。因为傲慢的人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比别人都强，所以很难受教。在《论语》中，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拥有周公那样的才华，但是又骄慢、又吝啬，那么其余的优点便都不值一提。

真正有学问的人都是自卑而尊人的，时时能够提起尊重他人的心。因为他能真正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知道人人都有明德、本善。我们尊重

人是尊重他的本善。

当有人向我们鞠躬，对我们表示尊重。这时就应该想一想，这种尊重、恭维，对自己有没有影响？当那么多的闪光灯对准自己的时候，难道自己的心真得能够做到丝毫不为所动，没有一点欢喜吗？如果一个人经常受到恭敬、赞叹，傲慢心就会不知不觉地增长，就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是否学习了传统文化，就已经站在了智慧的制高点上，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好了？事实上，克服习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因为在道理上明白了，就能马上做到。境界的提升需要历事炼心，即在每一天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过程中，逐渐磨掉自己的毛病、习气。

当受大众尊重、恭维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楚自己的问题。不仅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也要看到自己的短处，甚至要看清自己的长中之短，还有短中之长。要好学好问，不可傲慢，一定要放下虚荣，不能碍着面子而不好意思去请教他人，要不耻下问，这样才能有所进步。

尚谗谀而贱贤人

“尚谗谀而贱贤人”，喜欢听信谗言和阿谀奉承的话，轻贱了贤德之人。贤德之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很正直，直言不讳。君主如果轻贱了贤德之人，就说明君主不喜欢听老实话，所以才会疏远贤德之人。

《出师表》中有一句很精辟的话：“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国家兴盛也好、衰败也好，都有其原因。总结历史规律，国家盛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君主喜欢听信小人阿谀奉承、谄媚巴结的话，还是喜欢听批评、指责的话，以及犯颜直谏、直言不讳的话。《群书治要·文子》中总结道：“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将亡之国的君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厌恶忠臣的犯颜直谏，而听不进忠臣的规劝。

乐简慢而轻百姓

“乐简慢而轻百姓”，喜欢傲慢，以傲慢为乐，还轻视百姓。《孟子》中说：“人必先自侮，而后人侮之。”为什么别人会侮辱自己？一定是人自己先侮辱了自己，然后才会受到别人的侮辱。《春秋左传》中记载，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郑国攻打宋国，宋国的华元率兵迎战。在开战之前，华元宰羊犒赏将士，却没有分给他的车夫羊斟。他觉得羊斟只是一个车夫而已，就怠慢了羊斟。等到作战的时候，车夫羊斟说：“前日分发羊肉的时候，是由你来做主，今天战车进退的情况是由我来做主。”于是，羊斟就故意把华元乘的战车赶进了敌阵，结果宋军大败。这就是因为没有尊敬别人，对人心存侮慢而招致的惨败。

不能尊敬他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心存傲慢，所以必须首先克服傲慢心，才能自卑而尊人。《礼记·曲礼》开篇就说“毋不敬”，告诉我们要对一切人恭敬。

谦卦被称为地山谦，大自然中高山本来是在平地之上的，而在谦卦中，高山是居于平地之下的。如果一个人不仅才华横溢、有权有势，还能做到自卑而尊人，那么无论是上是下，都会对他恭敬，更不会有人嫉妒他。

谦卦和别的卦不同的地方，就是别的卦在各爻变动的时候，或吉或凶，或有悔吝，但是谦卦六爻，无论如何变动，只有吉利。追其原因，就是一个“谦”字。谦卦，是艮下坤上，艮为山，坤为地。山比地高很多，但是这个山很谦虚，愿意居于平地之下，而不是高高在上。比之于人事，就是不居功自傲，不过分显露自己的才华，能够谦退自己，推崇他人，这样就能成就谦德，万事亨通。所以周文王在《系辞》中说：“谦，亨，君子有终。”

谦卦虽好，却不易学，大部分人都想居于人上，接受别人的崇拜，这与谦卦的意思恰好相反。因此，学谦必须探讨义理。伏羲氏画卦的时候，特别发明两个简单的符号，象征着阴阳两仪，然后以此画成八卦，以

及六十四卦，包罗了宇宙万有、千变万化。在万有变化之中，有差异相，也有共同相。以差异相而论，万物形状各异，绝对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事、物，这叫差异相。但是以共同相而论，万物同具五行、同有生灭，一律平等。《毛诗·小雅·节南山》中说：“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南山虽然高峻，但是与平地同样是由土石等物聚合而成；师尹虽然显盛，但是与平民同样有生有灭。由此观察，高山居于平地之下，并不是伏羲故作玄虚，而是自然平等的现象。看清楚这种现象，再读孔子的《象传》，“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谦德便能油然而生。

国无常法，民无经纪

“国无常法，民无经纪”，国家没有固定的法律，人民没有行为的规范。“经纪”指做人的纲纪。中国自古以来都提倡“制礼作乐”，老百姓依据“五伦”“四维”“八德”“五常”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古人把礼比作阻挡洪水的堤坝，如果堤坝被废除，必然导致洪水泛滥。如果认为旧礼无用而将之废弃，就会导致人欲横流。如果今人从现实社会现象反观祖先的智慧，反观周公姬旦的“制礼作乐”，才能体会老祖宗的良苦用心，更佩服他们以礼防微杜渐，禁于未然的智慧。

好辨以为智，刻民以为忠

“好辨以为智，刻民以为忠”。喜欢争辩，还认为这是聪明智慧的表现；苛虐百姓，还把这当作对国家的忠诚。领导者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能只对百姓苛刻，而对自己放任。古人说：“言教者讼，身教者从。”如果自己做不到，仅仅用言语去教导他人，别人就会逆反，甚至生起对立心。如果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圣贤教

诲，那么不需要用言语教导属下，属下自然知道去做正确之事。领导者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对自己要求苛刻，但对他人要宽恕。

“刻民以为忠”，人与人之间相处，应该秉持这样一个原则：凡事应该要求自己先做到，而不是要求对方先做到。“别人做得对不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一定要做对。”别人做得不对，我们不应过多指责、批评、轻视、厌恶，而应该在他面前反复把正确的行为表现出来，直到他学会为止。

有一次，季康子请教孔子：“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从季康子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心态。他想让老百姓恭敬他，对他竭忠尽智，还能劝勉为善。孔子很有智慧，听到这个问题，就已经了解到季康子的心态出现了偏颇。孔子回答道：“临之以庄则敬。”在位者面对老百姓的时候要庄重、保持威仪，百姓自然对之心生恭敬，因为在位者有品德、礼节，让他人一看自然生起敬慕之心。特别是为人父母者，如果在家随随便便，慢慢地孩子对父母的恭敬心也就生不起来。

我们看到一些老人家，八十多岁了仍然穿着整齐、仪容端庄，让人看了，自然生起尊敬心。所以古人说，“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如果母亲在家里随随便便，穿着邋遢，那么儿女就难以生起恭敬之心。

“孝慈则忠”，要教老百姓，使他们忠心，就要教百姓孝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如果一个人对父母都不尊敬，做不到竭忠尽智，怎么可能对国君很恭敬而竭忠尽智呢？《孝经》中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所以要想让百姓尽忠，必须教其孝道，而且还要对百姓仁慈，要让百姓感受到君主的关爱，百姓才会对君主生起感恩之心，进而忠诚。

“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要把那些善良的人推举出来，为大家做榜样，教导那些不能做道德之事的人。现在我们国家每年都要评选“感动中国”的道德人物，这些道德人物的感人事迹在电视台广为传播，就使人们受到

提醒和教育。

孔子针对季康子的问题，告诉他要树立一种正确的心态。那就是凡事要先自己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在学习日本京瓷、第二电信（现为KDDI）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创始人稻盛和夫，因为稻盛和夫的管理理念被誉为“21世纪的管理”。在日本四大“经营之圣”中，稻盛和夫是年龄最小而被尊为“圣”的，他的经营哲学也被很多人推崇。稻盛和夫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使濒临破产的日航变成了在全球同行业中营业额最高的企业。他接管日航一年之后，企业的盈余达到1500亿日元，称得上化腐朽为神奇。他的一言一行都与孔子的教诲相应。首先他接管日航的初衷、发心纯正，他是为了日本经济、日本企业而出任日航董事长的。日航是日本一个很重要的企业，一旦倒闭，对整个日本经济都会造成影响。他去日航之后，就与当时的鸠山首相说：“我可以答应你去做这件事，但是我不拿一分钱。”可谓无私无我，尽心尽力。

稻盛和夫先生经常提到，人生有六项要精进的地方：第一，要以身作则，“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第二，“要谦卑，不要傲慢”。在《谏太宗十思疏》中，魏徵提到“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很多企业家在刚起步创业之时，与创业伙伴同甘共苦、荣辱与共，能够把不同背景的人团结在一起，但是当创业成功之后，自己的傲慢心生起，谁都看不起，甚至连同胞兄弟都不能够包容。第三，“天天反省”。每一天都发现自己的不足，修正自己的问题，真正做到“德日进，过日少”。第四，“活着就应该感恩”。我们每一天的衣食住行，不知道花费了多少人的劳力和汗水，所以活着就应该感恩。第五，“积善行，思利他”。稻盛和夫先生为年轻人写了一本书《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提倡要念念想着利益他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通过利他就可以慢慢放下自私自利之心，灵性就能得以提升。《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明明德，那么怎样明明德呢？亲民，通过帮助他人，把自私自利之心慢慢放下。所以亲民和明德是一不是二，就是要尽心尽力地帮助身边的人，做到自利利他。第六，“放下感性的烦恼”。例如，消极、悲观、冷漠、情绪化等都是感性的烦恼。要时时能够调整自己的心境，变得积极、乐观、进取。很多人把时间耗费在自我折磨上，不自信，懊恼、后悔、退缩，或者情绪化。当欢喜时，什么事都好，不高兴时，什么事都不愿意做，看谁都不顺眼，甚至脾气上来好几天都缓不过来，这些都是需要克服的。

流湎而忘国，好兵而忘民

“流湎而忘国，好兵而忘民。”“流湎”就是沉溺于酒色玩乐之中，而忘记治理国家，没有把心思放在国家上。此外，还喜欢动武而不顾人民死活，这样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武”字止戈为武的文化内涵，说明古人对用兵非常慎重。因为一旦用兵，老百姓的死伤会非常惨重，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喜欢穷兵黩武、争强好胜，都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肃于罪诛，慢于庆赏

“肃于罪诛，而慢于庆赏。”“肃”是严格的意思，喜欢用严格的刑罚来判罪，甚至诛杀百姓，但是疏于给予百姓、臣子鼓励和肯定。喜欢惩罚百姓和臣子，却不懂得去奖赏鼓励，这也是苛虐的表现。

乐人之哀，利人之害

“乐人之哀，利人之害。”把别人的哀伤当成快乐，不仅没有同情心，

还乐在其中；通过损害别人来谋取利益，如谋财害命等，或者为了建筑高台楼阁，在农民忙于耕种的时候征用民力，误了农时，这也是“利人之害”，损人利己。

德不足以怀人，政不足以匡民

“德不足以怀人，政不足以匡民。”德行不足以让人佩服，政令也不足以安抚百姓。不能够安抚百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令太苛刻，老百姓不能够认同。《孔子家语》中有一则故事叫“苛政猛于虎”。孔子带着弟子从泰山旁边路过，看到一个老妇人哭得很伤心，孔子就派弟子去问她原因。老妇人说，第一年她的公公被老虎吃了，次一年她的丈夫被老虎吃了，今年儿子又被老虎吃了。孔子就问，既然这个地方老虎经常出没，为什么不换一个地方住？老妇人说，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苛虐的政治。孔子听了之后非常感叹，对弟子们说：“你们一定要记住，苛政猛于虎。”苛虐的政治比老虎还要残酷。所以领导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能太苛刻，要以百姓安居乐业为重。同样，率领一个团队、经营一家企业时，也要体恤、关心团队成员、企业员工的身心状况。大家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工作，都是人生难得的缘分，应该好好珍惜，成就彼此、爱护彼此。

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防非

“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防非。”赏赐不足以鼓励人们行善，刑罚也不足以阻止、防止人们作恶。为什么“赏不足以劝善”？因为好的行为没有马上得到肯定、表扬，这就不是鼓励人们向善的做法。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件小小的感人之事，大家都将其宣扬出来，那么他就会想，我应该做更大的善事。如果一个人的善举得到了鼓励，也会感应更多的人行善。

以上这些都是“亡国之行”，是让国家灭亡的行为。

“今民间公令如寇雠，此古之离其民陨其国常行也。”这个“公”字既可以理解为公家的、国家的法令，也可以指齐景公。晏子总结说，现在老百姓听到公令，或只要听到齐景公发布命令、发布法令，就如同见到仇敌一样，这就是古代君主离散百姓、丧失国家的常见行为。百姓对国家是对立、仇视的心态，国家怎么会不灭亡？这里晏子提醒齐景公，如果君主有这些行为，国家随时都有灭亡的可能。

第三十二讲

忠以敬，谦以和



君子事上必忠以敬，接下必谦以和

在日常工作中，很多人既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应当如何担当这两种角色？《格言联璧》中有一句话，对我们很有启发。“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谦以和；小人之事上也，必谄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君子侍奉居于上位者，侍奉领导“必忠以敬”，对领导者要忠诚恭敬。“尽己之谓忠”，把领导者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竭心尽力、认真负责地完成，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服从服务于国家和集体利益，这就是忠。什么是敬？不要认为对领导者百依百顺、唯命是从，就是敬，这样的敬是形式上的敬。真正恭敬领导，是要以道德、天道鼓舞、引导、劝谏领导者，帮助领导者不断完善自我。

魏徵在和唐太宗的谈话中，常常期许唐太宗能够真正成为留名青史的好皇帝，这才是真正恭敬君主。恭敬他的性德、成就他的德行，这才是敬。所以“必忠以敬”。如果君主做错了，身为臣子，不去劝谏，还一味地顺从，帮助他作恶，就是助纣为虐。

“其接下也，必谦以和”，即君子对待属下非常谦虚，和气待人。《孟子》中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领导者带领一个团队，如果领导者对人很和气，那么整个团队的氛围就会团结和睦。如果领导者脾气很大，一走进办公室，整个气氛马上变得很紧张，那么，谁都不愿意意见到这样的领导者。

如何达到人和？“和”字经常和一些字连在一起使用。例如，“和谦”，让人感觉舒服的人，一定是谦卑待人、克服了傲慢之人。还有“和平”，人与人之间只有彼此平等对待，才能和睦相处。如果没有平等心，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我讨厌，对人有偏心，那么团队成员间也不可能和睦。

此外，还有“和爱”“和敬”“和善”“和睦”“和谐”。“和爱”，“爱”是用心感受对方的需要。拥有爱心的人，才能处处为他人着想，爱护他人，经常说爱语安慰他人，能够感受他人内心需要。当他人遇到问题时，要有耐心帮助他人、开导他人，这些都是爱的表现。“和敬”，即保持恭敬心，念念恭敬人。《论语》中讲：“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们都很向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其原因何在？为什么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无论走到哪里，和别人相处不到一个星期，不是自己不喜欢别人，就是别人讨厌自己了？原因就在于这些人小时候，在家大多是“小皇帝”“小公主”，备受父母长辈的关爱。父母长辈时时刻刻都想着他们的需要，关心他们的感受。但当诸多“小皇帝”“小公主”走到一起时，就容易出现矛盾、问题。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人的需要，只希望别人来关心自己，却没有学会如何关心别人，所以长大后与他人相处，就容易出现矛盾。

“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语者，殊无怪也。”父母长辈都没有用传统文化引导、教育孩子，孩子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想要什么就满足他什么，孩子自由自在已经习惯。既然如此，就应生起宽恕之心，不能看人不顺眼就心生轻视，不愿与之相处，这样也很难帮助他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凡夫现在还是在修行的过程中，没有成圣成贤，所以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纯属正常。因此，人要有一颗无条件的爱心，即使一个人做错了事，或者做得不够完美，甚至还作恶，要对他仍然不离不弃，想方设法地帮助他提升、改变。这才是爱敬存心。

“和善”，时时都是善意对人。即使别人对我没有足够的恭敬，我对

他仍然没有丝毫的对立和恶意，给人带来的只有好处，没有伤害，时时都传播正能量。“和睦”，相互信任、相互体谅、相亲相爱，这个“睦”字有亲爱的意思在其中。“和谐”，就像一首乐曲，是由不同的音符构成的，这些音符互相配合，才能奏出一曲美妙的音乐。所以要达到和谐，就要能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互相配合、取长补短。有这样心态的人，才是好干部。因为他时时能够从大局着想，只要一开口，就能化解团队当中那些不愉快的纷争，提起人的正念，教会人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他能够调剂人情，安抚人的怨气和不平，而不是一味地抱怨，使矛盾冲突愈来愈激烈。这样的人是团队的珍宝，对团队和谐起到促进作用，最值得珍惜。

小人事上必谄以媚，待下必傲以忽

与上相反的是，小人对待上位者、领导者“必谄以媚”，就是谄媚巴结、阿谀奉承领导者。而对待下属“必傲以忽”，因为小人的位置比较高，就容易小人得志，傲慢起来，忽视了下属的感受和需要，以至于对下属实际的身心状况都不能够顾及。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是不能够颠倒的，家不能齐，想治国、平天下也不可能。家为什么不能齐？团队为什么带不好？归根结底，还是领导者修身的功夫有缺欠，所谓“德未修，感未至也”。

作为人臣、被领导者，如何真正做到“忠以敬”？首先是立节，就是要树立气节。在古代，为官者都是老百姓的榜样，他们愈是有气节、愈是有德行，百姓、天下人就愈尊敬他们，愿意向他们学习。

《孟子》中说：“爵一、齿一、德一。”这就是让我们要尊敬有爵位的领导者、年长者与有德者。中国古人为什么这么尊敬领导者？很多人说这不是官本位思想吗？领导者有什么好尊敬的？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要成为领导者，首先要必须有德行。例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心系天下、国家，很少有自私自利的念头。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德行、气节，所以才备受百姓尊敬。

《吕氏春秋》中讲，忠臣、孝子是君主、父母特别想得到的。荣华富贵也是人臣、人子所希望的。哪一个君主不希望得到忠臣？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孙孝敬？但是事实往往是，君主得不到忠臣，父母得不到孝子，臣子、儿女也得不到自己想得到的富贵荣显。这都是不懂礼义所致，而不知礼义是因为没有学习圣贤教诲。为了实现君主、父母、人臣、子女的愿望，古代圣王没有不尊师重道的。

如果一个人不重视圣贤教诲，不了解大道，所作所为都凭着自己的喜好，以至于从世俗观念出发，随波逐流，那么就很容易走弯路、走错路，甚至走上不归之路。这样的人一生也体会不到“君子坦荡荡”的境界，反而经常是“小人长戚戚”。所以人不学，不知义。现代社会的一些贪官纷纷落马，甚至走上不归路，很多人对他们的行为都很痛恨。但是仔细想想，这些人也是可怜悯者。因为他们没有真正领会圣贤的教诲，搞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才导致了这样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学习《群书治要》就显得特别重要、特别迫切。

平居不惰其业，穷困不易其素

历观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积累殊异之迹，劳身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惰其业，穷困不易其素。

——《群书治要》卷二十八《吴志下》

综观古往今来有功于社会国家、青史留名的人士，都积累了殊胜不

凡的事迹。他们劳累身体、承受艰辛、勤奋思考，平常生活不荒废学业，遭遇穷困也不改变其志向。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上天将要把重大的使命降落到某一个人的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炼，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困穷之苦，让他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启发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和提升他所不具备的才能。

但凡古今成大事者，贫困者十之八九，而富贵人士仅仅是十之一二。所以古语有云：“风霜孤露之境，易生奇杰；醉生梦死之地，绝少英豪。”这也是古人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而演《周易》，孔子被囚于陈蔡而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而赋《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而写《国语》，孙膑双脚残废，被刖足，作了《孙膑兵法》，吕不韦迁蜀，到了蜀地边远的地方，作了《吕览》，韩非被秦国囚禁而写出了《说难》《孤愤》。此外，像《诗经》三百篇，大都也是发愤所作。这些人身处逆境的忧患之中，心气郁结，奋发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

至于死于安乐者，历代的昏庸之君，荒淫逸乐而身死国亡的，可以说数不胜数。譬如，夏桀王、商纣王、周厉王、周幽王，乃至后来的隋炀帝等，都是在富贵的生活中，经不起考验，过上了荒淫无度的生活，最后国破家亡。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物才能被称为大丈夫，譬如历史上的范仲淹、司马光等。别人都效仿他们并教育自己的孩子以他们为榜样。

司马光说，他的父亲曾经当过郡幕的判官，凡是家里来宾客，都会设酒款待，但是他的父亲饮酒绝对有节制，有的时候是三巡，有的时候是

五巡，最多不超过七巡。而酒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不是自己家特别酿造的，家里的水果干果是梨子、栗子、枣子、柿子等这些非常平常的东西，所吃的食物也就是干肉、肉酱、菜羹等非常简单的食物，所用的器皿，也都是用漆器或者瓷器做成的。当时的士大夫都崇尚节俭，所以他的父亲这样俭朴，也没有人非议。

但是到了司马光的时代，奢侈之风开始盛行，所以司马光就非常感叹：现在的士大夫家不比从前，喝酒一定要喝用特别方法酿制的酒。果品都是从远方运来的珍贵奇味，吃的食物也是各种各样的，特别丰富。器皿都很精致，摆满了案头。主人常常要在请客前的几天内将一切打理好，然后才敢向客人发请柬。如果宴会准备得不丰盛，主人就会怕旁人诽谤、嘲笑自己家太吝啬、太穷。所以当时的人们互相攀比，兴起了奢靡之风。但是司马光因为从小受到父亲的感化，做得甚至比他的父亲更加节俭。史书上记载，司马光在乡下的时候，经常聚集学生讲学，师生聚会的时候，饭菜都非常简单，比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父亲饮酒是有节制的，而他连酒都不饮了。

司马光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排出先后，然后为他们讲解孝悌忠信的道理，娓娓不倦，学生没有不被感化的。有几个老乡只是献上了普通的饭菜，就来请司马光讲学，司马光不以饭菜的好坏为意，为他们讲解《大学》中的章节，听讲的人都很高兴。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司马光每一次出门的时候，老百姓总是站立在两旁，敬如神明，非常恭敬。后来，司马光奉诏到朝廷做官，卫士见了他都举手加额行礼以表示恭敬。老百姓都拦在道上欢呼说：“司马公做宰相，我们才能过好日子。”后来司马光做了宰相，一次他经过青州，数以千计的村民都围过来，踊跃庆贺。当时辽国听说司马光做了宰相，纷纷告诫说：“宋朝以司马光为宰相，不可于此时侵犯宋朝边界。”

司马光过世的时候，皇帝为他“减膳撤乐，辍朝三日”，减少美食，

撤去音乐，三天都没有上朝，以示哀悼。京城的民众停市哭泣，祭奠他就像祭奠父母过世一样。四面八方来了几万人参加葬礼，香箔、纸钱都卖光了。可见，一位有气节、德行，真正为老百姓着想、付出的人，老百姓对他的回报自然也很恭敬、丰厚，而且这种恭敬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这些贤者为什么能够做到“平居不惰其业，穷困不易其素”？

第一个原因就是慈悲心使然，贤者不忍百姓苦，不忍圣教衰。贤者不忍心看到百姓因为不明理而生活得非常痛苦；也不忍看着圣教没有人宣讲而衰落下去。所以才不敢懈怠，不改易自己的志向。

《群书治要》中记载着季文子的故事。季文子做了鲁国的宰相后，要求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有一位仲孙大夫看了之后劝他说：“你是鲁国的上卿，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别人会认为你吝啬，而且会使国家不光彩。”季文子说：“是这样的吗？我看到国人的父母还穿粗衣、吃蔬菜，因此不敢奢侈。而且我听说君子是靠高尚的道德使国家光彩的，没有听说是靠妾和马为国增光的。所谓的德，是既能使我有所得，也能使他人有所得，这样才能够推行。如果放纵自己，尽情奢侈，沉迷于五欲六尘的享乐，不能反躬自省，怎么能够守卫国家？”这位仲孙大夫听了之后很惭愧地退了出去。由此可见，季文子之所以能够节俭，是因为他看到老百姓还吃不饱、穿不暖，如果自己过得很奢侈，于心不忍，所以这是慈悲心使然。

第二个原因就是贤者在道理上看得透彻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用儒家的话来讲，这个“孝”字代表的是一体的观念，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上一代和下一代自始至终都是一体的，假如有代沟、有对立，这个一体的观念就不存在了。

当贤者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时，他就认识到人生最重要的不是物质的享受。因为如果要享乐人生，往往就会蒙蔽自己的明德，灵性就很难提升，这是得不偿失、因小失大。颜回能够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表明一个人的幸福喜悦与物质条件没

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与明德开发的程度有关系。

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

夫贤者之为人臣，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

——《群书治要》卷四十四《潜夫论》

贤者作为臣子，不以奉承和花言巧语使君主的圣德受到损害，不为讨人高兴而曲意迎合大众，不损坏公义来顺从私欲，不扰乱法纪而畏惧强暴。他们的明智能够辨别奸邪，他们的行为符合道义，从不结党营私。

《春秋左传》中记载，鲁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晋悼公的弟弟扬干，在典梁搞乱了军阵行列，因而当时的司马魏绛处死了扬干的车夫。晋悼公知道了此事，非常生气，对羊舌赤说：“会集诸侯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扬干的车夫却被杀了，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屈辱吗？一定要杀掉魏绛，不得有误。”羊舌赤听了之后回答道：“魏绛对君王没有二心，侍奉君王不避危难，如果他真的有罪过，也不会逃避惩罚，会自动前来供述，何必劳烦君王发令？”果不其然，羊舌赤话音刚落，魏绛就自己来请罪了。他递给晋悼公的侍臣一份奏章之后，就准备拔剑自刎，结果被人劝止了。

晋悼公开始阅读魏绛的奏章，奏章中写道：“日前君王缺乏使臣，派我担任司马。我听说军人以服从为勇武，宁死也不触犯军纪，才算得上戒慎。君王会集诸侯，臣敢不戒慎吗？君王的军队不威武，执事的人员不戒慎，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臣下唯恐犯不武、不敬的死罪，并累及扬干，罪责难逃。臣下未能严加训导，还动用了斧钺大刑，处死了扬干的车夫。臣下的罪过重大，岂敢不听任惩处而使君王生气？因此请求回来死于司寇的衙前。”晋悼公读完了奏章，光着脚跑出来说：“寡人的话，是出

于兄弟之爱；您的诛戮，是出于执行军法。寡人有弟弟未能训导，致使其触犯了军令，这是寡人的过错。请您不要再加重寡人的过错了。”晋悼公很明智，能够明辨善恶。于是，他派魏绛返回边防阵地，并且任命魏绛为新军副帅。

《孙卿子》中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臣子服从国君的命令，若这个命令执行下去对国君确实是有利的，就叫顺。如果不是真正对君主有利的事，臣子也服从，那就不叫顺了。“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遵从君主的命令，实际上对君主并没有真实的利益，这叫谄媚。“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违抗了君主的命令，但是这样做是对君主有利的，这叫忠。所以古人说的忠臣大都是能够犯颜直谏的人。对于君主的命令，忠臣并没有一味地顺从，而是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敢于违逆。因为君主的命令若是错的，还一味顺从君主，并不能给君主和国家带来利益。“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如果违逆了君主的命令，而做的事也不利于君主，这叫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谓之国贼”。不考虑、不担心君主的荣辱，也不考虑国家的善恶、风气如何，一味地投合大众，或者投合君主，苟且容身，为了保持自己的俸禄，豢养宾客，与很多人都结交，这样的人叫作国贼。所以臣子、被领导者要经常反思自己平常的所作所为，到底是顺，是谄，是忠，还是篡？当然千万不要做国贼。

杨震不收“四知财”

杨震字伯起，弘农人也，迁东莱太守。道经昌邑，故所举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群书治要》卷二十三《后汉书三》

这就是“四知财”的典故。杨震，字伯起，弘农人，升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经过昌邑，以前所举荐的秀才王密正担任昌邑县令，前来求见。到了晚上，王密身带黄金10斤，准备赠送给杨震。杨震说：“身为老友的我了解您的为人，而您却不了解我的为人，这是为什么？”王密说：“在深夜里是没有人知道的。”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您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即使是在深夜里，在一般人看来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杨震也不愿意接受馈赠、接受贿赂。因为他明白“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理昭彰。他能够做到慎独，即使是一个人在的时候，看似没人，其实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

杨震为人公正廉洁，子孙们经常吃粗茶淡饭，外出时步行，也不乘车。在老朋友中有年纪长的，就劝他为儿孙置办产业。杨震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意思是说，使后世称他们是清白官员的子孙，以此馈赠给他们，不是很丰厚吗？杨震是真正的明理之人，他知道“遗金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古人告诉我们，如果子孙有才能，又有德行，他们会用自己的才德来创造财富，那留钱给他们有什么必要？如果儿孙没有德行，又没有才能，把钱留给他们，最后也会被败掉。所以无论儿孙有德无德、有才能没有才能，把钱留给他们，对他们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杨震正是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没有给儿孙留下家产。他的德行被后人所重视，杨家的堂号取名为“四知堂”。凡是杨家的子孙，从这个匾额下走过的时候，都会提醒自己：我的祖先不收“四知财”，我作为他的子孙，怎么能够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为我的祖先抹黑呢？

杨震的这种廉洁作风，无形之中影响了他的儿子。他的二儿子杨秉，在汉桓帝时任太尉，太尉是三公之一。每逢朝廷有过失的时候，他都尽忠规谏，很多谏言都被采纳。杨秉生性不饮酒，他很从容地说：“我有三不惑。”意思是，不被酒、色、财所迷惑。

杨震的行为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儿孙，也受到了后人的尊敬。唐太宗有一次经过杨震的墓地时，因为仰慕杨震的德行，亲自去祭拜，并亲自写了一篇祭文祭奠他。当时房玄龄看到了，就说：“杨大人的在天之灵应该很宽慰，因为经过几百年之后，天子亲自为他写祭文。”这些忠臣的精神确如文天祥先生所说：“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他们的磅礴正气长存于天地之间，延续下来，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德行。

现在旅居海外的杨家后人，仍然不忘祭祀祖先。1995年，在缅甸“四知堂”的杨家后人扩建“四知堂”，为的就是能够容纳更多的子孙祭祀。至今，杨震的德行已庇荫了他的后人1900多年，使得杨家代代都有贤人出现。不仅如此，后人经常把杨震的故事分享给人们，人们听了之后都深受感动、深受教育。杨震不仅庇荫了自己家的子孙，也庇荫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他的后代之所以绵延不衰，就是因为祖宗有德行。而当后人用心学习这些圣贤风范的时候，他们的正气就与后人相交感，照在后人身上，长养了后人的浩然正气。

第三十三讲

正臣与邪臣



臣忠必直谏

昔者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

——《群书治要》卷二十二《后汉书二》

晋平公问叔向：“国家的祸患，最大的是什么？”叔向说：“大臣重视禄位而不愿力谏，小臣怕获罪而不敢说话，下情不能上达，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

古人治国都要使下情上传，使皇帝充分了解民情，这样制度政策才不会出现偏差。所以古人都把那些能够犯颜直谏的人称为忠臣，并对其特别重视。

《孔子家语》中记载，卫国的蘧伯玉德才兼备，卫灵公却不任用他。弥子瑕无德无才，爱谄媚巴结，反而受到了重用。这时史鱼极力进谏，但是卫灵公却不采纳。史鱼生病将要去世的时候，嘱托他的儿子说：“我在朝廷，未能够使蘧伯玉入朝为官，也未能罢免掉弥子瑕，我作为大臣没有能够匡正国君。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匡正国君，我死后你们就不能用正常的礼仪来安葬我。我死之后，你把我的尸体放置在窗户下，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的儿子很孝顺听话，就按照他的意思办了。结果卫灵公来吊唁史鱼的时候问道：“怎么把史鱼的尸体放在窗户之下？”史鱼的儿子就

把父亲的话告诉了卫灵公。卫灵公听了之后愕然失色，说：“这是寡人的过错。”于是，他命令按照宾客的礼仪来安葬史鱼，并且听取他的建议，提拔任用了蘧伯玉，免去了弥子瑕的官职，并且也疏远了弥子瑕。孔子听到这件事之后评论说：“古代极力进谏的人，到死的时候也就结束了，没有像史鱼这样死了之后还要借尸体来进谏，以忠诚感动国君的人，这能不说他正直吗？”古代的忠臣，即使是快死了，还要想方设法地去劝谏国君。最后史鱼终于感动了国君，使国君采纳了自己的建议。

当然不一定非要采取尸谏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极力进谏，也可以采取比较幽默的方式达到劝谏的目的。《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着优孟的两个故事。

优孟是楚国的艺人，楚庄王在位时，有一匹心爱的马。他给马穿上了带花纹的锦绣衣服，把马安置在华丽的房子里，用没有帷帐的床给它做卧席，还用蜜渍的枣干喂养它。结果这匹马得了肥胖症，死掉了。楚庄王爱这匹马爱得有点儿过分，要求按照大夫的葬礼规格来安葬它，并且下令说：“谁敢因葬马的事情来劝谏，就处以死刑。”这个命令一下达，没有人再敢来劝谏他。大臣们明知道自己有点过分，都闭口不敢言。

优孟听说这件事后，走进宫门，大哭说：“马是大王所心爱的，凭堂堂的楚国，有什么事办不到？请按照国君的葬礼规格来安葬它。我请求用雕花的美玉做棺材，用细致的梓木做外椁。派遣士兵给马挖掘墓穴，让年老体弱的人背着土筑坟。再盖一所庙宇，用三牲（一头牛、一头羊、一头猪）祭祀。再拨一个万户的大县来供奉它。诸侯听到这件事，就知道大王轻视人而重视马。”楚庄王听了之后，知道自己错了，他说：“我的过错竟然严重到这个地步，这该怎么办？”优孟回答道：“让我替大王用对待六畜的办法把它安葬在人们的肠胃里吧。”也就是说，把它杀了，供大家吃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优孟以非常幽默的方式让楚庄王看到了自己的过失，结果同样达到了劝谏的目的。

另一个故事讲的是，楚国的宰相孙叔敖死了，虽然他在楚国建功立业，当宰相，把楚国治理得很强大，但是他过世之后，他的儿子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要靠着给人背柴、卖柴过日子。优孟知道了这件事，他就缝制了孙叔敖生前穿的那种衣服和帽子穿戴着，模仿孙叔敖生前的言谈举止。一年多后，优孟的言行举止、穿着打扮活活像孙叔敖一样。楚庄王看了之后大吃一惊，还以为孙叔敖复活了，打算任优孟做宰相。这个时候，优孟开口说道：“楚国的宰相做不得！你看，像孙叔敖那样做楚国的宰相，忠诚廉洁地治理楚国，使得楚王得以称霸诸侯。但是孙叔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贫困到要靠给人背柴来维持生活。”楚庄王听了之后，对优孟的苦心表示感谢，而且召见了孙叔敖的儿子，把寝丘之地封赐给他。

这说明古代君主对于尽忠的大臣，不仅要照顾他的生活，在大臣死后，去参加他的葬礼，表示对他的感恩，还要对他的后人给以关爱。这样大臣才会受到鼓舞，愿意竭忠尽智地把自己的本分、责任尽到。这就是君仁臣忠，也是中国式管理的特点所在。

现在的企业大多采用西方式管理。西方式管理就是靠制度、法律，使人达到不敢欺、不能欺的境界。但是中国人处理事情，不仅合理、合法，更加懂得合情。对事情处理得合情、合理、合法，才能让人即使受了惩罚，也能够对领导感恩戴德，达到不忍欺的境界。达到“不忍欺”的管理境界，就是无论领导者在场或不在场，属下的表现都是一致的。因为他们不希望领导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他们希望自己竭尽全力地回报领导者的恩德。有了这种仁义、情义，属下做事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有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

人臣之行，有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

——《群书治要》卷四十三《说苑》

作为人臣的操守，遵从“六正”就会获得荣宠，触犯“六邪”就会自取其辱。

何谓“六正”？

“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一是事物萌芽未发，迹象兆还未显现，这时他就能够清楚地预见存亡的机运、得失的关键，在事态恶化之前就能预先制止，使君王超然居于显贵尊荣的位置，像这样的人就是圣臣。

中国人特别强调“禁于未然之前”，如中医、中国式管理，都是“禁于未然之前”。但是西方人往往达不到这种深刻认识，所以一般人也看不到中国式管理的深刻之处。古人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伦理道德的教育可以防患于未然，让人根本就不会去做坏事。人不去做坏事，都有礼义廉耻之心，领导者就会无为而治，安享太平。所以真正的圣臣，会特别强调伦理、道德和圣贤教育。

那些教导人们“仁义慈悌”道理之人，告诉世人要有仁爱之心；做人要讲“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能去贪；要有慈悲心，看到别人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要尽力去帮助；与人交往要讲友爱。世人学了这些道理，就能够防患于未然，终身都不会有牢狱之灾。然而人们对这样的圣贤之人却不屑一顾。一些人目光短浅、见利忘义，为了谋取钱财不择手段，最后东窗事发、锒铛入狱，才知道后悔，但是悔之晚矣，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如果人们听了这些圣贤人的教诲，能够提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意识，就会知道不义之财不能贪取，财有吉财，也有凶财，用不正当的手段所获得的财富，只能给自己带来灾祸、带来麻烦，而且这样得来的财终究守不住。人们明白了这些道理，遇到事情就知道该怎么取舍，也就不还会因违法犯罪而被关进监狱。所以真正的圣臣是能够做到防患于未然的。

“二曰虚心自意，进善通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二是胸怀宽广、思想纯洁、进奏善言、通达道义，用礼义来勉励君主，用良策来启示君主，顺从君主的美善，纠正、补救君主的不良行为，像这样的人就是良臣。

《史记》中记载的晏子就是良臣。晏子名婴，东莱（今山东烟台、威海一带人），曾在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为臣，且都受到尊敬。为什么他在三朝为臣都受到尊敬？因为他节俭朴素，又能够尽力办事。他在处理政务的时候，国君说到的事，他都直言不讳自己的见解，没有说到的事，他就正直地去办。国君的命令有道理，他就服从，没有道理，他就反复斟酌，思考是不是应该去办理。因此他连续三朝为臣，名声传扬于各诸侯国。太史公说：“我读《晏子春秋》，关于晏婴的事迹，书中记载得非常详尽，至于晏婴的直言进谏，敢于冒犯君王的威严，这就是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人吧！”这样的臣子，可以称得上良臣。

“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于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三是早起晚睡，推荐贤士从不懈怠，经常援引古代圣君贤王的行为事迹，来激励君王的意志，像这样的人，就是忠臣。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推荐贤士，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私心，希望德才兼备的人层出不穷，这样才能够为国家带来生机、带来希望。魏徵之所以受到唐太宗的尊重，就是因为他读了很多的历史书，对历史上的贤君非常了解。因此他在进谏的时候能够引经据典，说得有情有理，还用事实来论证观点，以激励唐太宗，所以唐太宗听了，也不得不服气。

“四曰明察极，见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四是明察事理，预见最终的成败，早做防范并进行补救，堵塞漏洞，杜绝致乱的根源，转祸为福，使君主最终无忧无虑，这样的人就是智臣。智臣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这是有智慧的人才能做到的。古书记载，历史上很多有道德学

间的读书人，看到一个人目前的所作所为，或者看到一支军队现在的作风，就能够推测出这个人以后的发展如何，这个军队能否打胜仗。因为这些人熟读圣贤书，明白人生的道理，所以才能够准确预测。

《尚书》中记载：“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一个人，对内兴起了迷恋女色之风，即是“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禽荒即古代人喜欢狩猎、打猎，没有节制。“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沉溺于饮酒及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居然还雕刻着花纹。这都是极尽奢侈之事。以上这些事，只要有一件出现了，就没有不灭亡的。

人们总是看到一个人已经锒铛入狱，才感到非常惊讶、非常奇怪。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都是《周易》中的教诲。所以读圣贤书的好处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趋吉避凶。

“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衣服端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五是能够不逾越礼法，能够奉行法规，严格依法办事，胜任所在官位的职事，不接受礼物的馈赠，衣冠端庄整齐，生活节俭，像这样的人，就是贞臣。“贞”是贞洁的意思，有气节，不会随意受贿。

“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也。”当国家政治昏乱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不阿谀逢迎，敢于触犯君王的威严，当面指出君王的过失，像这样的人，就是直臣。

以上就是“六正”。

下面讲“六邪”。那么何谓“六邪”？

“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一个人安享官位、贪图俸禄，不致力于公事，心思根本不在公事之上，随波逐流，做事左右观望，这样的人是具位充数之臣，所以被称为“具臣”。

“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

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谀臣”的特点是，君主说的话都说好，君主的所作所为都认可，还暗地里去探求君主的喜好，君主喜欢什么，就把君主喜欢的东西进奉给他，以愉悦君主的耳目，一味地苟且迎合君主的意思求得荣身，与君主整天寻欢作乐而不顾及后患，这样的人就是阿谀奉承的臣子，被称为“谀臣”。

古代有一些君主，比如楚恭王，虽然和谄媚巴结、阿谀奉承的臣子申侯伯在一起，感到很欢喜，见不到他的时候，也会很想念。但是他心里很明白，这样的人对治国理政、对国家、对百姓没有真正的帮助，对君主提升德行，也没有益处。所以楚恭王还是把这种阿谀奉承的臣子赶走了，而对那些经常用道义来劝说自己、指正自己过失、直言不讳的人委以重任。

善友相依，要和那些能够规劝我们走正道的人相处。古人说：“与善人交，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人交友，和那些善良的、有道义的朋友相交往，受到其德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像在雾水中、露水中行走一样，虽然雾水打湿不了自己的衣服，但是可以时时蒙受其德风的滋润，不知不觉地也使自己的德行有所提升。这就是“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道理。

《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说：“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君主很昏暗，而臣子又阿谀奉承。君主昏暗没有智慧，就不能够识别人才，而臣子还一味地讨好、巴结他，不为他指正过失，他的危亡马上就来到了。这指出了谀臣的危害。古人说：“自知者明，知人者智。”如果领导者没有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的智慧不够，还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这样的人就很容易被蒙蔽，自己的智慧也不能得以增长，就容易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三曰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

者，奸臣也。”这样的人的心中实际上是阴险邪僻，但是外表表现出来却谨小慎微，花言巧语。致饰于伪善，表面上给人一种很和善的感觉，其实内心嫉贤妒能。对于他要举荐的人，就大大地宣扬他的美德，而隐藏他的过恶。对于他要罢退的人，就大大地宣扬他的过恶，而隐匿他的美德。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能施行。这样的人被称为“奸臣”，奸猾狡诈，就像狐狸一样。

“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这样的人智慧足以文过饰非，口才足以到处游说，在宫内可以离间君主的骨肉至亲，在宫外因为他的妒忌，可以使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称为“谗臣”。

“五曰专权擅势，以为轻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这样的人独揽大权，自己说了算。巴结权贵，结党营私，为的是使自家富裕。擅自篡改君主的命令，为的是使自己显达、富贵，这样的人是“贼臣”。贼臣控制欲望很强，为了控制别人，居然敢于擅自更改君主的命令，目的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让别人畏惧、听从。

“六曰谄主以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使国家灭亡的臣子有什么特点？用邪曲不正的道理谄媚君主，陷君主于不义。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蒙蔽君主的视线，使君主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使君主的恶名传布于国内，闻于四邻，这样的臣子被称为“亡国之臣”。像赵高，为了独断专权，就劝导秦二世只听他的声音，而不要经常见其他臣子，这样才能保持君主的威严。结果秦二世听信了他的话，不再经常上朝，最后导致赵高指鹿为马、独揽大权，秦二世也被蒙蔽。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任用的都是像赵高、易牙这样的亡国之臣，必然使国家陷于危亡之境。

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

《说苑》提醒道：“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贤臣以“六正”的原则处身立世，而不走“六邪”之路，因而上能使国家安定，下能使百姓得到治理。自己活着的时候，能够安享快乐，死了之后，也会被人们追思、怀念，这才是做人臣的道理和方法。

领导者如果学了《群书治要》，就可以明辨什么是真正的忠臣、良臣、圣臣、贤臣，也知道什么是贼臣、亡国之臣。而作为被领导者，也要做正事，以“六正”的原则来处世，这样才能声名显立、垂范后世，而不会身败名裂。现在，一些权贵之人之所以走上了腐败之路、不归之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唐朝李商隐总结历史兴衰成败的规律，在《咏史》中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总结历史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的教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乃至于一个家庭，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就是因为勤俭。而后来之所以衰落，就是因为人们过上了奢侈浪费的生活，以至于入不敷出。所以一个家庭再有财富、权势，也抵不上一两个败家子去破败。

古人说“至要莫如教子”，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把儿女教导好。对于国家而言，要培养后继的人才，就必须读圣贤书。如果世界各国、各党、各级领导者都能够学习《群书治要》，就可以达到见和同解。大家的意见、思想一致，都以孝来治天下，都有一体的观念，这个世界还会有冲突、矛盾吗？领导者尽到君道，能够起到君亲师的责任。被领导者能够竭忠尽智，发挥自己的才能，把本分尽好，这样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就能处理好了，两者也就成为一体的关系，而矛盾、冲突也能在学习的过程中得以化解。

第三十四讲

尽忠劝谏



上下相亲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孔子说，君子在侍奉国君，上朝为官时，总想着尽忠职守，为天下人谋福利；退朝居家时，总想着补救自己的过失。如果国君有美德善行，一定顺势促成；对于国君的过恶，一定要帮助他匡正、补救，能尽心尽力做到这样，那么君臣上下必能同心同德、相亲相爱。

“进思尽忠”，“进”有几重含义：第一是入仕，每日进入朝堂，身在君王之侧；第二是被加官进爵、被提拔重用时，君子都要考虑如何尽忠，全心全意、尽善尽美地做好忠君之事。君子在朝为官或者被提拔重用，不是为了自私自利、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怎样在更高的平台上，更好地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千字文》中讲：“孝当竭力，忠则尽命。”所谓的“尽命”，就是全心全力，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东汉大儒马融仿效《孝经》写了一部《忠经》。在这部书中，他详细谈论了忠君之事。首先要知上，不仅要知道君主、长上的脾气性格，还应

该知道他的胸襟和抱负，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侍奉君主、长上。假如是在地方做父母官，尽忠就表现为尽心尽力地爱护老百姓，把当地治理好。作为父母官，要把教化人民摆在第一位，因为唯有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才能够使人们心安，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在隋朝，有一位官员叫梁彦光。他去相州做刺史，刚到相州时，他感到这里的人比较险诈，民风不好。作为一名地方官，他看到百姓的这种状况，不仅没有指责、轻视、嘲笑，反而生起怜惜之心。“人之初，性本善”，因为这里的人没有受过教育，所以才会言行偏颇，这样的人生实际非常可悲。梁彦光看到这种情况，马上请了很多有学问的大儒设立学校，教化百姓。“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他明白要教化百姓，必须首先尊师重道。为了保护百姓的思想观念不受污染，他还规定，在当地只能传播圣贤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里社会风气大变，形成重视礼义廉耻、伦理道德之风。

有一个人叫焦通，不孝敬父母，结果他的堂兄弟告发他，请官府治他的罪。梁彦光没有马上治他的罪，因为“不教而杀，谓之虐”。还没有教育他、告诉他做人的本分和道理，犯了错误就处罚他，这就变成苛虐了。梁彦光把他带到孔庙，恰巧在孔庙当中有一幅画讲的是“伯俞泣杖”的故事。梁彦光给焦通讲，有一次伯俞的母亲打他，伯俞痛哭。他的母亲感觉到很奇怪，他从小到大犯了错，母亲处罚他，他从来都没有哭过，这一次不仅哭了，而且还痛哭流涕。母亲就问他：“你从来都不哭，为什么我今天打你，你这样伤心地哭？”伯俞回答得很感人，他说：“以前您打我的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到痛，但是今天您打我的时候，我已经感觉不到痛了，说明您年纪大了，身体愈来愈弱。不知道自己还能孝养父母多长时间，一想到这儿，我就很难过，所以才痛哭。”

梁彦光把这个故事娓娓道来。焦通听后，开始忏悔反省，最后痛改前非，成为当地的善人。所以地方官尽忠职守的一个表现就是要爱民、要

教化人民，使这个地方的百姓都受到圣贤教育，这可以影响好几代人。

教育的功德是无量的。因为受教育的人有父母、校长、企业家，这些人接受了圣贤教诲，学习了《弟子规》，自己的人生就得以改变。一个校长的背后有多少教师，一个教师的背后有多少学生，一个学生的背后有多少个家庭？这些学生以后长大成人，还要生儿育女，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也会成为校长、老师。看似一个人的转变，实际上影响了不计其数的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人尊敬的职业、最有意义的职业之一就是教师。教师教化人民，让人们明白什么是伦理道德。

当然，教人首先要正己。“教”，《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之一，就是孔子。孔子既没有钱，也没有权，但是他的3000多弟子、72贤人跟着他不离不弃。无论他走到哪里，弟子们就追随到哪里。因为孔子所讲的每一句话，他自己首先做到了、落实了，令弟子们特别佩服，特别愿意跟随他学习。所以教人首先要教己，正己才能化人。言教的力量是有限的，身教才能真正改变他人。

“退思补过”，“退”有几种含义：第一是退朝，第二是贬退、贬官，第三是退隐、归隐。“补过”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弥补君王的过错；第二是弥补自己的过失。特别是“退”当贬退讲的时候，一个人被贬官了，不能怨天尤人，要反省自己的过失，想着如何弥补自己的过失，不能能上不能下。中国古人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己被贬官一定是有自己的原因，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怨天尤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可能使自己的人生走上更加错误的道路和方向。

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就是顺势促成君主的美德善行，不能随顺君主的恶行。对于君主的恶行要劝谏、匡正。小人作为臣子时，出于自私

自利之心，就会一味地顺从君主的恶行。

忠臣却恰恰与此相反。看到君主有过失，不忍心他犯这个过失，一定会极力进谏，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去劝谏君主，这样的人被称为忠臣。因为他没有自私自利的想法，想的不是自己的位子提升，而是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福祉。忠臣这样做了之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上下能相亲也”。中国古人把君臣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体的关系。君臣一体，互相感恩、互相协作，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所以中国式管理最大的特点就是“君仁臣忠”。

《孝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教导臣子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君主，即“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这样才能够达到君臣一体，同心同德。

尽忠劝谏的三种策略

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也；发而进谏，谓之救也；行而责之，谓之戒也。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

——《群书治要》卷四十六《申鉴》

臣子尽忠心向君主劝谏时有三种策略：“一曰防”，即预防，错误还没有造成，就懂得劝谏、制止，这就可能把问题化解于无形之中；“二曰救”，事情开始萌芽、刚刚发生，赶紧补救；“三曰戒”，已经造成错误，再拿这件事来引以为戒，提醒君王。

“先其未然，谓之防”，防患于未然，被称为“防”；“发而进谏，谓之救也”，事情发生了，但刚刚萌芽，就赶紧劝谏，被称为“救”；“行而责之，谓之戒也”，问题已经产生，并造成了消极影响，再拿这件事情来

批评、提醒、警戒，被称为“戒”。从这方面讲，“防”是上策，“救”是中策，“戒”是下策。

《群书治要·桓子新论》中记载，淳于髡来到邻居家，看到邻居家灶台上的烟囱建得非常直，而柴火就堆在灶台的旁边。于是，他就提醒邻居，这样恐怕会引起火灾，并建议邻居把烟囱做得弯曲一些，将柴火搬到远离灶台的地方，但是邻居没有听。

后来邻居家果然发生了火灾，烧到旁边堆放的柴火，房屋也烧着了。邻居们都赶来救火。火被扑灭之后，邻居家的人便开始杀羊摆酒，犒劳这些帮助他们救火的人。火灾发生之后，邻居也懂得了要把烟囱做得弯曲一些，把柴火也搬离了灶台。但是邻居仍然不肯请淳于髡来饮酒吃饭。所以有智慧的人就讥讽他“教人曲突远薪，固无恩泽，焦头烂额，反为上客”。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智慧，便分不清孰轻孰重，本末倒置。

“盖伤其贱本而贵末”，一般的人都忽略了做事的根本。本应以预防为主，火灾根本就不会发生，而不是等火灾发生之后再去救火。一旦发生火灾，造成的损失已无可补救。但是人们往往看重的是问题出现以后的处理，反而觉得这些帮助救火的人特别有功。这就是看事情目光比较肤浅，看到的都是眼前之利。“岂夫独突薪可以除害哉”，难道只有曲突徙薪可以消除灾害吗？这个道理可以延伸到方方面面，譬如治国、治病都是如此。“而人病国乱，亦皆如斯，是故良医医其未发，而明君绝其本谋，后世多损于杜塞未萌，而勤于攻击已成，谋臣稀赏，而斗士常荣。”良医应该是医未病，而不是医已病，病还没有形成，就注重预防。真正圣明的君主，也应该是从根本上杜绝动乱。动乱的形成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人心还没有偏颇的时候，就把他教育好、导归正途，哪里还可能产生后面的动乱？后世往往忽略了防微杜渐的重要性，都觉得祸患形成，带兵去平乱的将军功劳最大。那些事先就已经提出要防微杜渐的、有智慧的臣子却没有受到奖赏。这就叫“谋臣稀赏，斗士常荣”。

“犹彼人殆失事之重轻”，现在人看待问题，都看不清楚本末轻重。“察淳于髡之预言，可以无不通”，通过淳于髡这个例子，可以举一反三。各行各业处理任何问题，都要能够做到防微杜渐，这才是处理事情更高明、更节省成本的做法。“此见微之类也”，这是能够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里讲到“良医医其未发”，真正好的医生都是治未病，不治已病。《群书治要》中记载着关于扁鹊的一个故事。魏文侯听说扁鹊的医术非常高明，有一次把他请来，向他请教道：“寡人听说你有两个兄弟，也是医生。那么你们三兄弟究竟谁的医术最高明？”扁鹊回答说：“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因为他在病人的病隐伏未发的时候，就能够给以对治，病人就不可能得什么大病，但是他的名声出不了病人这一家内，只有病人的一家人知道他医术高明。我的二哥医术其次，他是等病人的病有小小征兆的时候就给以对治，这个病人也不会得什么大病，他的名声却出不了病人所居住的这一条街。我是三个兄弟中医术最差的，我的名声却传遍了整个诸侯国。因为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不得不采取一些大的手段，钳开他的血脉，给他针灸，再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把他从死亡线上救回来。大家都非常佩服我，认为我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复生，所以我的医术最差，名声却最高。”

由此可见，中国古人的智慧之一就有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但是一般人看得不够深远，误以为中医没有西医高明，中国的管理方式不如西方的管理方式有效率。实际上，中国古人的智慧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中国古人为什么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为什么在治国的时候强调“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原因也就在这里。《大戴礼记》中提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通过伦理道德教育把人都教好了，使人根本就不去犯罪，这比等人犯罪之后再通过法律给以惩罚要好得多。

在周成王、周康王统治的成康盛世时，“囹圄空虚，刑措不用”。监

狱都空了，根本没有犯罪的人。他们依靠什么方法达到这样的治理境界？依靠的就是伦理道德教育，使几十年里都没有死刑犯。此外，历史上还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它们的兴盛，也跟伦理道德的教育息息相关。

古人讲“刑期于无刑”，设计刑罚的目的，并不是用刑罚去处罚人，而是希望达到没有必要使用刑罚的结果。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我当司法官员去审理诉讼时，和一般的司法官员没有什么不同，也是根据双方诉讼的实情，公平地加以审判。但是我与一般的法官不同之处，就是一定要让人们不起争讼。为什么能使人不起争讼？那就是要避免孔子所说的“不教而杀谓之虐”。首先要让人明了伦理、道德的道理，人人都受圣贤教诲，人人都有羞耻之心，人人都不愿意也不敢去犯错，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淮南子》中写道，孔子培养的弟子有3000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这是靠教育成就的。所以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关键就看我们有没有去教育、会不会教育。

侍于君子有三愆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侍于君子有三愆”，“愆”指过失。“君子”是指才德出众的人，或者是在位的君主。年少者侍奉长辈、老师、领导等时，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怎样才能做好？如孔子的弟子颜回所说：“博我以文，约之以礼。”

也就是说，要在学礼上入手。“礼”就是平常生活的规范。侍奉君子、侍奉有德有位的人与侍奉普通人不同，要从学礼做起。而最基本的礼就是《弟子规》。所以中国古人上学先学念诵，“口而诵，心而惟”。口里念诵，心里研究，必须口里念熟，才能够在生活上随时提醒。为什么需要把《弟子规》背诵下来？背是前提，做是目的，就是要在生活的每一个境界中，都能时时践行《弟子规》的教诲。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话未到当说时而说，被称为“躁”。郑康成批注：“躁，不安静也。”君子还没有提问，自己就先说，这就是犯了心浮气躁的过失。“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话当说而不说，被称为“隐”。“隐”，就是隐匿不尽情实。君子已经提问，就应该把话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如果君子提问，你还不说，这就是犯了隐匿之过。“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没有观察到君子的颜面就说话，被称为“瞽”(gǔ)。《论语集解》周先烈批注中这样讲：“未见君子颜色所趋向，而便逆先意语者，犹瞽也。”“颜色”就是表示意向，与人说话的时候要看君子的意向而说。不看君子的意向而说，就像盲人说话而不看对方，大为失礼，所以也是过失。《孟子》说：“王顾左右而言他。”这说明孟子在和齐襄王讲话的时候，非常注重察言观色。“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也就不再说下去了。

这三种过失，不仅不能对君子犯，对任何人都不能犯。强调“侍于君子有三愆”，是因为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进德修业、学为君子。这就需要见贤思齐，常常亲近那些有德的君子之人、善知识，向他学习。如果不能善学，即使有幸遇到大德君子，不懂得如何应对进退，就会犯下很多过失而不自知。“躁、隐、瞽”，是一般学人侍奉善知识、侍奉君子有德者，经常容易犯的过失。有了这些过失就很容易错失提升德业的大好机缘。

人向善知识、向君子大德请教的时候，主要是以言语表达。表达的时候要不躁、不隐、不瞽，这样才是侍奉君子之道。

做一个称职的学生，就要做到安而不躁、诚而不隐、敬而不瞽，即

《礼记·曲礼》所讲的“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一个人如果心存恭敬，这几个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能够做到。

言而见用，终身无难

景公问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悦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贵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其说何也？”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谋而不从，出亡而送，是诈伪也。忠臣也者，能纳善于君，而不与君陷于难者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三《晏子》

齐景公向晏子询问道：“忠臣应该如何辅佐国君？”晏子说：“国君有危难的时候，忠臣不跟着去死，也就是不跟着国君共赴劫难；国君如果出外逃亡，忠臣都不去送行。”景公很不高兴地说：“国君把地分封给大臣，让他们富足，还封给他们爵位，让他们尊贵。国君对大臣这么好，大臣居然在国君有难的时候，不跟国君一起共赴患难，而且国君逃亡的时候大臣连送都不送，这是什么道理？”晏子说：“如果忠臣给予的谏言被国君采纳了，国君一生都没有危难，忠臣何需送死？”就像上面讲到的“劝谏”，“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忠臣有智慧的表现是，在灾祸还没有形成之前就防患于未然，甚至稍微有一些迹象，就可以把错误弥补过来，把问题化解。所以当然是“言而见用，终身无难”。

然而国君更关注的问题是，在自己有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肯陪自己一起逃亡。这是出于情感上的考虑，而没有理智地进行分析。国君应该想着如何把国家治理好，如果国家衰败到连国君都要逃亡的地步，应该惭

愧至极才是。所以作为领导者，他对此着眼的不应该是情感，而应该是理智，只有运用智慧，才能洞察先机，防微杜渐。这其实也是晏子在提升齐景公看待事情的智慧。

晏子接着说：“若言不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如果大臣的谏言不被采纳，结果国君有危难了，还跟着去死，那是盲目地白白送死。“谋而不从，出亡而送，是诈伪也。”臣子进献了很多谋略，结果国君都不采纳，最后国君出逃的时候，臣子还去送行，这样的行为就是虚伪。“忠臣也者，能纳善于君，而不与君陷于难者也。”所谓忠臣，就是能够向国君进献善言，能够提早引导国君看到问题的根本、问题的迹象的人，然后将问题化解，而不是与国君一起陷入危难的境地。

这一段对话，说明晏子劝谏非常善巧。他用一个反话让齐景公感到很惊讶，接着再讲出其中的道理，让齐景公终生不忘。

第三十五讲

举荐贤能



进贤为贤

子曰：“……汝闻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子贡曰：“进贤贤哉。”子曰：“然。”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孔子说：“你知道是努力做事称为贤明，还是举荐贤才称为贤明呢？”子贡说：“举荐贤才才是贤明。”孔子说：“对。”

《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贡来请教孔子，问道：“今之人臣，孰为贤乎？”意思是说，现在各个诸侯国的臣子，哪一个可以称得上贤明的？孔子回答说：“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则贤者矣。”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子皮，可以称为贤明的臣子了。

子贡听了就大惑不解。因为当时在齐国有管仲担任宰相。他非常有能力，曾经协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且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在郑国也有子产任宰相。在《史记》中记载，子产治理郑国，达到了“不能欺”的境界。因为他把法律、监督机制都设计得很严密、合理，而且也重视道德教化，使郑国变得非常强大。所以子贡就问：“齐国没有管仲，郑国没有子产吗？他们都不算贤明的臣子吗？”孔子说：“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赐”是子贡的名。古代非常尊师重教，男子行成年礼之后，只有他的父母和老师可以称他的名，其他的人都要称他的字，表示

对他的尊重。即使他到皇帝那里做官，皇帝也要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重。这说明，只有父母和老师的恩德是最重的。“汝闻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用力”就是指使用力气、花费精力。你听说是出力的人算是贤明的，还是能够举荐德才兼备的人是贤明的？子贡说：“进贤，贤哉。”意思是说，能够举荐人才的人，才能够称得上贤明。孔子说：“对，我听说鲍叔牙举荐了管仲，子皮举荐了子产，鲍叔牙能够让管仲显达，子皮能够让子产显达，但是却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推荐了比自己更有才能的人。”

自己能做事的人，不能算是贤臣。真正贤明的臣子，是能够为国家、领导推荐比他更有能力的人，而且大公无私，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私利，更没有担心别人的位置、俸禄超过自己。这样的人是有公心的人，是为国家、领导、大局考虑的人。鲍叔牙一心为国家、为齐桓公着想，把自己的朋友管仲推荐出来做宰相。这个宰相的位置本来是鲍叔牙自己的，但是他知道管仲的能力比自己强，所以他才把管仲推荐给齐桓公。管仲果然不负所望，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霸主。鲍叔牙的后代中十几世都是齐国的名大夫，他的德行庇荫了他的后代。所以古人说：“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能够为国家举荐贤才的人，受到上天最丰厚的赏赐；而嫉贤妒能的人，也受到上天最严重的处罚。古人说“文人相轻”，这句话实际上说得并不绝对。这个“文人”是指没有学习力行《弟子规》的文人，是“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的人。如果真正从小力行了《弟子规》，知道“善相劝，德皆建”，别人有善事，我们还劝勉、鼓励、成就人，这样，别人的成就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就。真正能够做到“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才是一个正常人的心态，这叫同情心，即与别人有同样情感的心。别人有所得，就像自己有所得一样高兴；别人有所失，就像自己有所失一样难过，这才叫同情心。

古人知道，人免不了嫉妒之心，因此就从制度上来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教诲，而且还用各种措施提醒人们要进贤。譬如说，

古人为官者戴的帽子叫“进贤冠”，后边的比前边的要高，时时提醒其要为国家举荐人才。假设为官者从来没有举荐过人才，就是失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个人即使再有能力，也只是一人的才能而已。但是如果他懂得识才、选才、惜才、爱才，那么他一生为官，可能会帮助国家举荐几位甚至上百位人才。这么多德才兼备的人才都来为国家效力，对治理国家会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

从圣贤人的传记中，确实能够感受到他们为国家效力的公心。譬如，范仲淹、林则徐等，随时都有一本记录人才的本子，不失时机地为国家、民族举荐贤才。孟子讲道：“为天下得人谓之仁。”一个人的仁慈之心就表现在他时时想到为国家、百姓举荐贤才，使德才兼备的人出任领导者。

在《韩诗外传》中记载着楚庄王与樊姬的故事。有一次，楚庄王和朝臣商议国事，商议得很久，结果回来很晚。樊姬还在等候他，见他回来，就问道：“今天大王为什么下朝这么晚？”楚庄王说：“寡人今天和那些忠贤之士议论朝政，议论得很高兴，结果忘了吃饭，也忘了时间，就回来晚了。”樊姬问道：“请问大王，大王所说的忠贤之士是我们诸侯国之内的人，还是其他诸侯国的人？”楚庄王说：“寡人所说的忠贤之士就是沈令尹。”樊姬一听楚庄王说的这个忠贤之士是沈令尹，禁不住掩口而笑。楚庄王一看就问：“樊姬，你笑什么？”樊姬说：“自从臣妾有幸能够侍奉大王，臣妾何尝不想得到大王的专宠？但是臣妾还是到处去寻找那些德才兼备的女子，来辅助臣妾治理后宫。现在这些人，地位和我相同的有10人，而地位超过我的有两人。但是沈令尹当了令尹之后，从来没有为大王推荐过贤德之人，也没有罢黜过不贤德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称得上忠贤之士？”楚庄王一听深受启发，觉得很有道理。后来他就把樊姬的话说给沈令尹听。沈令尹很聪明，听后马上就为楚庄王举荐了孙叔敖。孙叔敖很有能力，他治理楚国不久，就使楚庄王成为一代霸主。历史上说，楚庄王之所以能够成就这样的霸业，也是因

为樊姬的功劳。

由此可见，忠贤之士就是不嫉贤妒能的人，而且他们愿意举荐德才兼备的人为国效力，这样国家才能愈来愈兴盛。这样的人确实没有私心，他们大公无私、厚德载物的精神，令人敬佩。

忠臣举贤，不避仇雠

忠臣之举贤也，不避仇雠；其废不肖也，不阿亲近。

——《群书治要》卷四十《韩子》

《群书治要·韩子》中记载着一则故事，说明举荐贤才要根据他的才德，而不是根据他与自己关系的亲疏。即要“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这个故事讲的是解狐和邢伯柳之间的故事。有一天，赵简子问解狐道：“谁可以做上党的地方官？”解狐回答说：“邢伯柳可以胜任。”赵简子很奇怪，就问：“这个人不是你的仇敌吗？”解狐回答：“忠臣之举贤也，不避仇雠；其废不肖也，不阿亲近。”这个“仇雠”，就是指仇人、冤家对头、仇敌。“不肖”，就是不成才或不正派的人。“阿”就是徇私、偏袒的意思。他说：“我听说忠臣举荐贤才不回避自己的仇人，废黜不肖之人也不偏袒与自己亲近的人。”赵简子听后很称赞解狐，于是任命邢伯柳为上党的地方官。

邢伯柳知道是解狐推荐了他，就亲自去解狐那里表示感谢。结果解狐说：“举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异日。”意思是说，我举荐你是出于公心，因为你有能力胜任这个官职。我怨恨你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私仇。你回去吧！我还是像从前一样怨恨你。

《弟子规》中说：“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虽然解狐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他有公心荐贤，而且能够做到不以私害公，不借机会公报私仇，已经非常难能可贵。

